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反华言論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 內 部 讀 物 ·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反华言論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園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五) 1.90 元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4\frac{1}{2}$ · 字数 338,000

1965年12月第一版 1965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761

出版者說明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7 月 14 日給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領導屈从苏共領導的指揮棒，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运动。据不完全的統計，到 1964 年 7 月，已經有六十个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其中包括这些党的中央的決議、声明和公报，主要領導人的报告、講話和文章以及党报党刊的社論等等。这些言論，象苏共領導和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論一样，信口开河，造謠誣蔑，內容荒謬絕伦，言詞粗野恶毒，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我們的黨員，我們的人民，了解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了解这些党的領導怎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現在象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論》一样，将这些党的主要反华言論輯为专集，陸續分册出版，以供讀者閱讀利用。

本书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自 1963 年 7 月 15 日至 1964 年 10 月 14 日的材料，共計七十六篇。书中的小标题、异体字和着重記号等等，都是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目 录

《紅色权利报》社論：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們团結的坚定不移的基础…………… 1

埃夫任·帕隆齐：

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节譯)……………13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7 月 19 日就

苏共中央致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員的公开

信发表的声明……………23

《紅色权利报》社論：

我們坚定地捍卫着国际主义团結的旗帜……………30

《党的生活》杂志社論：

坚定不移地为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原則而斗争……………34

《紅色权利报》：

奇怪的邏輯的繼續……………38

伊瑞·霍赫曼：

同“狂人”坐在一条板凳上……………41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授权捷克斯洛伐克

通訊社发表的声明：

我們完全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45

《紅色权利报》社論：

苏联共产党——先鋒队、朋友和战友(节譯)……………50

安托宁·彼特里納：	
希望最初的牺牲者也是最后的牺牲者(节譯).....	52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問題.....	54
M·馬德尔：	
广島大会和它的阴影.....	67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現时代与国际工人階級的策略.....	69
《紅色权利报》評論性报道：	
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声明摘要.....	86
茲德涅克·布拉达奇：	
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88
《紅色权利报》社論：	
明确的政策——安全的保证.....	104
捷克斯洛伐克通訊社关于新华通訊社布拉格分社的通知.....	109
伊瑞·亨德利赫：	
社会主义的成就是革命发展的强大因素.....	111
揚·弗拉納：	
巩固和平的重要步驟(节譯).....	119
《紅色权利报》：	
誰有理由憤慨?	123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3 年 8 月 31 日向高等軍事学院	
毕业生的講話：	
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我們时代的根本問題	
(节譯).....	126
阿历山大·杜布切克：	
自給自足还是社会主义合作.....	128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最迫切的任务——防止世界热核战争·····	133
弗拉基米尔·考茨基在捷国民议会上的发言	
(节译)·····	151
帕维尔·馬霍宁：	
社会主义社会和阶级斗争·····	153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3 年 9 月 22 日在布尔諾捷苏友好	
大会上的讲话：	
我們是为和平共处而斗争的列宁主义政策一贯的	
拥护者(节译)·····	169
雅洛斯拉夫·馬杰伊卡：	
現时代的性质是怎样的·····	171
茲比涅克·馬雷克：	
为了和平，为了社会主义·····	182
茲比涅克·馬雷克：	
十四年以来·····	187
弗拉基米尔·彼得：	
争取和平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节译)·····	190
埃夫任·帕隆齐：	
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	200
《党的生活》杂志社論：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节译)·····	210
茲德涅克·姆利納士：	
全民国家——列宁主义的概念(节译)·····	214
弗拉基斯拉夫·弗拉納：	
裁軍和反帝斗争·····	218

弗朗基舍克·克拉托赫維尔：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反对个人迷信的	
斗争和忠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	235
弗朗基舍克·克拉托赫維尔：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方针的	
意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249
弗拉基米尔·克雷赫列尔：	
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节译)……………	265
雅洛斯拉夫·克諾布洛赫：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之前……………	267
《紅色权利报》社論：	
团结为和平而斗争的力量(节译)……………	271
《新思想》杂志社論：	
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节译)……………	272
米洛斯拉夫·莫茨：	
现实(节译)……………	274
伊瑞·霍赫曼：	
在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会议上谈了些什么(节译)……………	275
《紅色权利报》記者报道：	
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阿尔及尔会议结束(节译)……………	277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4年4月5日在中斯洛伐克州	
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在党和人民牢固的团结中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	
进一步发展而斗争(节译)……………	280
《党的生活》杂志社論：	
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287

《紅色权利报》社論：	
本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团結起来……………	295
弗拉基米尔·考茨基 1964 年 4 月 8 日在捷科学院全体	
會議上的講話：	
党的科学和意識形态工作(节譯)……………	300
捷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形势的声明……………	301
茲德涅克·布拉达奇：	
在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結起来……………	305
——团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弗拉基米尔·考茨基 1964 年 4 月 21 日在捷共中央、捷共	
布拉格市委会和中捷克州委会举办的紀念列宁誕生九	
十四周年晚会上的报告：	
学习列宁，在每天的工作中发展他的遺訓(节譯)……………	314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我們时代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首領們的民族主义理論	
(节譯)……………	320
《紅色权利报》社論：	
战斗的国际主义和內部团結的节日(节譯)……………	330
伊瑞·弗拉涅克：	
将会来的……！(节譯)……………	331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誰正在走上分裂的道路……………	332
楊·沃依吉克：	
不体面的干涉方式……………	349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4 年 5 月 28 日在捷共工厂党組織	
主席全国代表會議上的报告：	
把为实现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決議的一切力量	
团結起来(节譯)……………	355

米洛斯拉夫·施奈德：	
兄弟党譴責中共領導人的分裂活動……………	363
波胡斯拉夫·拉什托維奇卡 1964 年 6 月 17 日在波蘭	
統一工人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我們完全贊同蘇共的立場(節譯)……………	370
約瑟夫·列納爾特 1964 年 6 月 23 日在捷新選出的國民	
議會會議上的報告：	
政府聲明(節譯)……………	371
拉基斯拉夫·托馬謝克：	
宗派主義的哲學論據……………	372
雅洛斯拉夫·季維士：	
談中共領導今天的行徑的某些原因……………	386
瓦茨拉夫·霍拉克：	
中共的“三面紅旗”政策……………	394
阿·彼特里納：	
奇怪的撮合……………	409
《紅色權利報》社論：	
中國的首領們正在加劇挑釁……………	412
茲比涅克·馬雷克：	
廣島和東京……………	417
《紅色權利報》社論：	
爭取團結的不可推卸的責任(節譯)……………	420
安托寧·諾沃提尼 1964 年 8 月 27 日在歡迎蘇黨政代表	
團的捷蘇友好大會上的講話：	
同蘇聯的友誼是我們的最大保證(節譯)……………	424
安托寧·諾沃提尼在蘇捷聲明簽字儀式上的講話(節譯)……………	426

《紅色权利报》社論：	
牢不可破的友誼的证明(节譯).....	427
尔：	
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反对沙文主义.....	428
《紅色权利报》社論：	
国际會議的迫切性.....	433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4 年 9 月 21 日在铁托举行的宴会	
上的講話(节譯).....	437
安托宁·米哈雷克：	
在兄弟般的团結中(节譯).....	438
波胡斯拉夫·拉什托維奇卡在紀念第一国际一百	
周年晚会上的講話：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今天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节譯)...	440
米：	
中国人民的节日.....	444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4 年 10 月 2 日在匈捷友好大会上	
的講話：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友誼和合作是牢固的并正在	
順利地发展着(节譯).....	446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們团結的 坚定不移的基础

《紅色权利报》社論

昨日在刊登中共中央(今年6月14日)致苏共中央信的同时,我們刊登了一个特別重要的文件——苏共中央致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

这个文件是在富有特点的情况下发表的。众所周知,苏共中央在今年1月建議停止由于中国同志的罪过而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公开論战,中国同志从1960年以来就公开地攻击苏共及其他共产党。这一停止在报刊上的公开論战、不公布观点上的分歧和不使中共同其他共产党之間的关系尖銳化而是在共同的會議上实事求是地判断情况的建議,曾受到所有党的欢迎。同时也就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談达成了協議。

但是,滿嘴口头保证,說他們最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中国同志,却采取了只能够把它看作是有意識地企图加深观点上的分歧和为同志式的会談——分歧可能在这些会談中消除——設置新的障碍。就在已經达成关于苏共和中共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談的協議,并已指定了代表团和确定了会談日期的时候,几乎是在会談的前夕,他們出乎意料地发表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我們的每个讀者对它都可以作出客观的判断——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提出了新的指責。

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也曾經认为有必要不予以公开答复——無論如何在会談沒有結束以前要这样——而是先在會議上

闡述自己的观点。这是审慎的决定，它证明苏共中央为防止形势尖锐化和分歧的加深而作出明确的、绝对真诚的努力。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同志的这种克制态度和他們避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論战尖锐化的真诚努力，作了奇怪的解释。他們重新攻击苏共，并把苏共中央的忍耐态度說成是軟弱，把它在目前的情况下避免冲突的努力几乎解释为蓄意掩盖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他們完全不顧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友好关系的准則，甚至完全違背国际慣例地开始在莫斯科及苏联的其他城市非法地散发自己的信。不仅如此，他們开始把这封信同其他侮辱各兄弟党的文件一起在全世界散发，并用捷文也在我們这里散发。当向他們的官方人士指出这种行为是不能容許的时候，他們曾示威性地宣称，他們认为繼續散发这封信是自己的权利，中共中央7月10日的新声明也确认了这种权利。

这一切都迫使苏联同志公开地予以答复，首先是向自己的党組織和自己国家的全体党员介紹事实情况。已不能够再繼續沉默下去了。中国同志开始为所欲为地行事了，就好象其他党只是为了在这里听取他們喋喋不休的劝告和他們向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籠統地和断然发布的指示。

如果有人提出好的建議，最終还是需要听取他的。但是每个只要讀过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件的人，感到吃惊的不仅是它的傲慢声調，它的不加选择的詞句，对现实及客观事实的毫不顧忌，它粗暴地对苏共及其他共产党提出的最荒唐的指責，而且首先直接惹人注目的是，它不断地強調“革命路綫”，反对“有些人的”莫須有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綫。最后他們还把一切解释成似乎今天只有中国同志（同他們一起的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众所周知，較长时期以来他們已在大声地說出中国同志不好意思說出口的东西）自己始終不渝地捍卫“革命路綫”，似乎整个共产主

义运动都主张所谓的“机会主义的路綫”。

凡是讀过中共中央的信的人，都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問題：这种沒有根据的批評和誹謗意味着什么。要知道，这封信的作者，甚至于在进行“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这种指責之后也沒有停止誹謗。

* * *

情况表明——在苏共中央的信中以完全实事求是的方式，并在心平气和的、深刻的理論論据的基础上证实了这一点——这远远不是某种經院哲学式的爭論，不是在給这些或那些概念下定义时产生的分歧，不是对这种或那种提法的不同理解，而是关系到各国人民最切身利益和当前生命攸关的問題。正如苏共中央信中所指出的，这是战争与和平問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問題，这是与个人迷信思想和实践作斗争的問題，这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問題。

对所有这些問題，苏共中央都重新表示和闡述了自己的列宁主义概念，这些概念是完全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解释相吻合的。苏共中央的信，是苏联同志以心平气和讲道理的方式，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不移的基础上解决分歧問題而努力的新的证明，它再次证实，苏共在闡述自己的观点的同时，首先致力于克服观点分歧和为我們的运动的牢固团结創造前提。

首先关系到的是战争与和平問題。无论这是怎样地会使人感到难以置信，但对中国同志來說，爭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是某种可以推迟到明天，可以用一般性的声明应付过去的次要的东西，是某种他們认为甚至违背革命运动利益的东西。对他們說来，为阻止热核战争和使帝国主义者不致挑起这种战争而作的努力，是某种和“机会主义”及“修正主义”等同的东西。說什么有人不断地过高估計氢弹——据他們看来这只是“紙老虎”——的力量，說什

么有人由于害怕这些炸弹而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让步”和“投降”！说什么有人把和平共处看作“包罗万象、不可思议的天书”和从而想回避“斗争”！说什么有人离开阶级的革命立场，因为他致力于消除战争，致力于全面彻底裁军，说什么由于这而阻碍革命斗争！

对共产党人来说，争取和平的斗争从来也不是对侵略者的和平主义让步。今天，在世界上没有人怀疑苏联在击退帝国主义侵略者方面的技术和全面准备。我们的人民也在准备着抵御对我们自身的进攻。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同志怎么能这样地歪曲我们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意义呢。

中国同志同时为他们的观点未被理解而感到惊奇。正如他们所强调的，他们不是反对和平，而是捍卫革命斗争的意义，捍卫与“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头等意义。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把这一斗争作为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的和平努力的论据。他们的主要努力在于证实全面彻底裁军的尝试是“幻想”，证实关于在将来有可能避免战争的看法是“幻想”，证实苏联政府为了确保世界和平而建议的所有具体措施都是“幻想”，因而他们对和平斗争的意义的一般性承认，是空洞的，并且激起——让我们坦率地说——人们对于表示承认这点的人的诚意的一定怀疑。特别是，与此相伴随的是关于“在死亡的帝国主义的废墟上”的“美好的将来”的奇谈。

在苏共中央的信中，对他们的这种立场给予了明确的分析。同时指出对革命运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冒险主义的理解是这种立场的根源。

中国同志强调说，和平共处不能代替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也完全是这样看的。但是关于在“死亡的帝国主义的废墟上”的“美好的将来”的议论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阶级斗争有什么联系呢？为什么这种斗争——如果它正好是阶级斗争的话——应该意

味着是各国人民“对于应在热核武器的火焰中死亡的帝国主义的胜利呢”？中国同志习惯了只谈武装起义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也不能使这种形式的斗争依附于原子炸弹。更不能允许只谈阶级斗争，而不考虑这种斗争正在那里进行着的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观点。如果估计这些国家的劳动者将为自己选择这样的开展斗争的形式，即这种斗争形式会导致群众性地毁灭人们生命、使他们的国家遭致毁坏，而后某人在这些国家的废墟上建设“美好的将来”，这是荒谬的。就是我们的劳动者——他们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捍卫革命的果实和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也不能同意这种假革命的前景。

对未来的想象，能使某些人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是，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能把对共产主义未来的到来的设想，与热核战争的恐惧联系起来，“输出世界革命”的冒险主义企图必将导致这种战争。一切关于“机会主义”的指责，以及全部关于某人“怕死”的阴险暗示（我们想提醒，在这方面这不是偶然的攻击，而是一贯性的运动，不久前它曾迫使我们对关于说什么“背叛了”伏契克的遗训的“现代胆小鬼”的侮辱性议论作了答复）只能有这种意义，即削弱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攻势，将国际革命运动带到冒险和孤注一掷的虚假的轨道上去。

当然，只有对群众的革命力量，对社会主义的力量丧失了信心的人，不相信掌握了政权和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能力的人，在世界上正在壮大着的社会主义的任务的复杂性面前投降的人，才会这样行事。列宁曾强调指出，只要至少建立起几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及工人阶级的国家越出了民族的边界，那么这些国家就将逐步地对整个世界的政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关于这一影响的具体内容的言论也是人们熟知的，即列宁写道，“……我们是用自己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给以主要的影

响……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转到这个方面来了。”这番话是在1921年说的。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确实正在开始对世界的发展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今天，该怎么说呢？那些今天在每一个局部问题上都小心翼翼地引证列宁的言论的人，但在原则性的看法上，却令人奇怪地对列宁的指示和思想视而不见。

当然，这不是偶然的。情况表明，中国同志不相信革命的前景，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有能力在经济竞赛中打败资本主义，不相信我们思想的力量。苏共中央的信在谈到他们的这种立场时说：“他们想通过另一些在他们看来更为近便的途径来更快地实现革命。但是，胜利了的革命能够以人民的劳动，并且只能够以人民的劳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诚然，这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革命如果是在继承了过去经济不发达的遗产的国家中进行的话。但是，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令人信服地表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就能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事物的逻辑是铁面无情的。当中国的领导人踏上与他们所独特理解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道路上时，他们不能不陷入到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某些基本要求以及同党的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的矛盾之中。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进行辩护的顽强努力和他们在这方面对二十大路线的攻击是与他们的整个态度相联系的。

整个国际革命运动都把二十大的列宁主义方针作为自己的方针——中国领导人自己当时也曾经强调过它的无限意义——这不仅仅因为它对国际革命运动现阶段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这次代表大会所揭露和谴责的斯大林个人迷信，曾有自己的

国际性的后果。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在所有共产主义的和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活动中彻底恢复列宁主义原则的起点。国际革命运动为自己今天的强大发展而感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揭露个人迷信和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各国共产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增长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威望提高了。但中国同志装着好象这是相反似的。他们攻击苏共綱領，攻击它的根本思想，并力图用反对全民国家和反对苏联的全民性质的理論性攻击作为自己的“反机会主义的”战士的立場的根据。

他们不顾社会的发展，不顾在苏联早已消灭了剝削阶级以及正在建設共产主义的苏联社会是友好的社会主义阶级——工人和农民以及知識分子——的社会这些事实，想把“阶级斗争”强加于苏联的社会。尽管他们这样努力地去論证在苏联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但他们完全忘記了解决这样重要的問題，如在共产主义建設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問題。

苏共中央的信还談到一系列其他的問題。例如世界各种革命潮流的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問題。这首先指的是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当前指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无疑，这两个世界运动之間的正确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忘記強調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場。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正好在这个問題上离开这种立場。在他们看来，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也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是民族解放运动。正如苏共中央的信中所确切指出的，中国同志显然想用这种輕而易举的方法討好某些国家的人民。他們的立場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但这对民族解放运动本身來說是非常危险的。

特别是苏共中央信中提出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路綫的主要特点的末尾几段，意味着重大的理論貢獻。規定这些主要特点是以1960年共同举行的會議上所作出的对我们时代的性质的分析和目前革命运动的特殊需要为依据的。这些段落特别是比中共中央的信的一般性的宣言来得有說服力。中共中央的信中規定整个国际革命运动的总路綫的企图沒有超出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普遍的、众所周知的任务的范围。把总路綫只局限在一般的任务上，意味着取消总路綫的目的性和效能。不能够同意这样的路綫。

苏共中央的信中十分清楚地說：“現时代世界革命过程的性质和内容，是由正在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汇合成統一的反帝斗争洪流这点确定的。”苏共中央的信从客观的历史条件——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极度加剧、具有巨大毁灭力量的武器的創造——出发，強調指出，“爭取避免热核战争的斗争在反帝力量当代所面临着的所有任务当中占有中心的地位。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去保卫和平和使人类免于遭到核灾难。”

* * *

中共领导在我们当代的原則問題上，特别是在战争与和平、革命运动同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的关系这些問題上的不正确的态度，正如使所有兄弟党感到不安一样，也使我们的党感到不安。我们完全不能理解这一整个“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的背景和这种“保卫世界革命”的大嚷大叫的进军的背景。但是，令人感到极端遺憾和使每个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看成是不可侵犯的人感到憤慨的是，对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沒有任何根据的攻击。

中国同志沒有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字眼。傲慢无理地談什么“家长制”，“干涉其他兄弟党的内部事务”，甚至談“大国沙文主义的錯誤”，实际上間接地与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的“莫斯科之手”的誹謗相一致。不仅如此，他們还这样来談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国家关系，即好象苏联实行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間已經成为习惯”的关系的制度，好象它在这些关系中力求“損人利己”。

这些荒唐的誹謗沒有任何論据作根据。如果說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們想用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他們对待其他兄弟党的做法普遍受到譴責——喊什么冤，又說什么苏共“把自己的綱領强加給其他兄弟党”，来迷惑沒有判断力的人，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說法的理由就更加无力：即說什么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因为它以国际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給別人”，“破坏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或者“損害兄弟国家人民的利益”。

这种說法不能是别的，只能說是荒唐的誹謗，沒有先例的誹謗。我們直言不諱，对苏联的这种攻击特別触动我国人民。我們感到这种攻击是对我們的侮辱。苏联是我們建設的支柱，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它忘我无私地帮助过我們，現在仍然帮助我們进行建設。

世界历史上确实沒有过这样的先例，一个国家这么大规模地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經濟、科学和技术。每个人都知道，苏联过去和現在給予社会主义国家和年輕的民族解放国家以怎样巨大无私的帮助，現在給予整个革命运动以怎样的帮助。任何其他国家的帮助都是不能与这种帮助——物质的和道义的——相比的。

人人皆知，譬如說苏联怎样大大地帮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共中央的信中列举了关于这种帮助的无数事实。相反地，如果說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出現了某些复杂的情况，这是中国

負責机关的罪过，它們最近几年以来主动地限制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合作和其他方面的合作。我們必須說，我們在我国的經濟中也感觉到了这个事实的不良影响。我們相信，这也对中国人民不利。

如果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遵循本国經濟“自給自足”的原則，这无疑地将意味着社会主义体系各个国家經濟的停滯、整个体系的經濟的停滯、将来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經濟潜力的严重削弱，它在这种情况下未必能够实现自己同正在一体化的垄断資本进行經濟竞赛的任务。

* * *

中共領導人对苏共綱領提出警告。这确实是令人吃惊的，他們的輕率已达到了何等地步啊。怎么能够把这个綱領“强加”給其他的党呢？譬如說，难道我們捷克斯洛伐克应当对于在最近的将来走上共产主义建設的道路这点有所防备嗎？难道我們仅仅因为这是另一个兄弟党已經开始实现理想和原則，就应当放弃共产主义建設的理想及其原則嗎？难道我們应当阻撓把这个綱領的基本思想——建設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加深和发揚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轉变为全民国家和逐步轉变为共产主义自治，用共产主义思想的精神进行教育，等等，等等——运用到我們的情况中去嗎？或者我們应当反对苏共綱領的那些总结了国际革命运动的經驗，規定了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簡而言之，也就是当代反帝斗争的任务的思想嗎？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究竟是怎么設想的——口头上热心于共产主义，但同时在行动上放弃共产主义！不，不能走这条路。

如果說我們党在苏共二十二大之后紧接着宣布，它把苏共綱領当作自己的綱領，那么，这不是因为有誰把这个綱領强加給我們，而是因为它在主要的思想方面，它以自己整个列宁主义的实

质,也表达了我們的願望和目的,也提出了我們最近将来的远景任务。我們將根据我国的需要,根据我国的国内条件运用对各国无区别地都适用的共产主义的普遍思想,这对我們來說是自然而然的。这也不会妨碍我們繼續向苏联同志学习,学习苏共的經驗。

* * *

我們昨天发表的中共中央 6 月 14 日的信件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現在中国同志所承担的义务同他們的行为离开有多远。在这封信中我們也可以再次讀到忠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必須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話。1960 年声明責成每个共产党不要做任何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事,不要采取任何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行动。中共中央信的本身,以及中国同志在會議之前、在达成了停止論战的共同協議之后把它发表出来的事实同声明的要求形成鮮明的对照。

不能这样史无前例地輕視我們运动的团結。我們的团結不能是形式上同意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而是要求革命运动的每支队伍做出加强这个团結的真誠努力。如果引用平等的原則来反对这个团結以及在推行单独的立場来反对多数党的情况下要求这个团結,这都意味着輕視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我国共产党人不能同意这种破坏共同通过的原則的方法。

他們无論如何不能同意在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而斗争的幌子下提出对苏共的完全沒有根据的指責。那些如此喜欢引用声明的人,不能忘記这些話:“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声明: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經驗和久經考驗的队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先鋒队。”

中国同志在声明上签了字。

承认苏共的先鋒作用——这不意味着承认誰的指揮。随便哪

个党的任何統治今天和将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是不起作用的。但是，承认苏共的领导地位意味着受到列宁的党的光辉榜样、它的革命传统、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決議、它的共产主义建設的宏伟綱領、以及它的爭取恢复列宁主义的一貫的、不让步的斗争的鼓舞；这意味着受到它的得到全世界进步人类贊揚的历史斗争以及爭取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的鼓舞。

我們的运动正在經歷着重要的时刻。現在首先是在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把整个世界革命工人运动团結起来。过去产生矛盾和严重分歧的原因，既在于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也在于根据整个运动的客观需要消除分歧的主观能力。我們对迅速地、容易地克服现在的分歧不抱任何幻想。但是这些分歧沒有任何使它們不能获得解决的基础。相反地，我們的目标是共同的，我們的利益在斗争的現阶段也必須是一致的。在我們党的十二大上，我們也強調指出这一点并从这点出发。我們从这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請中国领导同志完全負責地考虑自己的立場，并呼吁他們放弃損害我們团結的不正确的观点。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政策的彻底的国际主义路綫，又把巩固我們运动的团結的任务規定为我們的首要任务。国际革命运动的共同基本利益，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利益——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利益，是首要的和决定性的。

（譯自 1963 年 7 月 16 日捷《紅色权利报》）

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节译)

埃夫任·帕隆齐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民族解放革命 进一步发展的意义

帝国主义者力图利用每一种能贬低和誣蔑社会主义国家的說法，力图降低社会主义国家对前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意义并使他們脱离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合作。

但是，那种自称是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既損害爭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又損害各国人民爭取自由发展的努力的观点是特別危险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同时表示怀疑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各国人民爭取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消除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的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在需要集中全部力量投入反帝斗争的时期，一切削弱这一陣綫、制造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苏联的不信任的尝试，都是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襲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日益更加頻繁和公开地进行的这种尝试，客观上服务于反动力量，并阻碍发展中的国家的进步发展。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就不能順利地繼續进行。

持有这种不正确观点的人宣称，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帝斗争的最革命的和决定性的力量，而社会主义国家据说更多地是在关心如何巩固自己的力量。由此他們也得出結論，說民族解放运动是最坚决的反帝战士，“在一定意义上說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以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成果为转移”，因而就应该承认民族解放运动是为争取人类进步而斗争的主要力量。在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中，大声地唱出了这种虚伪的调子，其目的在于引诱和迷惑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私援助寄予正当信任的各国人民。

同意类似的观点则意味着同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这种说法，即对人类的进步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社会制度，而是经济发展的程度，因而，不是那些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家，而只是那些“贫穷的民族”，也就是说那些刚开始致力于从基础上提高自己的民族，会成为革命的和对人类进步有决定意义的力量。

这决不是否认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意义，也不是否认民族解放运动给予帝国主义的打击是意味着对侵略势力的不断削弱。当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世界发展的主导和决定性力量，这一事实决不是出于主观愿望，而是出自于目前国际形势下的客观的力量对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成果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使人类世代为之而奋斗的理想付诸实现。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社会主义优势日益明显的思想意识领域、政治领域，而首先是在对世界今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领域中，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如果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有了增长，如果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并且在最近期间将居于世界经济的前列，那么，这样就可以为向正在争取完全摆脱殖民主义压迫而斗争的发展中的国家提供最有效的支持和帮助，创造最好的前提。

因此，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企图，即把工业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成是不太“革命的”国家，并且说什么它们因此已不能理解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久以前曾是殖民地或者不平等条约把它们同帝国主义者连结在一起——的问题。

如果領導社会主义国家的是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共产党，而迄今領導民族解放运动的是民族資產階級——正如莫斯科声明所說，“它是动搖不定的，除了具有进步性以外，它还傾向于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那么根据什么能得出上述結論呢？这种說法不正是否认共产党的領導作用嗎？

苏联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认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政策的基本組成部份之一，并且坚决反对其后果将是削弱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友好关系的类似观点。苏共中央給各級党組織的公开信有根据地揭露这些观点的实际思想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階級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

在过去时期中，我們曾是一系列例子的見证人，这些例子证明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和力量以及苏联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决定性地制止了帝国主义用一切手段，包括侵略行动，鎮压民族解放运动所作的努力。

为爭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英雄主义和决心，是粉碎殖民主义桎梏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沒有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的忘我的援助，阻止和遏制帝国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从前，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曾无比英勇地反对过帝国主义，但这一斗争所以沒有成功，正是因为那时不存在能阻止帝国主义大国使用暴力保持当时殖民主义特权的社会主义陣营。

与过去不同，就拿 1958 年 7 月伊拉克发生的局势來說吧，艾尔索普兄弟在《紐約先驅論壇报》上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局势：“我們沒有在伊拉克采取行动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是：害怕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

去年准备侵略古巴共和国的事件情况也是这样。苏联当时执

行的既不是“冒险主义的”、也不是“投降主义的”政策，而是使古巴免遭侵略和使人类免遭核战争的政策，真正革命的政策。

反殖民主义斗争形式的多样化

帝国主义者利用一切手段进行抵抗，以拒绝对民族解放运动作出哪怕是微小的让步，如果要作类似的让步，那么也只是在反帝力量的强大压力之下做出的，反帝力量必须利用一切可能和手段来争取实现自己的要求。

反对殖民主义压迫斗争的重要形式，是首先在那些至今尚在殖民主义直接统治下的国家中所进行的武装斗争。

即使武装斗争对消灭殖民主义具有特别的意义，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铲除殖民主义压迫的斗争的唯一形式，和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和都正确的唯一手段。

在那些已经取得国家主权的国家里（这些国家在亚、非、拉丁美洲已是大多数），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巩固民族独立斗争的最重要形式，是争取实现民主自由和劳动人民的要求的斗争，这就是要巩固所有一切关心削弱帝国主义在国内影响的阶级和阶层参加的广泛的反帝战线。

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也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为战斗着的各国人民提供着巨大的援助，他们坚决反对那种把反帝斗争的其他形式称为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利益的“背叛”的观点。如果在国内或者由于国际形势的原因不存在武装斗争成功的客观前提，那么武装斗争不仅不会使提出的要求得以实现，相反地会导致革命力量的孤立，甚至使它遭到镇压。

殖民主义的新的形式表现为：帝国主义者干预发展中的国家的经济生活，施加思想上的压力，试图进行反革命输出，以及利用

一切有利于外国垄断资本的摩擦面；这些形式也要求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帝斗争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

帝国主义者在为保持它同亚、非、拉丁美洲各国的不平等关系而进行努力时，不仅遭到获得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被压迫民族的坚决反抗，而且还遭到本国劳动人民的日益强烈的反对，首先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所组织的积极反对。

由于这种努力，反对帝国主义这个人类文明的耻辱的全世界舆论的压力增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采取各种手段以削弱帝国主义和取消殖民主义大国至今在所占领的国家拥有的特权。

这些手段之一便是讨论争端问题的国际代表会议和会谈，特别是联合国的会议。帝国主义大国，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虽有强大的障地，但发展中的国家在联合国全体成员中已占三分之二，这些国家会有助于削弱殖民主义和揭露它的真正面貌。不能低估苏联代表提议的废除殖民主义制度的决议被通过的意义。作出这个决议，就是意味着公开谴责一切继续使各国人民遭受殖民主义奴役的人。由于对殖民主义特点的揭露，正如尼·谢·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所做的那样，帝国主义大国就越来越难以掩饰它们为保持自己现有的地位而采取的新的形式。在执行这个决议时帝国主义的破坏行为，有助于在这个世界讲坛上揭露隐藏在“民主”假面具后面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虚伪性。

认为利用联合国的讲坛是不正确的，说什么因为这会对这个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体国际组织的作用制造幻想，这种观点违背发展中的国家的进步发展的利益。赞同这一观点，并依据它行动，则意味着放弃这个重要障地和真正让它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活动范围。然而，联合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切致力于铲除殖民主义的国家可以在这里采取共同的行动，并且可以利用这个讲坛向每天处在资产阶级宣传火力下的西方劳动人民阐明社会主义国家

的政策。

尽管在联合国，解决不了铲除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鉴于整个国际局势将由每个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和团结来决定，但是也必须利用联合国这个场所来削弱帝国主义的阵地、迫使帝国主义者在全世界舆论面前执行大会所通过的消除殖民主义的决议，并且用刚果、南越、老挝或其他国家的例子来揭露他们的真正面目。

共产党人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这点出发：即在外交政策中，发展中的国家的政府可以奉行积极中立的政策，可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中，站在和平力量这一边。所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力求防止这样的发展——这种发展会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脱离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并从而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与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一起改变外交政策方针，以及用将民族利益从属于帝国主义大国的要求的政策去代替积极中立的政策创造条件。所以他们反对那种把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说成是“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观点，因为对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直接斗争将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集中进攻制造可能。这种态度将导致苏共二十大以前所发生的并在发展中的国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相当大损失的类似错误的产生。除了这点以外，另一方面，我们也常常看到主观主义的不彻底性。根据一时的策略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主观主义的不彻底性去迎合那些用侵略条约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民族主义在发展中的国家里的作用

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恶意的说法是有害的，即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借口什么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力图抹煞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的界限……”这种说法旨在使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威信扫地，其后果是支持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并与要求对民族主义情绪进行坚决斗争和反对企图在肤色基础上建立某种虚设的团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背道而驰。人类知道消除民族主义的道路，即在苏联及后来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解决民族问题所指出的道路。

民族主义对发展中的国家的进步发展意味着危险，它要求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在自己的队伍中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对分立主义和分裂主义不断进行坚决的斗争。

争取经济独立斗争的实质

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的国家合作的意义不是在数量上，而是在质量上，是在于，它给发展中的国家劳动人民指出了他们应该走的路，如果他们想达到真正的独立的话。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反对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他们虽然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说来，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但他们却又断然把这一事实与革命斗争对立起来。这种观点证明了形而上学地理解概念，证明没有能力看到世界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成就之间辩证的联系，证明完全低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和无视我们所目睹的世界上的具体的事件。这些事件每天都在证实社会主义体系的这种

革命化影响。

和平共处政策对发展中的国家的意义

发展中的国家尽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动摇性，但它们赞同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的政策，苏联在国际关系中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正是这样的政策。对这些国家来说，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已表明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要由于发展中的国家的政策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有矛盾而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就会为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发展中的国家的内政创造前提。与此相反，和平共处政策要求国与国之间建立这样的关系，即不许以任何一种形式干涉别国的内政，和不许滥用经济和军事力量压迫弱小国家。

致力于避免战争并就全面彻底裁军达成协议，是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一项主要的具体任务。今天核冲突的危险威胁到所有民族，整个人类文明，因此发展中的国家全部都站在为争取销毁所有武器，首先是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斗争的和平力量的一边。

但是有着这么一种人，他们把全面彻底裁军思想作为“幻想”来反对，并且诽谤性地断言，“如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做争取世界和平的最根本的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骗全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说出这种观点的人好象不愿意看到，今天帝国主义者们在许多国家里所以还保持住自己的阵地，正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领土上还有自己的军事基地，他们输送武器到这些国家去支持反动制度，并派遣军事代表团帮助反动集团保持政权，如同在南越、南朝鲜、泰国和其他国家那样。帝国主义者力图用军事远征的办法来镇压沙捞越、文莱、阿曼、安哥拉和约旦人民的反抗。

帝国主义者手中的武器，虽然还没有射击，但它是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从他们手中除去这些武器，会使至今尚依附于帝国主义者的那些国家的人民的意愿得以实现。就其结果来说，裁军将意味着，帝国主义将不能够借助军事暴力去影响任何一国的事件的发展。这样，完成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将完全打开，并使它的过程不致受到帝国主义者所执行的讹诈、恐怖和威胁政策等这些今天众所周知的外来影响的干扰。

因此，和平运动把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消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斗争与争取全面彻底裁军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是十分必然的和合乎逻辑的。苏联在第十五届联大上的建议和1962年7月举行的莫斯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阻碍这样的发展，因为这意味着失去依靠军事优势来保持在发展中的国家的影响的可能性。但是，对帝国主义来说，战争也正在客观上丧失是政治的有效继续这一能力，因为在核武器时代，战争冲突绝非意味着击中这些或那些目标的问题，而是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毁灭。资本主义国家中广泛的阶层也意识到了这一事实。所以侵略力量的处境日益困难，全面彻底裁军的思想是完全现实的。

尽管如此，但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还是相当强大，因而需要团结和动员所有反战力量去反对它，而绝不是特别在发展中的国家散布对争取全面彻底裁军的斗争的正确性的怀疑来分散这一力量。我们也并不认为，这个斗争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就。但是，不能在斗争的困难面前投降。

由于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共同努力，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全面彻底裁军的思想日益得到贯彻。在发展中的国家，情况也相类似。帝国主义侵略力量感到自己地位的软弱，因此不仅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压力，而且也杀害民主的代

表人物。

帝国主义者瘋狂地反对奉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实现全面彻底裁軍政策，这就表明，这是一条削弱他們在发展中的国家的影响的道路。

但中共领导对和平共处政策也表示反对，是很特殊的。去年秋天它沒有下决心通过这条有效的道路促使帝国主义陣地的削弱，而今天却找到了足够的勇气去非难苏共，說它“扮演帝国主义帮凶的角色”。这一荒唐的指責激怒了苏联曾忘我地帮助他們走向独立生活的各国人民。其他人也象我們一样，更多地是相信它的誠实的行动，而不是相信那些自命为批評家的人所进行的誹謗和陈詞濫調。对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和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政治实践中的貫徹來說，要伎倆、进行誹謗和歪曲皆是不中用的。

在发展中的国家里形势的复杂性要求根据各国具体形势創造性地貫徹馬列主义原則。发展中的国家中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之所以取得成就，是因为他們依据这些原則行动，首先努力巩固广泛的反帝战綫，并在反帝战綫的范围内提高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和迫使民族資产階級奉行反帝的民主的政策。很显然，沒有反对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反对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主义修正和空洞的革命詞藻的斗争，是不能保证取得这些成就的。

（譯自1963年7月17日第8期捷《新思想》杂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年7月19日就苏共中央致 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 党员的公开信发表的声明

苏共中央7月14日发表了致苏联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就中共中央今年6月14日的信表明了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的态度。

苏共中央的信与我党的观点和路线完全一致。因此捷共中央表示毫无保留地赞同它的结论和正在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的列宁的党的做法。苏共中央的信充满了坚决贯彻和有原则地捍卫作为全体共产党人在争取全世界劳动者的和平和共产主义前景的斗争中的共同纲领的那些思想，对此我党特别予以高度评价。

捷共十二大充分地表明了我党与苏联共产党在当代基本问题上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次代表大会再次证实了我们党对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团结的利益和目标的忠诚。我们在十二大致各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信中宣称：“为了我们的思想的胜利，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为了今后的顺利的斗争，在当前必须为加强共产主义的队伍的团结而斗争，在实践中坚决贯彻我们共同通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件的决议。我们的代表大会认为当前的主要义务是：贡献全部力量，以求和平得到维护，并为了这个目的而把世界全体居民中的最广泛阶层和各民族动员起来，

并在进行这一斗争的同时，坚决反对一切力求阻挠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生活走向进步的一切反动力量”。

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捷共中央已怀着不安和忧虑注视着与共同拟定和通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不相符合的中共的政策。最近几年以来，中国同志开始随心所欲地和不正确地解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通过的文件，以图用自己的路綫代替这些文件所表达的战略和策略原则，甚至将这个有错误倾向的路綫强加于其它党。

像其它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样，我們的党已不止一次地指出这种行动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性。

我們怀着充分了解和支持的心情欢迎苏共中央关于停止各党之間的公开爭論的建議，作为創造有利气氛的前提，在这种气氛中将能够最严肃和負責地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會議，討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重大問題和任务。

中国同志虽然对这一建議表示贊同，但实际上却未停止爭論，甚至对兄弟共产党，首先是对苏共进行攻击，进一步加剧了爭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6 月 14 日給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是这种活动的高峰。中共中央的这封信同苏共中央今年 2 月 21 日和 3 月 30 日給中共中央的信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馳。苏共中央的这两封信是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巩固，以求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爭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願望出发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决拒絕中共领导对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列宁主义政策、对在莫斯科會議文件中固定下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的攻击。中共中央为了达到使苏共政策声誉扫地的目的，不惜进行煽动、歪曲和誹謗，将苏共及其他兄弟党从来没有宣传和坚持过的說法与观点加在它們头

上。中共的全部論据以及关于非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态度的指責，都是建立在这样的說法与观点的基础上的。

中国同志从这样的立場出发，似乎他們有权垄断对宣言与声明的革命原則的解释。与此同时他們对这些文件中表达的原則进行歪曲，或者根本予以拒絕。他們力图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这些文件的革命精神是他們的創作。但是必須真實地說，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會議上千方百計地阻撓会談的进行，力图不惜一切代价地貫徹其錯誤的主张，只是当他們在頑固地推行自己的錯誤观点而陷入完全孤立的地位时，以及其做法被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坚决拒絕时，才在文件上签了字。同时令人吃驚的是，現在中共中央正在将自己的某些在會議上受到尖銳批評的錯誤观点强加給其它党，从而顛倒了真理。

中共进行攻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降低苏共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先鋒队作用，并把自己說成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純洁性的主要捍卫者以及为爭取自由、独立和消灭剝削制度而斗争的被压迫民族和劳动人民的最高保卫者。难道不是已經真正到了让中国同志意識到，置身于其它党之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妄图以坚决的毫无道理的特殊地位自居，这种态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得到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支持，而只会使怀着这种意图的人在一切共产党人眼中威信扫地的最紧迫时候了嗎？每个共产党的国际义务是：坚定地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中，时刻注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及其共同行动的利益，而不对这个运动采取高傲的态度，不把自己的观点看作是永无錯誤和唯一正确的观点，不要不顾其他党的意見而千方百計地将这些观点强加給它們。

中共中央在6月14日信中毫不犹豫地起来为受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譴責的个人迷信进行辯护，这使我党和捷劳动人民十分憤慨。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曾对苏共在这一問題上的

原則性做法表示贊同，而在今天，在已經充分證明，克服個人迷信時期的不健康現象對整個發展發生了極為良好的影響的時候，他們卻採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場。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各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生活中的列寧主義準則的恢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復興過程，正是社會主義及其對世界事務的影響的進一步高漲的基本條件，也正是近幾年來爭取世界和平和進步的鬥爭取得偉大勝利的基本條件。

我國全體人民在自己的生活中也體會到了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意義，這次代表大會的良好影響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里，情況也是如此。

中國同志自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純潔性的捍衛者，但是，事實是無情的。他們維護個人迷信的做法只是證明了他們停滯於舊的陣地，脫離了生活。

我們堅決拒絕中共中央試圖在國際革命工人運動中推行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路線。這條路線不會導致反帝戰綫的加強，而是導致反帝戰綫的削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當前時代的特點出發規定了自己的戰略和策略路線。當代世界革命過程的內容，是由於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各國人民的反帝鬥爭、資本主義國家里的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和各國人民爭取和平和民主的運動的聯合而決定的。當代的所有這些動力必須在有機的團結下來發揮作用，在這些力量之中，起決定性的作用是國際工人階級和世界社會主義體系。

在充分尊敬中國共產黨人的傳統的同時，對於中共領導目前在國際範圍內在和平與戰爭問題、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問題、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作用和發展問題以及世界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的戰略和策略問題上的主張和做法，只能評價為對反帝鬥爭的統一戰綫的分裂主義和危險的冒險主義行為。

下述这些,证明了在国际民主組織中,中国代表們的分裂主义活动:他們竭力建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分裂的闭关自守的組織,并竭力将苏联代表排除出这些組織,使这些組織脫离开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甚至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其中也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亚非人民团結委员会的代表——哪怕仅仅作为观察員参加今年2月初在莫希举行的第三届亚非团結大会,并且威胁說,如果我們的代表被吸收为正式观察員,他們将退出大会。

我党中央委员会在过去几年中就已对这些令人不安的現象給予了一貫的注意。1962年1月20日我党中央写信給中共中央,信中詳細地分析了中国代表在国际民主組織中的极端有害的行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于当代基本政治問題的不正确观点。捷共中央证明了,中共领导捍卫和發揮着一系列与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文件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截然相背离的論点,这些論点直接修正着这些文件的許多基本結論。中共领导对于这封信中所闡明的事实和論据,沒有給予直接的回答,并拒絕研究它們。

我党中央又于1962年7月9日写了一封信,回答了这种高傲的态度。信中除别的以外还指出:“我們被迫对这种兄弟共产党之間交換意見的不寻常的、不符合兄弟党相互关系中的平等原則的态度,表示遺憾和驚訝。”

甚至在这一提醒以后,从中国方面來說却产生了有意識地恶化党的方面以及其他一切方針方面的相互关系。

新华社布拉格分社,以后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布拉格大使馆本身,在我国領土上散发了与党的观点相违背的材料。中国的代表人不尊重我們对于这种行为的抗議。

同样,中国的代表者也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領上上大量散发了中共中央今年6月14日的信。他們甚至在布拉格機場上不加區別地把這封信散发给所有的旅客。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尚在北京《人民日報》刊登這封信的同一天，就這樣大量地、以這樣的速度在我國散發這封信，證明這是一個事先準備好的反對我黨的行動。

這種行為是大國對我國主權藐視的表現，是對兄弟黨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的破壞。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卻把我黨反對中國代表者的這種行為的正義措施，說成是破壞捷中關係，這真是奇怪的邏輯。

真正值得遺憾的是，中共中央把與蘇共中央和其他兄弟黨的意識形態的分歧也帶到國家關係上來了。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關係上的做法，給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從1961年起，由於中國代表人的過錯，在相互貿易關係中發生了急劇的下降。儘管我們竭力通過給予中國方面各種有利條件，以求保持和提高換貨額，但1963年整個貿易總額降低為1959年的16%弱，我國的出口額甚至降至10%弱。中國同志在各種借口之下，也類似地把我們在政治和文化領域的相互關係，降到最低限度。

由於中國同志的片面行動，而在我們相互關係中造成了突然的、急劇的轉折，這對我國人民來說，是很不能理解的，因為我國人民一貫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傳統，對英雄的中國人民在爭取國家解放的鬥爭中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所作的努力是敬佩的。

捷共十二大又一次表示了对中國共產黨人革命鬥爭的稱贊，但是大會對中共代表團的非同志式的講話和不正確的观点不能置之不理。大會同時向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如下迫切号召：“鑒於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尊敬，我們再次要求你們真正徹底地從1957年宣言和1960年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聲明出發，審查你們對於

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紧密相联的重大的国际问题的观点。”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全部问题时，一贯意识到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国际斗争的联系性，意识到同一切民主与和平力量的斗争的联系性。我们党贯彻着第二十大和第二十二大决议以及苏共纲领——它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大发展、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对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运动具有无限的意义——中所表达的创造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攻式的路线。同样地，一贯贯彻宣言和声明的原则。这些列宁主义思想被完全包含在宣言和声明中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接受。我们党把这看作是自己对巩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巩固各国共产党同世界一切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进步力量在争取和平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国际联盟的革命团结的主要国际主义的贡献。在执行这些任务中，我们党仍将继续按照它的革命传统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成熟性，作最大的努力。

（译自1963年7月20日捷《红色权利报》）

我們坚定地捍卫着 国际主义团結的旗帜

《紅色权利报》社論

我国人民以特殊的注意和兴趣（这证明我国人民高度成熟并忠于国际主义）接受了苏共中央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写给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捷共中央昨日发表的声明表达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对这些问题的立場。

声明认为，苏共中央的信与我党的观点和路綫完全一致。我党中央委员会表示毫无保留地同意信中的全部結論以及关于正在竭力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馬列主义团結的列宁的党所采取的行动。声明还說，我党尤其高度地评价这样一个事实：貫穿在苏共中央信件中的，是要彻底实现并有原則地捍卫这些思想，这些思想是所有共产党人在为爭取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和平的和共产主义远景的斗争中共同的綱領。我們党把苏联共产党人的文件看作是苏共以創造性的列宁主义态度去对待我們时代的理論和实际的根本問題的新证明。我們从一开始就認識到，由中国同志所引起的分歧，不是經院哲学式的討論，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問題。这是对下述問題的两种原則不同的概念和估价：即战争与和平問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問題，克服个人迷信的反列宁主义的方法問題，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問題以及其他与人类生命攸关的問題。

中共領導用拥护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声明和对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号召，为自己实际上不同意 1957 年和 1960 年所通过

的国际革命运动的文件的原則作掩护，为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路綫作掩护，最近时期以来它尤其不择手段地要把这一路綫强加給其他党。我們怀着忧虑和遺憾地看到，在他們对馬列主义政党，特别是对苏共的公开誹謗中，毫无根据地指責各兄弟党和我們的党是什么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正如声明所指出和提醒的那樣，在这些攻击的背后隐藏着使苏共和其他党的威信扫地并把冒险主义路綫强加給共产主义运动的企图。

特别是为制止热核战争而斗争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不能有任何含糊不清的地方。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

中国同志明显地表现出对革命前景丧失了信心，不相信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不相信思想斗争和可以获得对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的经济竞赛的力量，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各国的戒备和防御力量不会有任何削弱。

特别是在去年秋天保卫社会主义古巴的問題上，中国同志暴露了自己的有害的政治路綫。他們在对苏联的审慎作法所作的攻击中，甚至不惜称这种做法是“背叛行为”和提醒它是慕尼黑。我国人民清楚地記得慕尼黑事件，从历史中得到教訓的他們，知道在二十五年以前所以能出現慕尼黑，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民主与和平的力量还不象今天这样統一，它們不象今天这样具有压倒反共主义、反动派和战争势力的优势。在1938年，正是苏联沒有背弃和出卖受到威胁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正是因为苏联的帮助和苏軍使希特勒的法西斯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使我国重获自由和使我国人民能够建設新的社会制度。苏联在古巴危机中的坚定的态度，拯救了世界和平和古巴人民的革命果实。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将世代感谢苏联和英雄的苏联人民，感谢他們在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时期，特别是以后在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给予的无私援助和史无前例的合作。令人完全难以理解的是，一个赞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的人，怎么能够诽谤一个是执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榜样的党；诽谤一个为国际主义原则、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斗争了六十年的党。因此捷共中央坚决反对中共领导对苏共列宁主义政策的攻击。

我党和我们全国接受了苏共二十大带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生活中的彻底的列宁主义路线。我党坚决地清算了个人迷信时期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并且正在将个人迷信的后果及其错误方法从我国社会生活中和我党的工作中清除掉。但是，中共中央竟然在6月14日的信件中毫不犹豫地出来捍卫受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谴责的个人迷信！

我们也怀着极大的满意和自豪在通过每天的劳动建设新的社会制度，我党接受了苏共二十二大的富有生命力的思想，特别是它的宏伟的纲领的原则，这个纲领给我们勾画出了我们不久的共产主义的未来。

我党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拒绝了中共代表的挑衅性的发言，并且强调指出，尽管我们对中共怀着敬意，我们仍请求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查自己的观点、立场和背离共同通过的原则的偏差。但是恰好相反，中国同志发展了并扩大了自己的分裂活动。我党中央委员会曾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这一严重局势进行了多次研究，并给中共中央写了几封信。正如我党文件所声明的那样，中共领导没有对我们的论点作直接的答复，并傲慢地拒绝对这些论点进行研究。

遗憾的是，中共中央把与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例如在经济合作方面就是这样。从1961年起，由于中国代表们的过错，使得相互间的贸易关系锐减。尽管经

过我们的努力，向中国方面提供各种有利条件，以求保持与提高换货额，但1963年的贸易总额降为1959年的16%弱，而我国的出口总额甚至降为10%弱。由于这而给我们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因为原来所指望的商定的订货，由于中国同志的决定而没有交付。同样，中国同志将我们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联系降低到最低限度，并以种种借口破坏它。

此外还发生了进一步粗暴地破坏我们的相互关系的事。新华社布拉格分社、以及后来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本身竟然也在我国散发反对我党的观点和政策的材料，而中国代表们却根本不考虑我们对这种非法的、不能容忍的行为所提出的抗议。中共中央今年6月14日的信还在北京发表的当天，就在我国各地散发了它的捷文译本，并且寄给我国的公民。声明指出，“这种行为是大国对我国主权藐视的表现，是对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的破坏。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把我党反对中国代表者的这种行为的正义措施，说成是对捷中关系的破坏，这实在是奇怪的逻辑。”

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过去一贯尊敬中国共产党，并钦佩勇敢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英勇的努力，注视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进展，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每一个成就而高兴。因而中共今天的政策，中国同志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不正确的观点，更加使我们感到痛心 and 不安。我们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一起坚决谴责中共的分裂主义做法，这种做法有利于我们的阶级敌人。

我党正在光荣地履行自己的一切国际主义的责任与义务，全力支持一切增强世界革命运动与和平运动的事物，并且以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完成历史所赋予我党的一切任务。正如捷共中央声明所说的那样，“在执行这些任务中，我们党仍将继续按照它的革命传统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成熟性，作最大的努力。”

（译自1963年7月21日捷《红色权利报》）

坚定不移地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則而斗争

《党的生活》杂志社論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党员和我国劳动人民一贯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牢固团结的问题和兄弟党之间同志式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前进的、决定性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大家都严肃地注视着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根本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脱离了苏共及绝大多数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

目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彻底地认识到了在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信中所包括的苏联共产党的观点；也彻底地认识到了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所表达的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从党的刊物上，我们了解到一系列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观点。我们在本期发表了捷共中央委员会对苏共中央致苏联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声明。

在知道了这些文件之后，就完全明白了，在这个争论中，远不只是关于个别问题定义方面的分歧，争论的中心是直接涉及到各国人民最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同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意识形态与实践的斗争相联系的问题、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虽然按照各国共产党的一致意见，苏共二十大及集体制定的各兄弟的共产党及工人党的文件，这就是1957年宣言和1960年

声明对当代所有的这些問題，給予了一致的和正确的回答，但中国领导人却提出了在主要問題上越来越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綫的、新的、完全不同的概念。

特別重要的是首先在对全世界各国人民命运如此重要的問題——战争与和平的估計上。中国同志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場背道而馳，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低估和平与社会主义力量，相反地过高估計帝国主义力量。在他們看来，最重要的是尽快地消灭帝国主义。至于付出怎样的代价，据說这是次要的問題。

号召社会主义国家自由的人民进行世界热核战争，以便以后有可能在死亡了的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講話中很正确地提出了這個問題：“这种观点的創造者是否知道，如果現在所有的火箭、核武器都开动起来，地面上的大气将受到这样的污染，甚至我們不知道，活着的人将处在怎样的状态中——他們是否会羡慕死者？”

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社会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和平共处和經濟竞赛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道路，是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剝削的群众阶级斗争的道路，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是把斗争的这些組成部分联合在統一战綫中的道路。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像苏联的同志們一样，完全深信，要加速新社会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首先意味着证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优越性，意味着劳动和建設。喧嘩的假革命詞句什么也帶不来。因此我們党也不断地強調：通过忘我的劳动、实现政治与經濟方針以及貢獻自己的力量，才真正有助于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的共同事业的胜利。

这意味着什么？首先要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及它

們相互的經濟合作，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水平，從這一角度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根據“自力更生”的理論限制了與其他的兄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往來和合作的行動尤其嚴重。由此並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在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關係中也發生了這種情況。

完全符合我們黨和人民意見的捷共中央委員會聲明堅決拒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蘇聯共產黨及其他兄弟黨的毫無根據的攻擊、煽動和對事實的歪曲。中國同志有這種表現，即好像只有他們才有权壟斷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中共中央信中的誹謗腔調及在蘇共和中共代表的會議上討論它之前已被譯成多種語言並在一系列國家散發的事實也使我黨憤慨。在這些無可爭辯的事實的基础上，中國領導人還怎么能說，他們一貫竭盡全力不把共產黨之間存在的分歧暴露在敵人面前？

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人對蘇聯共產黨、對二十大、二十二大以及他們所通過的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綱領的攻擊受到了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尖銳譴責，這當然是完全自然的。捷共在自己的整個歷史中學習了蘇共的經驗，並且今後將繼續這樣做。它不會追隨中共現在的教條—宗派主義的路綫，而是遵循共同通過的文件——宣言和聲明——中所表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綫。如同其他共產黨的實踐一樣，我們自身的經驗也證明，為完全鞏固黨的生活和工作的列寧主義準則、為消除個人迷信不良的後果而進行的堅決的鬥爭有着怎樣的、無限的意義。如果中共領導人現在力圖把個人迷信時期所貫徹的思想、道德和方法強加給其他共產黨，那麼這種努力確實為他們“既不會帶來榮譽，也不會帶來光榮”。

但是各國共產黨是不會給弄糊塗的。因此，正如捷共中央委員會在自己的聲明中所強調的，“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各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生活中的列寧主義準則的恢復和國際共產主

义运动中的复兴过程，正是社会主义及其对世界事物的影响的进一步高涨的基本条件，也正是近几年来争取世界和平和进步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基本条件”。

不断地巩固所有世界革命力量的团结，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的团结，和平、民主和民族解放力量的团结是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每一个共产党员神圣的义务。我们党的报刊已报道，根据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莫斯科的会谈已经休会，过一段时期两代表团再举行会谈。尽管存在尖锐的矛盾，但是存在克服目前形势的可能性。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决不应该把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使我们分离的东西上，而应该建立在将我们联在一起的东西上，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我国人民将尽一切力量来促进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完全巩固。

（译自 1963 年 7 月 23 日第 15 期捷《党的生活》杂志）

奇怪的邏輯的繼續

奇怪的邏輯。前几天，我們党中央的声明曾用这些字眼來說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毫不犹豫地把我們当局提出召回三名新华通訊社駐布拉格記者的合理的和完全正当的要求說成是“破坏捷中关系”。这确实是奇怪的邏輯！它不使人們感到惊奇，因为它有着同样的奇怪的邏輯。

众所周知，是什么迫使我們当局采取在我們这里沒有人为之而高兴的措施。关于召回新华社上述三名工作人員的要求和在这一要求中所列举的理由，同他們的正常的报道、采訪活动毫无关系。

这指的是散发其内容与我們党的立場和捷政府的外交政治路綫相对抗的材料，这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曾經认为沒有必要正式地寄給我党中央的材料。我們党不同意这些材料中所提出的观点，因而它在沒有表明自己的立場之前，不准备登載它。很清楚，任何一个党都不允許別人以任何方式将登載某种文件的時間和方式强加于它。

因而新华社三名工作人員的活动越出了共产党之間的关系中普遍公认的准則，他們的行为的客观后果只能是使相互的关系恶化，而不能是别的。

这指的是，分社的工作人員曾經进行了这些材料的发行者的活动，同时采取了非常奇怪的对官方通訊社的工作人員來說完全不能允許的方式。

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共和国各地奔走，以便把材料也送到

共和国的偏僻的角落中去(如在叶塞尼克)或向那里邮寄。其他时候,他们又在公众场所(如在飞机场)把材料散发给行人,甚至直接强迫他们接受。

曾经劝告他们停止这种十分明显地越出通讯社分社活动范围的活动,并且这样警告他们:如若不听取,他们将被驱逐。驻在国的当局对此完全有权,并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这关系到侵犯我们共和国的主权的问题。对我们的抗议不理睬,这只能看作是大国主义优越感的表现,显然上述新华社三名工作人员堕入了大国主义优越感之中。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谁“破坏了捷中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最奇怪的逻辑才会得出不同的看法。

这种奇怪的逻辑进一步发展的方式,也最终证实这一点。最先出现了新华通讯社的这几行消息:该通讯社的工作人员乘飞机离开了布拉格,然后他们在柏林着陆,接着从柏林起飞等等一直到在北京的隆重欢迎。接踵而来的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高级负责人接见上述三名工作人员和发表各种声明的报道。

一个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的中国政府的副总理宣称:“你们的活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喜欢,所以将你们赶走。这对你们的工作恰好是一个评价,因为这证明,你们工作得很好,你们的活动很有成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采取这种做法来封锁真理是不明智的,真理是永远封锁不住的。”这番话是在7月22日,也就是在我们的报纸上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的信一周之后说的!在说这番话的那一天,我们的人民是怎样的态度,从许多言论和反映中已是众所周知了。

所以,这些工作人员的工作“很有成绩”只能是这个意思,即它破坏了我国两国的平等关系。

正如我们的人民怀着遗憾和反对的情绪得知中国同志离开共

同拟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綫一样，現在他們正以奇怪和憤怒的心情注視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圍繞新华社的三名工作人員所发动的大吹大擂的运动。（佐）

（譯自 1963 年 7 月 26 日捷《紅色权利报》）

同“狂人”坐在一条板凳上

伊瑞·霍赫曼

在战后的年代中，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和同他們在一起的数十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公众，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威胁、争取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的斗争的很多經驗。所有这些經驗，都是在为实现和平解决爭端問題的建議而作的系統的和不懈的努力中，在各种各样的战綫上和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的斗争过程中取得的。除其他經驗之外，属于这些經驗的有这一条經驗，即最終的成就将不是一下子、一夜就可以取得的，它只能是頑强的斗争和这样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这样一个长期过程就是：通过部份地、逐步地解决问题的道路，从較小的方案达到更重要和更有原則性的方案，直到主要目的——全面彻底裁軍和建立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穩固的世界体系。

在目前时期，整个斗争胜利的前景显得比几年前要现实得多。在战争技术中的显著的质的变化和对在当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力量对比的条件下所存在的现代化武器的毁灭規模的認識，共同形成这种局面：对消除战争危險感兴趣的已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了，而且还有許多资产阶级的士，特别是那些能够具体地想象出使用核武器和火箭武器将带来的毁灭的人。这种发展使得达成了反对战争危險的第一个集体步驟的協議——在大气层、水下和外层空間停止核試驗的条約。草签条約的三国同时一致協議，不把这一条約看作孤立的行动，而是看作由它轉入关于解决其他問題的严肃会談的起点。

这一步驟在世界上所引起的反对意見是非常个别的。甚至于在資本主义人士中，反对意見也只来自那些以其对緩和國際紧张局势的否定态度、以其瘋狂性和不負責任而著称的力量。相反地，人类真正的絕大多数表示支持沿着所踏上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但在这种形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就是說，一个断言自己的政策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甚至于較长时期以来就认为自己的理論态度是当前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最純洁的表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出来反对莫斯科条約，对它进行强烈的譴責和明确地加以反对。

从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中就已經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认为大規模毀灭性武器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事，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應該考虑到这一因素。它不认为，在原子战争中数以亿計的人們被焚烧的威胁会起某种作用。根据这一結論，中国政府藐視避免战争的問題，藐視旨在避免战争的一切步驟，其中包括全面彻底裁軍。

因此，現在中国政府在这个协定不解决防止战争的問題的借口下，把停止核試驗的条約当作“騙局”而加以反对，同时又提出范围大得多、艰巨得多、而在今天的情况下还不现实的彻底、立即把核武器从世界上消除掉的条約的建議，这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和非常沒有說服力的。

因此，作出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中国政府反对停止核試驗的条約不是因为担心这个步骤会堵塞住更全面的解决方案，而是因为莫斯科条約不符合事先制訂好的和同西方不能作任何妥协的教条主义地捍卫的中国的方案。为了证明这个公式是正确的，中国声明引用肯尼迪 7 月 26 日讲话中的某些話，特别是协定不消除核战争的威胁的观点。但是誰也沒有說条約消除这种战争的危險。尼·謝·赫魯曉夫也表达了这种看法。条約毕竟不是反战措施的

过程的结束，而是其开始。那么，为什么说是骗局，或者甚至说是“投降”呢？

条约双方留下同样的可能性。现在试验核爆炸物的实验室的条件也还是存在的，这是使得形势，比方说，与两年前不同的因素之一。但是中国领导人，到底愿不愿意考虑发展、尊重经验和承认新的事实呢？难道可以忽视去年加勒比海危机的经验吗？这一危机无疑地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促进因素，它对停止核试验的协定和这一协定被普遍认为是消除核战争的道路的开端起了促进作用。

中国政府从自己对局势的十分主观和盲目的估计出发，认为目前时机业已成熟，使它可以从思想分歧的障地转入对苏联公开政治上敌视的障地。它断言，莫斯科协定是反对中国和反对它现在已毫不掩饰地宣扬的获取自己的核武器这一意图的“阴谋”。它指责苏联政府背叛社会主义的利益，勾结帝国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当某人从国外教训苏联政府——为了世界上的和平和进步已经做了这样多事情的政府——什么对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好的，什么不好，这听起来一向都是令人难受的。加倍令人难受的是，这样做的那些人，没有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没有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他们就不会掌握自己国家的政权！

但中国政府建议的第二种可能性是怎样的呢？它提出通过政府首脑的一揽子会议销毁所有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没有耐心的政治活动，没有一系列事先必须作出的较小的活动和协定，这种建议是完全不现实的，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点。

这一不现实的建议的背景是怎样的呢？这不仅要使公众能接受对停试条约的反对，它同时还为了掩盖这个事实，即中国政府现在认为自己的主要目的不是裁军的步骤，而是获取自己的核武器。

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用来做什么？难道到现在还需要用

这来保卫中国革命？难道对中国人民来说，苏联的威力和它同中国的同盟过去不是使帝国主义者永远不敢侵犯中国人民的完全足够的保证么？

經驗使得对此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因而只剩下一个答案：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有自己的核武器，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大国的利益。但中国的态度同时损害和平和革命的利益。中国领导人不能不看到他们在万隆会议时期有过的影响和威望，和今天，即在同印度的冲突、公布了奇怪的亚洲地图、在国际民主組織中进行分裂活动和反对和平共处的运动之后，各国人民对他们看法之间的差别。中国的态度不仅是反和平的，而且在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势力。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反动的报刊愿意传播他们的观点；在经济上支持各种叛徒的时候，中国的津贴同反动派的津贴汇集在一起。难道中国的做法为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为印度共产党所造成的危害的經驗还不够吗？

遺憾的是，看来在北京对这些不作任何考虑。只有在宣传中談国际主义，但是在实践中則表现出大国民族主义。談世界革命，但是却执行一种会导致世界灾难的政策。談社会主义，但却阴险地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团結。

中国领导人，在全世界、本国人民和历史面前，对他们所执行的冒險主义的政治方針的后果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

（譯自1963年8月1日捷《紅色权利报》）

我們完全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授权

捷克斯洛伐克通訊社发表的声明

新华社7月31日播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1963年7月25日莫斯科三国會議結束时草签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水下进行核試驗的条約的声明，关于这项声明昨天已向捷公众进行了介紹。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就此授权捷克斯洛伐克通訊社发表声明：

世界公众热烈欢迎了苏、英、美三国政府达成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水下进行核試驗条約的会谈成果。正如从世界各地传来的消息表明的那样，全世界絕大多数的国家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称赞在禁止核試驗問題上所取得的进展，并把这一条約看作是緩和國際紧张局势，加强国与国之間的信任和确保和平的重大步驟。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社会主义各国以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立場完全背道而馳，对禁止核試驗会谈的結果采取了完全拒絕的态度，并且展开了旨在不择手段地詆毀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和使这一政策威信扫地的誹謗性的运动。它甚至于把禁止核試驗条約說成是騙局，說成是出卖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和試圖巩固束縛爱好和平国家的手脚的三大国的核垄断。对于中国官方当局对禁止核試驗条約的粗暴的和不严肃的攻击，只能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加劇进行的、旨在反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团结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不渝地奉行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列宁主义和平共处政策的日益加强的分裂活动联系起来，才能理解。这一诽谤性运动同时还表明，在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 1963 年 6 月 14 日的信件的公开信发表以后，中共领导力图抵制全世界对苏共中央信件的自发的支持和巩固自己动摇了的地位。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愤怒地拒绝中国领导人完全没有根据的和粗暴的攻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竟然会用自己居心不良的做法攻击和破坏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在确保和平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而作的努力，表示惊奇。中国领导人以自己的做法破坏了 1960 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声明的原则。

这里必须坦率地说，这是完全蓄意颠倒黑白和迷惑舆论的企图，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不相容的，同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不相称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坚信苏联和平政策的正确性和一贯性。这一和平政策为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和保障持久和平的四十五年不懈斗争所证实。中国政府的诽谤性说法深深地触犯了每个注视着苏联和平政策的人，它在自己的声明中把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当作“大骗局”，把苏联的政策当作“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和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全世界人民的政策。”

苏联依据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提出了全面彻底裁军的纲领，站在争取和平的世界斗争的前列。达成在三个范围内禁止核试验的协议是苏联和平政策最新的重大成就，它符合社会主义各国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和平意志和切身利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导致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的作法。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政府的支持莫斯科会谈结果的同时，把这个条约看成是和平力量的重大成就和导致缓和紧张局势新措施的实际步骤。这一实际步骤有助于为达成全面彻底裁军——即最终抛弃武器做为解决国家间分歧的手段——创造有利的形势。同时他们完全意识到，只有实现裁军协定才能从各国人民生活中排除战争的危險，才能从他们的肩上卸下军事开支的负担，并使人类得到和平发展。这里任何人也没有像中国政府企图断言的那样佯言和平已最终获得保证。所签订的协议对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来说，是增强为取得新的进展而作的努力的有力启示。缔约国政府在莫斯科条约中证实了继续为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的全面禁止核试验而努力的意图，提出了把根据联合国的意旨，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迅速达成全面彻底裁军做为自己的主要目的。中国政府的声明有意地对这一事实保持沉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已达成的禁止核试验条约所持的拒绝态度根本违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同志应该记得，最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阶级、和平运动、日益广泛的公众、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迫切地要求禁止核武器试验。已签订的条约使得能够立即结束会危险地威胁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放射性尘埃对人类周围环境的进一步感染。这符合日益迫切地要求消除这一威胁的各国人民的要求。

条约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在三个领域内禁止核试验，而且还在于为限制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创造前提。与绝大多数国家认为限制进一步扩散核武器是减少爆发热核战争危险的条件之一的立场相反，中国政府却提出了所签定的条约束缚其他国家的手脚的论据。中国政府究竟在捍卫哪些国家的利益呢？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安全完全可由苏联的军事潜力及其本身的防御手段来保证。中国领导人的立场说明，他们的首要企图是发展

自己的核武器。

中国政府輕率地走到了非常薄的冰上。它應該深思，誰在這個問題上抱有類似的觀點。這不是別人，而是西方國家的最反動的集團，波恩軍國主義者和那些由於反共狂熱而破壞每一個導致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諒解的積極步驟或致力於建立與擴張自己的核軍備的人。這就其結果來說是一種冒險主義的政策，只能被評價為從背後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努力。

中國領導人有意忽視存在於已達成的協定和解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全面徹底裁軍——的其他有效步驟的現實可能性之間的聯繫。中國領導人以“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假革命要求——這些要求脫離對世界局勢的現實估計——實際上阻礙社會主義國家、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以及其他愛好和平人民保障持久和平的共同努力。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就破壞了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在爭取實現全面徹底裁軍鬥爭中的團結。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对蘇聯政策進行粗暴攻擊的同時，提出了關於立即銷毀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取消在外國領土上的軍事基地，建立無核武器區的某些措施，以及包括召開旨在討論以上措施的世界各國政府首腦會議在內的其他措施，這絲毫也不能改變上述情況。這些建議本身不是什麼新東西，因為蘇聯政府所提出的全面徹底裁軍的綱領和社會主義各國在裁軍措施方面的其他建議已經完全包括了這些目標。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作法不同，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不滿足於僅僅提出這些目標，而是為爭取實現符合世界現實形勢、有助於為全面徹底裁軍創造有利條件的有效的具體步驟而努力和鬥爭。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和平及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的問題上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停止竭力破壞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關於消除熱核戰爭危險的談判中取得進展的企圖，

并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在争取社会主义与和平在世界上的胜利的斗争中的团结和一致的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欢迎的。

(译自 1963 年 8 月 2 日捷《红色权利报》)

苏联共产党——先鋒队、 朋友和战友（节譯）

《紅色权利报》社論

在过去的年代里，苏共同世界各国兄弟党合作，进行了巨大的理論工作和实际政治工作，这些工作成了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政治方針的基础。这一方針体現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討論和制定的文件——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

凡是密切注視国际局势发展的人都必然会看到，力量对比在怎样地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变化，共产党和革命工人党的威望及地位在怎样地巩固和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吸引力在迅速增长。这种情况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綫的生命力及其国际意义和国际有效性的最好证明。整个国际革命运动把这一路綫接受为自己的路綫。这种情况也最好地回答了中共领导人向苏共及其领导进行的沒有根据的攻击。

我們党无保留地贊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路綫及我們党曾参与拟定的两个文件。我們党一贯认为，对苏共的关系是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主要准则。

因此，我們也贊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它为整个革命运动制定了一个重要的文件——苏共綱領，世界上第一个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設的綱領。这一文件的意义是如此之大，以致我們党宣布（接受）它为自己的綱領。因此，中共中央的信中关于苏共将自己的綱領强加于其他共产党的侮辱性的說法，使我們感到恼怒。这种說法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是有人“强迫”誰接受一种与之“格格不入”的綱領似的。

苏共綱領会在哪一点上和我們格格不入呢？为了什么原因呢？我們党在有关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切原則問題上的立場是同苏共的立場完全一致的。难道我們應該反对和平和战争問題的解决、反对苏共綱領中关于两个体系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結論嗎？須知和平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路綫是完全符合我国人民的思想 and 願望的。苏共从当前时代的性质出发，提出了防止可怕的热核战争的可能性；它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列宁主义路綫来反对用热核战争这样的方式解决国际爭端；它指出，經濟是最終决定未来属于哪一个社会制度这一問題的主要領域。这将永远是苏共的历史功績。苏共在自己的綱領中規定了社会主义在經濟上战胜資本主义的具体途徑及其历史期限，这样就作出了創造性运用列宁主义的光輝范例。只有违背列宁的观点，不把經濟看作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斗争領域，或是对社会主义的經濟能力失去信心的人，才会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才会作“从外部”消灭帝国主义的打算。而且他們这样想也是必然的。

如果我們党接受苏共綱領作为自己的綱領，那是因为，我們党的路綫是同它的思想和理論方面的結論完全一致的。因而，它对我們不是“格格不入”的。苏共綱領不仅是从苏共和苏联的經驗出发，而且积累和总结了社会主义各国及資本主义各国共产党的經驗和認識。它是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經驗出发的，因此，它的思想財富是属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拒絕苏共綱領就是放弃爭取共产主义的斗争。

看来，中共领导人提防苏共綱領，不是因为他們沒有看到它在理論方面的結論的国际有效性及意义，而是因为綱領中貫串着創造性的列宁主义，而他們的教条—宗派主义立場是和創造性的列宁主义不相容的。

（譯自 1963 年 8 月 4 日捷《紅色权利报》）

希望最初的牺牲者也是最后的 牺牲者(节译)

安托宁·彼特里纳

“杀死几次”理論的創造者和美国的某些参議員以及瘋狂的將軍們想破坏莫斯科条約，这并不令人惊奇。他們体会到——正确地体会到，这个条約是他們瘋狂战略的末日的开端。

但是可悲的是，某些自称为馬克思主义者并以同样的口气談論“和平”的人，也出来反对这一条約。当然他們所談的和平是世界廢墟上的“和平”。

因为据他們看来，为了“和平的胜利”而作出的任何牺牲都不算是很大的。显然，如果数以亿計的人們死去，他們并不害怕。他們不害怕在苏联、美国及其它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数以亿計的人們的死亡。

他們甚至于不害怕他們自己国内要有千百万人死掉。纵然他們死掉一半居民，总还会剩下相当多的人。

从这种言論产生了“三亿人”的理論(这是剩下来的一半人民)。这一理論与“杀死几次”的理論的区别仅在于它比較粗糙，沒有細致地加工。但是它藐視人命的反人道、非社会主义的实质却是一样的。

* * *

在广島的周年紀念日，我們悼念第一顆原子彈的牺牲者。这是对的。但紀念四十六年前阿芙乐尔号上的水兵們和那些在冬宮前战斗的俄国工人們也許更为正确些。沒有他們和他們的后继者，世

界——如果还存在的话——今天将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是按照“三亿人”的理论化为灰烬，要么是按照“杀死几次”的理论化为灰烬。一个国家——比方说它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居民将只能选择：或“只是”他们中的七百万人被杀死，或“只是”所有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及其四郊的居民被杀死。

幸运的是，曾有过阿芙乐尔号上的水兵和冬宫前的战士。这才使人类不致在受放射污染的废墟上、而是在花园里和热闹的城市里建立新生活。

这也使我们有可能把广岛和长崎的牺牲者作为最初的，同时我们希望，也是作为在使用原子武器的历史上最后的牺牲者来纪念。

（译自1963年8月6日捷《红色权利报》）

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問題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它的团結問題，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在共同通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基础上的团結問題。

关于我們运动的最重大問題的公开討論，已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三年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同他們在一起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下述論点是不正确的；即关于我們时代的特点、避免世界大战、和平共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論点。他們也不同意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人民日报》在1963年2月27日《分歧从何而来？》的文章中写道，至于苏共二十大和特别是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重要問題的观点，“我們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中国领导人签署了宣言和声明——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文件——尽管他們現在不同意这些文件最重要的論点和过去也不同意这些論点。在1957年和1960年他們就此签了字：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不仅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同时他們又在宣称，正是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制訂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些最重要的問題上，他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因为苏共二十大的基本思想是宣言和声明的大綱，中国领导

人对这些文件的解释必然和其他共产党不同。他们自己在国际政治问题中导致冒险的、对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教条主义和片面的解释，来反对二十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声明的基本问题的列宁主义概念。他们对时代的特点、战争和和平问题、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及整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前途的看法，渊源于对当前形势的非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理解和对世界政治的說教式的概念。

中国领导人对声明的所有基本论点都加上自己的解释。他们对声明中确实存在的东西，避而不谈和迴避开来。但是同时把自己的口号塞入声明中去，然后宣称，“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致苏联共产党的信。）也就是说，我们决不应该按照现实存在来理解现阶段的社会过程，而是应该按照中国观察家所看到的现象去理解！

6月14日中共中央信中的观点的第二个方法上的错误在于，他们把现阶段世界革命运动总路线与那些现在有效和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都将有效的共产主义运动最一般的口号弄混了。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便是这样。只要世界上的无产者存在、只要是沒有消灭所有的阶级——由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结果——这一口号都将一直保持自己的有效性。

但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一般的口号本身能够构成我们运动现阶段的战略和策略内容吗？不能。我们运动的一般性口号和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它表达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党人正在遵循和履行这些口号。但是这些口号因一般性特点，因为不能反映出现阶段的特点，它本身不能够成为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现阶段的战略和策略的基础。苏共中央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信中正确地强调指出：“中国同志沒有看到，或是不願意看到，我们运

动的任务在現时代的条件下在如何地变化着。他們把总路綫限制在对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阶段都有效的一般任务上，从而使这条路綫失去了具体性、明确的目的性和真正的有效性。”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古典大师們曾經不断地強調指出：真理总是具体的。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这是列宁主义的要求。

中国領導人在自己的材料中采用的最恶劣的方法之一，便是下述爭取讀者到自己这方面来的方式：他們将反对者从未做过的丑事和沒有的品质加在他們的身上，然后“揭露”他們。这种方法像一条紅綫一样地貫穿在攻击其他共产党的各种文件中，也貫穿在6月14日中共中央的信中。

中国領導同志这样来談論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出現了一些这样的人：他們力图取消馬克思列宁主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力图挽救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灭亡，他們向帝国主义者乞求世界和平，不分敌友，他們完全离开了阶级分析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禁止核試驗条約的声明，是中国领导同志反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团结、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主义和平政策的分裂活动的最新证明。在这个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顛倒黑白。它把奉行和平政策說成是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全世界人民的政策！中国領導人以这一声明表明了自己最恶劣地歪曲事实和顛倒黑白。

中国工作人員——特别是外交官——在全世界散发侮辱各国共产党的材料。他們逢人便送——在机場、在旅館和在各种中心。为此目的他們并把这些材料用几十种語言印成小册子。资产阶级的报纸不吝篇幅地登載这些材料并且是这些材料的最狂热的传播者，由此可以看出，中共領導的观点在怎样为共产主义运动服

务。他們这样做是为了在劳动者中間制造混乱。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却責备其他共产党借助多数来推行自己的路綫和奉行分裂政策，并宣称自己捍卫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至于这种“加强”是怎么回事，苏共中央的信提出了一系列证据。而新的证据也接二连三地出現。从比利时共产党中开除出去的四名中国路綫的拥护者，拥有大量資金，他們使北京的著作在党员周围泛滥，并打算開設“馬克思列宁主义”书店。对中国领导人的上述方法和言論能說些什么呢？与具有同一世界观和在堡垒同一边的人們不是这样进行爭論的！

中共领导以其对各国共产党的攻击和对当前形势的估价，陷入到自相矛盾的局面。如果中国报纸关于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話是真实的，那么就必須把他們作为“彼岸”的人来看待，而决不是把他們看作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战友了。如果按照中国领导人的看法絕大多数的共产党不是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照，那么，由此他們也就否认了自己关于世界力量对比在朝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变化和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发展的論断。要么是革命过程确实正在进行和正如中国领导人自己所强調的那样，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和和平的力量正在增长，力量的对比正在朝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变化，或者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設和阶级斗争的加强正在沒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情况下、甚至是在违背各国共产党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着。究竟是怎样呢？

首先是这样的：中国领导人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綫的攻击中，在感觉到了自己立場的弱点的同时，他們把与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格格不入的“观点和实践”强加在它們头上，然后与它們“斗争”。怀有个人野心和目的的中国领导人，不惜一切地去批評其他共产党和他們的领导人，所以例如把联合帝国主义和战争力量反

对社会主义和和平力量加在他们头上。当然，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真正的分歧，但这些分歧，会在正确判断分歧问题的过程中和在世界客观关系的发展、群众及各国共产党的实际斗争过程中消除。

但是，正如捷共中央的声明中所强调指出的，我们坚决拒绝中共中央想在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中推行教条一宗派主义路线。我们坚决拒绝他们的不正确的斗争方法及中国领导置于其他党之上的企图。每一个共产党的义务是坚定地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时刻考虑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一致行动的利益。

* * *

中国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分歧内容的基本问题，是革命过程现阶段中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在我们的条件下，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是与这个问题密切相联的。所以这样，是因为争取和平的斗争成了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这便是其主要内容为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逐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我们时代的特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学说是制定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正确的战略方针的科学基础。只有尊重社会客观规律的影响的人，才能够制定革命工人运动的正确战略和策略。相反地，企图不考虑客观规律的作用而制定战略路线，这将导致主观主义、冒险和运动的失败。

但是，不考虑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只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也不能制定战略路线。不考虑特殊的历史条件同样也意味着脱离现实或把战略和策略局限为提出不同阶段的共同任务。必须现实地看待事物，必须以符合变化了的情况的方式去捍卫革命事业。

考虑某一阶段的特殊条件的要求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没有例外地客观地估价某一社会的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次，估价这一社会的客观发展阶段；第三、估价这一社会和其他各社会，

即其他經濟結構之間的相互关系；第四、应不是靜止地，而是以发展——其規律渊源于每一个階級存在的經濟条件——的眼光看待所有的階級及全部社会經濟結構和国家。这些原則既适用于制定一个国家的无产階級革命战略和策略，又适用于世界革命过程。

如果制定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必須考虑到：在国际范围内各階級之間的相互力量对比，不同社会經濟体系国家間的力量对比，它們的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客观发展阶段，最后必須考虑不同体系国家力量对比的发展方向。所以，制定国际工人階級的正确战略和策略自然而然地要以正确判断时代特点为前提。同时时代的定义应規定和強調指出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

我們不能預見这个或那个革命运动将如何迅速发展。这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实践問題。但是我們知道，那一个階級站在某个时代的最前列和确定它的发展的主要内容和方向以及这个时代的历史形势的主要特点。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考虑到不同时代的主要不同特点，我們才能正确地制定战略方針。所以正确地鉴定时代特点具有巨大意义。世界共产主义的战略路綫和策略，特别是每一个共产党的战略路綫和策略，与时代的特点相联系。列宁指出，在馬克思主义誕生之后，世界历史中的三大阶段（1848至1871年、1871至1905年、1905至1917年）的每一个阶段都为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的证实和新的胜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時代，为馬克思主义带来了更大的胜利。从主要的原动力这一角度出發，十月革命之后的时期，明确地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开始，第二个阶段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誕生和巩固相联系。

所以，我們的現时代已不仅仅是“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時代”，而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時代，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

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愈来愈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工人党和共产党的声明强调指出，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成果——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居于现时代的中心。作为它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同盟军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工人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同志在自己6月14日的信中提出自己特殊的总路线（在信的第二点中）。难道他们的这一建议不是从制定战略路线的列宁主义原则出发，为什么他们虽然口头上强调坚决捍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必要性，而却避而不谈声明中关于我们时代的特点的理论性结论呢？

了解共产党国际会议的具体内容和过程的那些人，在读中共中央最近一封信时，感到这一事实很明显：中国同志在自己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中，只援引国际文件中的那些当时他们自己所建议的说法。对声明中的其他全部东西，对声明的绝大多数原则，他们完全避而不谈。例如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它不是与世界大战相联系而产生的，而是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条件下产生的——的问题就是这样。

完全可以这样质问：如果宣言和声明代表我们运动的路线，如果正如中国同志在信中自己所强调指出的，“坚决保卫宣言和声明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任务”，那么中国同志为什么认为有必要提出我们运动的路线的新建议呢？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避而不谈声明的绝大多数内容，这已是向后退了很大的一步，且不谈它歪曲声明、提出完全不正确的看法和攻击各兄弟共产党了。

中国同志为什么避而不谈包含在声明中的现时代的特点呢？

所以这样，难道不是因为 1960 年他們在《列宁主义万岁！》这一材料中写道：“原子能、火箭等等这些新的技术都沒有象現代修正主义者所說的那样，已經改变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階級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嗎？当然中国同志也談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但是只談数量范疇內的变化，而决不談质量范疇內的变化。對他們來說，这些变化的总和还未达到新的质量水平，沒有达到即将出現新时代的界綫。

中国同志迴避声明中关于現时代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的基本論点，这不是偶然的。如果他們把这些論点作为自己的盾牌，那么他們就不能够宣称，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它的規律就象过去一样地保持其有效性。是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它便保持着自己的侵略性，难道世界社会发展只是帝国主义的規律所决定的嗎？完全不是，这是因为，在我們的时代，两个对立体系的竞赛过程和結果决定世界的发展，这是因为現代帝国主义的規律只能对有限的空間发生作用，这是因为反对帝国主义規律的社会主义規律在發揮着作用。

中国同志避而不談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論点。他們认为應該強調另外的論点来代替这个論点，即強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統治最薄弱的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信中的第八点），“国际无产階級的革命事业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轉移。”（同上）

这些地区确实是集中了矛盾、是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环节以及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地区嗎？上述論点全部是不正确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并不集中全部矛盾，它們不是这些矛盾的焦点。难道能够忽視这些大陆的数十个国家的內部及外部条件

的独特性和不同性嗎？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存在着有組織的和集中的无产階級，以便使这些地区成为集中所有矛盾，首先是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的中心嗎？由于一系列原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不是也不能是现代矛盾的中心。这种論点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掩盖着各个国家的任务的特殊性。

同样也不能說，在目前条件下上述地区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难道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已提到日程上，以使用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在这些国家中的帝国主义統治，即现代资本主义了嗎？

关于上述地区是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国际无产階級的事业以它为轉移的論点在貶低工人階級的作用，这不是无产階級的階級立場，而是革命的民族主义立場。按照这种論点，世界革命的決定性力量不是国际工人階級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是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信的上述論点顛倒事实和唯物主义的辯证法問題，即按照这点，对革命來說決定性的不是质量方面，而是数量方面。按照中共中央的信決定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所在地的不是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总和和階級力量的对比以及矛盾的尖銳性，而是居民的数量。

虽然中国领导人只向为爭取自由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致以“战斗的敬礼和团结的感情”，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国家給予經濟、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领导人却还教訓別人，說社会主义国家应“支持它們的革命行动和把它們的解放看作对自己的最可靠的支援”。似乎社会主义国家沒有这样做，似乎中国领导人“忽略了”菲·卡斯特罗的这句名言：“苏联正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它过去和現在都給予古巴人民以巨大帮助。沒有苏联的帮助古巴将不能抵制住帝国主义的侵略。”

只是令人奇怪的是，鞭策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亚洲和非洲人民

的中国领导人，却断然抗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参加在坦噶尼喀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会议。这莫非是因为他们想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否认我们的帮助？他们宣称只有他们坚决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只是“阻碍、扰乱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这不是偶然的。在中国同志的类似的名言和行动后面，很难不看到他们企图在亚非各国人民的眼目中贬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给共同的事业、进步和自由造成损失。

中国领导人关于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形势、国际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世界取得胜利的道路的不正确概念，是与拒绝现代实质上新的特点与低估这一时代的基本矛盾——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意义和作用相联系的。中国领导人把我们时代的矛盾的尖锐化问题同这些矛盾的加深和尖锐化的形式问题弄混了。

我们强调指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正在加深和尖锐化。但是，这些矛盾的加深和尖锐化表现在什么地方，这是另一个问题。只局限于夸大一种斗争方式，即军事斗争方式，并从而强调用战争解决基本矛盾和其他矛盾的不可避免性，这是正确的吗？但是，须知，今天矛盾的加深和尖锐化表现在斗争形式的增加方面（而这不仅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而且也在资本主义本身内部，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和新的殖民主义等就证明这一点）。除此以外，社会主义——随着自己力量的增长——正将那些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的斗争形式，强加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其他矛盾正日益更加紧密地交织起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进程的影响不断增加。

社会主义正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内抵制着资本主义，同时斗争形式更日益多样化。但中国领导人不论是在一国范围之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均把矛盾的加深和它的解决仅仅局限于一种斗争形

式——武装斗争形式，即战争。

基本上可以把解决分歧的形式归结为两种：武装形式和和平形式。我们通过怎样的形式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对我们来说能是漠不关心的事吗？

中国同志也表示拥护和平和和平共处。但是他们不把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的主要路线，而只是作为这一政策的因素之一。他们甚至给予军事方式解决矛盾以优先权。他们的这一臭名远扬的论点便是证明：“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他们常常引用这一论点。最后一次在1963年3月份的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中引用了它。）

在理论上可以估计，帝国主义军事上的失败会在世界上激起革命情绪。但这种失败本身还不意味着建立社会主义和为它的胜利创造必要的前提。

至于实际方面，中国领导人贬低现代热核战争对各国人民的后果问题。他们不愿意看到，现代武器已改变了战争性质。我们在这里不去谈这种战争的社会经济原因，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永远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关系到热核战争军事技术性质的改变，这种战争就其性质来说，是新的战争现象，决非仅仅是新的世界战争。

今天，原子武器的储备已远远超过它在使用方面的需要。比如，当前世界原子武器的储藏量的3%就足以全部摧毁美国。正如英共今年1月份的声明中所说，“对英国来说，原子战争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灭亡。那么谁剩下来在具有放射性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呢？”1956年8月中国人民中国的国防部长宣称：“我们不害怕原子战争。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即使由于原子武器而牺

牲二亿人，还剩下四亿人活着。即使有四亿人牺牲，还有二亿人活着。如果剩下二亿人活着，中国将仍然是一个大国。”

这便是导致中国活动家低估核战争后果的大国主义野心。但是，尽管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能只从远方和在主观主义的概念基础上判断事物。例如，上述牺牲的数字从何处拿来的呢？为什么正好是二亿或四亿，为什么不还多一些呢？这难道不是像对世界热核战争后果这样严肃的问题的主观主义态度吗？

正如郭沫若今年3月18日在《关于历史学家的任务》（见3月26日的《广西日报》）的讲演中所说的，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是现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自称为最进步的列宁主义者的那些人，应该知道列宁怎么谈工人和农民在战争中遭到的痛苦和为避免战争做些什么。列宁强调，我们极其清楚地知道，战争为工人和农民带来骇人听闻的痛苦。“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7—328页）究竟谁具有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呢？

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许多点中写道：“这是我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意见”。尽管他们有这样大的野心，他们也不应该将自己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上，反对它和忘记列宁的指示；只有考虑到各个时代（而不是在各国历史上的个别的插曲）的主要特点，我们才能制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各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共同纲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宣言和声明。任务是在日常的斗争中捍卫和实现这些文件中的思想。捷共十二大致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信中说：“为了我们思想的胜利，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为了今后顺利的斗争，在当前需要为加强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为在实践中坚决贯彻我们

共同通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的決議而斗争。”我們的革命理論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和对它們进行不断的对照，这有助于所有共产党的团结和巩固这一团结，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有助于創造性地运用这些确保和平和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胜利的原則。

（譯自 1963 年 8 月 6 日第 16 期捷《党的生活》杂志）

广島大会和它的阴影

M·馬德爾

广島禁止核武器大会已有伟大的传统。从1955年以来，人们每年都在美国原子弹的悲剧降临这个不幸的城市的那一天，在广島举行大会。今年的国际大会是在这一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时候举行的；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三大国的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

看起来，似乎一切具有善良意愿人们的这一重大成就，将激励广島会议的参加者在紧密的团结中进而为实现导致全面彻底裁军这一道路上的其它目标而努力。

遗憾的是，并没有这样。中国代表团滥用了大会的机会将自己的反和平观点强加于和平代表们。中国代表团就像不久前在莫斯科世界妇女大会期间一样，为了自己切身的和狭隘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扰乱和破坏争取和平的战士的统一战线。

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在广島就曾企图按照种族原则把代表们分开。他们从外部将分裂带入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中，这种分裂在三月份猛烈地爆发了，由于这点直至今天这个重要的组织还未苏醒过来。它甚至于在广島大会的准备工作中也未能统一行动，因而把会议的举办工作交给了地方分支机构。

中国代表赵朴初今年的发言是荒谬、伪善和侮辱的大杂烩。他选择了那份禁止核试验和苏联的外交政策作为自己居心不良的攻击的主要靶子。他没有费力去找论据，他也很难找到它。因而中国代表团也就更加热心地利用它从北京带来的那几个人，并把他

們說成是“各國人民”的代表。中國代表團以極端侮辱性的方式向社會主義國家和其它國家的代表們表示，“在大会上沒有他們的事”。

正如捷代表所指出的一樣，趙朴初的發言是對廣島的死者的侮辱。我們可以這樣質問，趙朴初為什麼沒有更多地向大會的參加者及廣島的居民闡述“原子彈是紙老虎”和“原子戰爭完全不可怕”的理論呢？或者廣島的人民會在新的廢墟上建設起“千百倍美好的未來”？如果這樣的話，那肯定會更坦率些。只是在這以後，他和他的同伴們會一小時也不能在廣島停留。他們沒有這樣做，而是用攻擊蘇聯來掩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願意參加禁止核試驗條約。

中國方面說，在廣島大會上“一些人揮舞指揮棒和採取了分裂行動”。確實是這樣，只是把人搞錯了。如果中國代表們用他們這面照別人的鏡子照了自己，他們在鏡子中看到的，將會是他們自己。

他們在廣島的表現和行為違背了中國代表團在去年世界和平大會上表示贊同的東西。違背了眾所周知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文件。最後還和整個愛好和平的人類接受莫斯科條約的感情相矛盾。莫斯科條約本身作為愛好和平的力量為爭取具體的裁軍步驟、爭取全面禁止和銷毀核武器、爭取全面徹底裁軍的進一步鬥爭的出發點，有着無容置疑的意義。廣島（發出的）警告一直栩栩如生，它的慘劇鞭策着人們去進行不懈的努力和鬥爭。應該歡迎、支持和發揚一切使原子武器不再成為千鈞一髮危險地懸在世界上空的時代趕快到來的努力。莫斯科條約是在這一正確的和必要的方面的不容置疑的步驟。

（譯自 1963 年 8 月 9 日捷《紅色權利報》）

現时代与国际工人階級的策略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一、两种途徑

作为大多数共产党与中国领导人之間辯論对象的基本問題是，世界革命进程战略概念問題以及与之不可分割地相联系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問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根据当代的历史条件和資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开端，制定了自己的理論与策略文件——自己行动的、革命斗争的和建設新社会的具体綱領。

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阶段也符合于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是由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苏共二十大关于关键性的国际問題的原則性的論点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指出了維持和平斗争的新道路和新手段，指出了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世界革命变革的新的前景。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強調指出，苏共二十大历史性決議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1957年和1960年，中共中央代表团也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文件上签了字。尽管这样，但是《人民日报》1963年2月27日却写道：至于說到苏共二十大及其对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若干重大原則問題的观点，我們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而由于苏共二十大关于我們时代基本問題的結論是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文件的核心，

中国领导人对这些文件作出与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完全不同的解释,那就是自然而然而又合乎逻辑的事了。

由于中国领导人想掩饰自己綱領的特殊的派系的特点,于是把自己打扮成声明的始終不渝的革命的保卫者,把別人的功績归于自己——有时对别的党提出的、中共领导人过去曾反对过的建議表示贊成——在許多問題上力图給予声明以不同的內容:这个文件真正包括有的东西他們則緘默不談,同时并把自己的口号塞进声明中,硬說:这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由于这样就存在着两个世界革命发展的战略概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念和中国领导人的概念。

二、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列宁主义原則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有着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世界經濟和世界市場的发展、生产力的国际化和对生产資料的一定关系属于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客观上把各民族的工人階級队伍联合成一支反对国际資本势力的国际无产階級大軍。由于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体系——資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这便把上述过程的发展提高到新的基础上。

科学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結——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及其实际的貫徹属于国际工人运动共同战略与策略的主观因素。

只有尊重客观和主观因素才能正确地制定国际工人階級的战略和策略。只有这样的战略和策略才表达出共同的利益、目标和意志,才能确保整个国际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的行动一致。

战略与策略当然不能改变历史客观趋势的整个发展方向,但是随着对上述趋势注意与否就可加速或阻碍这种发展。因此,从

达到工人运动的目标角度出发,极为重要的是,正确理解社会发展规律、我们运动的目标及其整个任务。但是这些资料的总和远远还不足以制定各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然而中国同志在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建议时,仅仅满足于这种最一般性的资料,只局限于我们运动的最普通的口号上。因为这些口号没有抓住现阶段的特点,当然它本身就不能成为规定现阶段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战略与策略的基础。因此,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信中完全正确地着重指出:

“中国同志不注意或者不愿意注意,我们运动在现阶段条件下的任务是怎样变化的。由于他们把总路线仅仅局限在适合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个阶段的一般任务上,因此使这条路线失去了具体性、目标明确性和真正的有效性。”

究竟必须怎样着手制定战略和策略呢?对这一问题列宁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

“马克思完全按照自己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全部原则,规定了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只有毫无例外地对一定社会的所有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作出客观的评价,对这个社会的客观发展程度以及这个社会与别的社会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评价,才能成为最先进阶级的正确策略的基础。同时不是用静止的而是用动的眼光去看待所有的阶级和所有的国家。”(必须指出,列宁经常地——正如在这种情况下——用“策略”一词来代替“战略和策略”。在整个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以及在政治行动的意义,即在相当的时刻内的斗争形式与斗争组织这种意义上也曾用过策略这个概念。这篇文章的标题也是在这两种意义上使用“策略”一词的。)

在制定战略和策略时,必须考虑到:一定社会所有阶级相互关系的总和,这一社会的客观发展程度,一定社会(社会经济结构)与

其他社会的相互关系，各国阶级与国家间关系发展的趋势。

上述列宁的指示既对制定一个国家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有效，也对世界革命进程有效——当然要作相应的改变。这就是说，还必须注意到相互关系和国际范围内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当然也要注意各个阶级以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力量对比发展的动向。

实际上这意味着，正确的表达全人类正在经历着的历史时代的特征，应该成为制定国际工人运动战略与策略的基础。

时代特征应回答哪些问题呢？

(1) 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一定时代的历史情况的主要特点。

(2) 各个“时代”主要不同特点是什么。

(3) 如果我们仅仅注意各个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插曲，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

(4) 对当前时代主要特点的了解是各个国家唯一能够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础。

根据这些原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规定：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成果——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现时代的中心。我们时代的主要特点在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决定当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方向和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

中国同志在1963年6月14日信中回避莫斯科会议这些结论。他们闭口不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不谈资本主义总危机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他们缄默不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些结论，是因为这些结论不适合于他们的“总路线”。要

知道，不然的話；他們會不得不承認國際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不斷增長着的作用與影響的，而且這些作用與影響不是與世界大戰相聯系，而是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的條件。因而他們閉口不談聲明的基本思想。這樣，當然就在國際工人階級理論和策略問題上大大退了一步，更不用說對各國共產黨的攻击了。

中國同志的理論根據證明，他們把現時代理解為帝國主義、戰爭和革命的时代。但是這種對特征的描述已經不符合於當前的條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所發生的歷史變化。我們的時代“是兩個對立的社会體系鬥爭的时代，是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國主義崩潰、殖民主義體系消滅的时代，是越來越多的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时代”。

帝國主義早已不是包羅萬象的世界體系了。環繞着世界的帝國主義鏈條，不僅在一個環節上，而且在一系列地方被打斷了。帝國主義已不能象以往那樣將自己的法則強加在世界頭上了。當前世界力量對比，有可能用完全新的辦法解決人類最重大的問題——向新制度過渡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首先有可能制止世界大戰，而這不僅是一天兩天的，而是根本地制止！

中國同志反對分析以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社會主義與和平的變化為特征的新形勢，反對由此而得出的關於共產主義運動和戰爭的結論，他們喋喋不休地重復帝國主義本性沒有改變的說法，指責其他共產黨忘記了這一論點，對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抱幻想。共產主義運動當然對帝國主義不抱幻想。帝國主義本性未變，但失去了相當大部分的進行侵略的可能性。對帝國主義作任何其他的估價——不把帝國主義本性与可能性這兩個方面作為估價的基礎——都是教條主義的、死板的估價，都不能動員力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制止戰爭。

失败主义使得中国同志不去寻找反对帝国主义、制止战争的最有效的斗争手段和方法，对真正不倦的和平战士采取高傲的态度，不进行争取和平的日常斗争，而只等待大事、“大危机”的到来，这种“大危机”虽然会导致帝国主义的灭亡，但也会使人类的相当大部分遭受毁灭。对现时代特点进行教条主义的估价会导致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高。中国同志可笑地指责各国共产党“害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让步”，而自己却过高估计现代帝国主义。例如，在信中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受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在离社会主义国家主峰几千里的地方建设社会主义的古巴同志强调指出，当前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超出了地理上的距离，这种威力是每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包围面前的保障。但是中国同志对包围的公式主义的理解只能证明，他们过高估计帝国主义力量，否认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世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事实。过高估价帝国主义，就使得中国同志得出结论：帝国主义由于侵略本质未变，因而可以为所欲为。换句话说，由于帝国主义力图发动战争来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因而也就可能发动起这一战争。这一战略结论使中国同志产生宿命论和冒险主义。

三、正确理解现代矛盾的意义

中国同志在文章中指责某些同志对当前存在的世界矛盾一窍不通，不懂得这些矛盾的焦点何在。

由于对时代特征的描述只是为制定战略路线提供总的基础，由于只有分析时代的一切矛盾及其相互影响与发展，才能正确指出阶级力量分布的状况；因而让我们来看一看：矛盾问题是怎么回事，中国同志是怎样理解这一问题的。

拿我們时代的基本矛盾——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問題來說吧。这个矛盾产生的基础是資本与劳动之間的矛盾，資產階級与无产階級之間的矛盾。在現阶段基本矛盾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不仅存在資產階級国家，而且无产階級也在一系列国家建立了国家政权。

基本矛盾的发展对資本主义体系本身內部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这一矛盾的影响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了，建立了民族国家，資本主义国家的階級斗争得到了发展。在这一矛盾的影响下，資本主义进入了总危机的第三阶段——它的內部矛盾的第三阶段。

中国同志是否特別突出这一主要矛盾，是否根据事实来分析这一矛盾的作用与发展呢？沒有。他們在6月14日信中說：

“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这些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的矛盾；資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垄断資本集团同垄断資本集团之間的矛盾……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至于說社会主义陣营与帝国主义陣营的矛盾，毫无疑問是“很尖銳的”。

全部引文中只有矛盾的罗列是真实的。至于說这些矛盾的分类，上述引文有許多严重的不确切之处。这絕不是偶然的！

首先，按照中国同志的看法，所有的矛盾都是主要的矛盾。如果所有的都是主要的話，那我們还要“主要的”这个概念干嗎？中国同志把所有的矛盾都当作主要的，从而使那个真正的主要矛盾淹沒在这些矛盾之中。

第二，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的矛盾是“很尖銳的”。但是，其它矛盾也是很尖銳的。要知道，中国同志自己要我們确信，矛盾在不断地尖銳化！为什么基本矛盾（虽然“現代修正主义者”

作了努力)不應該也是尖銳的呢?

第三,在談到兩個體系的矛盾的地方,中國同志僅僅使用政治術語,好像那只是關於不同的政治聯盟一樣。從而他們就宣傳起考茨基式的對帝國主義的理解以及對基本矛盾作片面的、軍事政治的理解來了!帝國主義畢竟不僅僅是政治統治的體系。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的、最後的階段,其基本特征是壟斷統治代替了自由競爭。壟斷資本與資產階級國家的國家機關溶合在一起和帝國主義國家壟斷聯合的出現等事實並不影響帝國主義的經濟本質。把帝國主義僅僅縮小到壓迫、首先是政治統治上,這不是列寧主義觀點。中國同志縮小帝國主義本質這點就大大地說明了,為什麼他們只片面地強調用武力解決矛盾,而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與經濟競賽的列寧主義原則推到一旁。

無疑,被壓迫民族依靠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以及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援助,將戰勝帝國主義的壓迫,推翻國內外剝削者,建立起真正的人民政府。但是僅僅用劍是砍不掉資本主義的根子的!這個問題歸根到底要由經濟性質的措施、建立新的生產與分配方式、更高的社會勞動生產率來解決的。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歸根到底將通過兩個體系的經濟競賽來解決,在這一競賽過程中,社會主義將表現出對資本主義的優勢。這點普遍有效,而尤其在今天——當社會主義已成為世界體系,通過世界熱核戰爭解決矛盾已失去任何合理性的時候,更為有效。

我們看到,中國同志低估現時代基本矛盾的作用。他們無視這一矛盾對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鬥爭、對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發展、對帝國主義者與被壓迫民族之間矛盾的發展的影響。

中國同志為了證明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戰爭是客觀的必然性,便說,從帝國主義國家直接利益出發,這些國家之間的衝突比它們

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更加迫切。过去确实如此，但这是三十年代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期，而这还是作为“奇怪的战争”而爆发的，之所以奇怪，是因为法帝国主义者和德帝国主义——他們的军队对峙着——于1939年秋在苏联身上打主意比他們相互間的斗争还多。强调关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比当代的基本矛盾更为迫切的论点，意味着不顾条件变化机械搬用历史經驗。

中国同志們的这种想法意味着低估在世界社会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者的阶级团结以及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战争的危險。帝国主义国家間的战争冲突就是今天在理論上讲也是可能的。但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建筑在这种空洞的抽象之上是徒劳地做学校练习。

中国同志們把帝国主义者和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各民族之間的矛盾看做当代基本的和最迫切的矛盾。他們在这里看到了一切矛盾的焦点，所以把亚非拉地区当做帝国主义链条上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当做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信中的第八点）。所以同样他們写道：“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取决于这些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果”。

直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指出，革命运动的中心可以从一国轉移到另一国；从法国轉移到德国、从德国轉移到俄国。这里沒有必要来分析这个问题，即：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前夜俄国成了一切矛盾的焦点和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的一环。对于当前的形势和对于同中国同志們进行辯論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第一个国家——苏联取得胜利以后，世界革命运动中心的概念正在起着质的变化。十月革命开始了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苏联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基地。在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和外国干涉者之后，建設社会主义

就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这无论对于苏联本身来说，还是对于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来说都是这样。1921年5月列宁就曾经写过：“现在，我们是用自己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给以主要的影响。所有的人，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都毫无例外地（绝非夸大）注视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我们的成就。资本家要想隐瞒和掩盖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他们就拼命寻找我们在经济方面的错误和我们的弱点。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地最终地取得了胜利。”

从而苏联便成了世界革命发展的基地和策源地。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出现以后，策源地的概念便扩展到这个体系，它同时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中国同志们曾在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作用的文件上签了字。此外，他们曾经大声宣读过，必需捍卫声明中的原则。所以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违反这个文件，而把世界三大洲做为世界革命的焦点，尽管在这些地区内，革命的发展正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

这样一来，我们丝毫也不低估民族解放斗争——国际工人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同盟者——的作用。

但是因为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首先不是通过民族解放革命来解决的，因为民族解放运动不能直接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不能起世界革命领袖的作用，而是起国际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场斗争中的同盟者的作用。

在开展世界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当代阶级相互关系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革命的领导者，为自身的民族、政治和经济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和世界革命的强大力量。

* * *

中国同志对制定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时代的特征意义估计不足；不分工人运动的最終目标和战略任务，因而他們混淆或者閹割战略的对象；在确定自己的战略概念时，不是用列宁主义的方式评价当代矛盾的内容、意义和互相影响；此外，形而上学地使战略和策略对立起来（在战略上藐視敌人，在战术上重視敌人）。

但是，这意味着中国同志沒有制定战略和策略的理論基础嗎？决不。中国同志离开了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原則。但是他們有自己关于我們的时代、世界舞台上社会力量的分布、斗争的主要任务和方法的理論概念。他們也有自己关于革命发展的阶段和速度的特殊概念。

四、解决矛盾的形式

中国同志們的战略概念突出地表现在解决当代矛盾的形式的問題上。

中国同志們指責其他共产党人，說他們掩盖了当代矛盾的深度和尖銳化。但是事情与中国同志們所描画的根本完全两样。每一个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当代矛盾正在逐漸加深和尖銳化。但是問題在于，这一事实是在什么样的形式下产生的。这一点对于解决矛盾問題具有巨大意义。与此同时，馬克思主义者是看事物的真正的本质的，他們是用符合于变化条件的那种形式来进行革命事业的。中国同志們無論在國內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都把矛盾尖銳化的問題仅仅与解决这些矛盾的軍事形式联系起来。

中国同志們不想承认，在当前条件下，矛盾的逐步加深和尖銳化是表现在各社会經济体系間斗争形式数量的增长上；表现在各种矛盾的交錯上和社会主义对于在非社会主义世界正经历的过程

逐漸增長的影響上；表現在世界社會主義把最適合於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的鬥爭形式強加於敵人的這種可能性的增長上。

中國同志們對於解決不同矛盾的形式持有這種觀點：革命的中心任務和它的最高形式是通過武裝道路和戰爭奪取政權。這一革命原則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其他國家，都是無條件地正確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用民族解放戰爭的方法來解決的。他們說，我們是一般革命戰爭的擁護者。戰爭是人類通過它進入不再有戰爭的歷史新時代的一座橋梁。

他們的臭名遠揚的論點，形象地談到世界原子戰爭的“優點”：“勝利的人民在帝國主義的廢墟上將極其迅速地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這是他們先前的論點的最徹底的发展，即：只有用槍杆子才能改造世界。

低估這種解決矛盾方式的後果是有其心理的、歷史的和政治的原因的。可以簡要地說，這是對一定的概念和利益的絕對化、是將從一定國家的立場出發所制定的革命戰略觀念強加於國際工人階級的企圖。但是，我們用列寧的話來回答：正確的戰略和策略是不能僅僅在個別國家歷史上的個別插曲的基礎上來制定的。

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革命政黨從搗毀舊社會的任務（內戰和用武裝力量鎮壓被推翻的剝削者）向進行經濟和文化建設任務的急劇轉變，是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觀點的根源。這種轉變，特別是在經濟落後和被戰爭破壞荒廢了的那些國家里，意味着在黨的政策上的極度尖銳的轉折。這裡，有一些領導人，他們不去重新確定方向，以便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精神來理解社會存在、發展的客觀邏輯，從而使他們自己和群眾的意識適應於這種發展；反而企圖在使物質條件來適應於在鬥爭的前一階段他們所掌握了的那種思維和行動方法。所有這一切都促使某些領導者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在本國和在世界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這樣就產

生出了极端革命的不耐心和冒险情绪；物质条件的贫困在一定国家某些领导者的意识中正在转变成哲学的贫困。

五、和平共处政策中的战略和策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从当代客观条件出发，捍卫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是其国际关系的总路线的立场。从问题的提法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

中国同志提出了另外的问题。他们把和平共处当作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因素之一，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援助和合作的问题——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虽然他们的做法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的——同它相对立。但是这样提出问题表明，我们的论敌至少是改变辩论的题目。如果我们谈到和平共处，我们考虑的则一直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清楚，对于国际工人阶级各支队伍之间的关系来说，最高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不是和平共处。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承认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是自己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从这些观点出发的：

(1) 共处是当代的客观事实。

(2) 社会主义不能一下子同时在资本主义体系各国或大部分国家取得胜利。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将通过一个个国家逐渐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道路来发展。因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将适用于很长的历史时期。

(3) 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形式，因为它包括不同社会体系国家相互关系和矛盾的问题。它们的争执不应该通过武力来解决。但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共产党人不排除世界舞台上两个体系武装

冲突的可能性。

(4) 因为帝国主义还保持着自己的侵略性，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保持最高的警惕是必要的。

(5) 对立力量的相互对比，社会主义和和平力量的增长，使得能够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糾紛的整个时期，直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时止，实现和平共处。

(6) 馬克思主义者考虑到社会主义原則的优越性及其最后胜利，把和平共处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經濟竞赛結合起来。

(7) 和平共处作为阶级斗争的形式把千百万人民群众拉到自己的圈子里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反对本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为反对侵略政策而斗争。新的民族国家为反对帝国主义者破坏其独立和主权的企图而斗争。民族解放运动总的来說为反对帝国主义輸出反革命的企图而斗争。因此，和平共处是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因素結合在一起的。

和平共处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和文化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的开展創造有利的条件。和平共处束縛侵略力量，因而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发展創造条件。因此，宣言有权指出，战争或和平共处的問題是世界政治的关键問題。中国同志縮小和平共处的意义，这就修正各国共产党共同通过的文件。

和平共处的战略目标是发展世界革命运动創造有利条件。主要打击是針对着帝国主义及其最富有侵略性的势力；主要的方向是为和平而斗争。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的最强大的力量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各国工人阶级。它們的同盟者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在这些力量联合行动的过程中，必須鍛炼出最多的为和平而斗争的战士，紧紧地束縛侵略势力，防止世界大战，达到长期的和平共处——这是社会主义进一步胜利的有利的历史背景。

中国同志不同意这个战略计划。他们特别攻击全面彻底裁军。这样，他们就是迴避反帝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问题。但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在符合发展的需要和人类的利益、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具体口号的基础上进行。列宁提出问题：什么是革命群众的斗争目标。“他们或者把这当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或者直接承认，这个目标就是‘社会主义’。他们使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对立起来。但是，这正好是（理论上）最不合乎逻辑的和实际上最空洞的……现在谈的不是两个社会体系的一般对立，而是具体的‘革命的群众斗争’的具体目标。‘革命的群众斗争’的具体目标在目前条件下恰好是为和平和全面裁军而斗争”。

是的，中国同志也说，他们是赞成裁军的。中国政府不久以前的声明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提出自己建议，仅仅是出于宣传的理由，据说也是为了鼓舞各国人民，“揭露”帝国主义。他们不属于那些“相信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建议”的人。

但是，拥护马克思关于改变世界和关于改造世界的思想的物质力量学说的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的口号必须从事物的客观情况出发，必须是现实的。换言之，宣传的口号必须同时是行动的口号，而不仅仅是宣传教育的空洞言词。全面彻底裁军就是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口号。

当争取和平的运动是拥护和平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最广泛的联盟时，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把反战士的各支队伍分开来并使它们对立起来的企图只有利于战争贩子，此外，也损害各支队伍争取其特殊利益的斗争。把亚非各国人民的斗争和反对战争的共同斗争分割开来的企图，在客观上不仅有损争取和平的斗争，而且也有损亚非各国人民本身。这些国家的人民的特殊任务不能在孤立

的，脫离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爭取和平的斗争中取得解决。

在爭取和平的斗争的問題上，把資產階級当作統一的一群人來对待的企图也是不正确的。特別是在和平的問題上，各种資產階級集团不是一致的。这指的不仅仅是受垄断資本排挤的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大資產階級也不是統一的。其侵略集团是各国人民和和平的主要敌人。但是这个資產階級的其他集团对世界力量的对比和世界大战的后果的估計上，或多或少是现实的。

正如从中共中央 6 月 14 日的信中可以看出的，中国同志不同意分別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資產階級；而他們却將亚洲的某些王公置于自己的保护翼下。

但是和平共处成功的战略的利益要求建立最广泛的反战战綫，爭取一切能为反对世界核战争的威胁而斗争的人。在这条战綫的形成过程中，那些必然提出民主改造社会和持久和平作为自己的目标的力量將得到充分的发展。

爭取和平和裁軍的斗争能够使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地进行对外政治活动。須知，对帝国主义者的压力特別表現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一定的政治外交关系的过程中。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外交活动，用怎样的方法和手段进行工作，起着无限的作用。

如果說社会主义力量及其同盟者的主要打击方向的問題是爭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的战略方面的問題，那么选择手段和方法的問題就是策略方面的問題了。当然，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必須互相結合。战略目标确定斗争的手段和方法的性质，也确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策略。如果这种策略不符合战略目标，这就会使达到这些目标受到威胁。簡而言之，和平共处的策略也必須符合它的战略。如果战略指向防止世界大战，那么策略就努力寻求解决威胁和平的冲突的合适方法。外交談判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

談判可以是各種各樣的。帝國主義政客為談判而進行談判，想以此來掩蓋他們不要協議。但是社會主義外交家和政治家需要談判，是為了闡明立場，達成協議。當然，妥協的問題與此有關。

自然，同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關係中的妥協和互相讓步有其界線，這些界線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戰略的範圍。會損害社會主義目的的妥協是不能允許的。相反，如果對和平和社會主義事業有利，在策略問題上的讓步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最高級會談的問題同談判方法的問題有關。弗·伊·列寧說：在原則上把革命行動局限在自下的壓力上，而放棄自上的壓力，是無政府主義。如果我們來看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外交關係的問題，那麼最高級談判恰是這種“自上的壓力”。但是中國同志不希望有這樣的談判，如果是蘇聯和美國的談判則特別不希望。是的，美國是世界反動勢力的堡壘。這就意味着必須把同美國的關係保持在緊張狀態之中，必須挑撥這些關係嗎？這種做法就會削弱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性，從而有助於和平事業嗎？對美國當然必須保持警惕，但是同時還必須採取措施防止美國的侵略行動，使其敵對活動陷於癱瘓。

中國同志喜歡批評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治活動。但是他們自己不提出解決國際關係和爭取和平鬥爭的複雜而尖銳的問題的建設性建議。他們的最后通牒式的聲明和要求不會帶來積極的效果，而是給愛好和平力量的活動製造困難。

和平力量通過簽訂部分禁止核武器試驗的莫斯科條約，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必須進一步發揚這個成就。主要的是在取得初步成就之後不要放鬆，不要削弱反對新的世界大戰的威脅、爭取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鬥爭。必須為使和平共處政策之果成熟，使沒有戰爭和沒有武器的世界取得勝利創造氣氛。

（譯自1963年8月14日捷《紅色權利報》）

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声明摘要

《紅色权利报》評論性报道

我們現在登載的苏联政府声明，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言人 8 月 15 日发表的和由新华社公布的声明的回答。

中国发言人企图在这一声明中指責苏联政府，說締結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 underwater 进行核試驗条約是苏联政府“放弃了自己的正确立場、接受美国‘两届政府坚持不渝’的立場、对帝国主义作了无原则让步”的結果。

中国政府发言人在具有粗暴的、誹謗性腔調的声明中，攻击苏联领导人，說什么“他們背叛了自己，出卖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但声明不列举任何事实地企图否认在最近几年中形势发生了变化，它不考虑苏联和美国核力量的新的对比，而只是重复老一套地說，“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沒有改变”。

尽管中国政府发言人在声明中不能否认这一事实：由于苏联核力量的存在，“美国的核訛詐政策並沒有能够阻止中国人民、朝鮮人民、越南人民、古巴人民，等等，取得革命斗爭的伟大胜利”，但在另一方面却又企图使人們对这个事实产生怀疑。

例如說，美国“准备在局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对付无核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对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和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它还硬說，如果允許美国能够借助地下試驗繼續完善战略核武器，說什么因而“让美国在一个一个的局部战争中得手，改变了国际范围内的力量对比，那就肯定地会反过来增加全面核战争的危險”。中国声明說什么，“无

可爭辯的事實是，**三国条約是一个便利美帝国主义繼續进行核訛詐、核威胁和鎮压各国人民革命运动、民族独立运动的条約”。**

中国声明的这一整段話，其結果是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原子武装。在声明中硬說：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自己的安全的斗争，首先依靠本国的国防力量，其次才是兄弟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手里的核武器，永远是反对核訛詐、核战争的防御手段。在帝国主义者拒絕禁止核武器的情况下，拥有核武器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多，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

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还包含着这样无耻的說法，如說什么“苏联领导人但求保全自己，不顾旁人的死活”，还說什么他們“为了求得自己一时的苟安，而出卖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說什么“苏联领导人同美帝国主义一条心，合伙行騙”。

了解苏联怎样始終不渝地捍卫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利益的每一个人，自己会对这些粗暴的誹謗得出看法。

中国政府发言人甚至不惜使用苏联任何不共戴天的敌人至今都尚未使用过的字句来指責苏联领导人，說他們想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兄弟国家”。說什么，“苏联政府拒絕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資料”，并根据这一說法，甚至荒誕地指責苏联政府“联合帝国主义强盜，一起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我們刊載的苏联声明是对所有这些对苏联的粗暴和无耻的攻击的有力回答。（佐）

（譯自 1963 年 8 月 22 日捷《紅色权利报》）

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和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茲德涅克·布拉达奇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展开的并使其队伍中的严重思想分歧完全暴露出来的論战，涉及到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政策的出发点的广泛的原则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内容和任务的不同理解。

不久前在我們报纸上发表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令人信服地证明，分歧的严重性是不能低估的。凡是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和团结的人都有权提出这些問題：这些分歧的实质和原因是什么？借助于何种客观标准才能确定誰捍卫和誰破坏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则？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和以何种方式才能恢复和巩固社会主义各国中被破坏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呢？

国际主义态度的标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自己所发表的文章、信件和讲话中总是重复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自称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则的主要代表者。然而，宣称一般的原則还不是对它理解正确和在实践中予以运用的证据。

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如同馬克思主义的其他綱領性原則一样，

就是对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科学阐述；共产党和工人党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革命活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名为《共产主义原理》的共产主义纲领初稿中写道：“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7年秋天当然不能预见今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的历史进程，然而他正确地预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即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国际化的必然过程，从那时起，随着现代生产力、国际劳动分工、贸易、交通和邮电事业的发展，这种国际化的过程不断地扩大和加深了。如果说在资产阶级政治中伴随着国际化过程而来的是血腥的侵略、殖民统治的扩大、国际资本联合的增长以及竞争和战争，那么在敌对阶级的一端，国际化过程必然使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剥削群众的国际联合得到加强；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剥削群众的联合，成了为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建立在社会主义各国平等和合作基础上的世界——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以后，在全人类共产主义大家庭的长期形成过程中民族差别将逐步消亡的那个世界——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基础和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纲领性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建立在科学地认识这些客观趋势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基础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8—369页。

的。由此得出一条原則：“……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①

然而，承认这些普遍原則并不是赋予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对待各种事件中任意給这些原則添加这样或那样具体含义的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革命的国际主义联合的規模在各个历史阶段发生变化，而且世界革命斗争的具体可能性和任务也在随之变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一百年以前表现了一小部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当前它又体现着三种伟大的全世界反帝斗争力量的联合，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革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联合，以及殖民地国家人民和已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年轻的独立国家的人民的反帝斗争的联合。当前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及其政治上的反动、反对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的战争政策、以及为争取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的条件，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联合形式已经经历了历史发展过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历史性变化，要求任何一个共产党为实现国际主义普遍原則而进行的斗争，必须从对世界发展现阶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共同任务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出发。

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表现出对这些列宁主义基本原則的不理解。鮮明的例子就是这样的断言，即认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有义务在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却不是。中国同志们把这一事实——絕大多数共产党没有孤立地看待这一事件、并且从致力于巩固全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力量的国际团结这一立場出发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9頁。

把边境冲突看作是有害的——当作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破坏，虽然他们自己的行动是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凌驾于作为整体的国际革命运动的共同利益之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把出自于民族的主观主义倾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普遍原则“具体化”的这种独特方法用来解释和捍卫自己的其他行动，而这些行动导致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的严重破坏。

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说法，马列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之所以出现分歧是因为“……最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里，出现了一股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①。中国同志把参与这股机会主义“逆流”的指责，扩大到全世界大部分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观点和做法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头上。在中国党的刊物上，同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想法和暗示，企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二国际的情况相似，那时，机会主义的倾向在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内占居统治地位，而在很长时期内，第二国际中的少数派却是国际工人运动革命复兴的核心。在上面提到的编辑部社论中写道：“历史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场合，真理并不在多数人方面，倒是在少数人方面。第二国际时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曾经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少数；但是，真理却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边……一切敢于坚持真理的人，绝对不会害怕自己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反之，一切坚持错误的人，即使暂时处于多数地位，也终究不能避免自己的破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6月14日的信也是旨在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出

^① 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去的这条路线的直接表现，中国同志们自己把这封信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在建立自己的思想基础的同时，正在加紧努力把分裂带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并建立支持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立场的集团。

中国报刊企图通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政策进行费尽心机的历史类比来替自己的分裂行动作辩护，一旦我们从表面的比较，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这种企图的荒谬绝伦程度立刻就会昭然若揭了。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主义团结基础的纲领性的战略和策略原则，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什么一劳永逸的、一成不变的东西。随着世界阶级斗争的重大的客观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在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影响下，在各国共产党面前就会出现新的共同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共产党如果要顺利地完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斗争的一切可能和形式，那就必须在今后每个时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上的一致在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达到最高水平——使之符合时代条件和要求——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更新和巩固。各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袖在完成这一任务时所起的作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衡量国际主义政策最重要的标准。

与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不同，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从在俄国和国际范围内已开始了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的客观条件进行创造性的科学分析出发，并且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有关革命斗争的任务、战略、策略和组织结论，这是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在组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的历史先锋作用的源泉。他们把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武装提到一个新的、符合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条件的更高阶段。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未来必然属于列宁主义，它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也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論武装貢獻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經驗，特別是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帝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問題上的經驗。全世界共产党人曾以很大的兴趣注視过中国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和經驗，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和中国党特別是在 1956 年至 1957 年期間的其他文件，在这些材料和文件中他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作为苏共二十大基础的克服个人迷信后果的复兴潮流中所做的貢獻。

然而，如果我們研究一下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包括 1963 年 6 月 14 日的信件，我們甚至連他們关于这种分析的唯一的重要的嘗試都看不到。中国領導同志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他們的新的“总路綫”的建議的观点，实际上意味着企图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創造性发展又退回到十多年前去，打着反对“修正主义”的虛伪旗号来否认和詛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对世界发展現阶段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新結論和經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对世界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对比进行现实估价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結論：在我們时代，国与国之間的战争不是历史注定不可避免的，出現了消除世界热核战争危险的现实可能性。1960 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會議在所通过的《声明》中給这一斗争指出了明确的现实前景：当社会主义和平的力量在世界上对帝国主义占绝对优势时，“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現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为全面彻底裁軍而斗争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手段，这个斗争在过去几年中尤其由于苏联的倡議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并且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泛支持。当然，在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之前，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必須使自己的軍事力量

保持这样的水平，即能作好准备成功地反击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并且不让任何人怀疑，挑起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就等于侵略者自寻灭亡。

由此还可以得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取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的当代主张的重要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古巴取得胜利的例子证明，在当代世界力量的对比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用军事干涉阻挠国内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正在大大减小。尽管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革命力量必须对帝国主义的阴谋不断保持最高的警惕，但是可以有理由估计，随着社会主义和平力量的优势的进一步增长，对于帝国主义来说，进行反革命输出的可能性将会不断减小，并且将会出现不经世界大战就可以使其他国家逐步摆脱资本主义体系的条件。在所有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提出了在当前情况下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斗争的基本任务和手段，即：开展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尤其是经济竞赛，从而通过其结果增强社会主义体系的优势，增强社会主义思想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吸引力；同帝国主义的思想意识进行坚决的斗争；扩大和巩固和平地带，发展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为铲除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和建立能够通过社会进步途径给迅速发展奠定基础的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而斗争；加强为改善帝国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为建立广泛的反战民主战线（联合一切能参加限制垄断资本的权力和推翻其统治的斗争的阶级和阶层）、以及为实现能给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便利条件的民主改革而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初期，支持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为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的共同的基本主张，并共同签署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1957 年和 1960 年国际会

議的文件，而最近三年來却逐漸走上了從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立場出發對它進行修正的道路。這一修正的最完整的表現就是包含在 1963 年 6 月 14 日信中的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

中國共產黨綱領的歷史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1960 年莫斯科《聲明》對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三階段和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當代作用所做的精辟分析，在中國的綱領性文件中，被對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矛盾所做的極端公式化的羅列和對世界社會主義發展所做的含糊論斷所代替。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識地企圖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期，沒有發生任何根本性的變化，因而可以認為在個人迷信時期所形成的、尤其在 1952 年出版的斯大林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所闡述的、關於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和反戰運動的可能性的原理，繼續有效。

中國同志實質上是教條主義地僵持這一立場，然而，由於爭取將戰爭排除於社會生活之外的鬥爭受到各國人民的巨大歡迎，由於在 1957 年和 1960 年他們共同簽署了完全與其觀點不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文件，他們只得比上述斯大林著作更隱晦更含糊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一方面，中國同志們強調自己忠於爭取和平的鬥爭，強調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意义，承認防止世界戰爭的可能性，表示贊成爭取裁軍的鬥爭和包含在莫斯科會議文獻中的其他和平要求。而另一方面，他們卻宣稱，資本主義在全世界還沒有消滅之前，在全面徹底裁軍的基礎上就有可能把戰爭從社會生活中排除出去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們拒絕把全面徹底裁軍當做現實的政治任務來對待，僅僅承認它是“有利於揭露帝國主義擴軍

备战”的宣传口号；拒絕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綫。

然而，在这种互相对立的杂乱的論断之下却隐藏着明显的政治意图：可以为爭取和平而进行斗争，但不能取得持久和平。必須为避免世界战争而斗争，但这种“避免”的结果只能是它的暂时推迟！提出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議是有益的，然而就是不可能实现！这样說来，爭取和平、防止世界战争、爭取和平共处与裁军的斗争的口号就完全不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的意思了。这个口号从切实可行的政治任务而降为适用于在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爆发之前“动员”群众的、临时性的“宣传”口号，在中国同志看来，只有新的世界大战——即使付出各大洲毁灭和亿万人民死亡的代价——才将最終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当前世界的社会矛盾。正如苏共中央致苏联共产党人的公开信提到的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綱領中反映出了过高估价帝国主义的力量、不相信当前世界上革命与和平的力量以及它們的发展前景的傾向，这就汇集成了关于世界战争冲突不可避免的信念。

然而，中国共产党最近和其他时期的文件同时还包含着别的更危险的因素，这已經不能评价为仅仅是教条主义地僵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的已經过时了的立場了。这些因素与当时在共产国际中以及后来在共产国际队伍以外传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①的某些观点和論证方式明显地相似。

^① 我們这里把托洛茨基主义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个左傾机会主义的思想流派与政治派别，它的领导人在被开除出共产国际之后，于1927年在各国建立了自己的特殊組織。不能把这个评价同后来受到个人迷信影响的言論混为一談，在那些言論中，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其思想內容，而被机械地与反对外国法西斯間諜特务的斗争等同起来，同时許多从来没有贊同托洛茨基主义观点或早就放弃了这些观点的正直的共产党人也曾与事实不符地被算作是托洛茨基分子。

托洛茨基分子在十月革命以后把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内部困难看作是不可克服的，他们在看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群众的“过于缓慢”的革命成熟过程时，沉溺于“革命的急躁情绪”之中。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各种假革命的活动和作出各种假革命的姿态，却既不考虑真正的客观可能性，也不顾及这种行动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后果，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把战争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的“原动力”。托洛茨基分子所依据的是这种观念：共产党人不应该防止帝国主义者进行新的战争冒险，因为未来的战争——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仿——将会削弱帝国主义的威力，并会使武器转入到被动员参加资产阶级军队的工人手中，这就有助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从而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在其他国家获胜。因此，托洛茨基分子用“社会主义”、“向帝国主义投降”和“背叛世界革命”等骇人听闻的词句来谴责和毁谤各国共产党和苏联为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为开展广泛的和平运动和建立反战的、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而进行的斗争，谴责和毁谤苏联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为建立和平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及达成协议而作的努力，虽然恰恰是这种同帝国主义的备战活动进行积极斗争的政策才使各国共产党享有巨大的威信，才有助于将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积聚起来。在三十年代，当世界上形成了三个富于侵略性的法西斯国家的联盟时，托洛茨基分子加紧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为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制订的和平政策进行毁谤性的攻击，托洛茨基分子将苏联为同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签订关于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集体安全》条约而作的努力，看作是阻止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1936年托洛茨基在当时成为反共宣传时髦小调的《被出卖了的革命》一书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在今后战争中，用不了两年半就会盼到首次

起义，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即使苏联在战争中失败，这与无产阶级在其他国家中的胜利比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必须指出，托洛茨基分子在被开除出共产国际以后也蛊惑性地标榜为“列宁主义的反对派”，得意地谈论起大多数共产党的“资产阶级化”；自称为是唯一坚持不渝的“革命的少数派”，它被受命来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复兴”。在1963年的今天，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所表现出的同情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的发展没有证明托洛茨基分子的意见是正确的，而是证明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正确的，尽管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对比对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远远不如今天有利。苏联利用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赢得了二十年的和平条件，在这期间，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对世界事件进程的影响尤其明显地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加强了，这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战争爆发前为防止战争作了最大的努力，并且在战争年代里他们又是击败法西斯战争联盟的最彻底的战士。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分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假革命纲领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并变成了软弱无力的派别。如果托洛茨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纲领的某些特征今天又复活了，并且在领导着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政策中得到反应的话，这是更为令人奇怪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显然只会设想通过战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根据军事技术的现代发展水平，战争必然会成为毁灭性的热核战争，从中国的材料和宣传的整个概念中，发出了极端危险的冒险腔调：如果同帝

国主义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力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多余的，不需要“扑灭”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播种下的战争冲突的策源地，而是“勇敢地”加强反击措施，以至使冲突发展为大规模的核毁灭。当然，这种有害的横蛮的态度在中国的材料中不是以一般性的论点表现出来的，而是在力图贬低战争危险和核武器的毁灭力量，以及在中国宣传直接以仇视和轻蔑的方式评论苏联和美国之间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各种会谈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同志一方面一般性地强调自己忠实于争取和平的斗争，另一方面尖锐地攻击削弱战争危险的每一个实际步骤。他们把苏联政府在加勒比海地区危机中所采取的既保证了古巴的独立，同时又不准将危机发展成为世界战火的慎重步骤污蔑为向帝国主义“投降”。

为了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予以肯定的争取从社会生活中排除战争和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胜利的斗争的主张威信扫地，中国同志对各国共产党直接进行荒唐的指责，而对它们的政策却不去作任何具体分析。他们把力图将和平共处政策扩大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去和扩大到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中去的罪名加在各国共产党的头上。他们进行捏造，说什么通过全面彻底裁军的途径争取从社会生活中排除战争的斗争纲领是针对反对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新华通讯社1963年7月31日就苏美英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发表的声明，使人们特别清楚地想起托洛茨基著作的腔调和“论据”。各国共产党清醒地把这个得到所有热爱和平人民欢迎的条约看作是禁止核武器和实现全面裁军这一复杂而艰巨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步骤。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清楚地表示，从这个条约得不出任何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

可以放松警惕的結論，相反地必須不断地加强斗争，迫使帝国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了解企图用武力来改变世界发展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中国官方人士把这一条約评价为“肮脏的騙局”，“出卖”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利益的尝试或甚至于是“联合”帝国主义和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表现的话，那么这不仅表现出他们对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缓和越来越仇视——这种仇视正在使中国同志同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接近起来——而且也是用通过获取核武器力求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来完全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非常明显的步骤，而不考虑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整体利益和全世界所有希望过没有毁灭性热核战争的生活的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领导人1962年6月会议关于加强成员国间的协作和分工的結論所持的反对立场，是对现实的严重歪曲和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的客观基础完全不理解的明显表现。中国同志在1963年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宣布这一措施是企图把充满着垄断资本集团争夺市场与追逐利润斗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的关系搬到社会主义国家中来。他们不能或者不愿了解，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去年六月会议的結論，不是表达一国的主观愿望；而是出自于这一共同认识：在当代，尤其在我們正在经历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国际化过程，不仅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内部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当然，根据各国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各国的表现也各不相同。中国同志没有任何理由担忧，加强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劳动分工与生产协作会使人竭力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会危害人民的利益等等。相反，在捷克斯洛伐克，我們感到采取这一措施有十分迫切的必要性，因为我国不能在广泛的多样的品种中采用要求严格、价格昂贵、能进行劳动生产效率很高的大生产的现代技术设备。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來說，逐步納入社会主义国家的統一經濟机体中，成了迅速发展国民經济从而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保证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同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竞赛中取得进一步成就的前提。中国共产党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只停留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成立的最初年代中产生的那些經濟合作形式上，实际上是建議他們放慢經濟发展的速度，从而放慢为在历史上很短的时期內取得对資本主义的經濟优势的努力。只是很难理解，中国同志用什么方式得出了这样的結論：他們对這些問題所持的教条主义立場，是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体现”。

如果我們看一看中共所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的話，总的來說显然它沒有表达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而是表明它的过了时的过去。与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的文件相比，它是明显的后退步驟。它严重地破坏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团結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

恢复团結的可能性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特别是当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出現了新的理論和实践問題的时候，我們常常会碰到尖銳的思想斗争。

在与个人迷信的影响相联系的不久以前的时期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及各馬列主义政党內的矛盾的极端簡單化和有害的解释还占优势。其特点是把具有真正的錯誤观点或虛构的錯誤观点的人不分青紅皂白地与階級敌人的“代理人”混为一談。实质上由此产生了解决矛盾的行政命令方法，这种方法經常同歪曲矛盾的思想内容和散布怀疑、恐惧的气氛联系在一起。这种方法意味着粗暴地违背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則，在某些情况下也粗暴地

违背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的关系的准则。在斯大林策划下的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关于南共联盟的不正确决议便是这种错误做法的明显证据。

在对个人迷信进行了公开批判的历史性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成果的基础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了克服个人迷信后果和彻底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的斗争。在苏共的倡议下，对过去所发生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后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了这些正确措施。

因而更加使人感到吃惊的是，它在当前重又回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年中的那些过时的、受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批判的观点上去。1956年曾对批判个人迷信表示同意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则认为反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尽管它举不出一个能够反驳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文件中所列举的个人迷信事实及其分析的实事求是的论据。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南共联盟的没有根据的攻击中，实质上是宣传1949年情报局决议的内容，尽管他们过去承认过它是不真实的。他们只字不提个人迷信时期真正破坏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列宁主义准则的做法；但同时在过去七年中即当苏联共产党站在争取纠正过去的错误和遵守这一准则的斗争的前列时，他们却将各种虚构出来的破坏这一准则的错误强加于苏联共产党。1960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在莫斯科国际会议的《声明》中共同签署了反映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真正信念的一段话：“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中国同志却谴责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是跟着苏共二十大路线“鹦鹉学舌”，还说有什么“指挥棒”等等。

全部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

不仅已經走了很远,而且正在不断加剧分裂方針,这种方針在目前阶段已开始具有組織形式。

现在还存在恢复团結的可能嗎?

从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基础的、馬列主义理論的、創造性发展的基本思想障地上,不能退让。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經形成了具有不同的、极左的綱領的变节者的特別派別的情况下,必須在公开的思想斗爭中作一切努力,以便不仅使所有的共产党人,而且还使全世界的其他劳动者正确地理解到中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間的分歧的真正实质。苏共公布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和苏共致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我国共产党也同样公布了这两个文件。

清醒的耐心,不因思想斗爭的热情而醉心于对事物做出不客观的判断和猜疑,一貫是革命者的优秀品质。尽管我們充分地認識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分裂行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怎样的危害和他們的綱領对在中国的新社会制度的建設的进一步发展是怎样危險,但我們沒有忘記,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它的具有光荣的历史傳統的共产党內,为实际貫徹錯誤路綫的經驗所迫,理解目前的錯誤和有害傾向迟早将成为迫切的需要。

实践是判断不同观点正确与否的最严厉的法官,它迟早将使中国領導同志面临严肃的決定。

(譯自1963年8月22日第9期捷《新思想》杂志)

明确的政策——安全的保证

《紅色权利报》社論

这些天来，世界上正进行着大规模的民意測驗。在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外层空间进行核試驗的条約上，签名正在一个个多起来。莫斯科条約簽訂后不到三个星期，就有六十多个政府的全权代表在条約上签了字，其他政府也在就准备在条約上签字一事进行磋商。禁止核試驗受到了各大洲人民的欢迎，受到了許多国家的和平組織及其他有关組織的欢迎，并且是被当作在解决目前世界上其他迫切問題，特别是在全面彻底裁軍問題的道路上迈出的有意义的第一步而受到了欢迎。还必须指出，在許多資本主义国家里，全体居民欢迎其政府在莫斯科条約上签字的情况是这些政府采取其他措施时很少看到的。

世界性的民意測驗的結果十分明确，但这絲毫也不改变这样的事实：传来了一小部分出于这样或那样的自私和狹隘利益而居心不良的不贊同的声音。遺憾的是，其中的一种声音是来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北京。昨天苏联政府所发表的声明，对它作了明确而有力的回答。

在短短的几周之内，人們必須再一次对新的、更加不择手段的文件，即这次称为《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声明》的文件表明立場。我国人民对于中国领导人對莫斯科条約所持的否定立場是有足够的了解的。中国领导人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和使各国共产党违背共同的、有約束性的綱領性文件的种种尝试，遭到了我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憤慨的拒絕。

苏联政府的声明又一次詳細地闡述了苏联在国际事务中所始終不渝地奉行的明确而不可动搖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个政策正在为一步一步地走向全面彻底裁軍作出努力，以保证人类免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大灾。同时也很詳細地分析了現世界的实际情况及其問題。它这次对世界的发展所作的估計，充滿了历史的乐观主义。用伟大的捷克詩人、共产党員的語言來說就是——沒有迷信和幻想的乐观主义。因此，苏联声明中說道：“我們的立場的力量，在于它的生命力，在于它完全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考慮到了近几年来在国际舞台上所发生了的和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

苏联声明从各方面指出了中国的論断在理論上和实践上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这样一个問題是如此（中国的誹謗就像諺語中所說的：口袋里藏不住錐子）：中国領導人不滿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主张的不扩散核武器的政策，以及这些領導人今天已不再隱諱，他們不顾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为中国获得原子武器去努力。

因此追忆一下某些事实是有好处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毫无区别地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地位，由于这个事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有权在联合国安理会占有自己的席位，以代替至今仍在那里吓唬人的、被唾弃的蔣介石集团的傀儡。

中国声明所提出的东西，只能把它称作按坏的詞义理解的大国主义政策，而不能称作别的什么。中国領導人不是从目前世界的客观条件以及本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程度出发，通过正确的、有成效的内外政策来巩固其大国地位，作为一个大国，由于它对和平事业作出过貢獻，而在世界上赢得了威望，并且在解决世界問題中有过积极的影响。但中国領導人現在开始宣揚他們将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核武器（他們現在不具备大規模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載工具

的条件，这种生产无论如何都只意味着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无限的牺牲），并指责别人拒绝他们获得这种武器。他们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把像签订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样有助于巩固和平的积极步骤，称为反对他们拥有核武器要求的阴谋。

中国领导人说什么热核战争虽然要牺牲世界一半人口的生命（其中包括三亿中国人），但在世界的废墟上将不再有帝国主义的存在了，他们的这种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慨。每一个有人性、有思想、有感觉的人，特别是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坚决反对与马列主义和与当前世界的现实绝无共同之处的这种投机行为。中国领导人是那样喜欢把自己说成是马列主义的专家和捍卫者，但他们却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段里的话，在这一段里，关于阶级斗争作者曾这样写道：“每次结局若不是全部社会结构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斗争阶级同归于尽”。

如果说这些话适用于很久以前的各个社会，那么为什么在今天，当人类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已由于新技术而变小并且受到核武器威胁的时候，就不适用了呢？即便是现有的核武器——其爆炸力按地球上每个居民平均计算，还摊不到十五吨以上的黄色炸药——但是如果继续进行军备竞赛，把原子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中去，这种可能性不是在威胁着人们吗？

所以对为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危险而采取的初步的具体步骤——即在最重要的方面，在核武器方面采取的步骤，这就是签订莫斯科条约——进行的攻击是不能成立的。谁也没有夸大它的意义，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莫斯科条约对国际气氛、对将来为有关当前世界上的其他问题举行的谈判产生的积极影响。

中国领导人关于把核武器扩散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进一步保证世界和平的论断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这些领导人在这里犯了一种在他们说来今天已是典型的“错误”：似乎他们是在代表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說話。誰也沒有賦与他們这种权利。其次，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沒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希望建立、甚至沒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建立自己的核实力。（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無論多么大的牺牲，在最近期間也不能設想建立起对世界力量的对比具有較重要的意义的热核实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并不因此而有任何的加强，这样的努力只不过是為西方的反动势力，首先是為西德复仇主义者效劳。我們最坚决地反对用核武器武装西德复仇主义分子。

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得到苏联无限的热核能力和同苏联紧密的兄弟般联盟的可靠保证。如果說，我們不久即将庆祝共簽訂二十周年的捷苏友好、同盟和战后合作条約是我国获得解放和我們整个国家得到巩固的可靠工具的話，那么这一条約在核世紀，在我們爭取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的时期就具有更大的意义。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來說也是如此。讓我們至少通过一个例子来回忆一下中国领导人自己在不久以前是怎样看待形势吧。中共中央的一位負責人廖盖隆写道：“我們和作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軍事强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結为盟国，便立刻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迅速地实现着国防的現代化，并且迅速地建立着自己的現代軍事工业。正是因为我們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为自己的盟国，我們才沒有如同苏联刚刚成立的当时那样遭到帝国主义的凶恶的武装干涉……正是因为我們有着强大的苏联作为自己的盟国，我們在現在和今后都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来粉碎帝国主义的任何冒险的侵犯。这一点就是帝国主义者也知道得很清楚的。有些人对于中苏同盟对保障我国安全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事实已經证明这显然是不对的。”这是1957年2月8日发表的。我們举出来这一段很长的引文，不过是为了指出一些人的过于健忘罢了。

上述这段话写后至多才过了六年，这段时期并不算太长。但是在这个期间，苏联已经成为一亿吨级，甚至更大吨级的最大的热核武器生产者，在这期间，苏联还生产和试验了全球火箭。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进一步的变化即将到来。但是，没有变的是苏联的态度，是苏联的和平与友好的政策，是苏联对社会主义各国和对经过长期斗争之后从殖民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国家的安全和独立的保障。苏联政府在苏伊士、台湾、特别是在加勒比海的危机的时期的坚决态度，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中国领导人在1957年说的话愈是有效，1963年的中国声明就愈是不真实。苏联政府的声明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这点，并以合理的愤怒补充说道，中国领导人应当承认，“他们所以能够如此大肆发表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声明，能够对苏联和苏共进行粗暴的攻击，只是因为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威力在捍卫着目前中国的安全。”

苏联和平的、极其人道主义的、具有原则性的外交政策是很明确的，因此它得到全世界人民愈来愈广泛的支持，因此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才被迫退却。苏联现代化的武器的无限力量和苏联人民手中所拥有的力量，是和平和各国自由的可靠保证。

（译自1963年8月23日捷《红色权利报》）

捷克斯洛伐克通訊社关于新华通訊社 布拉格分社的通知

在最近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有关当局曾多次以很大的耐心提醒新华通訊社布拉格分社注意它的不被允許的活动，布拉格分社散发过誣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粗暴攻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材料。

由于新华通訊社对这些警告不以为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7月8日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休假的两名分社記者不再回来和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召回第三名記者。

新华通訊社布拉格分社和中国的負責当局也沒有从这一严重警告中得出相应的結論。布拉格分社不仅繼續变本加厉地散发在自己新聞稿中的誹謗性材料，而且进而还用捷克文大量出版印刷材料。在这些材料中，粗暴地歪曲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关于召回三名記者的要求，同时蓄意避而不談向中国大使館轉达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要求的理由。

今年7月20日新华社新聞稿登載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召回新华社記者的声明”，在这項声明中，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要求說成是“无理的要求”和“粗暴无理的行动”，并硬說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捏造了荒謬的借口”。新聞稿还登載了在北京接見被召回的記者的消息。在北京的群众大会上对要求召回上述記者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进行了捏造性的指責。登載这样的消息是恶意和蓄意贊同在我們領土上的非法活动的证明。

不仅如此，分社还不顾上述警告，就莫斯科禁止在大气层、外

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加剧进行自己的活动。中国方面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把这一协定看作会促进在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谈判中取得进展的重要步骤。新华社新闻稿不顾这点，而在散发一些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毫无保留地支持的、苏联爱好和平的、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外交政策进行歪曲和攻击的文章与材料。

分社也采用小册子方式散发上述材料，不注明出版单位，不注明寄出者，不列举出版这些小册子的有关批准书的号码，它的大胆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友好国家曾提请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注意：在他们的国土上散发着其来源为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的、包含对它们党和政府的政策进行挑衅性攻击的材料。因而这个分社粗暴地违背了捷克斯洛伐克现行新闻条例（即1950年12月30日宣传教育部通告的规定），并粗暴地损害了驻在国的利益。

最后必须提到，尚在194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就已许可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的活动。这是受到中国方面称赞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给予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援助。为新华社开展其活动提供了一切物质的和技术的手段。当然，每个国家的人民与政府都不会允许，通过为友好合作而提供的手段使自己遭到粗暴的诽谤与侮辱。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委托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立即取消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的活动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按照捷克斯洛伐克记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等地位和其他外国记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同样条件，派遣自己的记者驻捷克斯洛伐克。

（译自1963年8月23日捷《红色权利报》）

社会主义的成就是革命发展的 强大因素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伊瑞·亨德利赫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在1957年和1960年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上，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制订了为共产主义思想新的胜利而进一步斗争的共同路线。它们当时的出发点是：对阶级力量对比的全面分析、对现代的科学估价、对各共产党革命经验的总结。在莫斯科会议的文件中，表达了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同的路线，表达了它们对一切基本问题的共同立场。各共产党在考虑到它们本国条件的同时，把会议确立的原则作为自己政策的总路线。被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世界历史性决议所鼓舞的各共产党的这种巩固的团结，标志着为共产主义与和平取得进一步胜利而斗争的革命力量的新高涨。

很难设想一个共产党人——列宁主义者，会不为下述情况而难过：最近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共同的结论，离开了争取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的斗争，并在破坏这种团结。甚而中国领导人歪曲共同制订的文件的结论、攻击苏共纲领、攻击其他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政策。他们随心所欲地从教条主义立场出发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企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推广他们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概念。中国领导人破坏各兄弟党旨在克服观点上的分歧的努力，阻碍了公开论战的停止，并竟然毫不犹豫地把坚持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党当作社会主义革命和本国人民利益的叛

徒。

中国领导人拒絕列宁主义的这样一个結論，即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的国家正在首先通过自己的經濟政策对国际革命产生影响；正好世界范围内的斗争已轉向这一戰場。列宁強調，“如果我們解决了这一任务，那么我們在世界范围内就肯定地和最終地取得胜利了”。

对这个問題，全世界共产党采取了 1957 年和 1960 年莫斯科會議文件中的完全明确的列宁主义立場。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在这些文件上签了字。在 1957 年的宣言中写道，在我們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結果。

1960 年的声明再次強調了列宁主义的思想：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首先通过經濟建設来影响世界革命的发展。

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活动制定了这样的路綫：“在整个工农业生产方面超过世界資本主义体系，进而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方面超过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在实际解决这一任务方面，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把社会主义的繁荣和吸引力看作是自己的主要貢獻。

中国领导人在各式各样的发言中，都把社会主义国家旨在发展經濟和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硬說成是违背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的利益的反革命行动，这是多么奇怪。据說，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努力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涣散群众的革命性。十分明显，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同共产主义运动的經驗相矛盾，同历史和明显的事实相矛盾，而且证明了他們思想的停滯，这种思想停滯必然要导致政策中的冒险主义。只有近視的人，才会把爭取在全世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爭取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同爭取社会主义国家經濟建設不断高涨的斗争对立起来。

伟大的十月革命到現在近五十年了，这些年代充分教导我

們；社会主义思想的繁荣以及它的吸引力和声望的增长，同生活对它的检验，同它在实践中的运用，同这种基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践所取得的成就，有着非常直接的、密切的联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繁荣的决定性方面正是在这里。国际革命运动认为这个体系是自己的成就、支柱和活生生的榜样，它使全世界革命者为争取劳动人民更好生活的斗争变得更容易。

在1917年以前，社会主义思想从揭穿剥削社会的駭人听闻的坏现象和剥削的原因这方面汲取了力量，确定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和推翻剥削者政权的斗争形式。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吸引力的源泉是革命的前景。但是，由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实际证明的，社会主义学說的主要結論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跃进。十月革命证明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性、它的现实性和生命力。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合乎規律地把数百万争取共产主义的新战士引导到革命斗争的旗帜下。

苏联战胜希特勒德国的胜利、使各国人民摆脱法西斯暴政的胜利、苏联經濟的迅速恢复及其空前的繁荣，使得全世界又一批数以百万計的人站到社会主义的立場上来。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了对本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并按照苏联工人阶级的榜样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

1960年莫斯科声明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些胜利向受資本压迫的各国人民明显地說明：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基础上組織起来的社会，为經濟和文化的繁荣，为保证人們的高度生活水平和和平幸福生活，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

我們根据我們国家的經驗知道，全世界劳动人民在非常关切地注視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密切地关心它們的生活。社会主义国家在經濟和生活方面的成就加强着全世界的人們对社会主义的

同情。在所有的例子中，苏联征服宇宙空間方面的成就再好不过地說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成了阻擋反共主义的进攻和对付资产阶級宣传的屏障，资产阶級的宣传首先通过歪曲社会主义的真实情况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計劃，企图使劳动人民厌恶社会主义。現在，中国领导人只是以自己的大量行动来迎合世界上的反共宣传，对此只能表示遺憾。

我們強調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經济发展和創造性成就的意义，也还由于它們是社会主义国家牢不可破的国防及其始終不渝的和平共处政策和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斗争所能依靠的唯一可靠基础。如果今天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設后面沒有这种巨大的物质力量支持，那么，在帝国主义陣营中未必有誰会傾听这些建議。正是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經济潜力、由于在同資本主义的經济竞赛中的成就，社会主义成了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靠这种基础来粉碎帝国主义集团发动威胁全人类的世界軍事冲突的企图，如果他們呼吁全面彻底裁軍、呼吁消灭殖民主义，那么，它們就使全世界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任越来越大，使社会主义得到新的拥护者。我們对人类的职责是尽可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尽可能有效地加强全世界的革命运动！这也是深邃的列宁思想的一个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将創造出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資本主义可能和最終将被击败。

把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政策的这一基本要求推到次要的軌道上去，甚至責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說他們現在強調和集中注意經济发展和不断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因而說这是“經济主义”，以上这种做法意味着不理解馬克思主义的实质。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們生活得更好。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始終认为这是自

己活动的主要意义。

我們絲毫不能貶低革命热情的意义，确实，这种热情本身是不够的。在迅速的革命飞跃时期之后必然到来的是革命的平常日子，那时，需要加紧劳动来巩固已得的成就，提高生产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扼要地说，就是通过日常自觉的劳动来实现在革命冲突中流血牺牲所换来的东西。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不断地巩固革命成果。共产党人把革命改造看作是建立劳动人民沒有階級的、富有的社会的手段。

怎么会有人以藐視的态度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成就看成是对革命者不严肃的东西、是削弱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活动，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无数事实否定了这种沒有意义的断言。許多事实說明，正是当人民尝到了社会主义的果实的时候，他們不仅沒有脱离社会主义思想，而恰恰相反，他們同社会主义思想更紧密地連合在一起，更集中一切力量保卫它們，更努力地发展經濟和文化了。

根据什么样的論断和在怎样的事实的基础上可以得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成就和它們人民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妨碍着西方工人运动的革命精神这一結論呢？反正大家都知道，甚至連資本主义国家中远远不贊同共产主义观点的許多劳动人民，在訪問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了解了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之后，仅在革命现实的影响下就开始寻找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何况在不久前在殖民主义的統治下爭得了自由的国家的人民呢？这些人民和他們的領導人在寻找他們已經解放了的国家要走的道路时，对比資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对比它們总的水平和建国原則，来作出决定。

这根本談不上中国領導人企图强加給我們的所謂我們盲目相信“世界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体系間的矛盾会在經濟竞赛中自然

地消失”的說法。这是同认为只要宣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革命高潮就会自动发展这种設想一样，是一种幻想。事实是，如果没有在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設中取得成就，甚至极端革命的詞句也无济于事，而只能給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害处，降低它的作用。言行不一致，没有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創造条件和前提就提出世界革命的任务，企图以响亮的革命号召代替順利的經济发展——这不是别的，正是同共产主义革命家的责任心毫无共同之处的令人吃惊的宗派主义的表现。

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和絕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国家在經济、科学技术和建設新生活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评价很高。他們知道，我們現在也在为他們将来的进軍寻找着前进的道路。但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重視經济的发展，而去解释，由于等待世界革命国民經济必然停頓，那么，他們未必能够理解这点——即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此，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后也将遵循 1960 年在莫斯科签署的声明的結論。

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和胜利的最重要的国际条件是众所周知的，是經過生活驗證的。这就是，相互援助和支持，利用社会主义陣营国家統一和团結的一切优越性。經济互助委员会成員国代表在今年 7 月的會議上重新证明了这一結論的正确性：“社会主义建設的客观規律，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这些国家人民切身利益的一致性，是各国民族經济日益接近的条件”。

社会主义国家之間越来越紧密的合作，使得它們在經济发展速度方面牢固地保持領先地位。去年，經济互助委员会成員国工业生产大約增加了 9%，与此同时西欧国家仅仅增加了 4%。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受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教育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从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开始建設社会主义时候起，就

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广泛合作的拥护者。

所以我们人民也完全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致力于有效地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不仅限于双边合作,而且沿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广泛的多边的劳动分工的道路前进。

我們也不能同意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国际經济合作已經达到的水平的人的观点,不能同意宣传那些近乎狹隘的、有局限性的民族观点的看法。我們首先拒絕毫无根据的、实质上是誹謗性的論断,这种論断实际上是在西欧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强盜規律同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国际主义原則之間划等号。中共中央 1963 年 6 月 14 日信件里的一切暗示,不能称为別的,只能說是对建立在严格尊重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基础之上的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不能容許的攻击。信件里說,好像社会主义国家把“損人利己”的資本主义的作法搬到自己的相互关系中来,或者据說,社会主义国家把垄断經济一体化看作是社会主义各国經济合作和相互援助的應該效法的榜样。

类似的指控有什么意义呢?中国领导人千方百計地想貶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深深感受到的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领导人之所以需要这种指控,是为了他們便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相互关系的問題上推行他們的特殊概念。中国领导人的綱領总的說来是明确的:他們以自給自足的經济独立的思想同发揚社会主义国家的多边的和有效的合作对立起来。同时,中国领导人試圖把每个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内部資源和可能性这个正确的口号,用来作为反对在多边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各国經济合作的最高形式的論据。

但是,誰把自己的努力脱离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寻求和完善他們相互合作的更高形式,誰就完全离开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要求,并且仅限于发出毫无内容的号召。

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同意这种狭隘的行动纲领，因为这将是又一次反对莫斯科声明思想的重要的一步。我们今后也将这样来开展我们的活动，以便它符合莫斯科声明的结论。不实现这些原则就不可能顺利地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在物质生产的领域内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一向积极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生活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自己的原则和行动，同苏联和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肩并肩地、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我们党把在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全力帮助建立未来世界——共产主义世界的榜样，当作自己对国际革命运动的伟大义务。这是列宁指出的道路，是经过生活检验的道路。

（译自1963年8月27日捷《红色权利报》，
原载1963年8月26日苏联《真理报》）

巩固和平的重要步骤(节译)

——评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

揚·弗拉納

条约获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意和支持。絕大多数国家已决定在条约上签字。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完全贊同莫斯科条约。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所采取的拒絕参加条约、尖銳地攻击条约同时对苏联进行粗暴的誹謗性的攻击的立場更应受到譴責。在苏联政府的一系列文件中，尤其在8月3日和8月21日的声明中，已經指出了这种立場和反苏攻击是完全沒有根据的和有害的。同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我国共产党和政府)以及許多国家的共产党也都坚决地反对并譴責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这一行动。

对緩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貢獻

所有欢迎签订条约的人們同时也認識到，这只是第一步。在签订条约的同时已經明确地指出，不消除核战争的威胁，也就不能停止軍备竞赛，更不必說实现有效的裁軍措施了。还由于遺留了地下核爆炸的这一公开的問題，这一条约的意义也受到了限制。某种削弱条约意义的事实是，某些国家，特别是法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某些至今还受法国巨大影响的非洲国家宣布它們不参加这个条约。

社会主义的成就創造了新的条件

由于在国际生活的許多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目前在关于禁止核試驗的談判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8月3日，特别是8月21日苏联政府的声明明确地指出了这些事实。声明回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莫斯科条約的攻击。在这些声明中強調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忘記生活不是停止不动的，科学和技术在蓬勃发展，因此，至于談到禁止核試驗，“昨天还不能接受的东西，今天可能就变得有利，甚至是非常有利的东西”。

苏联坚定地捍卫着世界和平 与社会主义的利益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显然不願了解也不願承认所有这些事实。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簽訂条約問題发表了两个声明，在声明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反对条約并对苏联政府及其对外政策进行了恶毒的誹謗性的攻击。甚至不断地使用这样的詞句，如簽訂条約是一个“騙局”，是“出賣”苏联人民的利益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所有和平力量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以条約旨在保持大国的核垄断地位而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縛起来为借口反对莫斯科条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这一立場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坚决反对和譴責。在今年8月初的捷克斯洛伐克通訊社的声明中，我国人民已經表示了对这个问题的立場，并且駁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全部論断。在苏联政府就此問題发表的8月3日和21日的声明中，已經詳尽地分析了并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錯誤

立場。

如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以条约旨在保持大国的核垄断地位为借口拒绝莫斯科条约。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說的是什么样的垄断呢？怎样看待这个垄断呢？今天，不仅帝国主义国家而且社会主义大国苏联也拥有核武器。苏联的核力量恰恰过去是、甚至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最可靠的保证和世界和平的支柱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秘密。至于谈到什么垄断，那只是煽动而已。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企图借助煽动来替他们获取自己的核武器的努力作辩护。不能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之所以发起对莫斯科条约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在扩散核武器问题上的政策的攻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没有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样品。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与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个问题上一贯所持的立场，即一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阻止进一步扩散核武器的立场，有着明显的矛盾。

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政府对外政策所进行的粗暴的、在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关系中完全异乎寻常的诽谤性的攻击，也是毫无根据的。应当受到谴责的。从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天起，整个国际关系史就是苏联外交政策不仅为争取保障苏联本身的利益、而且也为保障国际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利益和殖民地的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自由与独立而斗争的唯一的不断的锁链。苏联有远见的和一贯的政策，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必要的国际条件方面，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所有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苏联的经验 and 无私的援助曾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事实上使自己置身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死敌的一边，站在与美国、西德和法国最反动的侵略集团同一立场上，这一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场的错误和危害性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所以我们全体人民就像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一样，坚决拒绝这一不正确的立场并完全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它是第一批决定在莫斯科条约上签字的政府之一）的立场。

各国人民还要更加提高为和平而斗争的积极性

中国领导人的行动的危害性还在于，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奉行力图使和平力量溃散、迷失方向从而破坏其团结的政策。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坚决地反对并谴责他们的态度。由于莫斯科条约的签订而创造的良好局势，要求为和平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积极性和加强努力，以便利用由于达成停止核试验协议而创造的良好气氛去取得为和平而斗争的进一步的成就。

（译自1963年8月27日第17期捷《党的生活》杂志）

誰有理由憤慨？

需要再一次回到新华通訊社布拉格分社的事件上来。从北京再次发出中国外交部匿名发言人的反应，对取消該分社活动权利表示不滿意。除其他外，該发言人并对我們当局上述完全正当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憤慨和抗議”。这里我們必須稍微仔細地看看，究竟誰有真正的理由憤慨和抗議。

在蔣介石分子还統治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时候，就为新华社提供了在布拉格从事活动的可能并給予了它一切可能的支持。不需要广泛地证明，这是同志式的帮助的行动。但在将近十五年之内，发生了許多变化，而这是在中国方面。該分社的活动变了，它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变了。前几个月，在它的材料中，开始日益更多和更頻繁地出現一些文件、声明和文章，它們所表达的观点不仅与駐在国的观点相背离，与共同拟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相对抗，而且日益更加公开地和粗暴地攻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以及它們的团結。这些全世界都清楚地知道。大家也知道，这些观点在我們的人民那里遇到了怎样坚决的反对。

为了我們能够判断新华社怎样远离了自己原来的使命和墮落到何等地步，讓我們举一个人們不太熟悉的事实。除上述材料外，在它的广播和新聞稿中开始出现卑鄙地誹謗苏联的冗长的材料。同时，对居于絕大多数的苏联共产主义建設中的巨大成就，在新华社的广播中找不到位置，然而却从北京的綫路上开始播发歪曲苏联的各种批評性文章的“报道”，把个别消极現象描述得好象是某

种典型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中国官方国家通讯社的做法，同资本主义西方的黄色报刊完全一样。

（中国记者和中国整个报刊走到了何等地步，从下述例子也可以得到生动的说明。在中国一家中央报纸上，与登载我们刚刚谈过的这类材料的同时，他们还登载了被苏联法庭审判的女投机商的照片。但是，当全世界兴奋地注视着瓦伦基娜·捷列什科娃的飞行的时候，没有一家中国报纸有登载她的照片的地位！对此还需要有什么补充吗？）

中国反对签订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运动，受到了许多方面的明确的谴责和驳斥，新华社特别猛烈地展开了这一运动和发表了粗暴地和捏造性地攻击一切签署这一条约和把它作为有益于世界和平的行动来欢迎的人的声明。新华社怎样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的活动内容，怎样远离了社会主义国家通讯社的使命和被利用进行怎样可耻的分裂主义活动，这是很明显的。

中国通讯社布拉格分社的工作人员，不是积累关于我们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实事求是的、客观的事实和把这些事实在每日的新闻稿中予以发表，不是在预计的活动范围内和依据合作的精神向捷克斯洛伐克报刊提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而是在我们这里进行不被允许的活动。他们不仅发表了敌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它的利益的材料，而且毫不犹豫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成员，非通讯社工作人员也参加这些非法活动。这些人及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把上述材料散发给私人及某些与新闻无任何关系的机关。同时，印刷的这些材料，没有注明出版者，没有注明投递者及批准书号码等等，也就是说，这种印刷和散发完全违背现行条例。

难道日常在布拉格市场上采购时散发粗暴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路线的材料（我们用一个例子代替许多例子），是通讯社

的任务和“正常許可的活动”嗎？而这种活动是在我們当局方面提出再三警告之后发生的。这样中国通訊社布拉格分社的工作人员本身使自己威信扫地，使整个通訊社的使命威信扫地，他們并表明，他們的活动与进行真正日常的、有益于参加者双方的活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官方通訊社自然而然的活动有多么少的共同之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自己的評論中有几处是胡說八道。他甚至試圖断言，說什么新华社只做了捷克斯洛伐克通訊社和捷克斯洛伐克記者在北京所做的事情。該部的发言人本人最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事实。更恶劣的是，他竟醉心于这种荒唐的說法。但这同时只能再一次說明，誰旨在恶化捷中之間的相互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归根結底正如所預料地那样——包含同往常一样的对我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粗暴的、誹謗性攻击。这些今天已經陈腐的和不真实的中国老調，已得到了应有的回答。至于該发言人对此所作的补充，不值得重复和予以严肃地分析。我們的目的只是，提醒圍繞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的某些事实和指出誰有理由正当地憤慨和正当地抗議。（佐）

（譯自1963年8月30日捷《紅色权利报》）

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 是我們时代的根本問題(节譯)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3 年 8 月 31 日

向高等軍事学院毕业生的讲话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认为,不断巩固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結、不断发展和加深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合作是自己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政策的根本原則。我們也认为,維持和平、实现列宁主义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当代的根本問題。

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中国領導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和平与战争問題上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路綫相对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綱領。这一綱領在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下,錯誤地把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认为是向资本主义投降和某种背离革命斗争立場的行为;他們认为,在革命斗争中,任何牺牲,甚至几亿人在核战争中死亡也都是值得的。

他們的这种思想把爭取和平的斗争同爭取革命进步的努力不可調和地对立起来,而在另一方面又宣称,热核战争虽然恐怖,但人类可以在旧世界的廢墟上建立起幸福的共产主义未来。当然,如果接受这种思想,就会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带来巨大的危害。中国領導人的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們的事业遭到巨大的損失。特别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和世界各民族來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正最有力地爭取他們站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而斗争的战士一边来,而中国領導人的态度却会动搖他

們的信心。因此，下列事實使我們感到十分不安：中國領導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不同意莫斯科禁試條約，從而他們就同美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法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中出名的反對和平共處的人站到同一行列中去了。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領導人走上了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和社會主義各國團結的道路。他們的言論和行動表明，他們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轉而站到民族主義、狂妄自大、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立場上去。對於這種政策，我們在我們的經濟關係中有亲身体會，它使我國經濟遭到了不小的損失。

（譯自1963年9月1日捷《紅色權利報》）

自給自足还是社会主义合作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 阿历山大·杜布切克
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向全世界劳动人民提出了满腔热情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认为，工人阶级的团结是工人阶级社会解放的主要条件，是摧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在地球上建立和平和自由的最重要的前提。

后来的阶级斗争的全部进程、社会主义发展和胜利的历史，极其令人信服地证实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力量。不仅夺取政权需要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团结，而且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特别需要这种团结。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和在巩固防御方面的紧密的兄弟般的合作，在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竞赛中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世界革命运动在现代条件下壮大和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

目前，企图把自己说成是革命理论的唯一保卫者的中共领导人，正在否定这条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粗暴地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所通过的一致肯定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独特的散发着民族主义气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劳动分工、生产专业化和协调经济计划。

中国教条主义者在给苏共中央的信里写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从中共领导

人的講話中，從他們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里，以及從中國人士的行動中不了解中國領導人賦予這個公式什麼內容的話，那麼這種提法本身是無可非議的。各共產黨向來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動員國內的全部資源，建立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首先是工人階級的事業，是走上了建設新生活道路國家的人民的事業。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从一开始建設社會主義就本着這一原理行事的。但是，同時我們怀着感激的心情利用過和正在利用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我們自己也幫助它們解決各種經濟和政治問題。

蘇聯當時曾經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內部資源單獨地，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下建設社會主義。歐洲和亞洲的各人民民主國家是在有利得多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有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體系存在。現在，除了自己的資源以外，我們還可以成功地利用從社會主義國家互助中，從社會主義各國的合作、勞動分工和生產合作中所得到的補充的好處。

中國領導人給“主要是自力更生”建設社會主義這一論點塞進的內容，是絕不能令人同意的。因為它宣揚建立在經濟上與外界隔絕的民族經濟的觀點。況且同社會主義各國的一切聯系與合作只限於交換和貿易方面。縮減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否定這種合作的好處的觀點，歸根結蒂是阻撓社會主義大家庭迅速發展經濟的觀點。

正如列寧所預見的，渴望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統一，渴望建立在共同計劃指導下的統一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是從生產力超出民族範圍的合乎規律的趨向中得出的。這種渴望目前在資本主義各國特別強烈，資產階級國家的各種一體化集團証實了這點。社會主義國家並不像中國宣傳家所企圖斷言的那樣，在效仿資本主義一體化。社會主義國家只是想利用生產力發展的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客觀趨向來加速社會主義

建設。合作、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建立經濟上閉关自守的民族經濟的企图是同力求国际化、力求組織統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經濟的生产力的客观規律相矛盾的。

世界上只有不多的国家具有建立綜合性多部門經濟的必要条件。对于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來說，建立这样的經濟不仅是不合算的，甚至是有害的。举例來說，目前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比較小的国家，沒有现代化的电子机器，生产是不行的。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非得自行生产使生产自动化所必需的电子机器，那么它就要集中几千名高度熟练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員、工人来解决这一任务，花去数以十亿計的資金进行研究，而这一切只能用于生产数量比較有限的电子机器。无可爭辯，捷克斯洛伐克为滿足本身的需要生产这种机器是非常不上算的。在生产力現代化高水平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致力于建立閉塞的經濟，力求具备本国国民經濟所必需的各种产品。

甚至具有建立自己多部門經濟可能性的苏联，也不拒絕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所产生的良好条件，并在最大程度上加以利用。这一点特別表现出苏联共产党对那些比起苏联更需要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国际主义性质。拒絕利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为加速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所提供的优越性，企图在自己狹隘的經濟范围内閉关自守，必定使中国人民遭到不必要的貧困和困难。

在中共領導的行为中不能不看出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在两个經濟体系競賽中的努力的企图。要知道，在实际上实行他們所解释的“自力更生”建設社会主义的原理，就会使社会主义国家失去这一競賽中最强大的因素之一，失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劳动分工和全面合作对于資本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领导人无视这一事实：紧密的合作能够大大节约社会劳动。例如，如果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范围内机器制造的专业化水平提高 50%，那么这一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至少提高五分之一。我们的实践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是正确的。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这些国家来说，自己生产大部分大型机器制造业的产品是很不上算的。假如只是打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那么我们不得不建立新的生产设备，可是由于资源和国内市场的限制只能生产少量的这种产品。因此，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最近的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一千多种以上的机械和设备生产专业化的建议。

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劳动分工会促进更好地动用各国内部资源的事实避而不谈。例如，捷波合作开采硫磺和铜的经济根据就是很难驳倒的，这种合作是对这两个参加这一事业的国家的巨大贡献，也是对经济互助委员会其余成员国的巨大贡献。同样，对生产铝方面的苏匈合作，对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苏联金吉谢普磷矿建设，对共同设计和建设多瑙河水电站……这会根本缓和这条河两岸的社会主义国家电力紧张的状况……都可以这样说。

中国领导人恶意地诽谤社会主义互助的实际情况。他们的信和文章每每对苏联做出下流的和无根据的断言，说苏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破坏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一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帮助另一个国家增加财源，并在共同采取措施的基础上共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大大改善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状况，难道说这种做法是破坏主权吗？难道说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统一、克服某些经济的民族闭塞状况这一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分割状态，就是兄弟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吗？目前，当社会主义大家庭经济建设的成就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任何阻碍迅速提高兄弟国家经济、妨碍兄弟国家联合起来力争

达到共同目标的人，尽管說了些假革命的詞句，客观上他的行动是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有利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正是这样做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我国政府、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也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絕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一样，坚决拒絕中共中央的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立場。想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意图是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不相容的，是同列宁主义的意識形态和实践不相容的。

（譯自1963年9月6日苏联《消息报》）

最迫切的任务——防止世界 热核战争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誰阻碍着爭取和平和革命的斗争？

今年9月1日，当我們的年輕一代重新踏入校門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最幸福的、和平的时代——生活作好准备的时候，中国政府发言人又发表了新的声明。他以一种似乎是值得称道的頑固态度，重新尖銳地攻击了苏联政府的和平政策。苏联政府在实践中最有原則地、同时又灵活地运用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則。从新华通訊社吵吵嚷嚷的喇叭中重新响起了对苏共和苏联人民的列宁主义的领导极不友好的詞句。說什么，由于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水下进行核試驗的条約，苏联领导人出卖了苏联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人民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这一指名对苏联政府的駭人听闻的誣蔑，他們已經重复了相当长的时期了。但是，在最近的9月1日的声明中，他們进一步“加深了”自己的攻击。中国政府发言人說：“苏联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理論，是不准革命的理論。”发言人却完全不顧这样的事实：站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爱好和平力量最前列的苏联正集中全力制止热核战争，执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寻求和貫徹为爭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的最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以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精神給爭取民族解放和更美好的未来的民族以巨大的、无私的援助。

上述中国发言人的誣蔑直接攻击了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綱領的基础。他甚至企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和平努力貶为是反动的行动。

真正关心所有各国人民的命运、从创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出发并根据現时代的历史条件坚持貫徹共产主义思想与和平思想的一切共产党人，憤怒地、坚决地拒絕这种誣蔑。这种誣蔑最終必然像迴旋鏢一样返回来反对那些投出去的人。

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們——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全世界的輿論——对7月25日的莫斯科条約都表示欢迎。这是因为这一条約是緩和國際紧张局势和导向普遍裁軍的实际步驟，它有助于限制核武器的扩散。几十个国家都保证不在对人类健康危害最大的地方进行核武器爆炸。

所有各国的人民明确地、一致地贊成禁止核武器試驗条約这一举动证明：条約是符合爭取巩固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利益的。

当然，条約只是爭取裁軍和巩固和平的斗争的一个部分。停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試驗并不意味着狂热的軍备竞赛已經停止，世界大战的危險已經消失。因此，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繼續把保卫与巩固世界和平視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他們必須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尽管这些国家执行着侵略計劃——放弃作为政治手段的战争，必須坚决要求在解决国际問題时不采用軍事的手段，而采用和平的手段。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此。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一观点。

但是，世界上最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美国的“狂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复仇主义分子、法国戴高乐保卫新共和联盟的极右翼——以及中国首領們都反对莫斯科条約，反对爱好和平的人

类。因此，由于自己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由于狂妄自大的、大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政策，中国首領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深深地陷于孤立，这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領领导人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热核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应该用这种热核冲突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他們这种論断，沾污了国际工人阶级的最終目的，严重損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們不仅願意牺牲半数的中国居民、而且甚至願意牺牲我們地球上半数居民的生命。是誰給了中国領领导人这样来代表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讲话的权利呢？这种权利是他們自封的，是他們从民族主义的武庫里搬出来的，他們企图把自己的立場、路綫和指示强加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头上。

扮演着現代希罗斯特拉特的角色

希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是由于他焚烧了古代最美丽的建筑之一而載入史册的。但是，希罗斯特拉特式的桂冠不能使任何人变成历史伟人，也不能使他得到人民的愛戴。《紅旗》杂志写道：在全世界热核战争之后，胜利的人民将在帝国主义的廢墟上十分迅速地建立起真正美好的未来。这句格言帶給中国領领导人的只是虛有其表的光荣。現在，中国政府发言人又把这一格言說得“更加有条理”。我們引证如下：

“战争狂人們是会到处扔原子弹和氢弹的。他們要扔了，我們也将以他們为榜样去做，这就要发生混乱，人們就要死亡。需要从产生的各种結果来判断这个問題。我們党的政治局在几次會議上都討論过这个問題。如果現在要爆发战争，中国只有一只手——手榴弹，而不是原子弹，——虽然苏联有。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

果爆发了战争要死多少人呢？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如果要再多一些那就是一半……。如果要发生了最坏的情况的话，就要死掉人类的一半，可能剩下一半，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可能被消灭了，全世界变成了社会主义；在許多年以后这里就会又有二十七亿人口，甚至还要多一些”。中国政府发言人最后以这样的话来结束整个推断的：“我们说，假如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那么，世界上半数的居民将被杀害。至于说到世界的未来，我们是乐观的。”

这就是中国观点的“更加有条理”和他们的乐观主义。显然，中国政府发言人企图用这些话去驳斥虚构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诽谤”，企图证明自己的历史乐观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但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愈搞愈糟！

首先，全段引文的论断和以共产主义的态度提出问题——像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那样——毫无共同之处。

其次，上述引文决不能证明是历史乐观主义，而是悲观主义和对人类的轻率态度。

第三，论断是建立在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和对世界原子战争牺牲者作民族主义的、中国的计算方法的基础之上的。

第四，诚然，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将被消灭。但是怎么能够担保全世界会变成社会主义呢？须知，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光靠用世界热核战争去消灭帝国主义是不够的，为此还必须具备其他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

让我们更具体地看一看这些问题吧！

中国政府发言人的整套思想方法和论据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即：世界热核战争一定会爆发。但是，这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出发点；共产主义运动的出发点今天的具体分析，以世界力量对比为依据，同时——这也不是最不重要的——以对从质的

角度讲是新式的作战军事技术手段的估计为依据的。

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我们的全部政策和宣传工作都是为了最终消灭战争！鉴于防止世界大战的现实可能性，也鉴于世界大战将使用从质的角度讲是新式的军事技术，今天，列宁主义的这一指导思想更是有效的。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强调指出：“能够粉碎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世界战争的企图的时代已经到来。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一切正在反对战争的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共同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但是，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不能拖延的。不能等到原子弹和氢弹开始落下的时候。现在就应当进行这一斗争，并且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努力。主要的是及时制服侵略者，防止战争，不使它爆发。

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决不是坐待世界热核战争爆发，计算多少亿人将葬身于战火之中，而是应该采取实际的措施，使世界大战不会发生。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此目的正发挥着坚持不懈的主动性，它们正在为禁止一切核试验、为争取签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家间互不侵犯条约、为争取签订对德和约并在此基础上解决西柏林问题、为解决国际争端而斗争。正是在危险最大的时刻（在苏伊士、叙利亚、伊拉克和加勒比海危机诸问题上），为了束缚住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魔爪，苏联才把自己的全部国际威望和自己的军事力量压在天平的称盘上。苏联在理论上，同时在一系列事件中也已在实践中证明了：世界大战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它是可以制止的。

与此相反，正是在苏联担负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最大重担这一最严重的历史考验关头，中国领导人不但不予以积极支持，而且给它的斗争不断制造困难。当中国政府发言人宣称：“中国要和平，不要战争”时，他的这些话到底有什么分量呢？不论苏联采

取何种和平步驟，中国领导人总是以搗乱的政策来加以阻撓，詆毀苏联爱好和平的政策，他們說这是向帝国主义投降，理由仅仅是因为迄今苏联还没有用原子武器同美国打起来。各国人民都异常怀疑中国政府是否真正要和平，对此中国首領們还能觉得奇怪嗎？

因此，虽然中国領導人也表示要和平，有时候也說要和平共处，但是，政治实践和他們的全部邏輯证明：他們并不反对采用軍事方式去解决爭执問題的这种可能。根据他們的观点，改造世界只有靠枪杆子。其次，原子战争不用害怕，因为在原子战争以后各国人民——根本不用考虑无法計算的牺牲的人数——将十分迅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社会。用中国領導人的術語來說，他們“在关于十分严重的問題上的严重的討論中”表现出“惊人的不負責任的态度”。

他們为什么忽視革命的具体条件？

从上面引述的中国政府发言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出：按照中国首領們的观点，帝国主义在軍事上的失敗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自动胜利。誠然，在資本主义总危机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已經成熟。但是，根据列宁的学說，这种过渡的世界革命进程必然的是由革命力量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一系列的冲击、由一系列的革命时期构成的。但是，中国批評家們从冒险主义的、抽象的概念化的立場出发去对待世界革命发展的問題，他們企图把正面的、一次就成功的进攻或者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反攻的可能性和革命建立在世界热核战争基础上革命直綫发展的方法强加于人。如果苏联共产党——以及其他共产党——不願意被迫接受这种思想，那么，“苏联領袖們的理論就是用来阻止革命的”。

显然，唯一“革命的”步骤就是把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投入到，甚至以半数人类的死亡为代价的原子冲突中去。

中国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落后的，更精确地说，中国领导人缺乏一个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中国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荒谬观念把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和方法对立起来。共产党人有自己的科学学说，因此，不必借用耶稣教徒们的口号，“用正当方式来达到目的”。是的，狭隘的、与人民对立的封建主和资产阶级曾经在实践中使用了相似的口号。斯大林在自己的个人迷信气氛中，在一定程度上也遵循了这一口号。但是，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手段必须符合它的最高的人道目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群众的目的，因而不能抛开群众斗争或和他们相对立去宣传共产主义的理想。相反，这些手段和方法应该能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革命精神。不能把社会主义恩赐给群众，群众必须经过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同时，也必须活着看到社会主义。当人类的一半都不能活着看到它，而人类的另一半在比戈壁沙漠还要荒凉的世界里为了能有最可惨的生存条件将用数百年的时间来积蓄力量，这算是是什么样子的“社会主义”呢？

各种各样的中国首脑们和发言人所允许的这种“抽象化的概念”竟达到了如此程度，这是使人不能接受的，他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胜利的人民将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十分迅速地建立起十分美好的未来。恰恰相反，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去看待热核战争的结果；从质的角度讲，热核战争将完全是一种新的战争现象，它将意味着几亿人的死亡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毁灭。这是首要的。此外，我们不能对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问题闭口不谈，回避它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的失败将增强群众的革命热情，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很难预言，那时社会主义变革的一切前提都将自动地成熟。对中国领导人说来，这一点是特有的：在他们

的評論、文章和发言里，缺乏关于各个国家的革命形势的思想。中国首領們完全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当世界范围内社会体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已經成熟，当大多数国家已經具备了为实现这一过渡必要的水平时，就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列宁却不止一次地強調过：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如果不具备革命形势，就不会爆发革命；而且有了革命形势还不一定会发生革命。

中国领导人不是从概括了丰富的革命經驗的列宁主义的結論出发，迴避关于革命規律的列宁主义思想，认为群众总是处于沸騰状态，在任何条件下，总是願意进行任何斗争的，只要高喊进攻的口号就行了。迴避革命形势为的是使冒险主义的宗派分子們把革命过程公式化的工作变得輕松些。中国首領們断定：“革命的中心任务和它的最高形式是通过武装道路、通过战争夺取政权。这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則无論是对中国或者对其他国家都是无条件地有效的”。显然，某一国家和某一階級的特殊性被当成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被絕對化了，因而变成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自然有效的万能的規律。

中国领导人忽視各个国家中具体的革命条件这一事实只是证明，他們設想将社会主义“恩賜”給各国人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是在被战争摧毀的帝国主义的廢墟上“恩賜”的。

这样，我們就接触到中国的观念的另一个严重的——理論上的和实践上的——錯誤。

背离馬克思主义，符合托洛茨基主义

当馬克思列宁主义大师們談到新的、更高級的社会制度是建筑在前一制度的廢墟上时，他們是指被革命粉碎了的旧的社会和經濟关系的廢墟而言的。但是，不能机械地将“廢墟”的比喻搬用

到第三次——热核战争——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中。

《红旗》周刊在与帕·陶里亚蒂的论战中曾经写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说的旧制度的废墟，说成是人类的废墟，这是用无理取闹的手段代替严肃的争论。”让我们看一看，到底是誰无理取闹地歪曲历史现象。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旧的封建关系和巴士底监狱变成了废墟。但是，巴黎城依然如故。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是封建—资本主义的关系成了废墟，但是列宁格勒（彼得堡）依旧是俄国城市中的明珠。在热核战争以后，就连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也很难构成“非常美好的未来”的一个部分。不仅仅是城市，而且其他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工业中心都将与全世界的几亿人一起遭到毁灭。如果爆发热核战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阶段的废墟将与几亿人和人类几千年来所创造的财富的废墟混杂在一起。如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中所说的，战争的灾难将把世界文明的主要中心化为废墟。

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政府发言人看不到，文件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废墟”所具有的永久的、常用的意义，这里决不是什么比喻。

为什么就是现在，当中国政府发言人考虑世界大战后社会发展的远景时，他也不考虑考虑战争的后果呢？假如他真的考虑到这些后果，也许他会不得不放弃旧社会的“废墟”这个字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提出“废墟”的问题时是有着完全不同的联系和含义的。

弗·伊·列宁是以完全不同的态度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当他指出战争给工人和农民带来的骇人听闻的苦难时，他教导说：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战争问题。

与此相反，中国发言人，正如他们最近的活动所表明，却贬低原子战争的作用，把这种战争和人类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联系起来

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們得到了托洛茨基叛徒們和苏联的死敌精神上的支持。在托洛茨基一手創建的所謂第四国际給中国共产党的領導和黨員的公开信中写道：第四国际从自己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與你們現在所反对的思想进行斗争，在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全世界大部分共产党的观念的斗争中，第四国际站在你們的一边。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一篇文章里还宣称：“他們（指中国領導人——原編者注）已經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論接近了。”总之，他們所追求的，和以各种方式来掩盖的东西，都被托洛茨基分子公开了。

“紙老虎”的理論是有其限度的

中国政府发言人9月1日又鸚鵡学舌地重复着中国1946年的旧論点：原子彈是紙老虎，說什么看起来可怕，但是，实际上不那么可怕。

在中国报刊上出現了一整套的題为“一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原子彈不过是紙老虎”的信条。

“紙老虎”的名言被认为是一种学說，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定理的发展，是阶级斗争的丰富的历史經驗在理論上的总结”。中国宣传家們上述理論上的野心只能使明白事理的人們对“紙老虎”理論信徒們的不負責任和沾沾自喜表示憤怒。

誠然，政治領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謂宣传自由，可以用形象化的成語使群众接受一定的事物。但是，絕不允許妄图使类似的俗語变成科学定义。列宁不止一次地強調：这样做显然是离开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傾向的意义，它的重要性在不同情况下是不同的。当一位鼓动家，一位面向群众的人，当他用詞藻华丽的术語講話的时候，是为了让群众更好地理解他的话，这是

一回事。如果把类似的术语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顶峰”，那又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谴责这种现象可能是对这位鼓动家的自由及其“教育活动”的自由限制；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党所进行的谴责则是必不可少的了。更何况这里谈到的是低估大规模杀伤人类的武器的問題。类似的論断是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中对原子武器的科学的評價完全背道而馳的。

“原子弹是紙老虎”这种說法第一次听起来，似乎說明中国领导人沒有充分意識到原子弹和氢弹的破坏力。在提出有关“紙老虎”論断的1946年，这也許是可能的。但是，1957年中国的关于使用原子武器的可怕后果的論断证明，他們是多少理解到，反对“美国紙老虎”的斗争将付出巨大的牺牲。然而，这种情况並沒有使中国领导人感到什么不安。一方面，他們預言社会主义陣营的胜利，另一方面他們又說世界力量对比和各国間相互的力量对比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所強調的那樣，即使在三分之二的人类遭到毁灭的情况下，还会有两亿居民，因此它依然是一个大国！这是何等駭人听闻和妄自尊大的論断，它使人們更具体地理解了中国领导人的現代政治哲学的含义和本质。

我們并不想揭人之短，但是，中国首領們的論据的邏輯似乎是要要求两个原子巨人发生軍事冲突。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态度更多地透露了他們这方面的心意。但是，任何人也別弄錯了，原子战争并非解决当代世界問題的万应灵药！

反对关于群众作用的唯心主义观念

中国领导人为了能够宣称“苏联领导人一味夸大核武器的作用，鄙視人民群众，忘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他們是需要有

很大的胆量和虛假的表現的。

中国发言人的宣言本身已經說明，到底是誰蔑視群众和他們的生命，对此不用再多費唇舌。但是，从上述引文中同时还证明：中国政府发言人只是形而上学地理解群众的作用及其历史創造活动，把群众和軍事技术的作用对立起来。因此，中国政府发言人把群众的活动从历史条件中抽象出来，把群众放在一边，而把武器放在另一边。他不只证明了自己的折衷主义，同时也证明他是完全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本质的，他对群众作用的理解是唯心主义的。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創造者，并不是因为：他們是一大堆“群众”，比如：六亿五千万人口；而是因为他們是生产資料的生产者。群众的創造活动是受历史条件制約的——首先是受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技术水平——包括軍事技术的水平制約的。

弗·恩格斯对此說过：軍隊的全部組織和作战方式与之一起的軍隊的勝負都是依靠于物质的亦即經濟的条件的，依靠于人的材料和依靠于武器，即依靠于人民的质量和数量，依靠于技术。总之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地方經濟条件和强大的工具，才能帮助“暴力”取得胜利。企图从相反的立場去改革軍事学的人，到头来总会吃苦头的。

掌握較完善的武器的人比之于掌握較不完善的武器的人有着巨大的优势，这一事实，中国政府也不是不知道的。因此，他們抱怨說：假如苏联領袖們遵守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那么，就会把核武器的样品提供給中国了。这决不是偶然的。中国政府发言人的邏輯实在是令人費解的。从什么时候起，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曾下令苏联政府去帮助实现中国政府的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要求呢？

苏联人民和他們的政府的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不在于是否給中国提供了原子武器的样品。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是經過科学論证的、

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工人阶级利益一致的思想。它是各民族工人阶级队伍之间关系的标准的典范，是建立在团结和协调行动的基础上、建立在互相帮助和支持的基础上的关系的标准的典范。

苏联人从不空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是他们以实际行动把它的原则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贯彻到对各国人民、对国际工人阶级的关系中去，而首先是给全世界的革命力量以最大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道义的援助。

归根结底，亿万的人民群众才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都承认这一点。但是，当我们和中国发言人进行论战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却是另一件事，即：原子武器改变了人在战争中的地位。

即使在新的军事技术条件下，人民群众依然是进步的决定力量。但是，问题就在这里：火箭和核战争却威胁着这一力量。因此，不能低估使用原子武器的后果；不能宣称：决定世界命运的是群众，而不是武器。

我们之所以不能把群众和现代武器的作用对立起来，还因为我们具体地和以历史的观点承认武器和暴力的作用。

在群众的解放革命斗争中，暴力无疑起着进步的作用，但是，它决不能为暴力而暴力。当暴力将达到原子冲突的水平时，我们就应该更全面地考虑暴力的作用，免得到头来原子武器的暴力不但没有带来进步，反而酿成几百年的倒退，并使亿万群众遭受巨大的苦难。社会主义力量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消除社会的不正义现象。但是，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为了反对这种不正义的东西就必须使用原子武器。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记住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留传下来的列宁的预言：“技术的潜力可能达到如此的水平，以致作为进步手段的暴力将被排除出去。”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一个亿万富翁死于原子战争的代价，将

是数百万工人的肉体遭到毁灭。

对使用热核武器的一定的威力和后果作如实的和冷静的估计，难道就意味着支持“武器决定一切”的理论吗？这种现实的估计会引起对敌人的恐惧吗？它会涣散群众的革命意志吗？恰恰相反。当人们愈加清楚地理解了世界大战可能引起的后果时，他们就将愈加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制度和制止世界大战而斗争。

符合于新的历史现象

苏共今年7月14日的信中指出，火箭核武器已经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虽然这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给自己党员和组织写的信，但中国政府领导人却干涉苏共党内问题，把意识形态的问题扩大到国际关系中来并且“英明地”认为：“实际上这就是说，在核武器出现以后，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了，再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帝国主义已经不再是战争的根源，各国人民不再应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正义战争”。

中国政府发言人装作不理解苏共中央委员会7月14日信件中有关论点的含义的样子，蛊惑人心地曲解和歪曲它，以便以后好对苏联共产党进行诬蔑。

核武器丝毫也没有改变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核武器正改变着现代战争的技术性质。

核武器没有改变阶级斗争。但是，工人阶级为了成功地进行这场斗争正需要各国之间的和平。世界大战只会是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变革斗争中的障碍。当然这并不排除在一定国家内由于资产阶级使用反革命暴力而爆发国内战争的可能性。

核武器丝毫也没有改变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但是，为了完成

这一斗争，为了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各国人民所需要的首先是和平。相反地，世界大战只能阻挠新兴民族国家的进步的經濟和政治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排除由于帝国主义的罪过而爆发新的解放战争的可能性。

在目前条件下核武器并不会消除所有的战争。中国报刊臆造这种观点，企图借助笨拙的捏造来誣蔑和攻击其他共产党。共产党人支持正义的解放战争，帮助那些被迫拿起武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取得胜利。

为制止新的世界大战，反对使用核武器的斗争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帝国主义仍然是一切战争的根源和起因。但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必须看到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

今天帝国主义已经不是唯一的囊括全球的制度了。反对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首先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反对帝国主义反动计划的有全世界人民和苏联的最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可以迫使帝国主义的好战势力退却，可以防止世界战争。近年来一系列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一点。始终不渝地执行了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止一次地避免了热核冲突的危险，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威信在全世界提高，加强了共产党人和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孤立了帝国主义者。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帝国主义仍拥有足够的力量，它的侵略性并没有减弱。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把加强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力量看成是自己的责任。

核武器的存在难道改变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著名论点了吗？没有改变。一定战争的出现是一定政策的继续。从克劳塞维茨的论点中决不能得出相反的结论：没有战争政治就不存在。也不能从战争是一定的政治的继续这一点而得出战争是

不可避免的結論。并不是每种政治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战争。一般可以这样说：作为政治的继续的战争，其本质决不因技术与武器的改变而改变。但是，核武器却将世界核战争排除于合理的政策的范围之外，因为这样的战争在目前条件下——在一定的世界力量对比的情况下——不能保证帝国主义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社会主义恰恰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反对任何世界大战，当然更加反对世界热核大战。

和中国其他的文件一样，中国官方发言人9月1日的声明也是建立在谎言和对苏联政府的诬蔑的基础上的。由于中国官方发言人意识到他们在禁止试验原子武器的问题上处境不妙，由于他们一系列的外交政治活动已使他们陷于孤立，因此，他就重新翻出历史，再一次搬出加勒比海地区危机的問題，企图煽起和扩大反苏战争。

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及其解决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苏联的经济与军事威力粉碎了北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拯救了古巴免遭侵略者的入侵，使古巴人民能自由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如果英勇的古巴人民能在世界帝国主义堡垒的大门旁边按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建设新生活，这首先是因为苏联、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爱好和平的力量在支持着古巴。

加勒比海危机的解决证明了制止反革命输出的可能性，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和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可以制止世界战争的爆发、捆住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手脚。

苏联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也门以及其他国家的帮助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同样，1956年秋苏联政府对英国和法国政府的严重警告，阻止了帝国主义国家对阿联的侵略。中国发言人不顾这些事实，企图唆使这些国家的人

民反对苏联，他的这一声明更应该受到所有正直人们的反对和鄙视。中国政府发言人认为“帝国主义这几次失败，首先是埃及人民、叙利亚人民、伊拉克人民斗争的结果。全世界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坚决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想问一下：当时中国政府的这位发言人在哪儿呢？当时已听不到他的声音，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并没有觉察到他的援助。而今天又怎样呢？难道说，中国首领们给那些为三十元银币而散布中国对其他共产党，特别是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诬蔑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败类和叛徒的帮助就是这种援助吗？读者们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也没有能幸免于他们的攻击。

* * *

中共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制止世界热核战争问题上的观点是根本不同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的。诚然，某个中国领导人在这儿或者那儿宣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防止的，但这毕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中国政府的各种行径都是要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破坏国际民主和平组织的团结，瓦解其活动能力。

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防止世界热核战争是谋求任何进步的先决条件。在评论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脱离争取和平和制止世界热核战争的斗争。我们时代的特点正在于此。历史事实证明，在目前条件下，争取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口号不仅不互相排斥，而且相互补充、互相支持。除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之外，争取和平的反帝斗争也是传统的反帝斗争手段之一。

我们认为，世界革命运动和平运动的一切主要潮流之间的正确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保证。

不论从为争取和平的观点还是从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的观点

来看，組成和加强广泛的反帝联盟具有重大的意义。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和共产党正是在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斗争过程中才能最好地爭取群众来执行更高和要求更广的任务，来为过渡到更高阶段而斗争。

对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正是由于这一点产生了复杂的和责任重大的任务：**坚定不移地为劳动群众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同时决不允許帝国主义发动世界火箭—核战争。列宁主义政策的历史使命和共产主义的运动的意識形态正在于此。**

（譯自 1963 年 9 月 11 日捷《紅色权利报》）

弗拉基米尔·考茨基在捷国民 議会上的发言(节譯)

捷国民議会外交委员会于1963年9月12日开会討論了捷政府关于将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提請国民議会討論和批准的提案。議員弗·考茨基在討論中发了言。他強調称：

莫斯科条約无疑是多年以来在我們陣营的領導人和資本主义大国領導人之間达成的和緩国际紧张局勢的第一个具体協議。正是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自然就参加了这一条約的签字的活动，正是因此，世界各大洲几十个兄弟共产党都支持这一条約。

这一条約是走向原子裁軍道路上的完全现实的一步，我們必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爭取实现原子裁軍。

考茨基說，他参加过經濟互助委员会成員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第一書記會議，在會議上他亲眼看到，国际工人运动的这些强大的、光荣的隊伍的領導人如何以衷心滿意的心情欢迎莫斯科条約，把它当作自己的成就和胜利，当作自己的工作的一切兄弟党工作的成果。因此，——考茨基接着說——我們在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那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声明时，就更加感到憤怒不平。那篇声明竟說什么莫斯科条約是“背叛”，是对世界人民的“大騙局”，說什么它增加了战争危險，甚至会导致战争。

中国領導人至今仍变本加厉地繼續进行这一瘋狂的运动，在这种顛倒黑白的口号下組織分裂世界保卫和平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他們一貫地破坏国际民主組織。所有这一切的唯一原因是：仇恨苏联、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的不負責任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們进行了誹謗和恶毒的攻击；而我們国家，我們党，我国政府

和我国全体公民也成了他們誹謗和攻击的直接目标之一。

因此，我們今天有义务对这些誹謗和攻击提出坚决抗議，将其危害性公諸于世，加以譴責，并警告进行誹謗和攻击的人。我們怀着最深刻的信念拒絕他們的誹謗和攻击，我們坚信：我們所作的和平努力，特别是已导致簽訂莫斯科条約的如此卓有成效的和平努力，是我們对世界上爭取自由和进步、爭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最有效的支持。进行的这种努力就是最坚决地貫徹 1960 年在莫斯科签字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声明。

（譯自 1963 年 9 月 13 日捷《紅色权利报》）

社会主义社会和阶级斗争

帕维尔·马霍宁

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信件的交换，也强调指出在至今几乎尚未公开讨论过的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阶级斗争的作用问题上，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教条一宗派主义立场之间观点上的原则性分歧。分歧不仅涉及到局部的观点，而且还涉及到对问题的整个态度。

阶级斗争的过渡性

中共中央 1963 年 6 月 14 日的信，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是建立在把阶级斗争片面绝对化之上的，在谈到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地方也是如此。信中明确地断言，在进入据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离它很远很远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按照中国同志的看法，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信中相当大部分的论断是用于发现直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无产阶级专政都应与其进行阶级斗争的那些敌对阶级。

马列主义把阶级斗争作为分成各个阶级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它一贯论证了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敌对阶级的存在，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它一贯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理解为阶级斗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里資產階級必然逐步被消滅，新的社會關係必然逐步實現。中國同志不斷地為這一條為共產主義運動所普遍公認和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內的經濟所証實的這一馬列主義基本真理辯護，加以強調，好象有人反對它似的，同時却悄悄地把它的有效性移至對它確實有效的條件的界綫之外。這是非常危險的作法，它將在共產主義運動的隊伍中引起混亂。

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經驗，還是記憶猶新。須知，除蘇聯外，這要么是不久前的事，要么目前過渡時期未結束。但是不注意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新條件和新任務，搬用非歷史性的評價標準和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適用的方法來工作，將是極不正確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進行管理和領導，這首先意味着在實事求是的、專業和政治知識的基礎上為經濟和文化的发展指出方向，通過說服來領導人們，並同時向他們學習。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我們單純用片面理解的階級政治標準去領導和估價人們是不夠的。凡是還採用這種做法的地方，都遭到損失並導致社會後退。中國同志的立場客觀上支持這種情緒和態度，並給它們提供了思想綱領。

與此有關，必須記住，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來說，階級鬥爭本身永遠不是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把工人階級以達到高潮的社會主義革命來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看作是客觀上必需的、是歷史上連接對抗性的階級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中間的一環。共產主義運動的使命決不是使階級鬥爭永無止境，相反是要在歷史上結束和克服階級鬥爭並代之以沒有階級的社會。

卡爾·馬克思已在1852年致約·魏德邁的信中表達了關於他的社會政治學說的極其重要的一段話：“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历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

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阶级斗争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过去和现在都决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用革命方式消灭有着人吃人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必不可少的手段。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从运动开始起，只要有可能，即努力引导阶级斗争进入这样的形式，这种形式既能最大限度地加速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又能最大限度地加速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发展。这是最人道主义的形式。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也要努力研究，在哪个历史时期和在怎样的条件下阶级斗争是必需的；相反地，在哪个时候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消失了。

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新性质

马克思和列宁多次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对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不可避免性。但是他们两人都把代替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时期，即把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称作共产主义。他们通常把整个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它的社会主义阶段在内——称作没有阶级的社会。他们从来不谈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列宁在自己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详细地论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并得出结论：“那时国家就会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3页。

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① 列宁直到在自己的著作《伟大的创举》中，才第一次提出关于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也保存一定社会的阶级组织的因素的问题。

中国同志在这一问题上的全部构思，实质上是以共产主义的定义在马克思主义中有两种意义为根据的，一方面它是用来标志包括两个阶段的整个新制度，另一方面只用来标志它的高级阶段，即“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正如苏共中央的信所指出，中国同志通过文字上的耍花招，在不引人注意地把从资本主义到广义上的共产主义，即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偷换为从资本主义到狭义上的共产主义，即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因而对他们来说——与对似乎是具有完全相反的立场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类似——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基本的质的差别消失了。谁想严肃地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的真正作用的问题，那么他对待社会关系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质的变化的问题就不能漠不关心。

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我们暂且不谈随意把列宁的观点解释成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只是形式不同的问题。^②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阶级斗争继续进行着的那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是指的什么？——只是指从资本主义走向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54页。

② 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内容和比重的增长，不仅阶级斗争的形式起着变化，而首先是阶级斗争的作用范围大大缩小了，而本质上新的关系越来越广泛地发展起来。

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呢，还是連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包括在内呢？中国同志詳細地列举了过渡时期资产階級影响的根源，列举了各种各样真实的或臆造的“资产階級分子”的种类，并且宣称“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都不能說，那里已經完全沒有这类分子”。显然，中国同志关于资产階級分子存在的論断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这样就掩盖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里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原則性的和本质的变化。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消灭资产階級的基础上消除了人对人的剝削，小资产階級也轉到了社会主义經濟的范围内，这样，基本上小资产階級也就轉入了社会主义的生活。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是整个社会非对抗性的团結一致的关系，是各个社会集团和个人之間的非对抗性的团結一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同志般的合作和互相帮助的关系。社会主义已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它在社会組織上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結構以及过渡时期的社会結構有着原則上的不同——后二者的特点是包含社会的对抗性矛盾。

全社会团結一致的形成意味着社会关系发展規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階級社会（正如社会主义国家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一样）。階級首先是指对生产資料的关系互相不同的人們的集团。但是，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員对生产資料的关系的基本平等之上的。以年輕的，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久的捷克斯洛伐克为例：

根据人口普查^①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所属社会集团情况如下：

^① 根据人口調查初步統計資料。

社会集团	人 数	所占百分比
工 人	7,556,051	54.97
其他职工	3,767,386	27.41
农业合作社社員	1,443,360	10.50
其他合作生产者	162,624	1.18
个体农民	455,802	3.32
其他私有經營者	45,385	0.33
自由职业者	8,799	0.06
情况不詳者	306,197	2.23
总 計	13,745,577	100

虽然此表中有相当大的百分比的公民其所屬社会集团不詳，所列工人和其他职工的选择标准的正确性是可以商榷的，个体經營者的百分比（总共 3.65%）主要由于退休人員而增高（在从事生产經營的居民中仅占 2.7%），但此表仍相当清楚地表明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关系的巨大的本质的变化。絕大多数的居民——实际上占95%以上——在社会主义部門工作，他們沒有私有財產，但是他們共享生产資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至于談到对国有成分的生产資料的关系，是很明显的。社会全体成員毫无例外地共享国有成分的所有制。就是連中共中央的信也如此強調和工人有着差别的合作社社員（主要是农民），他們对生产資料的关系，在总的性质上和其他劳动人民是沒有区别的。一方面他們完全和工人及其他职工一样共有国家財產；另一方面合作社所有制本身同样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資料共同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并且这种所有制在实际的联系中还常常同国家所有制互相交織和互相渗透，以致有时很难在这两种所有制之間找出一条分界綫。即使在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之間存在的差别还有这样的性质，即我們給社会主义的工人和农民打上階級的烙印，但是，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在这里

我們無論如何不是指的在原来意义上的階級，而是指的非對抗性的、友好的、在对生产資料的关系上仅仅只有部分的差別的階級。而且这种差別不是決定性的，而是次要的。

工人和合作农民在对生产資料关系上的根本平等体现在他們的社会地位及其他方面的根本平等。这首先表现在他們为了社会的利益能以基本上相同的方式使用生产資料。不論合作农民使用生产資料的形式詳細說來是怎么样的，但他們不是随心所欲地使用，而是根据預先制定的生产計劃行动的。合作社使用生产資料的方式即使在形式上也是和国有成分相接近的。其接近程度随着生产資料所有制性质本身的变化以及生产的工业化而提高。合作农民以供应工业生产的原料和供应居民食品来完成一定的社会责任，这和在有部門工作的劳动人民对社会所負的責任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是对农民也力求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的原則，与此原則相对立的是早已被抛弃的托洛茨基的剝削农民階級的藥方和在个人迷信时期出現的某种忽視农民利益的做法。社会主义也力求逐步消除工人和农民之間收益方式上的差別，这是頗能說明問題的。我們支持合作社实行先进的、和工資制接近的報酬形式，并且把在有部門工作人員中实行的社会保障和疾病保險制逐步扩大到統一农业合作社工作的劳动者中去。

与工人和农民經濟地位根本平等相适应的是他們的政治地位和参加国家管理机会的根本平等。虽然工人階級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領導力量，但在政治权利和义务上工人和农民之間已沒有任何差別，同时，实际上参加社会管理的机会也逐步趋于平等。举下面的例子就足以說明这一点：我国在 1960 年选出的人民委员会中，大約有 26.7% 的成員是来自合作社农民；由于农村人民委员会

的数目很大，这个百分比远远超过了合作社农民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份額(10%)。

在工人和农民經濟、政治地位根本平等的同时，他們之間在非本质和較次要的方面还存在着某种矛盾和不平等。这些矛盾和不平等一直到过渡到共产主义才能消除。但是，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和資本主义社会以及过渡时期的階級矛盾有着原則性的区别的。

在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关系或城乡劳动者的关系上根本談不上階級关系，更談不到階級斗争；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則，在某种程度上在国民收入中分配到的份額大小不同的各个居民集团之間的关系上，甚至是按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性、觉悟程度和参加社会管理的程度而划分的各个居民集团之間的关系上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这些关系沒有一个是具有对抗性的，沒有一个是建立在对生产資料不同的关系之上的，也沒有一个是階級斗争的基础。

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階級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不再起推动社会繼續发展的重要动力的作用。階級斗争作用的范围基本上縮小到只是反对人們思想和行为上的资产階級残余的斗争，而階級斗争的形式也起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問題在下面还要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同其他社会集团間有着对抗性关系并与之进行階級斗争的稳定的社会集团。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全体劳动人民有着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义务，并且必需首先按其为社会付出的真正劳动和現在的政治、业务的成熟程度来鉴定和在其工作中以及首先是在社会管理中来使用。

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互相之間保持对抗性和进行階級斗争的稳定的社会集团这一論断，是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学說的基本論断之一。这一論断曾无

数次地遭到来自右边的资产阶级的宣传、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批评，以及来自左边的、特别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批评。在所有的情况下，马列主义反对者的论据都汇成这种或那种、或多或少被减弱的或公开的“新阶级的理论”，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一部分剥削和压迫另一部分等等。

中共中央的信为了论证自己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拿关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还存在各种资产阶级分子的论断作为根据。它援引列宁的话，并列举各种真正的或想像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集团。

首先它列举了力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被推翻的剥削分子。确实在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专政在对他们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在这里我们要问，今天中国同志怎样估计从前他们曾经这样多地强调过的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和一部分国内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会成为非对抗性的那些材料呢？

社会主义社会的胜利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消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还有资产阶级的分子活着，而且是在人们思想和行为中的各种资产阶级残余和病根的体现者和传播人。但他们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出来积极反对制度，而大部分人投降了。主要的是，由于自己新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和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对他们的教育——从前中国同志曾经这样多地强调过这一点——至少他们正在使自己适应新的条件。

其次中共中央的信谈到，“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倾向的并不是不确定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而确切地和具体地说，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的经济。而这种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当然是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的。所以也不存在从小资产阶级中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资

产阶级倾向的稳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尽管如此，我們仍不能低估小资产阶级残余和习惯势力对于人们的意识和行动的长期影响。

其三，中共中央的信中说什么“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政府干部中，由于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的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当然，个别这类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常条件下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水平和觉悟并不排除社会上的任何公民发生小资产阶级蜕化变质的可能。但如果指的是某种稳定的社会阶层的话，那么，要产生这一阶层，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确实必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优势”，而社会则对它无能为力。但愿中国同志说的不是这种意思，否则，这无疑将使他们的论据同上述“新阶级”的理论不相上下。

至于中共中央所谈到的“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必须指出，“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已多少年来就不存在了。当然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仍继续存在。国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展的影响，包括颠覆活动在内，仍然继续发生作用。但这指的不是存在被资本主义收买的、不断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的居民阶层，而只是个别的人；为了使他们循规蹈矩已经不一定非无产阶级专政不可了。

当然这里所谈到的结论，只适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一定的必要的水平之上，没有这种水平，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就不能正常地发生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胜利还不久，人们之间的新的关系还相当年轻，还必须在很多方面系统地发展和巩固它们，以便能充分表现出刺激社会迅速进步的优越性。在一定的不可缺少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至今还未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建设的国家中（例如至今还未完成小生产的合作化），但是基本上已消灭了资产

階級的国家里，階級斗争还有較广泛的用武之地，因为资产階級傾向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小资产階級經濟中发展着。

但象中国这样的国家又是一种特殊情况。这些国家完全或大部分已实现了——有时十分迅速——使資本主义和小资产階級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但是鉴于从剝削社会继承下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低，事实上它們至今尚未能够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某些基本特点——如計划經濟，按劳分配等。当然在这些国家很难說社会主义社会已經建成，相反地，特別是在經濟和政治战綫上（首先是在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談“将社会主义革命繼續进行到底”是完全恰当的，在文化思想战綫上也是如此。

在这些国家中，反对资产階級傾向的階級斗争当然还应起重要的作用，在經濟刚刚初步社会化（因而社会生活的其他所有領域也是如此）的基础上，这种资产階級傾向必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出来。本来，在这些国家中，只有耐心地 and 系統地发展生产力并相应地提高文化水平，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何现实进展提供一个基础。当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盲目地过高估計階級斗争。在这样的国家中，一方面用多大程度去注意或不注意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另一方面，用多大程度去注意或不注意階級斗争发展的政治行政方面，——这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这是那个特定国家及其领导力量——共产党內部的事情。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社会关系的新性质的強調絕不意味着我們把社会主义社会理解成某种理想的世界和富有田园詩意的和諧意境。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产的水平必需达到使社会主义关系能起作用的高度，但在另一方面，物质生产水平在总的質量上和那些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沒有原則区别，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落在它們的后面。共产主义将建立在生产力和文化方面的

新的质的跃进上。首先由于这个原因，同将来的共产主义的关系相比，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是不完全的，有历史的局限性的，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主义特有的非对抗性矛盾还相当深，不仅有进步和积极的方面和因素，而且也有落后的、消极的和起限制作用的方面和因素。而正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领域内进行着新和旧、进步和保守、正确和错误之间的激烈斗争（总之正像中国同志从前正确指出的那样）。但是这已不是敌对的社会集团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全社会为着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而进行的斗争。

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有的非对抗性矛盾同过去的联系首先在于，这些矛盾是由于基本上从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继承过来的生产力的水平相对的低下而产生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不可能使这种生产力水平一下子起质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在自己的外表形式上有时也同过去有联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存在着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城乡之间的本质性的差别，分配上的不平等、参加社会活动和参加管理工作上的差别等等。但是敌对的阶级消失了，作为稳定的社会集团间的斗争这个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消失了。

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进行斗争

这些改变当然不是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已完全不起作用了。首先，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仍然是推动发展的主要杠杆之一，作为阶级斗争一种形式的和平共处，在这里决定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国际间的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

想的不可調和的斗争是占有首要地位的，不仅在国际范围内，而且在国内，我們有责任坚决地、进攻性地、內行地向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識进行斗争。

剝削階級的特殊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已被废除，因此，这些階級本身也就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已基本上在文化和思想意識領域內取得了胜利，尽管旧社会的殘余影响存在的時間还要长一些。与此同时，甚至某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也繼續存在。所以也可以說，在社会主义国家內部，接近尾声的階級斗争主要表现在社会反对人們思想和行为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殘余的斗争上，反对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敌对現象上，例如个别人或小集团的自私自利的剝削行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对待人的官僚主义态度等等。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殘余的斗争中，必須注意下列几点基本情况：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殘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地存在（特别是在那些社会主义关系刚胜利不久的国家里），但是，它們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优势的东西，它們也不能給社会主义社会打上自己的烙印。例如，苏共中央的信指出：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努力当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殘余是錯誤的，因为只要这种努力是通过社会主义劳动来实现的，它就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原則的。我們所指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殘余，只是指这些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使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对抗性地对立起来的观点和行为。

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殘余的斗争不是由人們某个局部性的、包攬一切的小集团领导的（虽然工人階級的覺悟的核心在这一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而是由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领导的。斗争也不是反对某种稳定的，甚至应该有某种稳定的經濟形式的集团。即使中共中央信中如此广泛描写的寄生分子也决不是社会主义社

会中什么稳定的社会集团，而仅仅是基本上置身于社会之外、置身于经济上确定的社会集团之外的个人的聚合。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这些分子认为是堕落蜕化分子，从来没有把他们和阶级等同看待。这些残余在从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成员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这当然是很可能的。但是社会中的任何阶级和阶层在这些残余的侵蚀面前，都没有免疫力的。

在这里，斗争不是去反对资产阶级残余的代表者，而是反对残余本身，是为了把它们代表者从资产阶级残余中解放出来。反对资产阶级残余斗争的主要方法是用社会主义社会的正面工作来限制资产阶级残余侵蚀的可能性。凡是系统地生产的增长和文化的发展创造条件，凡是保持社会主义的秩序，凡是正确的实现了包括“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在内的社会主义物质刺激的地方，那儿的资产阶级残余就很难立足。这种反对资产阶级残余的斗争的间接方法当然是很难算在阶级斗争的抽象空话名下的。

社会主义社会首先是通过思想意识的作用，通过教育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残余的斗争的。行政手段和强制只是在为了维护社会利益真正非用不可的情况下才用。

但是，若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不良现象都看成是资产阶级残余，那也是荒谬的。很多社会主义社会的缺点的客观根源是来自社会主义本身的条件。人们主观上的错误也常常是由于专业知识和政治知识的不足，并非总是带着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残余的阶级性质。

在我们把这样的或那样的观点归结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时，必须特别谨慎。自然，国际范围内的思想斗争也反映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来。同样，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在意识领域内特别顽固地继续存在着，这也是自然的。所以必须不调和地和持久地进行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残余在思想方面

的表現，必須阻止其傳播。但是，为了不把在認識上的部分錯誤，或者甚至是正確的，却是新的、不尋常的觀點當作資產階級觀點看待，我們就必須在非常了解情況的基礎上認真負責地進行這種鬥爭。在這方面，我們若重犯以前在各種所謂意識形態的討論中（例如關於生物學、遙控學的討論等）的錯誤，那將是不正確的。

所有這些論斷表明，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合乎規律地進行反對資產階級殘余的鬥爭，這種鬥爭可以看作是階級鬥爭的尾聲。不過，階級鬥爭作用的範圍及其在社會中的比重已大大縮小，其形式已起了如此根本的變化，以致於使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把這種階級鬥爭看作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中某種有決定意義的過程，或者因而稱之為社會各階級間的鬥爭。由此可見，為了進行反對資產階級殘余的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繼續存在不是必不可少的。全體人民的組織——全民國家能夠勝利地完成這一鬥爭任務。

* * *

在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性質和階級鬥爭的性質問題上的理論分歧，只是在理論和實踐中若干無限重要的問題上，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全民國家和黨的社會職能等問題上的矛盾的根本出發點。當然，這裡有一個問題，中國同志的特殊問題和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是他們關於社會主義的社會關係和“階級鬥爭”問題的論點的基礎。某個國家的共產黨人選擇什麼方法來解決內部困難，這當然首先是這個國家的黨和人民的事情。但因此就更不能允許在理論性的論斷“普遍適用”的形式下強迫在根本不同的條件下工作的其他黨接受這種方法。

我們黨表示贊同蘇聯共產黨綱領，因為綱領中可以找到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社會前進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社會未來發展的基本特徵。我們黨是在分析本國的條件的基礎上自己下決心這樣

做的。同样我們党也贊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在給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的公开信中所闡述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捍卫苏共綱領的列宁主义的路綫，捍卫走向共产主义的列宁主义道路。

（譯自1963年9月19日第10期捷《新思想》杂志）

我們是为和平共处而斗争的 列宁主义政策一贯的拥护者(节译)

安托宁·诺沃提尼 1963 年 9 月 22 日在
布尔诺捷苏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同时，我們考虑到，热核战争的威胁还没有被制止，防止热核战争还一直是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一切力量首要的和持久的任务。由于这一原因，我們完全把苏联的和平纲领当作自己的纲领，我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都是为和平共处和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而斗争的有远见的列宁主义政策的一贯拥护者。因为它们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以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目标完全一致。

但是，使我們深深感到遗憾的是，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独特的“总路线”毫无顾忌地强加给各国共产党，这条“总路线”从左倾机会主义立场全面地修正 1957 年和 1960 年莫斯科文件的基本纲领性原则和列宁主义精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则性立场完全背道而驰。

我們非常尊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使我們深为难受的是，正好在和平、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事业在世界上取得新的成就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出于民族的和大国威望的原因把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分裂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国际宗派活动，同和平共处政策的所有反动的反对者并肩站在一起。他们粗暴地攻击苏联、其他国家和共产党，这不利于自己，也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这种作法至少是违背阶级原则和马克思

列宁主义原則的，是向社会主义敌人的磨盘上加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报刊最近的声明和讲话表明，他们把争论从党内转到显然国家的立场上去，他们的道路是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公开分裂的道路，只能导致对苏联采取完全敌对的立场。中国领导人对于在全世界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利益所造成的损失负有重大责任。我们将坚决为反对这些观点和这种活动而进行斗争。我们将竭尽全力，以使我们在同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各国和所有其他共产党进行兄弟般的协作的情况下，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

（译自1963年9月23日捷《红色权利报》）

現时代的性质是怎样的

雅洛斯拉夫·馬杰伊卡

对这个在政策方面极端重要的問題的不正确回答，往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傾向性錯誤的根源。伯恩斯坦、卢森堡以至今天中国的理論家們的情况都是这样。我們必須两只脚牢牢地站稳在客观实际的土地上。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发展常常会使許多設想和学說站不住脚。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首先就在于，它能認識这些新现实，能制定新的路綫和思想，这些新的路綫和思想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活动的新的問題和任务。誰要是在認識实际的方面忽視用具体的、历史的观点看問題的要求，死抓住过时的教条，或者把一般的原理生搬硬套到已經改变了的具体情况中去，他就不能使自己的意图和实际結果一致起来。不管他的主观意图是多么好，客观上却会是有害的。有的人可以頓足捶胸，賭咒发誓說自己是忠于革命的，但实际上却在为反革命效劳，使之得到无可估量的好处。可惜，中国领导人沒有認識到这一点。

帝国主义的产生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向馬克思主义理論家提出了一个問題：正在开始的新时代的内容是什么？列宁回答說：“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0頁）。这个回答以普通的形式表达了历史发展中的质变。直到今天它也以最普通的形式繼續有效。不过，要使我们能在現时代很好地判明方向，光靠这个回答是不够的。因为从那时候以来，出現了一系列使問題深化和复杂化的新因素。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間的力量对比改变了；形成了两大体系；殖民地的革命发展了；世界上人們的思想起了重大变化；經過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系列解放战争。因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分析时代的性质方面也向前发展了，在1960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中把上述定义作了如下的扩展和具体化：“我們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的时代。”过去，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行动，是由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矛盾和弱点的表现程度来决定的。今天，社会主义对世界局势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它成了头等重要的创造性因素。

面对着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理論家們重复和歪曲着列宁的一般性定义去证实自己的非现实主义的不断进攻的理論，并指責共产主义运动的絕大多数“叛变”列宁主义。中国的列宁主义和他們的进攻性理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把这些言之无物的冒险主义空談变成实际政策，它会走向哪里去呢？今天决定世界局势的发展、决定我們政策的究竟是什么呢？

* * *

現时代的主要矛盾过去是、現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間的矛盾。^①力量对比对这一矛盾的解决起着根本性的影响。这是一个内容很广泛的范畴，其中包括各种因素：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各国間經濟方面、政治方面和軍事方面的力量对比；资本主义世界中各种潮流的相互矛盾或联合的状况；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同盟軍的民族解放运动；世界和平运动以及各种民主运动；

① 苏共中央刊物《共产党人》发表的题为《争取创造性馬列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針》的社論，更詳細地論述了这一問題。此文《党的生活》杂志第17期已轉載。

群众及各国政府的思想状况；工人运动的发展等等。这一切就是规定世界历史的现代性质的，内容广泛、形式丰富多采的现实。

力量对比中的各种因素，不是在一切时候都起着同样强烈的作用的。起着头等重大的影响的有时是这种因素，有时则又是另一种因素。但各种因素又都同时存在，并且互相发生影响。它们互相交错着，因此，只有对力量对比的各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才能判断世界局势的发展。对一种因素估计过高而对其他因素估计不足，会在政治上引起极为严重的后果。当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管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起着什么样的变化。

战后首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方面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壮大，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了新的推动力。社会主义思想掌握了亿万人民。对此，帝国主义者用“冷战”作了答复。这样就开始了他们妄图阻止世界的发展、夺回反动派业已丢掉的阵地的阶段。进步和反动之间的这场斗争是在对我不利的军事力量对比下进行的，美国在头几年的原子垄断和后来在原子武器方面的一定优势，影响了军事力量对比。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依靠着新兴的强大和平运动，胜利地抵抗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攻势。

五十年代后半期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苏联的原子武器和火箭技术使世界上出现了新的战略形势。这对两大体系之间的根本国际政治问题的解决起着本质性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化过程也加剧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战略和策略提出了灵活的、创造性的新原则。社会主义的政策不是“实力地位”政策。但是，它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力量对比取得了许多胜利，从平息中近东地区

的侵略企图起,到解决加勒比海危机止。

正是加勒比海危机表明,力量对比上的新现实迫使西方好战集团清醒起来,同时也使我们在执行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时候能为了和平的利益进行革命的妥协。它使我们能迫使帝国主义者承认现状而不必同他们进行可怕的较量。但是,中国教条主义者却把这种人道主义的解决看作是“新慕尼黑”、“投降”和“叛卖”。中国首領們的政策中的这种盲目自信和冒险主义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虽然不一定是唯一的和完全的解答,应该到他们对于时代的性质、对于力量对比的各个方面的不正确理解中去找,到他们对于力量对比的发展将日益对我有利缺乏信心中去找。

* * *

社会主义使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当然,斗争仍然在继续进行。但在经济方面我们还没有赶上资本主义。过去留给我们的底子太差了,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带着严重的历史创伤开始建设新生活,要消除这种情况是困难的。但近十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得兄弟国家的经济核心力量有了巨大的增长。社会主义实行国际分工的可能性、对一切社会资源进行计划以及生产的不断增长,使我们有理由预计到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景。社会主义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政策也就是从我们能够通过和平途径在这场竞赛中取得胜利的信念中产生的。两大体系的斗争可以在工厂中、田地里、科学实验室里,并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来赢得胜利。

中国是一个深受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统治之苦的国家。尽管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建设热情并取得了成就,但中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中很薄弱的一环。这种落后状况,再加上由于不正确的经济理论而引起的某些困难,使许多中国首領变得急躁起来,他们不相信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能取得胜利。此外,帝国主义

政策使中国所处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地位，特别是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不平等地位，无疑也使中国首領們十分恼火。所以他們就想利用在軍事方面对社会主义有利的力量对比——其实这完完全全是苏联的功劳——，用战争来解决主要的世界矛盾。显然对他們来讲，人类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是无所謂的。这场双方将使用如此可怕手段的战争如果打起来，将会使人类及其生产力倒退很远，使几代子孙都受到危害。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并不否认战争的可能性。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險。而且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它一定会受到应有的回击。但是，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来决定两种社会制度决斗的勝負。这就是思想方面和經濟方面的斗争。中国的理論家們发誓忠于和平共处政策，不过他們的这种和平共处在任何情况下正是，而且仅仅是通过暴力手段强迫而实行的。他們的文件和言論中一直使用着同我們一样的馬克思主义術語和概念。但仔細看一看就能发现，这仅仅是術語上的一致。对于概念的内容在北京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而且，空洞的詞句和不少是从孔夫子那里学来的华丽詞藻又常常使概念的内容含糊不清。

中国領领导人把軍事力量对比絕對化和他們用暴力解决世界矛盾的整个冒险政策，在他們对莫斯科禁止大气层和地面核試驗条約的态度中特別明显地表現出来。北京政府頑固地努力想成为所謂“原子俱乐部”的一員，想自己拥有原子武器，这使得它在絕大多数人类以寬慰的心情欢迎这方面局势的緩和和各大国間第一个实际協議的时候，竟然站出来反对。

中国政府对莫斯科条約的整个态度和論据以及它在某些不发达地区所展开的瘋狂活动，证明它的目的不多不少，恰恰就是要加强自己的大国地位，这整个政策使人感到它是在同华盛顿和伦敦討价还价。

在时代的性质和当前形势发展倾向方面的認識論上的不正确态度，还不仅表現在这个范围之内。中国领导人也沒有能正确地了解資本主义世界的目前形势。

他們在北京臆造出一种奇怪的理論。这种理論特別貫串在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的信中。他們說什么目前在整個資本主义世界中对統治階級发动全綫进攻的特殊有利的革命形势业已成熟。因而革命已是近在咫尺了！必須以工人階級采取暴力行动，全面展开斗爭为方針。

攻击其他的党，如意共和法共，說它們缺乏战斗性，并給重要的革命战士扣上各种帽子，甚至加上侮辱性的綽号，这种做法很难认为是同志式的和友好的。西方的共产党人在斗爭中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就，而这正是因为，他們在斗爭中首先注意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理論家們在1956年就創作了众所周知的文件《再論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虽然在这篇文章中已可以找到今天的錯誤和理論歪曲的萌芽，但同时也包含了譴責机械地把普遍适用的学說搬到各国特殊条件中去的思想、并提出每个党有按照具体条件领导斗爭和建設新社会的权利。但是中国理論家們也第一个把这种思想忘却了。

有这样的“馬克思主义者”，他根据真正是停留在长城某处的目光，毫不尊重世界上事物的发展，却去給兄弟党提出劝告，对这种“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加以原諒呢？

資本主义发展的普遍法則当然是繼續有效的。資本主义充滿了各种矛盾，百孔千疮。工人階級仍然受着剝削。共产党人正在为建立广泛的战綫而斗爭，正在爭取同盟者。資本主义患了許多慢性的不治之症。但中国领导人关于資本主义在第一次进攻性的打击下就会崩潰和它是“紙老虎”等等的論点，与对当前世界的科学看法沒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一系列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不存在直接的革命形势。近几年来，一系列刺激因素在某些国家中引起大的或小的繁荣。统治阶级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武器，还使相当大一部分工人阶级处于它的影响之下。共产党人正为争夺群众的思想而同反动派和右派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他们经常顺利地培育反对垄断资本的統一战綫的萌芽。他们在争取群众拥护社会主义的和平政策，并同社会主义政党內的左翼建立同盟。如果照中国的建議去做，就只有放弃这一切，投身到只能导致早已受到譴責的宗派主义和孤立的冒险行动中去。我們党争取全国人民的大多数拥护共产党政策的斗争經驗，特别是 1945—1948 年的經驗，对西方的共产党人具有巨大意义。但我們党不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些經驗。西方的共产党人是英明的，他们了解本国形势，懂得利用我們的經驗中对他們合适和有用的东西。

工人运动是力量对比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敏銳的、复杂的和有着无限进步发展前途的組成部分。但是，脱离实际生活的、由某种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强加于人的理論，只能葬送革命者对最后胜利的希望。

統治阶级队伍中的特別的分化过程，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目前的发展中的又一特征。这种分化过程特別表现在近几年中。资本主义的政治家們在对东方的态度和解决世界性問題方面，是不一致的。这影响着我們对外政策的战略和策略，成为力量对比中的又一个有利因素。中国同志們否认这点，拒絕它并坚持对“现实主义者和“狂人”，軍火商和和平商品輸出者，法西斯分子和自由主义者，戴高乐、阿登納、麦克米伦、肯尼迪、尼赫魯、苏加諾、納賽尔等不加区分的政策。对他們來說，所有这些人都是一样的，他們的目标是一样的，他們政策的性质也是一样的。

近几年来在世界上和两种体系的关系中出現的力量对比的变

化和新的现实也使资产阶级政策中增加了五花八门的观点和流派。人民群众的压力、由于割断国家间的传统经济关系而引起的经济问题、由统一组织提到更高地位上进行的竞争、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联系的吸引力、以及——这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双方都拥有无比巨大的威慑力量这一事实——这一切使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政府的政策具有较为现实的看法。这就为缓和紧张局势、举行谈判、为了维持和平局面而采取解决争端的更明智的态度提供了希望，甚至在这方面已带来了第一批局部性的成果。

可是在另一方面，在这些新现实情况中也产生了一个特别的危险的共存局面，它在继续威胁世界和平，给国际关系的进步过程中设置障碍。所谓波恩—巴黎轴心把戴高乐的大国主义野心同阿登纳集团的复仇主义要求结合了起来。中国的立场一方面既不把现实主义的潮流同这些反对一切能和缓紧张局势的协议的人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例如为了反对莫斯科条约，它却又使中国政府和这些和平破坏者“同舟共济”起来。

* * *

不发达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使“积极中立”政策成长起来。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常常动摇。他们受着内部、外部的许多压力。但在国际政治方面，他们在原则上总是代表着进步潮流。这种进步潮流有时是我们政策可能的同盟军，有时则是真正的同盟军。这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态度使美国根据其“全球战略”建立紧紧包围社会主义体系的军事基地和条约的完整链条的计划不能成功。这样，对帝国主义战略家来说，两个体系之间就出现了他们作战部署的死角。

所谓新兴国家也是拥护和平的。甚至连肯尼迪政府几年来都尊重这一事实。中国政府在1954年4月就同印度政府一起宣布了潘查希拉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样它就成了第一个承

认新诞生的自由国家的政策的和平性质、尊重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的特殊性的国家之一。今天对它来说，尼赫鲁同苏加诺和纳赛尔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它不愿意看到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别。它把共产党同政府在和平政策上的合作看作叛变。印度共产党的主席丹吉则是“尼赫鲁的走狗”。

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愿意支持北京争夺领导权的野心，谴责中国将军们对印度的侵略要求，并决心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政策正是极大地帮助着帝国主义者的影响向这些地区渗透，虽然它言之无物地、泛泛地空谈对帝国主义要进行坚决斗争。印度右翼势力的加强，除其他原因以外，必须记在中国在同印度争端中采取的不良步骤的账上。中国政策会使我们很快地丧失在力量对比方面这一重要的中立的反帝因素，这一因素站在和平方面，并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十分重要的后备力量和同盟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战争、起义和革命的浪潮在亚、非、拉丁美洲汹涌澎湃。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的危机变成了这一体系的真正崩溃。民族解放运动同近二十年来席卷全球、导致社会主义体系产生的强大革命进程联合了起来。殖民地和附属国争取自由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互相支持。但是，二者不是同一回事。甚至根本不可以把民族解放斗争当作是时代的首要现象，让世界进步力量的一切政策服从它。支持这一斗争不能意味着社会主义体系的战略、策略服从这一斗争。如果要这样做，那就不仅是曲解时代的性质，而且是又犯了上面提到过的老错误——把一种现象绝对化而忽略其他现象。

中国的理论家们硬说，他们是纯粹的列宁火炬的唯一的守卫者。但列宁曾反复地、十分强调地说过，归根到底，共产党人必须使任何民族运动、任何解放斗争服从争取社会主义、争取世界革命

的斗争要求，中国理论家们怎么能忘记列宁指出的这一条著名的真理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是现时代的主要内容。四十多年来，这个基本矛盾一直影响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并将继续影响下去，直到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最终失败为止。

现在和将来决定这一历史发展的结局的主要力量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这种力量依靠着它在全世界的强大同盟军。民族解放斗争肯定也是它十分重要的一支同盟军。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体系作为世界民主和平力量的主要物质后盾，那么，任何进步斗争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体系用自己作出的榜样来帮助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力量，在经济上援助获得了解放的国家，并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些国家的利益。同时，社会主义体系自己也从这一斗争中汲取力量。

殖民地和新兴国家的共产党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这条真理。把问题本末倒置只会使他们不能正确地认清自己在世界革命力量的潮流中应占的地位和态度。不管中国的理论对这些国家的某些共产党人来说是多么悦耳动听，这种理论不过是蛊惑人心之词，其目的是要分裂共产主义运动，争取这一运动在新兴国家中的部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国主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制造了分裂主义观点。但这些国家的党的健康核心坚持列宁主义的阵地，不上北京首领们的圈套，使他们为争取同盟者支持其分裂主义行为而使用的不负责的、无原则的伎俩不能得逞。

中国的政策会导致反帝战线的分裂，导致在许多场合下享有巨大威信的各国共产党的孤立。

革命的工人阶级为自己创造了强大的斗争武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九十多个党团结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几千万最有觉悟的、最坚强的代表。这是一支伟大的突击队，它在当代力量对比方面具有重大的作用。这支队伍越是统一，越是团结，战斗力越强，它

就能越加順利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最后胜利作好准备。一切共产党人的头等国际主义义务就是加强团结。

当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过，现在也常常产生各种矛盾、讨论和分歧。各国党认识客观现实的程度不同，各有其具体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看法也不同，这样就带来了不同的观点，引起了矛盾、讨论和分歧。共产党人努力通过交换意见、同志式的帮助、谅解和耐心来克服这些矛盾和分歧。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处理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关系的精神也是如此。

但是，中国领导人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显然认为，辱骂、不断加剧矛盾、怀疑和对从不同的看法和实践中必然会产生观点分歧采取完全不容忍的态度将会更有助于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不仅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是这样。现在北京的报纸还侮辱其他党的领导人，并把一切不同意他们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思想的人都宣布为犯倾向性错误的人、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徒。根据这种情况，他们关于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号召就显得非常奇怪。他们想讨论，但是不愿意倾听反对者的意见。他们想决定今后的步骤，甚至想强迫别人接受按人口数量计算的表决原则，从而剥夺其他党的平等地位。他们想把自己对和平和工人阶级运动来说是危险的观点强加给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阵线。

但事实是很顽强的，要想用投机性的论断来把它从世界上消灭掉是办不到的。时代是不能臆造的。必须了解时代。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生活的、有胜利希望的政策。立足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首要前提。这也是行动一致的唯一基础。我们相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健康力量将会离开投机的境界，同世界其他共产党人齐心协力地踏着我们地球上坚硬而又美丽的土地前进。

（译自1963年9月24日第19期捷《党的生活》杂志）

为了和平,为了社会主义

茲比涅克·馬雷克

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輿論正再一次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文件,再一次考虑当代的最基本的问题。昨天我們刊登的苏联政府的声明,像区分谷粒和谷糠一样分清了是非,并且提出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同中国领导人錯誤的投机活动的危险背景进行斗争的明确目标。

近几个星期和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所进行的侮辱性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受到了无数有根据的、正当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試驗的莫斯科条约所持的态度、也完全正当地受到了同样的反对和譴責。中国政府9月1日的声明,实质上只不过是在世界各地对它提出的公正批評面前为自己辯护的尝试,是把自己描繪成和平政策最热心的捍卫者的尝试。可惜許許多多的事实,許許多多中国的声明和行动都证明恰恰与此相反。

我們不妨看一看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基本观点,看一看他們对世界上存在着核武器的巨大潜力这一事实抱怎样的观点,看一看他們对可能发生的世界核冲突及其后果的前景持何种观点。他們在这一关系到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所持有的十分錯誤的态度的論据,是毛泽东的一句格言——很久以前中国领导人就开始用这一格言玩弄騙人的把戏,并且恰巧在不久以前,当被他們自己所挑起的論战所迫的时候,才把这句格言(当然是一种被奉为标本的

經過修飾的語句)搬了出來。在今天,這涉及到大家所熟悉的事情,也就是一個得到了絕大多數國家共產黨人的否定回答的問題:即所謂為了消滅帝國主義不管付出多大的犧牲,人類在熱核衝突以後,將得到“美好的未來”。

這種幻想般的想法不是新的想法。它在中国的出現同中國經濟建設的不現實想法和計劃緊密相聯的,它是同臭名遠揚的“大躍進”理論、人民公社、民族主義和對其他共產黨與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員的非同志式行為的表現一起出現的。對於他們這種以駭人聽聞的輕率態度任憑整個整個民族,特別是那些弱小民族犧牲的幻想般的理論,我們曾不止一次地同中國共產黨人當面討論過。這種討論不是在今天,也不僅是在昨天,而是在四年前就展開了。那時我們就曾指出他們的觀點是不科學的,不人道的,指出他們觀點的反馬克思主義性質。

“投降”和“投降主義”這兩個詞在中國言論中出現得多么頻繁!這種毫無根據的指責是不值一駁的,過去幾年我們所目睹的幾次尖銳的國際危機的歷史過程足以證明中國論斷的荒謬性。世界輿論(也許只有中國輿論例外)充分了解蘇聯政府堅定不移地起來捍衛和平和各國人民獨立的堅決態度。

然而中國領導人對之固執地閉眼不看的投降主義是有的。這就是他們自己在反對戰爭的鬥爭中的投降,在世界上存在着巨大而無比危險的核武器潛力這一事實面前的投降。他們的政策是宿命論地承認這一事實的政策,是力圖將自己的下列觀點強加給全世界的政策:即對這一事實除了給予留心以外別無他法,對停止軍備競賽無能為力,人類除了經過繼續囤積和擴散核武器直到爆發熱核災難以外別無他路。中國泛泛的和平聲明絲毫不能改變這種情況,而且不斷地伴隨着這種聲明的是,對為逐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減少世界核危險、使各國人民所共同爭取的目標予以接近和為

实现作为持久和平的可靠保证的全面彻底裁军而采取的步骤所进行的攻击，这就使得这种声明站不住脚了。

如果这不是投降主义，那么这又是什么呢？是不是一种比投降主义还要更坏的东西，是不是进行使别人在热核冲突中相撞的投机呢？

所谓争取和平、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与和平共处的斗争违背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甚至等于“不准革命”的说法，是中国惯用的攻击内容的一部分，是他们的分裂目的极其明显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苏联政府9月20日声明也对中国的谬论作了适当的回答。遗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整个长时期所提供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很明确的经验，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还嫌不够。中国领导人今天就已经对几年前他们自己也签了字的东西表示不满了。因为，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声明对这个问题讲得十分清楚和明确，它强调了和平共处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以及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有利发展的意义。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也在1960年声明上签了字。然而过去几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同一个领导人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的讲话中攻击和平共处，竭力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对立起来。似乎在国际问题上捍卫列宁主义路线的人由于肯定核战争会使许多国家的人民遭到死亡，因此他们就是“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诬蔑为死尸运动”。

同往常一样，接着而来的就是将所有问题混淆在一起的杂拌，其目的在于迷惑那些可以被迷惑的人、分裂革命运动、把革命运动各部分和各战线相互对立起来；把争取和平与全面裁军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对立起来；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立起来；把反对核战争威胁

的斗争同整个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并且首先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同苏联共产党对立起来。

这样的投机和預謀过去沒有得逞，而且将来也不会得逞。无论多少誹謗、歪曲和謊言都破坏不了革命运动的团结，都离间不了革命运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用种族“分类”的毒素也毒害不了革命运动的队伍，解除不了它们的武装，也不能使它们按照宿命論的观点在核武器的威胁面前投降，不能使它们放弃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这一明确的、列宁主义的人道主义政策，不能使它们沒有头脑地投入到世界性的热核战火中去。

苏联政府的声明正当地、极其严肃地指出，“中共领导人已超出了同志式的党与党之间的討論范围，現在他們已經在公开地进行反对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旨在实现自己特殊目的的政治斗争。越来越給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中国领导像看待自己的敌人一样看待那些不同意他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同时苏联声明还指出了一个事实：今年7月苏共领导人和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并没有結束，只是根据中国党的建議而中断了。尽管中国领导人近来的言行无所不有，可就是沒有繼續进行真正的两党会谈的愿望，苏联声明还是表示了要利用一切可能消除分歧的意願，并借此机会提到了它为停止公开爭論而发出的呼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所有关心共同斗争成就的人，都贊同苏联的呼吁。他們从中再次看到了苏联为保障革命运动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而作的努力，他們从中也看到了采取重要步骤加强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可能性。我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它的态度也是为全世界所了解的。我們要提請注意我党十二大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的呼吁，我們也提請注意今年7月捷共中央声明对此所表示的迫切希望。中国领导

人直到最近还在繼續对我党进行的誣蔑性攻击，絲毫也动搖不了我們的坚定立場。

我們完全支持苏联政府的声明，并同意它的思想。它指出了为伟大的目标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而必須走的道路。

(譯自 1963 年 9 月 25 日捷《紅色权利报》)

十四年以来

茲比涅克·馬雷克

今天是人民中国的国庆。在这样的时机，一般习惯是回顾往事并想一想，这个节日意味着什么。

十四年以前，北京成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见证人。中国人民经过了漫长的、艰难的革命道路而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善于摆脱旧制度的令人痛苦的枷锁，摆脱东方的专制统治以及伴随专制统治的一切东西。中国人民善于摆脱掉自己的历史和世界发展的进程所加在他们命运上的令人痛苦的枷锁。

任何一个见证人都不会忘记，我们以及世界上进步的公众是如何衷心地祝贺中国首都、上海，以及其他重要的中心从反人民的、反动制度的政府中解放出来。我们的人民以最大的兴趣注视着，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如何开始了自己国家的建设，如何以忘我的劳动开始克服困难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后果，以及如何奠定新社会的第一块基石。就是在今天我国人民也认识到这一事实的无限的意义。像那时候一样，就是今天，地理上的距离也不能削弱我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的经受了考验的友谊。

如果我们纪念中国国庆，我们不能不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签订的，并用以宣布朝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目标的基本文件，我们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条约，在这些条约中，不论就时间，还是就其意义来说，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签订的条约属于首位。

在中国国庆的这一天，我们也回忆起传统的捷中友谊和它在过去所带来的不少成果。我们也回忆起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条约。在这一条约的序言中强调指出，条约的根本思想是：促进和平、国际合作以及和平解决世界上目前的一切迫切任务的事业。

当然，今天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相互往来的情况和进一步发展感到担心。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要对中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负责的不是这些国家，不是因为它们而造成这些关系的严重恶化。

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到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都了解中国人民根本改变自己的国家面貌和生活的巨大努力，他们尊重中国人民的才干，他们也了解到中国本身所蕴藏的巨大可能性，中国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的紧密合作才能发展这种可能性。可是，今年不得不指出，过去几年，相互之间的换货量大大减少了。我们的劳动人民清楚地知道严重破坏和人民中国整个合作的原因，破坏的严重程度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不安。

须知，人民中国的诞生和成长从一开始就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存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世界上第一个大国，世界走向社会主义和持久和平的基本支柱——苏联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只有各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建立在列宁主义原则上的最紧密的合作，才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作为整体的这些国家的大家庭顺利发展的保证。对此，不能有丝毫怀疑。

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这样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成我们这样作。我们所有的人都以此来为世界和它的前途负责。相反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任何退让都会损害共同的事业、损害和平和社会主义。

在10月1日，我們向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的、同志般的祝賀。同时我們毫不动摇地相信，把我們联合在一起的东西最后必然取得胜利，同时，我們一刻也不忘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而光輝的目标。

（譯自1963年10月1日捷《紅色权利报》）

爭取和平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的 新胜利(节译)

弗拉基米尔·彼得

《党的生活》第 17 期转载了苏共中央刊物《共产党人》上的一篇重要文章《爭取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篇文章从原則上全面地清算了主要以中国首領为代表的“左傾”机会主义者修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当前方針的企图，同时也分析了爭取和平的斗争同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关系的根本問題。文章指出，和平共处并不排除社会的革命变革，而是为实现这种变革創造有利的形勢，它有助于世界革命进程的繼續发展。文章中写道：“世界两大体系各国的和平共处和經濟竞赛不是什么别的，正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目前条件下最集中的表現。当然，如果我们象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做的那样正确地理解这一点，而不把阶级斗争只看作是武装暴力和流血的話。”

这个原則性的結論也充分反映了我們党的立場。在这篇文章中，我們將更詳尽地研究有关爭取和平的斗争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关系的一些具体問題。

和平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的关系一向是很密切的。近几年来在爭取和平的斗争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間形成了一种非常紧密的联系。其原因是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的世界局势中，发生了重大的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局势今后的发

展。这主要是指下列两件事实：

——世界上新的力量对比，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具有决定意义的增长和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的发展，为防止战争创造了有效的前提，为不经过世界战争、在和平条件下解决当代的主要社会问题创造了有效的前提；

——新的军事技术在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后果方面也引起了质的变化。产生了这样的条件，就是：防止世界战争成了顺利解决基本社会问题的直接前提。

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前提

不难理解，这样的世界热核战争对于解决当代世界上的社会问题意味着什么。不错，在这样的战争中帝国主义将最终被消灭。但中国首領們力图证明，世界战争的结果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废墟”，他们这样做是蓄意欺骗各国人民。须知在这样的战争中，同帝国主义一起，很大一批国家的居民，包括其工人阶级也将实际上被消灭。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那种情况下，在英国、西德、法国以至美国这样的国家里，究竟还有谁来完成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呢？事情很明显，对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实行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这个问题那时将根本不再存在，其理由就是这一可怕的事实：战争将实际上消灭非常大量的劳动群众。因此，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是按照中国首領們的建議，把自己的路綫建立在这种“前途”的基础上，这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对于为争取民族独立或为巩固独立、发展本国经济而斗争的民族来讲，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还要问，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又是如何呢？中国首領們指責我們說，我們害怕战争，而这就是我們和平政策的主要动

机。这种誣蔑不值一駁。去年秋天，当加勒比海危机把人类推到世界热核战争的边缘上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沉着而勇敢地完成了加强准备来对付帝国主义阴谋的一切任务。我国劳动人民忘我地加强着我国军队的防御能力，如果必须拿起武器来保卫我国边界不受侵犯、保卫我国独立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世界热核战争对我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我们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规定的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计划和目标，只有在热核战争将被防止这种前提下才可能实现。

因此，防止世界战争和保卫住和平在今天是实现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革命目标、解决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的一切根本社会问题的极端重要的条件和具有关键性的前提。

中国首領們再三重复自己的理論說，世界核战争之后，“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他们翻来复去地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散布关于人类经过世界核战争之后的前途的这些“甜蜜的幻觉”是什么意思呢？这不仅是故意欺騙各国人民，以各国人民的命运当儿戏。这是中国首領們拚命地要为自己以实际拒絕和平共处为基础的政策辯护，同时力图使人民群众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途”是“可以接受的”。中国领导人甚至把是否乐意为了早日消灭帝国主义而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作是衡量革命性的标准。

不管他们怎样保证，說“中国也要和平，不要战争”，实际上我們在中国首領們的文章和言論中找不到，在他们的实际政策中就找不到一点实际的证明，說明他們是在积极地、坚决地努力爭取

持久和平，打退侵略勢力的挑釁，迫使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站到和平共處的立場上來，迫使他們接受當代世界發展中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和平解決。相反，中國首領們的行動迎合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需要，幫助他們加劇緊張局勢、增加世界核戰爭的危險。中國首領們再三主張實行“針鋒相對”、“以牙還牙”的政策，號召為爭取和平而鬥爭的各國人民“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如果有人提到世界熱核戰爭，他們就露出一副驚訝的樣子問道，他們又沒有原子彈，怎麼談得到什麼發動世界核戰爭呢？但這正是他們的思想中特別令人厭惡的特點。他們的政策幫助國際帝國主義加劇戰爭緊張局勢，同時他們卻估計，會有別人來代替他們打核戰爭。他們說：“好吧，蘇聯的頭子們，你們用自己的核武器來保衛我們吧，不過我們可是要繼續批判你們的。”中國首領們認為一旦打起仗來，主要的核打擊將落在發達國家（包括蘇聯）的頭上，而人口眾多、經濟不大發達的中國將能“比較順利地度過”這次戰爭。看到中國首領們的這種態度，人們不禁要問：這種投機想法到底起着什麼樣的作用呢？

世界各國共產黨也號召反對帝國主義者用來實現其侵略意圖的所謂“局部戰爭”。就是在這些局部戰爭中無疑也可能使用核武器，而且這種戰爭很容易就會變成世界核衝突。當然，國內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同這些帝國主義的局部戰爭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國內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是正義的戰爭，而且在這些戰爭中基本上不會有使用核武器的危險，因為這些戰爭通常是在一國範圍內進行的。但中國首領們卻不顧羞恥地把這兩類戰爭的概念隨意偷換，只要適合他們的意圖和目的就行。他們這麼做，有時候是為了在實際上證明，為了“輸出”革命，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進行局部戰爭。另一些時候則又是為了用可恥的誹謗在各國人民心目中誣蔑蘇聯、捷克斯洛伐克等國，說它們在防止戰爭危險的鬥爭中也反對

各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

但他們的这种谎言只会反过来揭露他們自己。举世皆知，正是赫魯曉夫同志如此明确地宣布了一条原则：在对人民群众的压迫达到极点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就有神圣的、不容侵犯的权利拿起武器，举行起义，推翻反动政权或殖民统治，争得自由。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并不仅仅宣布各国人民有这项权利，而且还为此给予他們所需的具体援助。此外，世界局势还无可辩驳地证明，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优势为挫败和防止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有利的前提，从而也为人民群众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解决本国内部问题，并且常常不必通过武装斗争来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前提。

和平共处促进社会主义的胜利

防止战争和保卫住和平是解决当代世界发展中的根本社会问题的前提，这一点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最重要的是，目前国际局势发展的条件也为当代一切主要社会任务能够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得到解决提供了现实的前提。不仅如此。对维护有利于和平的力量同时也能促进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只有象中国首領們那样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可能性和历史使命失掉信心、对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无穷的革命力量失掉信心的人，才会冒险在战争和“输出”革命上投机，绝望地企图这样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才会撇开无产阶级去另找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实际上，列宁主义的和平、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政策对世界革命发展起着—一个十分巨大的加速器的作用。

现在，社会主义各国面临着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对苏联来说——在不远的时期内建成共产

主义社会的前景。同时，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对地讲很短的时期内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完全现实的可能性。苏联的工业生产已达到美国生产量的63%，经济互助委员会其他成员国的生产量同参加所谓共同市场的西欧六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量相比，达到的百分数也大体相仿。对苏联和经济互助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来说，在1970年左右赶上自己的资本主义对手是完全现实的。

中国领导人力图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努力只是追求自己狭隘的私利，追求自己的福祉。他们还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追求自己的福利，“为了求得自己一时的苟安，而出卖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见中国政府1963年8月15日声明）。但他们只能证明他们自己同列宁主义有着多么尖锐的矛盾。须知正是列宁再三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远远不仅是它的内部事务，而且是一项最高的国际主义任务，因为世界范围内的斗争已经转移到经济战场上，而“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地最终地取得了胜利”。（中国领导人在著名的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中引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革命的影响的结论时，正好没有引这一个显然不适合他们的需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这决不是偶然的。）

社会主义国家向世界上的进步力量和解放力量提供广泛的直接援助。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努力迅速发展本国国民经济也不是为了什么“自私的”目的。相反，它们争取在经济上超过资本主义的顽强而艰巨的斗争，正是在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尽自己伟大的国际主义义务。因为，在人类活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域——物质生产领域中打败帝国主义，这将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

社会主义在经济、科学、技术各方面的成就，远远不仅是对广

大人民群众起道义和政治上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本身也有巨大的革命意义。社会主义这些新成就还起着更为具体、更为直接的作用，因为它们同时也改变着世界整个力量对比，加强社会主义的优势和对整个世界局势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今天这已经不仅是理论，而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实践了。

例如，要在紧靠美国的地方顺利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这在不久以前还被人认为是实际上不可设想的事。美国高级领导人自己在不久之前还宣称：不允许共产主义侵入所谓西半球。今天，古巴已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中向前迈进。由于存在着新的力量对比，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力量和古巴人民的英勇，美国妄想使古巴局势发展倒退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而古巴正继续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前发展。古巴的例子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实例证明力量对比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这样的条件，使革命群众在远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也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革命的目标。这是整个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根本变化。

力量对比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不断变化，加上和平力量不断加强的道义、政治压力，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这样的处境，他们越来越多地被迫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极端手段而退出自己的阵地。关于这一点，尤其是许多非洲国家提供了例证。大家知道，塞老撾问题和解放西伊里安问题也一度都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这并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本性改变了。但是，不管西方大国愿意与否，它们都不得不作出一条结论：从军事上解决这些问题对它们来说一方面是危险的，同时也是无效的。

社会主义国家执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政策方面取得的成就当然不仅对世界革命力量发展的整个国际环境和国际条件发生影响。它也对各个国家内部必要条件的形成发生强大的影响。社会主

义国家的成就和它們一貫遵循和平共处政策，使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提高了；使社会主义思想在人們心目中更受到尊重，广大人民群众更深信其正确性，使各国共产党的影响更加扩大和加深了。为爭取和平而斗争的口号有助于各国共产党爭取群众，揭露資本主义和孤立最反动的势力。同时，社会主义国家順利发展所作出的范例提高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对劳动人民的吸引力，加强了他們必須消灭資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中国领导人硬說，和平共处政策会使群众人心涣散，它意味着向帝国主义投降，会“麻痹各国人民的斗志”，它是“禁止革命”。他們說，冷战是件好事，对革命斗争的发展來說，“紧张的条件是好条件”。他們甚至还发明了一条什么“不可战胜的法則”，这就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强。

但事实本身推翻了这种論断。經驗证明，世界上极度紧张的情况也符合发动反共歇斯底里和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行动的需要。相反，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緩和和和平共处政策的胜利，就会出現資本主义世界中工人运动的积极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新高潮。过去几年和几个月来阶级大搏斗中的重大胜利，都是在忠于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的旗帜下取得的，而不是在“光輝的、动听的、令人陶醉的”但“脚下沒有任何土地可以立足的”——列宁这样生动地称呼革命空談——口号下取得的。这不是偶然的事。

1919—1939年間，世界上平均每年发生九千次罢工，参加人数四百四十万人。1946—1960年間平均每年罢工数已达八万次。1956年参加罢工的人数为一千三百八十万人，1960年为五千三百六十万人，1962年已达六千万人，今年罢工人数仍在繼續增长。不仅罢工人数，而且罢工的性质本身也都证明阶级对立正在尖銳化，同时也证明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战斗力正在提高，证明工人阶级具有无穷无尽的革命精力。罢工越来越多地具有政治性。工人阶

級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斗争的群众性，更使这种斗争在该国整个国内局势的发展中具有十分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影响。

在意大利今年四月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胜利。它获得的选票增加了一百万张以上。这证明党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正不断增强。意大利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提高自己对群众的影响，正是因为它对争取和平的问题以及对国内问题都采取了非教条主义的、创造性的态度。而且它是在中共领导人对意大利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进行荒唐的攻击的情况下取得这些成就的。去年的选举和今年5月的补选在法国、比利时——那里共产党人所得的选票比1958年增加了60%——以及其他国家中也都表明，人民群众正在逐渐左倾。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队伍大大扩大了，他们对群众的政治影响大大加强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一致的經驗是：正是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能有助于孤立极反动的势力，能有效地帮助共产党人进行政治工作。

从另一方面我们要问，中国首領們的假革命路綫对动员共产主义运动、扩大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作出了什么贡献呢？有一个例子是十分突出的。当然，本文不打算来分析中国领导人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的不正确做法。但无可争議的是，这场冲突是对印度共产党的一个沉重打击，姑且还不談它也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削弱了不少。

“左”傾机会主义損害和平和 社会主义的利益

中国首領們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问题上的“独特”态度不仅是一个理論問題。局势发展本身表明，它是世界上直接威胁和平和社会主义利益的现实危险。1962年秋加勒比海危机及一

些其他事件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社会主义的古巴看作是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范例。古巴顺利的社会主义发展将用最鲜明的方式，通过具体的例子来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我们的任务是保卫革命的古巴——这样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同时阻止世界热核战争的爆发。

但中国领导人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根据自己的“和帝国主义进行公开的较量”这种思想，只有在古巴同美帝国主义公开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才把这认为是古巴的革命路线。因此，当苏联既有原则而又灵活的和平政策制止了对古巴的直接进攻，避免了迫在眉睫的世界热核战争危险时，中国领导人却竭力火上加油，阻挠冲突的和平解决，号召古巴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不妥协的”斗争。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思想完完全全帮了美国侵略集团的忙，同时直接威胁了革命古巴的生存。

这样，加勒比海危机及其他事件明显地表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想在实践中就是铤而走险，它不仅极大地妨害和平的利益，而且也极大地妨害社会主义的利益和世界革命的利益。

取得社会主义的新胜利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也不是简单的。这是一条以各种各样形式在各种不同的领域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道路。但是在今天，争取和平、和平共处、争取社会主义在和平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的战线成了最重要的战线。这条战线上的大搏斗将为社会主义的新胜利、为各个国家中及全世界范围内胜利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开辟道路。

（摘自1963年10月8日第20期捷《党的生活》杂志）

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

埃夫任·帕隆齐

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尤其在近几年来获得了许多成就。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坚决斗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及其全面的支持给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促使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废除了殖民主义的直接统治。

不能认为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就是解决了殖民主义的问题，因为帝国主义者至今仍在它们从前的殖民地保持着一系列重要的地位。但是，殖民地国家政治上的解放和许多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其革命的进步。因此，我们完全有根据地說，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以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是战后发展中的最有意义的一个事实。

在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成为世界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的时期里，殖民体系的崩溃为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了新的形势。这种形势要求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改善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以及生活水平的斗争中制定新的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在今后的行动问题上发生了观点的分歧。尽管中共领导人在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然而今天他们却背离了这个声明的原则，并且在其实际的政策当中，提出了同这项声明直接违背的观点和步骤。

中共领导人的主要错误之一，是他们不用阶级观点来看待当前世界上的主要矛盾，因而混淆了世界上现存的各种性质的矛盾。

在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的信中說，“被压迫民族同帝国

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之一。接着又在同一封信中指出：“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这就是说，属于剥削阶级队伍的民族资产阶级、封建的王公也像工人阶级一样，也像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反对帝国主义。在这里我们完全需要进行一下阶级分析，这一分析一方面要正面地估计一切反帝力量的作用，但同时也要指出，这些“王公们”仅仅在某些国际政治问题上反对帝国主义，而他们不仅不对本国殖民主义统治和落后的根源进行斗争，相反地而是竭力保留它们，因为这些基础也是他们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样，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但同时又寻求同帝国主义的妥协，反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反对本国的劳动人民，只有广泛的反帝战线的坚决行动才迫使他们采取坚定的反帝立场。

在《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日的社论中写道，“一年来，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有了进一步高涨。”与此相对照，这篇社论看来，“一年来，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加强了。”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各国只是加强了自己的威力，与此同时“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963年3月1日《红旗》）一文中，也流露出对当代基本问题的糊涂看法。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这篇文章中说道：“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是由帝国主义制度的本性所决定的。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对它们的实际利益说来，比较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更为迫切，更为直接，更为不间接。”

这种对基本問題的糊塗不清，也即无視当代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这样一点，使中共领导人犯了一系列其他錯誤。

毫無疑問，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斗争的、而且也是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貢獻。中国革命的經驗是迄今民族解放运动所获得的經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然而，中国领导人現在不再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榜样，而是力图用不仅无助于民族解放运动、相反地是十分有害于它的行动来取得这些国家人民的进一步同情。

不久以前，中国领导人曾強調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提供的援助，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它的 1959 年 11 月 7 日的社論中写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給予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以热情的支援和鼓舞；一切爭取民族独立国家的人民都把苏联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看成是他們最忠实的朋友。”

还在 1961 年，即当中共领导人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了一系列反苏活动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曾在北京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說，“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始終不渝地、积极地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始終不渝地、坚决地捍卫万隆會議的決議，并且坚决地保卫世界和平。”

但同时許多中国代表在各种国际組織的集会和會議上发表了純粹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竭力使这些国家同民族解放运动隔离开来。与此同时，苏联对发展中的国家的政策不仅沒有改变，反而比以往更为积极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是，这并不妨碍出席莫希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领导人在宣称“我們反对任何大国以‘援助’为手段，在国际交易中，以受

援国家的权利来进行騙人的勾当”的时候对苏联进行攻击。

然而，不久以前他們还是背地里极其普遍地发表类似的声明，今天却已公开地发表这些声明了。在他們最近的材料中，不仅指責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指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背叛”、“貶低”或“蔑視”民族解放斗争。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广島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的声明，即宣称苏联“帮助美帝国主义杀害了卢蒙巴”，这就证明中国领导人已到了何等荒謬絕伦的地步。

这种方法既不利于民族解放斗争，也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只能使社会主义的敌人从中得到好处。

沒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沒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支持，帝国主义对发展中的国家的政策会更加放肆更加无耻得多，而民族解放运动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是难以設想的。同时，这也絕不是夸耀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发展中的国家人民的某些支持，正像中国代表不久前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亚非团结組織执委会會議上所做的那样，而仅仅是关于对客观局势的評价問題。同样，民族解放运动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援助，它通过自己的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与加强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給予重要的支持。

中共领导人还指責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絕大多数共产党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与争取鏟除殖民主义的斗争对立起来。1962年1月1日的《紅旗》杂志写道：“认为战争与和平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把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当作次要的問題，这实质上是把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由此他們硬說什么和平共处的政策就是意味着被压迫民族同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首先是什么相互間的“友好”、“尊重”和“合作”。

这种观点乃是对絕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对苏联和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实际立場的粗暴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帝国主义是和平的主要敌人。所以，反对战争的斗争意味着必须同战争危险的传播者，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帝国主义也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怎么能够說我們想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对立起来呢？如果中国同志不是进行廉价的煽动而是真正努力消除观点的分歧的話，那么必须承认，“被指责”的国家和兄弟党历来就是把这个斗争联系起来的，它們从来没有提出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和平共处”的观点。

中国同志的錯誤观点是众所周知的，他們說什么爭取全面彻底裁軍的斗争就是意味着“夺去”正在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手中的武器”。但是，被压迫民族对全面彻底裁軍思想的支持证明了：这些民族比中共领导人更懂得全面彻底裁軍不仅不会妨碍而且会大大有助于它們的反帝斗争。

在日益高涨地反对用亿万美元扩軍备战的帝国主义政策时，苏联提出了将部分被这样浪费掉的經費用来援助发展中的国家的建議。通过这种方式帝国主义至少可以偿还它从发展中的国家榨取的部分資本。这个建議不仅受到了发展中的国家的支持，而且也受到了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那些談論关于对发展中的国家的目前局势負有道义責任的民主人士的支持。

然而，中国同志非但不支持这个有助于动员发展中的国家的人民群众的建議，反而对它进行猛烈的攻击。

刘宁一在莫希會議上說，“当帝国主义正在瘋狂地实行扩軍备战的时候，我們完全有理由认为，那种把裁軍节省下来的錢援助所謂不发达国家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欺人的无稽之談。这种主张是十分有害的，它会削弱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意志。”

特別危险的、与共产党人的最主要的原則相违背的是，中共領

导人士企图利用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来加强自己的影响，他们企图把发展中的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这种企图是极其危险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既被帝国主义也被国内反动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被民族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革命力量的武器。中共领导人竟也支持民族主义的这个反动的一面。

在我国报刊上已经刊载了有关中共领导人在日本政治家松村謙三访问期间所采取的种族主义态度的报道。在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的信中举例说，在莫希会议上中国代表对苏联代表团说，“白人在这没有什么事可做。”我国“捷克斯洛伐克亚非团结委员会”的代表，无论在加沙或是在莫希都看到了中国领导人士的类似态度。

但是，就是在亚非国家里，对中国代表的类似行动，也表示了越来越多的抗议。例如1963年8月21日的《尼泊尔评论报》写道，在尼泊尔工作的中国专家在农民群众中间进行反俄宣传。报纸写道，“他们断言，是亚洲人的中国人比白人、俄国人对尼泊尔人更亲近。”最后，报纸问题：“这些阴谋的目的何在？”

中国代表指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什么它掩盖殖民主义的存在、并且宣称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已不在今天的日程上了。

在他们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说，‘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溃’（陶里亚蒂在意大利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世界上不再有为帝国主义保留的势力范围了’（陶里亚蒂1961年7月2日在意大利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还有人說，‘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呻吟’，殖民制度只有残余了。在他们看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更大的任务了。他们的这种说法毫无事实根据。”

这里文章作者把問題搞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从作为殖民主义直接統治的形式——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已經瓦解出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文件——莫斯科声明中，也强調了这个事实。

但仍要坚持并繼續进行反帝斗争。当然，在各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怎么能够把反帝斗争只看做是武装斗争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强調指出，必須着手进行反帝斗争，以便取得更大的成就。

因此，絕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坚决反对中共领导人把武装斗争絕对化。这样的政策之所以危险是在于，它不对其他的斗争形式予以适当的注意，不去努力争取反帝斗争中的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并且取消了与这些力量合作的可能性。这样的行动就势必会造成使革命力量陷于孤立的后果。武装斗争过去是、現在仍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形式，中国的經驗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能只看到这一种形式，拒絕或者不承认其他一切形式，不考虑新的形势。

在目前仍处于殖民主义直接統治下的地区，以及其他已經取得了国家主权的地区，斗争的形式是不同的。安哥拉、莫三鼻給、葡属几内亚、沙撈越、文莱和罗得西亚等国人民在沒有找到消灭殖民主义罪恶統治的其他途径的时候，拿起了武器，争取在武装斗争中把殖民主义者从本国国土上驅逐出去。这个斗争获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决支持。

毫无疑问，联合国大会关于号召消灭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決議对于鏟除殖民主义的直接統治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決議得到了全世界輿論的同意，它有助于孤立殖民主义者。我們大家都看到，亚非国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組織內进行的反对葡萄牙和南非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得到了积极的反应。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和美国共产党用不少的方式来支持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它們正在動員反對殖民主義壓迫的公眾輿論，迫使殖民主義者作出让步。

當然，在已經獲得國家主權的那些國家里情況就不一樣了。即使在那裡，帝國主義仍然是主要的敵人，首先在經濟部門，它們還有着決定性的地位。因此，這些國家中的一切革命力量的主要任務是：在統一戰綫內，保存能夠同帝國主義作鬥爭的一切力量，鞏固這個戰綫，並且在統一戰綫內為實現反帝反封建革命所提出的目標而鬥爭。

如果不僅聯合最廣泛的羣眾，而且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部分軍隊為反對殖民主義統治而鬥爭是殖民主義直接統治時期的口號，那麼現在為經濟獨立而鬥爭便成了這些國家的口號了。

今天，在發展中的國家里，在這條戰綫上所進行的鬥爭的激烈和尖銳程度並不比爭取政治獨立的鬥爭小些。因為殖民主義大國往往在民族解放運動的壓力下同意宣布政治獨立正是在於，他們想通過這個讓步來保持自己的經濟地位。因此，反對使殖民地和附屬國成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原料基地和壟斷集團的商品市場的鬥爭，爭取建立不依賴於壟斷集團專橫獨斷的健全的國民經濟的鬥爭，正是觸動殖民主義統治的基礎。當然，不可能一下子改變現有的狀況。長期以來，形成了將發展中的國家的經濟同帝國主義國家聯繫在一起的國際分工。要緊的是改變這種分工，例如僅在去年由於不等價交換的結果，這種分工就使發展中的國家損失六十多億美元。

但是爭取獲得經濟獨立的鬥爭，不僅要反對外國壟斷集團，而且也要反對它們國內的同盟者。這首先就必須進行基本的社會改革、動員國內的一切潛在力量，不言而喻，也必須不斷地鞏固反帝戰綫，以便能夠實現所有這些改革。

但是中国首領們拒絕这种思想，拒絕社会主义国家力图将相互平等的原則帶到发展中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間的关系中来，拒絕社会主义国家努力保持与扩大相互間的商品交換，他們把这些說成是使发展中的国家“从属于”帝国主义的嘗試。但是，武装斗争并不能解决获得經濟独立的問題。我們不得不提列宁对当时局势着重提出警告“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談断送了革命”的那一句话，对于那些喜欢假革命空談的人，始終是有效的。

《紅旗》在《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中写道，“有人认为，目前反对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现实手段，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經濟竞赛。什么民族解放斗争，什么人民革命斗争，什么揭露帝国主义，等等，都不过是‘最廉价的斗争方法’，是‘巫师庸医的做法’。他們像富有的慈善家老爷一样地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說：你們不要‘逞强’，不要激起‘火星’，不要去追求‘壮丽地死’。你們不要‘对在和平經濟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沒有信心’，等着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水平方面把资本主义彻底比輸了，到那时候，你們自然什么都会有了，帝国主义也自然倒下去了。很奇怪，这些人总是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

对中国領导人的这种十足的謊言能說些什么呢？从他們語言恶毒的文章中，可以重新感觉到一种能造成无限严重后果的、絲毫沒有根据的冒险主义气息。还在不久以前，他們自己也曾同意經濟竞赛的思想，并且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赶上英国的時間。如果中国同志对自己的論断缺乏证据，那么为什么不承认自己过去錯了呢，为什么要歪曲事实呢？任何人也沒有断言，发展中的国家爭取經濟独立的斗争是容易的。沒有健全的国民經济，政治上的独立迟早会成为虛假的，帝国主义一定会寻找如何才能全部控制这些国家的途徑，使这些国家虽然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却完全

从属于外国垄断組織。

我們认为，不同观点的討論，其目的在于闡明爭論的問題。在相互协商后采取一种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也就是力求有效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

假如我們將“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中国报刊毫不知耻地称印度总理尼赫魯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解放印度領土上的葡屬殖民地果阿的态度来同中国政府对中国領土上的葡屬殖民地澳門以及对香港的态度作一比較的話，那么中国领导人对此又該怎样看待呢？想必中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是有它的理由的。但是，为什么自己本身不做的事却要求別人做呢？既然在一些情况下只发表自己过激的空談而不行动，那为什么在另一些情况下却要說这是“背叛”、“傲慢”和“冒险的态度”等等呢？

民族解放运动最近的事态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外交政策方面已陷于孤立。莫希會議，特别是最近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結組織执委会會議就是这方面的证明。最近，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部分停止核試驗条約进行了空洞的不体面的攻击。亚非人民团結組織执委会會議在尼科西亚通过了決議，決議“对在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 underwater 进行核武器試驗条約上签字的八十多个国家表示贊賞，这个条約是随后将会走向完全禁止試驗、生产、儲存和使用核武器的第一步。”中国代表团完全陷于孤立，他們不敢起来反对这个決議，而只能对它表示“保留”。如果中国领导人不認識到他們的立場在原則上违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这些国家的人民是拒絕討論这种有害的观点的，那么，他們的孤立就会繼續下去。

（譯自 1963 年 10 月 9 日捷《紅色权利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鋒队(节譯)

《党的生活》杂志社論

目前，全世界共产党怀着很大的忧虑注視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的进一步发展，他們虽然签署了共同拟定的文件——宣言和声明，却轉而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总路綫，攻击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首領們对苏联共产党、苏联、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苏联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中的經驗，对約·維·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估价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合作及其它問題的关系，在他們的整个路綫——它实际上是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中起着不小的作用。

沒有疑問，中国首領們对苏共的所有恶意攻击是注定要彻底失败的，絕大多数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态度完全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不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世界上进步的人們，和平、民族解放和一切民主运动的拥护者也公认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历史作用。世界上全体进步的人們都用尊敬的眼光来看待苏联。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困难时期肩負着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重担，并且由于自己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主义而为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創造了新的条件。苏联为了巩固和平不惜一切的牺牲，在加勒比海危机时期通过自己坚定的行动保证了古巴的独立，并从热核灾难的恐怖中保卫了人类。甚至于无法充分地估价苏共和苏联，世界进步和和平的伟大旗手的巨大作用。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及同它在一起的我們的共产党高度评价苏共为消除个人迷信后果、为完全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則和

領導原則所作的努力的无限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签了字的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的声明中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決議，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中国首領們过去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給予了肯定的評价，例如在众所周知的《再論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一文中，而現在公开捍卫个人迷信，并因为苏共和其它兄弟党千方百计地去努力提高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发展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則和集体領導原則，发揚党内民主、群众参加国民經济和国家的管理而譴責它們。

在这些問題上与中国共产党領導人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們“担心”，如果苏联共产党人把苏共說成全民党，会严重地威胁共产主义的建設，据說这将导致“从組織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階級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和贬低党的領導作用。中国教条主义者不願意看到，共产党逐步变成全民的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它的影响和在共产主义建設中的作用增长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本身发展的十分必然的結果。

中国首領們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階級斗争問題和苏联由无产階級专政国家变为全民国家的观点，同样也是不正确的。显然，中国首領們完全不理解或不願意理解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法則。很明显，在他們的这些观点后面，隐藏着的是对党和人民群众的不信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經驗及我們党的經驗都說明，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成长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导致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展。这不仅不削弱国家政权，而且相反地使它成为爭取建設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

会的斗争的最有效的手段。至于谈到党本身的发展和中國领导人关于苏共变为全民的党是与领袖的作用相对立的观点，那么他们必须意识到，党不是为领袖而建立的，而是党员群众自己将党内的那些最有能力的同志推举到领导地位上，这些同志的主要义务是为党服务，就像党把为工人阶级和为人民服务看作自己的唯一目的那样。

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行列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坚决拒绝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不正确观点。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学习了，并将继续从苏共取之不尽的经验中学习，特别是从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中学习，从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中学习。在本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这一财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此来丰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经验。

如果中国领导人在其它一系列问题上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则是令人遗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基本上限制了同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往来。捷共中央委员会在就苏共中央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发表的声明中已经认为，从1961年开始，由于中国政府的过错，在捷中相互贸易往来中发生了急剧的下降。

中国领袖们用所谓的“自力更生”来从理论上为自己的这种态度找根据。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一观点，我们就得出结论，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或那一社会主义国家自己为经济发展所提供的资源的一切可能性当然是正确的。虽然如此，但中国领导人观点的绝对不正确是在于：他们不考虑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不考虑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利用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前提之下，才能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可能性。这无例外地对一切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有效。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員和全體勞動人民完全一致地拒絕中國首領們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合作上的不正確觀點。他們知道，單純的“自力更生”將使我們任何時候在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中也不能夠達到目前的水平。今年，正在慶祝捷蘇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簽訂二十周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高度評價蘇共和蘇聯人民過去提供的和目前一直在提供着的兄弟般的援助。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憤怒地拒絕中國共產黨首領們的宗派主義—教條主義的觀念和他們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的綱領性文件——宣言和聲明的修正。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完全與把蘇聯共產黨看作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真正的先鋒的兄弟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立場一致。它同其他共產黨和工人黨一起高度評價蘇聯共產黨人的堅定的和原則性的態度，蘇聯共產黨人正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下不懈地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為反對任何修正主義或教條—宗派主義的觀點，為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和爭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最終勝利而鬥爭。從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革命力量鬥爭進一步發展的利益出發的蘇共目前的態度和行動在爭取鞏固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中重新令人信服地證明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的先鋒隊作用。

（譯自 1963 年 10 月 22 日第 21 期捷《黨的生活》雜誌）

全民国家——列宁主义的概念(节译)

茲德涅克·姆利納士

苏共綱領中总结了苏維埃国家过去的經驗而得出的新論点指出，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胜利之后，在建設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正在轉变为全民国家。这一論点在它产生之前就已遭到有教条主义思想的人的反对。尼·謝·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苏共党綱草案的报告时即已指出：有人竟提議“将无产阶级专政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完全胜利为止”。大会一致譴責了这种从教条主义出发理解馬列主义理論的提議。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恩維尔·霍查立即站到批評关于全民国家的理論的人的最前列，他断言，这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从而也是取消整个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理論。而在最近时期中我們又看到，中共中央 1963 年 6 月 14 日信的作者也正是选择了关于全民国家的論点作为一项根据，来“证明”苏共綱領和各国馬列主义政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所执行的政策完完全全是“修正主义”和“背叛馬列主义”的。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同这些現代教条主义者的論断作詳細的辯論。这些論断，苏共中央在答复中共領導的信中已正确地称之为“一大堆伪理論性的論断”。毫無疑問，在这些伪理論性的論断中首先有一条就是，认为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或流氓的存在可以成为对某一个国家和政权的本质进行科学理論分析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出发点，认为这是阶级专政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客观根据”，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等等。

其实苏共以及其他馬列主义政党的理論和实践都沒有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已不需要作为权力—政治組織的国家了，也沒有說这种社会的国家不是对付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和流氓的强制工具。因此很明显，这一类“論证”是沒有說服力的，是恶意的，是一种伪理論。

因此問題不在于同这些明显的恶意言論爭論，而在于正确理解苏共綱領中关于工人階級专政轉化为全民社会主义民主、关于工人階級专政的国家轉变为全民国家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論政策論点具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全民国家的概念表达了历史經驗

苏共綱領中关于全民国家的概念不是投机性的思考的产物，而是总结苏共十年来现实的社会政治实践的結果。

但中国領導人对现实情况的相互联系根本不予理会。如果他們对某种理論提法的异議是以对实际情况的分析为根据，如果他們公开地說明，他們是不同意在有关問題上某种完全明确提出来的政治实践，那么，倒也可以同他們进行实实在在的政治理論討論。可是中国領導人不这样做。他們断章取义地随意抓住几段“經典著作中的引言”，想仅仅用这种表面的形式来使自己的論断具有馬克思主义理論思維的模样。为了使我们看到，他們的确只是装模作样的讲“理論”，我們不妨仔細看了被教条主义歪曲濫用了的馬列主义經典著作中有关的主要理論和思想。

馬克思、列宁和全民国家

中共中央 1963 年 6 月 14 日的信中的論点，即“由資本主义过

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只要是国家，总是具有阶级性的”，这一论点的主要依据是三段引言，一段是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引出的，还有两段是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引出的。这三段引言的共同思想是：“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苏共中央的信已经提到，上述列宁的话中使用的“共产主义”的概念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唯一的社会经济形态”来理解的，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

列宁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把“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同“推翻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之间划了一个等号”。

因此，今天，在应当找到无产阶级国家消亡的具体历史形式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应当认识工人阶级专政逐步变为社会自治的过程的时候，怎么能以列宁的一般性论点为依据呢？这样做只可能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要么是他们对引言的学究态度完全掩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实质，要么是他们并不想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而是在进行别有用心地政治蛊惑宣传。

全民国家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中共中央的信的作者论据认为，在使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发展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国家和政权的主要任务是镇压以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骗子、懒汉、流氓和盗窃国库者为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捷政治书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72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6页）。列宁这段话是转述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

代表的“瘟疫和潰瘍”。它根本沒有涉及作为共产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的生产力发展問題，它对国家在这方面的作用不感兴趣。

其实对于中共中央的信的作者來說，这种态度不仅是在有关国家的論断方面具有典型性。他們在論述一切問題时，对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問題所給予的注意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在这一点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們这种态度同苏共綱領的概念——把建設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看作是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社会問題——之間存在着多么深刻的矛盾。

这个問題对于用創造性的馬列主义态度解决工人階級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問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教条主义当然根本不会去注意这些問題。但这样做只能是同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失掉一切联系的理論，只能是归根到底认为——如苏共中央的信中所說——“人民穿草鞋，喝大鍋清水湯”就是共产主义，而提高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几乎就意味着資本主义复辟”的那种理論。因为只有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才能在論述关于階級专政的問題时这样完全忽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产階級专政变为全民国家的論点不仅是一条新理論，而且是同苏共及其他党在整个社会实践中执行的創造性列宁主义政策相联系的。

（譯自1963年10月24日第11期捷《新思想》杂志）

裁軍和反帝斗爭

弗拉基斯拉夫·弗拉納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社会发展的目前阶段面临着—項历史任务——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保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各个組成部分为完成这项任务而进行的斗爭中所遵循的共同路綫，已写在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两次代表會議制定和通过的共同文件——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并这样确定下来。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要能在最短时期內順利地完成这项任务，其主要的前提之一是，必須尽一切努力加强团結。上述文件，尤其是声明強調指出了这一点。因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正当地以不安的心情注視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行的政策，并反对这种政策；中共领导人对这些共同文件中关于我們的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爭取社会主义的斗爭中主要战略和策略問題的最根本的結論发动了公开論战和攻击。目前，中共领导人已不仅限于挑起理論上的爭論、企图修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文件中提出的結論和路綫而已，而且他們还公开地要实行分裂。他們甚至不惜同托洛茨基分子、叛徒和变节者合作。

在中共领导人持不正确立場的問題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問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站在全世界和平力量的前列，为实现裁軍而进行斗爭的問題。中共领导人在討論这一問題时所采取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态度的錯誤和危害性，已經在他們的实际政策中

明显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在他们对締結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
水下进行核武器試驗的莫斯科条約所采取的反对态度中表现出来。

这种不正确的立場是中共领导人在和平共处問題上、在防止
世界核战争的可能性問題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观
点中合乎邏輯的一个环节。它是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和和平的
力量缺乏信心，而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可能性估計过高的表现；是
他们对爭取裁軍的斗争作为一項现实的任务，作为和平共处政策
的一个具体組成部分，作为制止世界核战争的斗争的动員性綱領
缺乏信心和持反对态度的結果。

全面裁軍——现实的目标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裁軍問題上的綱領和目标，是从对当前
世界局势的馬列主义科学估計出发的，首先是从对社会主义和帝
国主义的相互力量对比的清醒估計，而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也是从
对战争力量和和平力量的相互力量对比的估計出发的。从这个角
度来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爭取裁軍的斗争任务，是爭取和
平和消除世界核战争威胁的斗争綱領的合乎邏輯的繼續，并使这
一斗争有着具体的方向和內容。

与此相反，中共领导人的立場，他们对裁軍的现实性缺乏信心
以及他们在莫斯科部分禁試条約达成后形成的具体局势下的所作
所为，則是他们在和平共处問題、防止世界核灾难問題和爭取和平
的斗争問題上的不正确立場的直接繼續和結果。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把裁軍看作是一項现实的任务，完成这项
任务会对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起重大作用。消灭各国拥有的作战
的物质手段，是消除战争危险最有效的办法之一。这样做就会使

帝国主义势力沒有可能发动战争。它将成为反对扩军政策的有效步骤；这种政策是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中产生的，在目前的談判中表现为企图用对扩军的监督来代替裁军。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把争取裁军的斗争看作是一项实际的和现实的重大任务，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能够取得具体的结果，这自然并不意味着它们抱什么幻想。正相反，它们是从对形势、对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的相互力量对比所作的完全现实的、实事求是的估价出发的。它们考虑到帝国主义的性质，考虑到帝国主义最反动、最富侵略性的集团执行的政策。它们充分认识到，实现裁军不是轻而易举的，为实现裁军而斗争必须克服这些集团的顽强反抗。

因此，共产主义运动在提出争取实现裁军的斗争纲领时强调，为了实现这一纲领必须进行积极的和坚决的斗争。但同时也指出，虽然必须克服帝国主义势力的反抗和种种障碍，但裁军还是一个现实的，可以完成的任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中说：“社会主义国家、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积极的坚决的斗争，就有可能孤立侵略集团，使扩军备战遭到挫败，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普遍裁军协定……现在裁军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战斗要求，成为业已成熟的历史的必需。”

这一结论是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关于和平和战争问题的结论完全一致并与之直接相联系的。会议的声明指出，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因为产生了能够挫败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现实力量。

关于防止世界核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关于实现裁军的这些结论，都是以对当前形势，首先是对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间相互的力量对比进行马列主义的、严格的科学估计为依据的。这种估计考

虑到了当前条件下在反对战争的力量方面起作用的所有因素。

在这些因素中具有异常重大的作用的一个因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物质力量和政治力量。毫无疑问，在目前的条件下，苏联巨大的火箭、核武器和热核武器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正是由于有了这股力量，正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在这股力量面前，任何武装进攻苏联或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就等于自杀，才使帝国主义者不能实现其侵略意图，才使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能在实践中做到不同社会体系国家的和平共处。

当然很明显，不能孤立地看苏联的军事力量。今天，连共产主义最顽固的反对者和敌人也被迫承认苏联火箭武器和热核武器的强大，这一事实也间接地证明他们被迫承认苏联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也就是从防止世界核战争和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角度来看，在估价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时、首先在估价苏联的军事力量时，具有重要的决定性意义的是下列这一事实：这一力量迫使帝国主义者用现实的态度来估计当前的局势，迫使他们在执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计划和力求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到世界上现有的力量对比情况。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中能够实事求是地、清醒地估计局势的人，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企图用武装力量、用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完全不现实的。

新的军事技术，威力巨大得难以想象的新武器的采用，使发生战争的后果起了质的变化。1945年8月向广岛和长崎野蛮地投掷美国原子弹之后人类获得的关于这种武器的威力的知识，以及进行核武器和热核武器试验获得的资料表明，使用这种武器的战争将意味着几亿人的死亡，将威胁整个民族的生存，将使物质财

富遭到难以想象的巨大破坏。凡是还能够现实地考虑问题的人，凡是认识到在目前条件下战争将带来的可怕后果的人，都不会把战争当作是解决世界问题的适当手段。

这些事实，一方面使防止世界核战争的斗争的迫切性，以及包括在这一斗争范围内的争取停止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的斗争的迫切性更加突出出来；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动员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投入这一斗争的一个因素，同时也是迫使帝国主义大国的统治集团对局势作某种重新估价，对其对外政策的方针作某种修改的一个因素。这也反映在裁军问题上，使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增大了。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于裁军问题就是采取这样现实主义的态度，它既看到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性的因素，也看到表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仍在继续反对裁军和一切消除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因素。同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共领导人在裁军问题上的态度。虽然他们企图这样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使之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象是同莫斯科声明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1960年规定和通过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中共领导人最近公布的文件中的论点，特别是他们在裁军问题上的实际政策，使人们看穿了他们的这种企图。

莫斯科声明明确地指出，实现苏联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计划对人类命运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实现这一计划就意味着消除各国间进行战争的可能性。但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信却违背了这一声明，信中说：“现在，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信中又说：“世界的现实又是怎样的呢？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究竟哪里有一点准备实行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呢？他们不是毫无例外地都在进行全面彻底扩军吗？”

一眼就能看出，中共领导人完完全全离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制定的争取裁军的立场，企图使人对裁军的现实性失去信心。同时他们还试图为自己攻击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商定的路线“从理论上”找到根据。

如上所述，他们说：“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点“准备实行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他们企图这样为自己不相信裁军的现实性辩解。这种企图，典型地代表了中国首領們攻击莫斯科声明中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时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他们力图把声明中本来没有的观点硬加在声明头上，然后对这些他们自己的臆造和论断气势汹汹地批评一通。共实事情是清清楚楚的，——这也是从上面已经提到的声明的根本思想出发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制定关于裁军问题的共同纲领时的根据，并不是“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准备实行全面彻底裁军”这种不现实的设想，而是认为，以社会主义国家为首的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进行积极的坚决的斗争，就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全面彻底裁军协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不是从任何幻想出发，仿佛帝国主义者希望实行裁军；这种斗争的根据是对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目前的力量对比作科学的估计而得出的现实结论：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关于这个问题的协议。

国家和裁军

中共领导人还想用另外一种办法来为自己反对裁军找根据。他们企图证明，争取实现裁军的斗争不仅会引起幻想，而且甚至于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为这种观点提出的根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没有武装力量的世界只能是沒有国家的世界。在这里，中国领导人也故意地

一方面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国家机器的学說，另一方面又歪曲在苏联全面彻底裁軍建議中提出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爭取裁軍斗争的明确的綱領。

在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国家机器的学說方面，只要举出一些基本事实就可以充分证明中国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們的态度是教条主义的、非辯证法的，因而也就是非馬克思主义的。中国领导人断言，軍隊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只要还存在国家，实现全面彻底裁軍所要求的取消軍隊就是不可能的。他們把这种論断看作是一个不变的定理。这种观点是从非历史的、非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出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国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为实现和保护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务的。国家的这种使命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及其內外职能。在剝削階級当权的国家中，国家的职能基本上就是对內的鎮压和对外的扩张和侵略；与这些职能相适应的就是統治階級建立的国家机器，它是由各种工具和机构組成的复杂的綜合体。

这些工具和国家机器的各个組成部分由于各有其不同的任务而互不相同，它們的作用在不同情况下会随着具体条件而变化。沒有疑問，特别是在剝削階級当权的国家中，軍隊在国家机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把下列論断絕對化，軍隊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組成部分；而中共领导人却正是以这种論断作为自己观点的根据的。对各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形势的分析清楚地表明，軍隊在每一个国家里的意义和作用是完全依具体形势、历史条件、該国的地理位置以及許多其他因素为轉移的。同其他大洲——不管是非洲、亚洲还是拉丁美洲——的情况比起来，欧洲的軍隊在过去以及現在的作用和地位都是完全不同的。

无可爭辯的是，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的日益完善和

发展，军队——特别是如果它拥有核武器的话——正逐渐成为主要是执行国家外部职能的工具。军队的主要使命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和夺取新的领土而进行侵略战争，或者是为了保卫已夺得的战利品不被其他帝国主义者侵占。

为了执行内部的镇压职能，国家机器的其他组成部分迅速发展起来。虽然在这些组成部分中，武装组织，首先是警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其任务不同，这些武装组织的组织、装备、指挥和训练都和军队不同。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的论断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们的论断力图把军队绝对化，把它说成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绝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此得出一个没有根据的结论：消灭军队就意味着消灭国家，因此只要国家还存在，消灭军队和裁军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种观点完全非辩证法地、非马克思主义地忽视并否定了从当前形势中产生的、从目前的历史时代中世界上发生的质变中产生的某些事实。中共领导人回避对局势的具体分析，而只发表一些缺乏任何切实论据和证明的颇有权威的论断。目前，在剥削阶级国家的外部职能以及它实现这种职能的可能性方面，正在发生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世界上新的力量对比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造成了完全新的形势。首先是产生了新的条件，这些条件大大影响着利用侵略战争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的可能性，使这种可能性不能发生作用。这些在莫斯科声明中详细分析和估价过的事实，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了。所有这一切情况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实现剥削阶级国家外部职能的工具——军队的地位。

这也充分反映在苏联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中。苏联的建议从下列事实出发，即剥削阶级的国家不会放弃为该类型国家的相应的职能所必须的一定的国家机器。这些建议提出逐步取消军队

及其装备，但同时也估計到，要留給各个国家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数严格限定的、配备輕武器的警察。同时各国应当作一項保证，如果在全面彻底裁軍的条件下竟还有某一个国家企图进行侵略，其他国家就把这种警察中的一部分数量交給安全理事会来制服侵略者。

因此，苏联的全面彻底裁軍建議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理論的。建議考虑到，在社会主义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如莫斯科声明中強調指出的——“不久的将来，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将获得新的成就，……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将占絕對的优势”，在这些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現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見莫斯科声明第 21 頁），在这样的时代里，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条件下，什么样的国家机器、方法和工具可以用来实现国家的职能。

因此很明显，中国首領們攻击全面彻底裁軍的思想，想把它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論对立起来的企图是沒有任何根据的，其动机是要敗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爭取裁軍斗争的声誉。

中国領导人还企图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著作的話来作为自己反对裁軍的根据——“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肯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銷毀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77 頁）他們这种企图同样也是枉費心机的。列宁的这段話不仅不能用来支持中国首領們的有害立場，相反，它恰恰证明莫斯科声明規定的、体现在苏联的全面彻底裁軍建議中的路綫是正确的。苏联裁軍建議中沒有一处地方，莫斯科声明中沒有一个提法含有一絲一毫这样的意思：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者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願意采取有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世界无产阶级和为自由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利益的行动。正相反，声明清楚明确地强调指出：“在裁军沒有实现之前，社会主义各国仍然必須使自己的国防力量保持应有的水平。”（見莫斯科声明第 20 頁）

中共领导人企图用引证馬列主义的办法来为自己攻击 1960 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中規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綫寻找根据，这是沒有任何道理的。把过去对具体的历史情况——它是同今天的情况有质的区别的——进行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而得出的結論和命题教条主义地复述一番，这不是什么为保卫列宁主义“純洁性”而斗争，而是最粗暴地歪曲列宁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它是具体的，因为它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鋒队——共产党能够在任何新情况下正确辨明方向，选择相应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

中共领导人想引为依据的列宁学說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因为列宁善于在新的条件下采取革命斗争的新态度和新方法，因为列宁善于运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式适应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中的新条件，适应帝国主义阶段中沙皇俄国的具体情况。想把目前的形势硬塞到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作出的結論的框框里去，想这样来使列宁的論点“純洁化”，其結果只会扼死列宁学說中最可貴的东西——在具体情况下运用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行动指南的能力。

裁軍和民族解放斗争

最后，中共领导人还企图从另一个方面来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爭取裁軍的斗争。中共中央 1963 年 6 月 14 日的信中說：“如

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作争取世界和平的最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那就是企图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种提法又一次暴露了中国首領們在討論中使用的手法。上述說法同莫斯科声明中表达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場毫无共同之处。声明強調說：“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声明的另一段中又指出：“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和积极的行动，能够维护住和平，防止新战争。”

当然毫无疑问，裁军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一方面将最终排除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它消灭了进行战争的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又可腾出巨大的物质资源，用来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但这并不意味着，争取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斗争是建立在帝国主义者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上。相反，如上所述，声明強調指出：只有向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势力进行彻底的斗争才能实现全面彻底裁军。

可是中国领导人的这段攻击的中心是在于，他们硬說争取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斗争企图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种說法是荒謬的，毫无根据的。这首先是表现在中共领导人整个态度中并貫穿在他们最近发表的一切文件和言論中的一种傾向的反映。他们力图用假革命的空洞詞句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只有他们是唯一的真正的革命者，而遵循莫斯科声明的原則的一切其他共产党都离开了革命，背叛革命斗争。他们企图将自己的冒险主义路綫說成是唯一正确的革命态度，这条路綫如在1962年秋加勒比海危机时期就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它也充分反映在中国领导人对裁军的态度上。他们企图将革命斗争的一种形式——武装斗争绝对化，这是完全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几十年来在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取得的經驗的。

中共领导人想这样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在爭取和平和裁軍的斗争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之間有矛盾，他們企图把反帝革命斗争的这两个組成部分、这两种形式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錯誤和有害的做法。

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拒絕也不排除革命斗争的武装斗争形式。1960年声明中也反复强調了这一点，同时声明中指出了在革命运动中利用一切和平的，非暴力的斗争形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这些关于革命斗争形式的結論不仅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且也完全适用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剝削阶级的少数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首先是依靠国家机器、强制机构，归根到底就是依靠其武装組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时是这样，在它企图維持其对被压迫民族的統治时也是这样；尤其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企图击败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时，更是首先依靠武装力量。它的方針是輸出反革命，在一国资产阶级的镇压机构不足以打败革命运动时，就由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該国内政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

在资产阶级拥有武装力量的情况下，革命运动的高涨促使资产阶级使用武装力量来镇压革命。这种情况正可以通过裁軍来加以改变。这样做不仅不会削弱革命斗争，更不会取消革命斗争，正相反，这将为革命斗争的发展創造有利条件，为革命能通过和平的斗争手段和斗争形式取得胜利提供前提。革命运动的力量，从它的性质和发展条件来看，首先在于有組織的群众革命行动之中。只有在阶级敌人迫使它进行武装斗争时，革命力量才会去进行武装斗争。

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剝削阶级为維持其統治而用来作为最

后“論据”的国家机器的組成部分，将由于实现裁軍而被取消，因而裁軍决不意味着取消革命斗争或者使革命力量放下武器。相反，裁軍将提供一个革命斗争所需要的抗御反革命和干涉的屏障。

不正确的理論立場——有害的政治实践

中国首領們在反对莫斯科声明中制定和通过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时，找出沒有根据的、站不住脚的借口来反对争取裁軍的斗争，說这个目标是不现实的，会引起不切实际的幻想，說全面彻底裁軍的思想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事实表明，他們知道自己的立場是站不住脚的，認識到他們反对和平共处、反对裁軍的态度将导致自己的完全孤立。因此他們就要花招，力求造成一种印象，即他們并不完全反对争取裁軍的斗争。

他們这种做法充分反映在 1963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給苏共中央的信中，信中說：“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軍备战，我們一向认为，提出普遍裁軍的主张，是必要的”。

这一段話集中反映了中共領领导人整个不正确的有害的路綫，这条路綫現在已經开始由錯誤的理論立場轉为不正确的、有害的政治实践，轉为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以及一切反帝和平力量团结的行动。事实表明，中国首領們违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場，企图把全面彻底裁軍贬低为一个鼓动口号，认为它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如上述分析中指出的，认为实现全面彻底裁軍是有害的。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一点。中共領领导人指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說，它所进行的争取全面彻底裁軍的斗争会引起不切实际的幻想，会涣散群众争取和平斗争的斗志。但事实上，如果有什么人的行为会涣散群众的斗志的話，那么这正是中共領领导人在全面彻底裁

軍問題上的态度。因为，只有那种我們可能实现、并且的确在为其实現而奋斗的要求，才能够起动员群众起来斗争的作用。相反，提出一个綱領，但同时又说它是不现实的，甚至是有害的，这样是不可能争取群众来进行斗争的。这种“政策”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贯奉行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

中共领导人显然也认识到，自己提出一些要求而又说它們是不可能实现的，要争取群众来为这样的要求而斗争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就装点门面地说，在裁軍問題上他們願意为实现某一些措施而努力。他們所說的这些措施中有全面禁止和完全銷毀核武器这一条。他們在今年6月14日的信中說：“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銷毀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一項重要任务。”信中又说：“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

在全面彻底裁軍問題上，中国领导人只看帝国主义者是否有善意，是否乐意实现它；他們否认全面彻底裁軍的现实性，其理由是因为帝国主义者没有一点准备实行全面彻底裁軍的影子。与这种态度不同，他們对于全面彻底裁軍范围之外的全面禁止和完全銷毀核武器的要求，却采取了表面看来比較现实的态度。他們指出，必須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关于这个問題的協議。但同时他們又千方百計地削弱争取实现这一要求的斗争；低估核武器的威力，把这场斗争說成是自然会胜利的并且拒絕任何局部的进展。他們夸夸其談地要求实现“全部”要求，但他們明明知道，要一下子实现“全部”要求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人們自然就要提出一个問題：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认为能够迫使帝国主义者实行这一步驟，但却又否认用同一方式解决全面彻底裁軍問題的可能性呢？他們的这种态度沒有任何邏輯性，其唯一的动机是力图提出另一个建議来代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規定的目标——实现全面彻底裁軍，想用这种办法来使自己的

不正確立場不致遭到揭露，避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隊伍中陷於完全孤立。

莫斯科條約——和平力量的勝利

中共領導人在裁軍問題上的立場的錯誤和危害性，不久前在他們的實際政策中、在他們對莫斯科部分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的態度中充分表現了出來。締結這一條約無疑是完全符合1960年聲明的路線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正確地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解決全面徹底裁軍問題上。但這並不排除同時尋求解決各個局部問題、實現能和緩國際緊張局勢的具體措施的途徑。這一點在聲明中寫得清清楚楚，聲明指出，由於全面徹底裁軍遭到帝國主義者的頑強反對，必須“堅持不懈地爭取達到現實的結果——禁止試驗和生產核武器，取消軍事集團和設在別國領土上的軍事基地，大大裁減武裝部隊和軍備，從而為普遍裁軍鋪平道路”（見莫斯科聲明）。

因此，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各國的對外政策的方針是，除了力求在全面徹底裁軍方面達到具體的結果之外，也爭取實現一些能對國際局勢的發展起良好影響的措施。長期以來，停止核武器試驗的問題就是這些措施之一。由於社會主義的優勢不斷增加，由於這種客觀現實逐漸反映到西方的政治思想中去，這樣經過了五年，通過蘇聯政府的不倦的主動努力，才終於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進展，於1963年8月簽訂了在三個空間禁止核試驗條約。自然，不能過高估計這一條約的意義。它顯然並不能消除核戰爭的危險，也不導致軍備競賽的停止，更談不上導致裁軍了。它連核試驗問題本身也沒有完全解決，因為地下試驗的問題還懸而未決。

但另一方面，无可爭辯的事实是，莫斯科条約的簽訂是和平力量的重大胜利，它证明和平共处政策是正确的。它是实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求的一个实际步骤。它使今后在談判中解决另一些悬而未决的問題、取得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緩和、减少核战争危险的希望增大了。所以莫斯科条約在一定意义上是跨出的第一步，它应为解决其他国际問題开辟道路。

因此，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以滿意的心情同意并欢迎莫斯科条約的簽訂。在短短的时期中，一百多个国家签署了这个条約，而且可以断言，所有这些国家政府的这一行动是完全符合本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的。

但大家知道，中国首領們对这一条約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他們拒絕簽署这一条約，并且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行了粗暴的誹謗攻击。这样，他們就同美国、西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中和平最死硬的敌人、和平共处的反对者們站到一条战线上去了。

他們的态度的錯誤和危害性就这样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事实表明，中国首領們虽然滔滔不絕地大讲其为各国人民的利益、为和平和裁軍而斗争的假革命詞句，他們的实际政策却是和这些言論不一致的。正是在世界当前的条件下，人們一次又一次地認識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能靠夸夸其談，而要靠实际的行动。而实际行动充分证明，1960年声明規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是正确的，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貫徹这一路綫时执行的对外政策也是正确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这一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它完全支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两次代表會議上制定和通过的、写明在1957年宣言、特别是1960年声明中的路綫。根据这个立場，我們也尽力为貫徹这条路綫而作出自己的貢獻，在这問題上

我們完全支持苏联共产党的政策——正如声明中所強調的，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經驗的和久經考驗的队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先鋒队。

（譯自 1963 年 10 月 24 日第 11 期捷《新思想》杂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 基础——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和忠于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

弗朗基舍克·克拉托赫维尔

在中国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肃争论的问题中，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态度和对批判个人迷信的态度问题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中国首脑们一直在力图否认这一事实，那么，最近他们已被迫公开承认了。让我们评判一下，为什么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态度是今天各国共产党政策中的原则问题，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什么东西使中国领导人不感兴趣；同时，对这一代表大会的否定态度为什么必然会导致错误的和有害的政治观念，正如北京今天所坚持的那种政治观念一样。

在战后的整个时期中，从未发生过像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巨大反响的事件。关于苏联共产党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成果，朋友和敌人，好心肠的人和恶意的人，革命者和反革命分子，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和它的反对者，都写了许多文章，发表了許多谈话。

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就其意义来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共产党代表大会的通常的范围，它已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至于谈到国际工人革命运动，那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直接表明：它是国际工人革命运动发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虽然在这次大会的基础上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人们恐怕还无法充分估计它对于国际工人革命运动巨大的积极意义。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劳动人民群众和它的先锋队的斗争历史上开辟了新的阶段，它推动了一切国家的共产党人彻底地估价和重新估价自己的成就和缺点、自己活动的形式和方法；去消除一切陈旧的或者他们工作中错误的东西，去肃清个人迷信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带来的有害污垢；去分析当前的形势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制定出这样的政策方针和选择这样的工作方法和斗争方法；这种政治方针和工作方法、斗争方法在与社会主义学说和运动的科学原则、丰富的正面的经验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应该最大限度地符合各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的客观情况。

同时，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不仅限于对这一活动起了促进作用，而且，它还提供了如何进行这一活动的鲜明的范例。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有害的后果的结论，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分析、创造性地解决这些迫切问题，例如：和平共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形式问题，如此等等，发展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并给所有的共产党在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斗争中提供了有效的武器。

基于这些原因，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才受到了决心献身于人类福利、进步和社会主义的一切人们的欢迎。因此，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完全赞同这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思想，并开始贯彻它们，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创造性地实现它们。不论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论，或者是它解决当前紧迫问题的方式本身，都如此的重要，以至直接地、客观地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新的重要的基础和准则，成了衡量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思想和它的科学性质的准绳。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社会主义带来的全面的好处还可以从资产阶级对它的反应中得到证明。反动的、反共的集团是带着仇视和恐惧来“欢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他们围绕这次大会掀起了贬黜和削弱它的意义和恫吓共产党人拒绝贯彻它的路线的运动。同时，反动派还企图贬低对严重的、但是是暂时的缺点和错误的批判（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存在一直在为反动派带来好处），以便能抵制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发展必然会起的积极的、持久的影响。资产阶级在这方面遭受到的失败是人所共知的事。

然而，更为可悲的是：资本家们以其自身的本能所感到的东西（关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社会主义事业所带来的益处），甚至那些常常自称为“最忠实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人却至今还没有理解它们，或者——更准确地說——不愿意去理解它们。

这样的立场特别对中国领导人是具有典型性的。从中国领导人发表的许多文章和演说中（其中还有中共中央今年6月14日的信件和9月5日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评苏共中央信件的大文章）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中国领导人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不仅采取了相反的立场，而且发动了正是反对它的最重要的结论的广泛运动，并系统地称之为“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准则”；而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本身，他们现在声称，那“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思索一下它们的内容以及论证这些观点的方式，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和中国领导人的争论的实质（而不是争论的原因，因为，这些原因更远为深刻，并有着认识上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根源）正在于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态度问题上，归根结底是这一代表大会所制订的路线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当然，我们不是說

仅仅口头上贊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結論的問題，而是指对这些結論的实质、解决問題的方法以及創造性地具体实现这些結論的必要性的理解上。

已經证明：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态度是今天衡量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以及对待社会主义建設实践的态度的重要的标准。

但是，中国领导人却把这种观点看成是完全錯誤的，并坚决拒絕这种观点。他們断言：如果他們不同意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綫，这根本談不上他們会损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問題。按照他們的說法，根本不能认为：同他們的矛盾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沒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論点而产生的。他們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仅仅是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因此，据說它既不能对他們、也不能对国际工人革命运动具有約束力；他們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們說什么唯一具有約束力的是1957年的“宣言”和1960年的“声明”。

那么，就讓我們看一看这些文件的話吧！在“宣言”中非常明确地評價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宣言”写道：“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決議，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1960年的“声明”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場。这里不必作更多的評述。事情是完全清楚的。但是，“宣言”和“声明”除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明确的評價外，还包含着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分析和由此而得出的各共产党活动的主要任务。

在上述两次會議上所作出的、真正代表着被一致接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綫的实质部分的最重要的新結論中，包括这样的論点，即：今天“存在着防止战争的现实可能性”，“战争不是注定不

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在世界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它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在目前条件下，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以自己的先进部队为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使议会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认为有必要“不允许有束缚共产党员发挥创造性思想和主动性的个人迷信”等等。

中国领导人所反对的并称之为对他们无约束力的这些结论除了正是标志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方针的主要的、新的思想之外，还意味着什么呢？

事实上，他们称之为有争论的、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一切基本论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出了这些论点）都在1957年和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共同会议上经过彻底的讨论，并且成了各兄弟共产党一致通过的、代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中国领导人也不断强调忠实于它的“宣言”和“声明”的本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

当然也可能，中国首脑们认为：他们可以同意构成“宣言”和“声明”的本质的组成部分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但是，他们同时又将忽视它，并仅仅强调对他们的观念和打算有益的方面。同时，他们选择了陈腐的、众所周知的手法：为了遮掩自己的片面性，他们就从对“宣言”和“声明”作片面的解释出发去责难所有别的人。

但是，如果认为：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拒绝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是出自对各国共产党之间能否保持形式上的平等关系抱有某

种过虑，这样想是幼稚的。

他們采取这种立場的真正原因是因為他們不同意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这些最最重要的結論的內容及其解决迫切問題的具有創造性的方法。

首先，这里談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問題呢？而又是什么使我們有权认为：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綫在客观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活动的基础和衡量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的重要准绳的呢？不同意它或者不理解它对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的意义为什么不可避免地会損害社会主义的发展呢？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討論的最重要的問題中无疑地包括了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問題。关于个人迷信所造成的危害，人們已經談得很多，也写了許多文章，事实和經驗也已經证明了这一点。个人迷信粗暴地破坏了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則，歪曲了党和国家工作的原則，违反了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因为它引起了和传播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公式化和概念化，把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带入科学的社会主义世界观，毫无根据地、甚至是唯心主义地神化个人，而同时却低估和降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与个人迷信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是官僚主义方法的滋长，对劳动人民和党采取老爷态度，在理論和实践中个人的垄断地位，甚至是直言不諱的专断、濫用职权、肆无忌惮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

以斯大林为主要代表的个人迷信，就其意識形态、道德标准和实践来說，是与社会主义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它代表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非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和非社会主义的統治方法的残余。当然，个人迷信沒有改变苏維埃制度的社会性质，它决不能取消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的伟大的历史真理，它也无法阻止它們的胜利进军。

可是，个人迷信的活动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人局：即要及时地和

創造性地解決內政和外交的許多迫切問題是十分困難的。某些事物會陳舊過時，會出現錯誤和缺點，當我們考慮到共產主義建設事業的複雜性，對它尚缺乏透徹的研究這一情況時，這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這並非是什麼不幸的事。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個人迷信的影響下，各種缺點不只未能消除，相反地却愈積愈多，因而超出了一般性質的錯誤和困難的範圍。個人迷信在一切方面阻礙了蘇聯社會的發展，造成了物質上的、道義上的、而更為嚴重的是——人類肉體上的不必要的犧牲。

因此，可以解釋、理解斯大林的嚴重錯誤、過錯和違法行為，但是卻不能袒護它們，在任何情況下更不能把它們視為優點，來加以宣揚、重複和繼續。

但是，個人迷信決不是僅僅在蘇聯存在過的現象。事實上，就其後果來說，個人迷信在這種或那種程度上毫無例外地滲透到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如同在蘇聯一樣或者類似，個人迷信在許多方面也曾起過作用。

個人迷信把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帶進各國共產黨內，以公式化和概念化去影響它們，妨礙它們制訂和執行有效的、有原則的、同時又是靈活的政策，因而削弱了它們與群眾的聯繫。此外，個人迷信還阻礙了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和爭取群眾信仰共產主義思想，因為，它的結果——特別是破壞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民主和原則——損害了、有時甚至是淹沒了革命已經推翻了資本統治的國家中政治社會生活的有決定意義的、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所無法與之比擬的成就和優點。這一切削弱了共產主義思想對勞動群眾的影響，降低了社會主義的威信。資產階級有可能濫用這些消極現象來誹謗蘇聯和共產主義，同時，共產黨人和一切進步的人們卻被捆住了手脚，以至無法全部地、徹底地粉碎他們的誹謗。

因此，蘇共中央的列寧主義革命核心，而首先是赫魯曉夫同志

具有历史意义的、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功績就在于：苏联共产党人在 1953 年开始了反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斗争，它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成了指名道姓的斗争，并成了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并尖锐地谴责了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它号召彻底地、永远地肃清它们，从而表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真正忠实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帮助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清除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肮脏的污垢，因而使理论和实践健康的和创造性的发展成为可能。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成果就在于它提高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给所有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带来了新的力量。

不消除个人迷信的包袱是不可能开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的。因为，正是个人迷信阻碍了这种新阶段的到来；同时，也不可能形成和巩固这一运动的决不是机械的、而是真正的团结，这一团结的基础就在于根据自己的情况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努力寻求最有效的、能实现共同目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手段。

决不能一方面赞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又不同意它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决不能发誓忠于国际主义而同时又拒绝批判个人迷信。决不能发誓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同时却同意像个人迷信这样格格不入的现象。决不能既想加强反帝斗争面同时又要抓住曾经削弱这一斗争的东西不放。因而对待个人迷信的态度就完全成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准绳。

可是，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至今还没有或者根本不想理解这一简单的真理。而这一事件已过去许多年，在这段时期内他们本来是可以理解许多事情的，因此，这种情况就更令人奇怪了。如果说，某些人由于不明真相和出于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宣传的长期影

响下所形成的感情因素，經過了一段模糊不清的时期，今天，他們都已經了解了反对这种如此有害的現象的斗争的意义和绝对必要性，那么，中国首領們却完全与之背道而馳。

1956年4月7日《人民日报》編輯部发表的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的文章中写道：“反对个人迷信斗争的問題，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討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大会非常坚决地揭露了个人迷信的流行，这种現象曾經在一个长时期内在苏联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錯誤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錯誤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文章又說：“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同样，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編輯部文章也认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錯誤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錯誤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那时，連中国領导人也強調說：他們也必須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与批評斯大林有关的所揭露和譴責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可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6月14日著名的信件中，我們却找不出一个字是譴責个人迷信或者肯定地评价为消除个人迷信后果而作的努力的。相反，却相当广泛地，在十分明显的，然而頗不聰明的影射中一再強調，反对与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这一現象的斗争是完全錯誤的。比如，下列的提法就可作为证明……“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領袖、政党、階級、群众之間相互关系的学說的原則，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是錯誤的、有害的”（1）（楷体字是弗·克·标的）或者，甚至說“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領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这是何等奇怪的转变！在1956年嘖嘖称道苏联共产党人揭露个人迷信的决心和勇气，高度评价“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反对个人迷信的真正伟大的勇敢的斗争”，毫不怀疑这一斗争的正确性。而今天，就连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问题本身也说成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在谈到这种荒谬的论断时，比如：说什么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违反了列宁关于领袖、群众、阶级和政党的关系的概念，完全不能相信，中国领导人说这话是严肃的。否则，这只能意味着：他们丝毫也没有理解列宁的话，也不了解个人迷信的实质，或者，他们根本没有读一读或听一听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负责干部在个人迷信问题上所发表的许多谈话、文章和决议。中国领导人非常了解：任何一个开展和推行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阐明它的目的和含义的人，不只没有把个人迷信的概念和革命工人运动的伟大人物的威信和作用混淆起来，而且，直言不讳地提出应该防止对问题作如此解释，并说明了这种解释的错误和有害性。

批判个人迷信的矛头从来也不是指向著名的领导人的：他们以自己非凡的才智和经验，对社会主义的赤胆忠心，为实现共产主义思想忘我的劳动，他们特有的品质和与党的生活准则一致的行动，在历史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伟人所具有的威信决非人为地、而是自然而然地，由于党和劳动群众对他们尊敬而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共产党需要这样的领袖，当然，也完全维护他们的威信。

难道个人迷信与革命工人运动领导人物的这种真正的威信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批判个人迷信过去和现在都是反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会降低人民群众、阶级、政党和他们的集体领导机构作用的对个人的神化，反对任何人可以不受监督和批评、可以篡夺

他人的职权、可以独絕专行而不服从任何东西和任何人、濫用权力、妨碍进步。

因此，不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而恰恰是个人迷信粗暴地破坏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領袖、政党、阶级和群众之間正确关系的原則。肃清这一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馳的現象就能恢复这些原則的列宁主义概念。

同时，必須指出：在一定的时期里，就連中国領導人也一点不怀疑个人迷信意味着什么。

比如，在上面引举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一文中曾經指出：斯大林……“錯誤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符合事实的地位，他把个人的权力放在集体領導之上，結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基本原則发生了矛盾，”他“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断，”……“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把个人放在群众之上、当他脫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等等。

中国領導人为什么今天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为什么煞有介事地认为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意味着某种別的东西？是否因为有人害怕这样做会动摇对他个人的迷信呢？彻底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不会損坏革命工人运动領導人的威信。但是，如果拒絕肃清这种对社会主义如此有害的、格格不入的阴暗面，他的威信就会遭到損害。

或者，是不是中国領導人現在认为：他們以前对个人迷信的观点是錯誤的呢？难道他們今天放弃了自己以前的立場是因为情况已有所变化嗎？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們又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們不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他們无法找出这样的“新情况”。

目前事态的全部发展过程已經全面地、不容辯駁地证明了反

对个人迷信斗争的功績和必要性。每一个经历了个人迷信时期的人，每一个进行今昔对比的人，每一个真正关心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今天对这一点都是看得清楚的。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反动派利用揭露斯大林严重錯誤而发动的反共运动把中国领导人吓倒了。但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难道由于害怕他的自我批評会被资产阶级利用，就可以放弃改正自身的缺点嗎？中国作者們素来喜欢充当好汉。那么，在这一問題上他們又害怕什么呢？事态的发展本身已經表明，资产阶级围绕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所掀起的聳人听闻的宣传早已失去了吸引力。恰恰是在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这些成就把这种资产阶级宣传完全淹沒和压倒了。

共产主义运动中小部分同路人脱离了运动，但是运动却赢得了更多誠实的人們和朋友；在此以前，个人迷信的消极現象會使他們徬徨并远离了我們的思想。如果，中国领导人企图引证 1956 年匈牙利事件，那么，他們揀来的只是蹩脚的实例而已。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恰恰证明了个人迷信的危害性，同时证明，必須坚决肃清它的后果。因为，特别是在匈牙利，个人迷信使党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工人阶级，忽視他們的利益；个人迷信瓦解了党，削弱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使人們失却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扩大了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緒的影响。

个人迷信的过錯和严重的錯誤某些时候會使群众看不到国家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使他們迷失了方向，因而为国内外的反革命的活动准备了土壤。

但是，綜上所述，我們还可以得出一个严重的教訓。要击退反共、反苏运动，决不能使糾正錯誤的进程停止不前，也不是放弃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而只能是在揭露和粉碎敌人的誣蔑和阴谋詭計的同时，繼續清除个人迷信的一切遺毒。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

雄辯地、最終地粉碎反动派的謊言，例如說什么：个人迷信及有关的缺点都来自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无法消除个人迷信及其有关的缺点的等等。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却包含了听起来十分离奇的句子，說什么：“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謂‘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

丑化党的“有些人”到底是指誰呢？如果是指资产阶级陣营中的形形色色的政客和宣传家，那么，这种說法完全是对的。反动分子們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的。在有关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問題上，他們繼續这样干，那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如果攻击的是彻底揭露个人迷信的过错、錯誤、甚至罪行并力求肃清它們的那些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者們，那么，危言聳听的作者是找錯对象了。个人迷信沾污与丑化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而繼續这样干的就是那些拒絕反对个人迷信、企图繼續保存并培植个人迷信的道德、思想和实践的人。

中国领导人对于平等和不干涉其他共产党的事务的原則似乎是极为敏感的。每一次的批評，每一种不同意他們的概念的意見，他們都視之为对他們的攻击。但是，他們自己却最最粗暴地对別人进行人身攻击。他們談論什么叛徒的政策呀、修正主义呀、变节行为呀，喊叫什么同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联成一气呀等等；他們对基本情况不了解，但却去干涉其他兄弟党（如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内政，攻击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人，称之为投降分子、誹謗者、叛徒等等（难道这不是中伤和改变其他党领导的企图嗎？）。

他們叫嚷所謂“有原則的团結”，而这种团結在他們的概念里就是要接受他們的錯誤观点和只能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并使共产主义运动倒退几十年的冒险主义路綫。他們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

领导人却采取了如此“有原则的态度”，那样小心翼翼地保护“小国家”的狭隘的利益，只是因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支持他们的政策和同意他们的概念。而对于其他人他们却势不两立，并采取毫不自制的态度。他们不久前的声明——据说他们从来没有同意对斯大林的批判、从来没有同意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更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嘴里说的“原则性”和诚意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一切不能不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某些人所以对个人迷信和对斯大林的批判感到不快，是因为那些有害的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必然联系着的方法、道德、思想意识和实践适合他们的需要。

当然，对那些出于类似原因而反对对个人迷信的斗争的人们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的。为了社会主义，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社会进步，决不能这样做。

中国首領們不断地为斯大林的严重錯誤和失策辯护，他們只乐意承认他的某些局部的缺点，不断地吹捧斯大林，同时，力图造成一种印象：斯大林行动中的缺点首先仅仅是苏联的事情。但是，对待个人迷信的态度问题是任何一个共产党所不能迴避的、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目前与中国领导人的爭論、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行为以及某些其他事态繼續证明：对个人迷信、特别是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态度是衡量对待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的准绳，在反对个人迷信斗争中采取共同步骤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迫切需要和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正是从这些經驗中可以看出：仅仅在口头上声明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如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一度所做的那样），那是不够的；口头声明还必须見諸行动，而首先是：审查自己的工作，真正鏟除自己党内、自己国内个人迷信的一切后果。

（譯自 1963 年 10 月 25 日捷《紅色权利报》）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 列宁主义方针的意义和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弗朗基舍克·克拉托赫维尔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既在于它彻底地批判了个人迷信，同时也在于它纯洁了理论和实践，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苏联共产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迫切的和重大的问题。

首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第一次概括地和全面地总结了目前的国际形势、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社会阶级力量的重大变化。引起这些变化的因素主要有：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社会主义各国，尤其是苏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们的国防力量加强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增大了；社会主义斗争、和平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空前发展，其组织程度和积极性提高了；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义体系迅速地继续瓦解，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民族主义国家。不少这些国家的政府积极支持维护和平的努力。因此，这些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了广大的和平地区。

这些新现象表明，世界上发生了有利于和平、进步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根本变化，帝国主义原有的强权地位大大地削弱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从而也进一步加深了。当然，帝国主义的剥削本质和侵略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简略地说，这就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基

本总结。

上述分析是规定共产党今后行动方向和方法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前提，但它也只是一个前提而已。仅仅对总的说来是明显的事实表示同意是不够的。现在问题在于，根据这一分析作出什么样的结论来。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其中一种方式总的说来是简单的：把帝国主义的性质仍然没有变、帝国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这一事实作为决定性的出发点，由此得出一个单一的结论：在对待帝国主义的做法上不需要有任何改变。过去在这方面的有关言论，现在毫无例外地全部有效。所以，只要重复人们早已知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公式、学说、论点和最一般的真理，再加上大量空洞无物的，但却“气冲牛斗”的号召和带有花样繁多的譬喻的有声有色的口号作为点缀就够了。可是，力量对比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这一明显的事实终究是不能避而不谈的，于是就又说，必须“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打碎资本的统治”，“藐视帝国主义纸老虎”。

这种“政治任务”的“优越性”在于，它是完全清楚的，绝不需要费什么脑筋来思考。其“唯一的缺点”是，它完全是抽象的，对于具体的争取社会主义的顺利斗争是没有用的。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导致冒险的行动，而这种冒险行动的结局往往是令人十分痛心的。这样产生的是空洞口号的“总路线”，而不是行动的总路线，这样形成的是冒险行动的指南，而不是革命行动的指南。

这是教条主义的、非创造性的方法，不论它的创始人如何为自己辩护，今天这首先是中国领导人的方法。

中国领导人的许多文章、言论以及实际行动证明了，并正继续证明着这一点，归根到底，中共中央今年6月14日的信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信中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总路线的提法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凡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革命运动史略有所知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里作为现阶段(!)各国共产党斗争的总路线提出来的，是最一般的原则和目标，而且基本上同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提法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同一百一十五年前科学社会主义刚诞生、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第一个章程刚产生时的提法是一样的！

在这里除了一些名词(如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等等)之外，我们找不到能反映当前形势，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现阶段的问题的任何具体东西。

同样，谁都知道，各国共产党都承认这些原则是普遍适用的，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这一点上不必进行什么争论。但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是，中国领导人仅仅限于坚持这些原则的一般性，却反对根据新的阶级力量对比来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原则，使之具体化；他们反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努力。

众所周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没有走中国首领们的道路，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规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任务的。

客观事实表明，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由此得出结论：不需要改变至今实行的，对待帝国主义这种剥削制度的根本态度；不能对帝国主义的性质和目的抱有幻想；共产党人的任务是继续为消灭帝国主义而努力，争取和组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实现这一思想，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并且随时准备好应付任何局面，进行任何方

式的斗争。

这一切都是重要的和无可争议的，但只讲这些还不能完全解决共产党在当前条件下工作的全部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没有变，但同时（除此以外）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别的重大变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由于正在实行科学技术革命和向国家垄断阶段过渡而发生了变化，而尤其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既然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共产主义运动就必然要相应地提出新的任务、新的斗争形式和工作方式来。

由此只能得出一条结论，这就是说，必须十分具体地利用新的、对我们有利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形势，来最大限度地加强社会主义、进步和和平的阵地，加快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发展及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并提高其质量，使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使群众能通过切身经验比过去更加具体深刻地体验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随着当前国际局势中新现象的出现，被压迫民族摆脱殖民统治、获得解放、已经取得国家独立的被压迫民族维护和巩固其独立的可能性，通过最小的牺牲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使全人类免遭可怕的战争灾难的可能性都增大了，变得更为现实了。努力使这些新的可能性得到实现，这必须是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根据。但为此必须在实践中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创造适当的条件。

阶级力量对比中的深远变化，尤其不能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和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发生影响。不难理解，在这些形式和方法中，有一些也必须加以补充、修改，丰富其内容；另一些以前只是例外情况或遥远的前景，现在却可以加以推广，可以应用于比以前广阔得多的范围，成了实践的问题。甚至有些过去只能当作梦想、显得高不可攀的理想，在目前的条件下变得现实得多了，有

可能在不太遙远的将来得到实现。有些理論問題过去或是根本不存在，或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因而无法解决的，在今天也提出来了。因此必須对这些問題作出新的答案。

因此，制定一条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是全面总结过去的全部經驗，具体考察作出这条或那条結論时的特定条件，确定这条結論的适用范围，把它同今天的客观形势加以对比。

所以，共产党在現阶段的总路綫要求进一步发展馬克思主义理論和革命实践。这项任务只有用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才能完成，只有这种方法才符合这种世界观的科学性质。是否用这种态度来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測驗我們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是否忠誠的第一个标准。

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就是一貫采取这样的态度的，他們在一切工作中的一条指导思想是，要使科学社会主义成为有助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效工具。因而他們也不止一次地强調，他們的学說不是教条，而只是行动的指南；应该把他們的学說作为科学来对待、来研究和发展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首先就是关于社会发展規律的一門科学，它象任何其他科学一样，必須发展、深化和充实。因此，作为一門科学，它是不会过时的。但是，如同在其他科学中一样（也因为这是关于科学的問題），在不同的客观情况下得出的这条或那条認識，是可以而且必須“过时”的，可以而且必須加以修改，使之更加准确。十分令人奇怪的是，自然科学中人們公认为天經地义的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它所处理的是社会运动发展过程这样复杂的問題——中国教条主义者却认为是“聞所未聞的”，“修正主义的”，甚至称之为“背叛”。

中国领导人用来为自己的錯誤立場找“根据”、同时又去指責

其他党(以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本身)“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玩弄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經典著作摘出的引語。他們的做法是,引用一些最一般的原則,这些原則本身是无可爭辯的,但在需要根据馬克思主义将这些原則具体化的时候却可能会引起爭論。或者——而这是更常見的一种做法——他們断章取义地从經典著作中挑出對他們合适的話,不管这些話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客观条件下說的,在什么条件下才有效,也不管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能不能解决那些在他們生前根本还不存在的問題。中国首領們正是把这种个别的、断章取义的引語称为普遍适用的东西,把它們作为衡量“馬克思列宁主义純洁性”的唯一尺度。当然,对于那些不中他們意的东西,中国理論家是避而不談的,或者只是順便带过,不予注意。

但是,这种“引語战”同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討論的性质是不同的,它不能得出有价值的結果,对于社会主义的真正利益來說它至少是毫无用处的。須知,我們甚至能够在同一个經典作家那里找到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言論,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这种“矛盾”只不过是似乎存在而已。实际上这絲毫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也不能減低这些言論的权威性和意义,因为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这一或那一言論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发表的。

坦率地讲,当我們閱讀中国的官方材料和注意中国領领导人进行“討論”的方式时,我們不禁感到,他們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不仅是非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带着唯心主义性质的因素。

共产党人正在积极地为在我們地球上創造一种正义的、真实的而不是虛幻的空中樓閣式的新社会制度而努力。这种新社会制度不是用任何符咒能够創造出来的。要創造这样的新社会,就需要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識,它已經证明,这样的社会是按照事物的发展規律必然要實現的,实际上也是可以實現的;只有它才能使我

們透徹地掌握关于实现这一目的完全具体的途径的最先进的知識。在科学地認識社会規律的基础上我們才能取得信念——如果我們要在這個意义上相信这种做法的正确性的話——而这是使我們能进行創造性的斗争和行动的重要基础和鼓勵。

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一种可以加以固定，使之永远不再发展的体系或思想學派，它不会过时，不会仅仅作为許多曾在历史上出現过的思想流派之一而出現。當我們談到保卫我們學說的純潔性的斗争时，我們指的正是不能允許非科学的累贅物、不能允許無視客观确认的真理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所发现的規律的反科学的主观主义态度沾污和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不让研究事物的辯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遭到破坏，不管这种试图是以修正主义还是以教条主义的形式出現的。对于我們來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潔性意味着科学的純潔性，用科学方法得出的无可爭議的成果的純潔性。

我們不断听到来自中国的关于“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純潔性”的叫喊，但在实际上，这种叫喊是要求抛弃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反对它的科学性和創造性。这种“保卫純潔性的斗争”实际上在糟蹋作为关于社会的唯一真正科学的學說的馬克思主义、誹謗和沾污它的科学性、破坏它的威信，从而助长資产階級和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謾蔑和造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忠誠的表現和范例，因为它再一次強調了这一學說的創造性的、科学的性质，譴責了沾污这一學說的东西，并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在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作出了重大进展。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一新行动也推动了其他共产党以同样創造性的和彻底科学的态度来着手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綫。这就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作出的重大貢獻之一。

同时，大家知道，就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創造性問題上，苏

其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不是仅仅一般地肯定其正确性，而是十分具体地指出这种创造性表现在那里。这一点的证明是：代表大会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并使之进一步具体化了，作出了“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一意义深远的结论，并且从新的角度来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不同形式。而正是这些结论（还有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成了中国领导人攻击的目标，这一点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 * *

中国首領們說，他們贊成和平共处，但同时又宣称，“那些把和平共处只解释为思想斗争和经济竞赛的人，背离了阶级斗争的原则”。

和平共处解决的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人所共知，这种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斗争可以是和平的，这就是思想斗争和经济斗争（这是阶级斗争）；也可以是军事的，这就意味着战争，在目前的条件下就意味着世界核战争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除此以外，不存在任何第三种可能性。

和平共处意味着不同社会体系各国放弃使用战争作为解决自己的对抗性矛盾的手段。这个或那个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过，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无关，而这种斗争也可能采取最尖锐的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支持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但不会向资本主义国家举行军事进攻，来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那里的人民。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不会输出革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变是有关国家人民自己的事。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坚决地，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不顾一切后果地反对反革命输出。

因此，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是和平共处政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人拼命为自己辩护，怕别人指责他们进

行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輸出革命”的冒险企图。可是，如果在談到和平共处的时候他們是在宣传着与此类似的观点，那么，他們这样辯护只能使人們怀疑他們說的話到底是否出自真心。不然，他們叫嚷什么有人要用和平共处来代替階級斗争，又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领导人还承认，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但同时他們又使这种声明变得一錢不值，因为他們否认全面裁軍的可能性，并断言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这一論断，他們也提出了引人注意的論据，这种論据之一便是指責共产主义运动忘記了“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繼續”。其实，这早已是人所周知的原則了，誰也沒有把它忘記。看来，倒是中国首領們沒有理解这一原則。

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繼續，但問題在于，是不是必須无条件地使用这“另一种手段”呢？当帝国主义者不能用其他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們就使用軍事手段，但是——这一点是具有根本性的——只有当他們至少有希望能用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意图时，他們才会这样做。如果他們看到，战争相反会意味着自己的彻底毁灭，那么，他們大概是会另打主意，不去使用这种手段的。这就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結論的明确根据。

中国的“理論家”們不断地提醒我們，說什么我們忘記了“一个最重要的問題，即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階級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个階級进行的……”，并就此断言，說什么我們不注意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这种指責是荒謬的，本来不必去理会它，如果不是在这种指責后面很可能隐藏着某种更重要的問題的話。

須知在贊成和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人中間，根本沒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否認过这样原則性区分各种战争的絕對正确，相

反，他們不止一次地強調支持正義戰爭的必要性。但同時，我們同列寧的看法一樣，連正義的戰爭也不希望有。只有在不存在走別的途徑的可能性的時候，也就是說，只有當帝國主義強迫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或被壓迫民族進行正義戰爭的時候，當取得民族自由或社會發展的其他方式已經成為不可能的时候，我們才會連正義的戰爭也贊成。

這不是和平主義，而是唯一明智的、符合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的利益的分級觀點。

中國的首領們斷言，要防止世界戰爭不能通過談判，而只能通過人民群眾和工人階級的鬥爭，通過民族解放運動；他們說：“不能向帝國主義者祈求和平”。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空前未有地推動了爭取和平的鬥爭，其原因之一是，它指出了這一鬥爭可以獲得現實的結果。誰要是事先就認為，他所為之鬥爭的東西反正是無法實現的，那麼，鬥爭就搞不好。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爭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帝國主義的老殖民主義統治，主要正是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崩潰的。帝國主義對埃及、亞洲及古巴等地的侵略，也是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被打退的。這樣的事實我們可以舉出很多很多。

可是我們不能把人民群眾爭取和平的鬥爭同旨在和平解決爭執問題、有利於和緩國際緊張局勢的談判對立起來。談判可以減少由於誤會或一件十分偶然的事件而爆發一場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爭的危險性——在“冷戰”氣氛中和現代軍事技術的條件下這種危險性是不能排除的。此外，進行談判和達成協議也是群眾爭取和平鬥爭的結果，是世界上最有利於進步的新的分級力量對比的反映。我們在這方面採取的主動步驟，同時也能揭露和孤立那些侈談和平，但拒絕接受具體的和平建議或破壞已達成的協議的反動集團和反動分子。拋棄和平政策的這些手段，或者，甚至把爭取

和平的斗争看成是一种“策略手段”，实际上就是使帝国主义能够欺騙群众，歪曲我們争取和平的努力的目的，就是助长极端反动分子的影响和他們的战争和反共的瘋狂气焰。苏联进行的和努力争取进行的談判，根本不是什么“向帝国主义者祈求和平”，它是社会主义体系的經濟、軍事和道义力量为后盾的，是以日益积极发展的人民群众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运动为后盾的。

已經达成的、或苏联正争取达成的和平協議，当然不仅仅对社会主义有利，而是照顾到双方的这些或那些要求的。当然这是每一个妥协的实质。但同时这些協議是原則性的妥协，因为，它們不仅不违反各民族、劳动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而且代表了这些利益，有利于这些利益。假如这些根本利益遭到威胁，那么，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会同意这种妥协，相反，会毫不犹豫也用一切手段和力量来维护这些利益。

中国领导人有时承认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进行談判和达成妥协的必要性；特别是最近以来的情况重新表明，他們自己也經常这样做。所以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凡是根据苏联的創議举行什么談判，凡是签订某种这一类的協議的时候，中国方面总是紧接着就拚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和誹謗。

同时，中国的首領們总是費不小的力气来阻撓談判的进行，或者贬低談判的意义。他們对莫斯科部分禁止核武器試驗条約的反应就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 * *

还需要談一談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的一个意义深远的新結論。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創造性地丰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它证明在新的階級力量对比的条件下，和平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甚至是通过变議會为工人階級政权的工具而不經過武装起义来实现过渡的方式，正在成为日益现实的前景。就是在过去，共产党也願

意尽量通过和平的途径变革社会制度，因为他们知道，内战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牺牲、痛苦和破坏。所以它们总是努力利用这方面出现的每一个机会。但在那时，这种机会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出现，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在国际、国内都是强大的，它能够用武装的反革命斗争来阻止政权和平地过渡到劳动人民手中。

但是现在，在新的力量对比之下，情况开始改变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开始扩大了。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扩大和变得更加现实的结论，如同关于和平共处和防止战争的问题一样，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然首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它推动共产党人去深刻地研究本国的条件和可能性，同列宁的要求完全一致地去掌握一切的斗争方式，包括至今被人遗忘的和平道路在内，制定和执行一项反对垄断资本、争取最广大的群众拥护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有效政策。争取最广泛的阶层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之一，是同那些社会党及其拥护者合作，这些人由于反对将来举行武装起义和爆发内战而至今不愿和共产党人更密切地合作。今天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点来识别，哪些人是真心拥护社会主义的，哪些人则只是利用这一口号来掩盖自己反社会主义的真正面目，以便欺瞒劳动群众。

在这里，中国领导人对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所持的立场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他们也抽象地谈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和平的和使用武装暴力的两种。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他们的态度，那么我们会又一次看到，他们的言论是缺乏诚意的。他们只是形式地、顺便地谈谈和平道路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他们却不断地、十分片面地强调，这种可能性只是例外，并为此引用列宁在1917年所讲的话作为证明——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列宁这段话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讲的，那时候世界上甚至连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存在。

为了掩饰自己的片面解释，中国领导人指责其他共产党只强调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凡是读过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任何文件、读过声明和宣言的人都会看到，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中国首領們形式上承认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只要有哪个共产党着手制定这样的綱領或为实现这种綱領而斗争，它馬上便成为中国首領們攻击的目标。不用說，在他們的攻击中充滿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背叛行为等等之类的帽子。

就是在这一情况下中国首領們也采取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場，不管他們是否承认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摆出一副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純洁性的架子，到处扣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帽子，同时却把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比作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等。奉劝他們不妨回想一下，考茨基之所以轉向改良主义，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犯了教条主义，思想僵化，不能及时認識世界上发生的变化，不能及时适应这些变化和掌握工人階級斗争的一切手段。

其实列宁早在 1920 年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讲过这一点。当然，这段话对北京的列宁主义的彻底的捍卫者來說，是不怎么对胃口的，因此說給他們听一下是有好处的。“象考茨基、奥托·鮑威尔等等这样学識渊博的馬克思主义者和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領袖們所經歷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訓。他們完全認識到必須采取灵活的策略，他們自己学习了馬克思的辯证法，而且用它来教育过別人（从前他們在这方面的著作，其中許多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們在运用这种辯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錯誤，在实践中他們竟成为非辯证論者，竟成为这样不善于估計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中迅速裝滿新內容的

人，以致他們的下場并不比海德門、蓋得和普列漢諾夫幸運。他們破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只是‘死盯着’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某一個形式，而忘記了這個形式的片面性，他們不敢正視由於客觀條件的改變而必然發生的急劇變化，而繼續重復那種簡單的、背熟了的、初看起來是不容爭辯的真理：三大於二。然而政治與其說象算術，不如說象代數，與其說象初等數學，不如說象高等數學。實際上，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切舊形式都已充滿了新內容，因此在數字左邊，出現了一個新符號即‘負號’，可是我們這班聰明角色却還繼續固執地向自己和別人担保說，‘負三’大於‘負二’。”（《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3—84頁）

中國的首領們不正是在犯同樣的錯誤嗎？讓他們也好好地學學計算不是挺好嗎？固然，中國領導人會夸夸其談，滿嘴最革命的辭句、口號和原則，大講什麼反對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鬥爭。問題在於，在教條主義者看來，所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都是修正主義。但是，只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才能戰勝修正主義。玩弄假革命的辭句並不能導致革命的行動，而只能引起冒險主義的行動，其結果可能會激起反革命的挑釁，在一定情況下也可能會使革命力量遭到完全可以避免的令人痛心的失敗。因此，不以對各種力量的現實估計為依據的左傾過激的“積極性”，在無情的現實面前碰壁之後，會轉而變成右傾機會主義的消極性，這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了。

中國首領們企圖在工人革命運動中代表一種特殊的派別。這種派別是以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為基礎的。但是，純粹的教條主義往往是不存在的，往往摻入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成分。這種成分在北京發出的革命空談大合唱中也已經可以聽得到了。從他們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的口號和勸誘拉攏中，從他們的分裂行動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誹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這種派別也常常表

現出无原則性和歇斯底里，因为它不可能取得胜利，于是就不顧真理，一心只想維護自己的威信和爭得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这种攻击的目标，这是它的光荣。它用严格地以科学社会主义学說为依据的創造性的結論，证明它是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丰富了我們的理論，推动了我們理論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爭取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及其斗争，清除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妨碍和沾污我們理論和实践的东西。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的結論成了宣言和声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綱領——的基础。而且，即使不是如此，絕大多數的共产党也已經同意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綫，把它視为自己的路綫，并正在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进一步实现和貫徹它。我們党也完全贊成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这在我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再一次表現出来，在我們党关于苏共中央的信的声明中也得到了肯定。声明中說：“我們党貫徹着第二十大和第二十二大決議以及苏共綱領——它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大发展、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对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运动具有无限的意义——中所表达的創造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攻式的路綫。”

凡是共产党人認真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貫徹执行的地方，就都能看到这种思想的益处和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积极貢獻。

这样，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綫客观上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的而不是机械的团結的最重要的准則之一。所以說是真正的和創造性的团結，这是因为这种团結的意义和总的精神要求我們不能仅仅表示同意，而是要加以思考，加以实现和深化，并且在爭取和平的伟大斗争中，在爭取群众拥护共产主义思想、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发展、巩固和扩

大社会主义陣地的斗争中一致行动起来。因此，誰反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誰就不可避免地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削弱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败坏科学社会主义的声誉。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意味着革命工人运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阶段和新进展。誰不願意理解这个綱領的实质，誰客观上就在使发展倒退。这就是中国领导人的处境。只有希望他們及早回头，認識自己的錯誤，丟开面子問題，考虑一下：如果不来反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而为实现和发展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貢獻一份力量，那么会对社会主义更有好处。

（譯自1963年11月6日捷《紅色权利报》）

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 創造性发展(节譯)

弗拉基米尔·克雷赫列尔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及許多国家的共产党完全正当地注意了革命的 1917 年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經驗，把它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活动中重要的迫切問題之一。此外，它們这样做的根据还有 1945 年以后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政治局势发展的經驗，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誕生所引起的結果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新的变化的分析。

中国首領們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列宁主义路綫的攻击，也是通过对布尔什維克党的这些历史經驗作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解释的方式进行的，这不是偶然的。在他們“对列宁主义的解释”的总概念中，他們片面地頌揚起义的手段，从而就对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和平方法采取虛无主义态度，高傲地教訓和批評許多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活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十分复杂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并努力以真正科学的、现实的态度来解决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問題。

在紀念十月革命的时候，各国共产党人不能不对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留給我們的这些有启发性的教导加以思考。特别是从同中国同志进行思想爭論的角度思考这些問題就更加重要，因为这场爭論不是什么学院式的、无关紧要的討論。中国同志的立場就是否认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如此勇敢地恢复了的列宁主义的創造性本质，就是企图使运动倒退到个人迷信时期的状况，从

而危害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人类的进一步胜利发展。只有在创造性的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基础上，才能克服这些矛盾，有利于这一历史趋向的顺利实现。

中国领导人在反对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政策的时候，攻击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起的先锋作用。中国领导人口头上不断表示赞同列宁著作中的各段引语，但他们的整个概念和实际行动却否定这一学说的创造性本质，这种创造性本质正是苏共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所重新大力强调的。

（摘自1963年11月7日捷《红色权利报》）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會議之前

雅洛斯拉夫·克諾布洛赫

本月底将在华沙举行世界和平理事会會議。这次會議將討論在簽訂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水下核試驗条約之后形成的更为有利的新情况下和平保卫者的任务。

部分禁試的協議使各种和平組織、和平主义团体以及知名人士的积极性高涨起来。因为它鮮明地证实了：和平共处的政策是现实的，但是为了保障持久和平，仍必須战胜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頑强反抗。

这在最近也得到证实，近来美国的及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中有一些人企图阻撓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緩和。如果他們已无法破坏业已取得的成果的話，就力图尽量制造最大的障碍，来阻止这种进展扩大到新的領域中去。他們不敢公开反对举行新的談判，于是就毫无根据地说，取得新的进展是“沒有希望”的。不管現在的形势是如何有利，这絲毫也不能改变帝国主义仍然是阻撓实现持久和平和进步的主要障碍这一事实。

而恰恰在这个需要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團結起来一致行动的时候，世界和平运动却不得不来清算中国領導人的教条主义和冒險主义立場。就其后果來說，他們的立場意味着和平运动的否定，因为它否认解决当前矛盾的可能性，从而也就反对导致世界和平理事会誕生的那些主要原則。

中国領導人最近提出的論据是：在簽署莫斯科条約之后，美国仍繼續进行地下核武器試驗，由此推論，这会使美国取得对苏联的核优势。

但是历史在这方面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尽管苏联进行的核试验比美、英、法三国的试验总数少得多，但在核武器的发展方面苏联不仅不落后，而且它还拥有威力最大的核弹。

为了对抗美国的核讹诈，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苏联被迫制造了自己的原子弹，在1949年年中试验了这种原子弹。而能够被运载到攻击目标的氢弹，苏联比美国约早半年，在1953年8月12日就进行了试验！由此，显而易见，试验次数的多寡在确定核大国的名次时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但如果美国将继续不断地进行地下试验，那么苏联——如果它认为对保卫本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必要的——也会进行地下试验。但至少有一点好处是无可争议的：按照莫斯科条约的规定，地下试验必须保证不让放射性尘埃落到进行试验国家的国境以外。

很多科学家谈到过这种非常严重的危险性。约里奥—居里——他在科学上的权威性是连他政治上最大的反对者也承认的——在去世前也曾着重地提出警告说，如果在大气层再进行两三个大型的核武器试验，那么，这对人类健康引起的后果将是无法消除的。

因此，苏联政府在出现了达成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协议的可能性时同意部分禁止核试验，是出自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动机。

莫斯科条约的中国反对者另一个爱用的论断是，“三国条约把停止核试验同禁止核武器的全面任务完全分开”，并说什么这个条约意味着使地下试验“合法化”。这是蓄意歪曲事实。其实倒是可以说，莫斯科条约使探索进一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合法化”了。条约的序言中写明：条约签字国宣布，“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尽速达成一项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协议，这项协议将制止狂热的军备竞赛。”此外，条约的第一条中也说，条约中的各项规

定“并不妨碍签订一项永久禁止一切核试验爆炸的条约。”条约中又称：“这些核爆炸中包括所有在地下进行的这种爆炸，缔约国将为禁止地下爆炸而努力”。

特别是在最近时期中，中国领导人强调，他们也是拥护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经过一切有善良意愿的人坚韧不拔的努力等等。但同时他们却不择手段地攻击苏联的和平政策。虽然他们口头上说需要一切有善良意愿的人坚韧不拔的努力，但实际上却竭力破坏和平力量的团结。

他们力图将分歧带入世界和平理事会内，这就是一个证明。例如他们指责世界和平理事会，说它对莫斯科条约表示肯定的态度就是投降主义，就是背叛争取和平的斗争。

但是，从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一切文件和活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指责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签订莫斯科条约的声明中就說：不能认为，“不必开展全世界人民群众非常紧张积极的活动来支持新的裁军措施，就可以使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所开辟的光明前景变为现实”。貝尔納教授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一向强调，这一条约应该成为开展争取全面彻底裁军的广泛运动的信号。怎么能說这是背叛争取和平的斗争呢？

我们当然不会把和平共处的政策理解为对敌人投降。我们一向肯定：和平共处并不排除更积极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 and 思想的斗争，并且是以这种斗争为前提的；和平共处将为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革命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也就是说，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同帝国主义调和，而是斗争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对全世界劳动人民有利的，因为这里主要的活动场所不是军事领域，而是两种体系的經濟竞赛。也正因如此，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一点缓和都有利于我们贯彻和加强这项政策。在几年之前西方还拒绝这项政策，而现在却不得不接受它了。

中国首領們蓄意縮小核武器的危險性。大家知道，投在广島的第一顆核彈“仅仅”相当于一万五千吨黄色炸药。那顆炸彈直接炸死了七万八千一百五十人，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繼續夺去人們的生命！可是現在已經有了二千万、五千万和一亿吨級的炸彈，它們的破坏力之大簡直是无法想象的。

根据西方专家的推算，只要二百五十个大型核彈就可以毀灭美国，五十个这样的炸彈就可以毀灭英国，等等。西方报刊也报道，各核大国已經儲存了二十多万件各种用途和各种大小的核武器。如果這場可怕的死亡灾难（可是中国首領們还称它为紙老虎哩！）竟降临到人类的头上，那么，帝国主义无疑将被消灭，但人类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人类的文明将倒退几百年！

根据这些清醒的估計，一切真正的和平保卫者反对用战争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同时，他們的根据是：在当代世界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和平是能够保持的，全面彻底裁軍是能够實現的。實現了这一点就能使一亿人由軍事生产轉入和平生产，每年就能省出一万亿美元用于經濟、科学和文化的和平发展。为了这样的前景值得我們去坚决果敢地工作。因为，只有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信心才能使广泛的各阶层人民团結起来，为爭取和平和人类美好的未来而采取坚决的行动，悲观和絕望是不行的。

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这次會議的重要使命将是討論如何动員各国的广泛阶层，以便对西方国家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些政府虽然在談論和平，但至今为巩固和平做得却很少。资本主义国家中公众輿論的影响无疑正在增长。現在需要拟定一个有效行动的計劃，向和平保卫者指出，为了在和緩国际紧张局势和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应当朝什么方向去努力。我們相信，世界和平理事会将胜利地完成这一重大任务。

（譯自1963年11月14日捷《紅色权利报》）

團結为和平而斗争的力量(节译)

《紅色权利报》社論

首先是，中国代表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會議上又一次对莫斯科条約所采取的态度，肯定无助于巩固團結的这种努力，无助于提高和平运动的积极性。削弱这一團結的任何活动只能使那些不願意停止軍备竞赛和緩和國際紧张局势的势力感到滿意。看来，好像中国代表在这一會議上把誹謗莫斯科条約和为反对这一条約而“斗争”当成了自己主要的任务。

(譯自 1963 年 12 月 5 日捷《紅色权利报》)

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 思想(节譯)

《新思想》杂志社論

同样必須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不正确的傾向。

現在阻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了社会主义的进一步胜利而充分利用世界有利形势的主要危險，是左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其代表首先是中共领导人。他們的綱領、宗派和分裂活动意味着实质上破坏包含在声明和宣言中的原則，中共领导人錯誤观点的危險首先在于它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团結。他們貶低苏共和苏联的作用和意义，使劳动人民在反对战争和爭取实现階級的要求和民主要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他們阻碍当前三种基本革命潮流联合的进程，从而削弱社会主义和一切进步力量在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斗争中的陣地。尽管苏共和其他共产党作了一切努力，中共领导人至今沒有表现出願意解决分歧或至少停止公开論战的良好願望。

我們也譴責被帶入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傾向。民族主义既是修正主义、又是左傾教条主义的理論和綱領的泉源和产物。它是同作为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表达了全世界工人階級一致要求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背道而馳的。

不断巩固和加深同苏联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工作方面的合作，互相交流經驗和运用經驗，对我們和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当前所有革命力量中的首要的、最有经验的、经济上和政治上最强大的国家——苏联的态度，对苏共及其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态度，仍然是国际主义的基本准绳。

（译自 1964 年第 1 期捷《新思想》杂志）

現 实 (节譯)

米洛斯拉夫·莫茨

法国的最基本和主要的論点——“承认现实”，显然能够加强法国的政治地位，其目的肯定是要争取在发展中国家里扩大其影响，同时也企图消除法国的政策在其他地区引起的不良后果。同样也不能忽视整个事情的經濟方面。这一现实对法国來說之所以是最能接受的，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莫斯科部分禁試条約問題上以及在緩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其他措施上采取了类似的立場。法国所获得的优势使其盟国感到恼火。上星期法国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維尔也曾证实了，法国企图以某种方式干預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問題的討論。

(譯自1964年1月28日捷《紅色权利报》)

在亞非人民團結理事會會議上 談了些什么(節譯)

伊瑞·霍赫曼

在會議每個代表的發言中，都努力迴避一些代表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之間不同觀點的實質的問題。代表們竭力求使會議專注於具體的任務，而不要把它變成意識形態分歧的講壇。

可是，中國代表團完全沒有尊重東道國的總統和大部分代表明顯地表示出的這種願望。中國代表團的態度直到今天還受到阿爾及利亞兩種主要報紙《人民報》和《共和阿爾及爾報》的批評。至於談到參加亞非人民團結理事會的討論，中國代表團首先濫用了該組織的非政府性質所給予的可能性。中國代表團把這種總的來說積極的因素（這種因素使得殖民地的國家和人民能夠參加民族解放運動）向有利自己的方面解釋，并在自己的控制下把“代表們”帶到阿爾及利亞，這些“代表”不代表任何人，而有一個任務——去執行中國的態度鼓掌的命令。

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講話沒有出乎人們最壞的意料之外。為了最後傾聽完全形式主義的“擴大、加強和改善”團結的建議，會議會必須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去听取對蘇聯粗暴的侮辱。中國代表的發言非常缺乏涉及到該組織進一步活動的具體建議。

中國代表，首先嘲笑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建設所作的努力，並且對任何一個防止戰爭的努力不僅描繪成無意義的，而且甚至描繪成是一種騙局。在中國代表的這次講話中，雖然沒有老一套地攻擊南斯拉夫；但是，最近一期在巴黎出版的親華的《革命報》尖銳地

攻击了阿尔及利亚工人自治的政策，这对代表們來說并不是秘密。中国代表，在列举帝国主义力量的时候，完全“忘記”了法国，这一点也未向代表們諱避。

中国代表的发言，在所有的主要問題上，由于自己的总概念，不仅带来了反苏的歇斯底里，而且也带来了和本·貝拉讲话精神的間接論战。

鉴于此，中国代表团的路线，无疑地将会在委员会、在其它的一般討論过程中表现出来，因而，对會議的討論将会产生不愉快的局面。誰肯定中国代表团在阿尔及利亚的活动，誰就再一次表现出完全不考虑亚非国家甚至全世界人民所面临的实际問題。

（譯自 1964 年 3 月 25 日捷《紅色权利报》）

亞非人民團結理事會阿爾及爾 會議結束(節譯)

——中國代表團為破壞團結運動而來

《紅色權利報》記者報道

團結理事會在阿爾及爾舉行的第六次會議的經過和結果表明，參與這一組織工作的絕大多數國家和運動都認為：更有效地為完全消滅殖民主義，為使各大洲都能享有自由地、和平地生活的合乎人的尊嚴的條件而鬥爭，在當前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

亞非人民不以取得形式上的政治獨立為滿足，他們正在為反對隱蔽形式下的殖民統治而鬥爭，這種隱蔽形式的殖民統治尤其在拉丁美洲和原來法國在非洲的許多殖民地表現得最為典型。同時會議的討論尤其表明，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在亞非地區正在怎樣不斷地擴大。

在這次會議上，當代亞非各國對待世界其他國家的總政策的兩種主要概念比過去更加明顯地發生了衝突。蘇聯代表團和阿爾及利亞代表團提出了第一種概念中最重要的一方面。會議的文件多半是以他們的提案為依據的，其實質是：世界一切反帝力量共同行動，共同努力完成消滅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實現和平共處和裁軍的任務。

中國代表團在阿爾及爾提出了第二種概念。他們的概念的實質是力求控制團結理事會，把爭取和平和裁軍的鬥爭從它的綱領中一筆勾銷，拉攏亞非人民去支持中國冒險的、沒有出路的方針。關於這一點，不僅中國在會議上反對莫斯科條約和一切裁軍談判

的态度是一个实际的证明，而且他们对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原则所表现出的狂怒的不同意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证明。

中国领导人认为，为了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在亚非国家中孤立苏联，破坏以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国家为一方，以发展中的国家为另一方之间的联盟与合作。

中国领导人为此选择了最卑鄙的方法——种族主义的口号。中国代表团不是向健康的理智呼吁，而是力图激发沙文主义的本能。但是，他们大大低估了代表们的政治水平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虽然许多代表对一系列问题还不明确，但是，在同许多参加会议的人交谈以后，特别是在同非洲国家的代表交谈以后，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领导人这次很有功劳，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得不明确之处减少了。

中国的反苏诽谤虽然受到西欧和美国反动报刊的热烈欢迎，但在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的行径却引起了相反的反应。会议反对他们的方针，认为根本的要求是不仅要保持，而且要巩固团结和共同行动，会议根本拒绝讨论中国的“论据”。就连那些有时对中国的激进主义有一定反应的代表们，这一次也不能不看到，光叫喊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必须有一个同运动的需要相符合的具体措施的积极纲领。

中国代表团本来准备要求从这一组织中把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开除出去，如果出现了对此合适条件的話——这并不是秘密。这证明了，中国的政策在反苏歇斯底里方面已走得多么远了。但是，会议通过的文件——各委员会在这些文件上花的时间比预计的时间多二十个小时——的内容却说明，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在阿尔及尔战胜了中国的灾难性的概念。

* * *

“中国代表团是带着破坏亚非国家团结运动的目的到阿尔及

尔来的，但是它沒有得逞。最后它不得不同其他代表团一起投票贊成关于全面裁軍和平共处的決議。”苏联代表团长加弗罗夫在特別記者招待会上这样說。

他說，中国代表团的態度只能理解为是他們企图控制亚非国家团结运动的一种表現。因为他們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給其他代表团的企图往往不能成功，他們就力图分裂这一运动。會議表明，大部分代表团是同意我們的立場的。这一点表現在最后的总政治決議中，这一決議把巩固亚非团结作为主要任务。苏联发言人认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对會議的順利进行有着巨大的功劳。

（譯自 1964 年 3 月 28 日捷《紅色权利报》）

在党和人民牢固的团結中 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而斗争(节譯)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4年4月5日在
中斯洛伐克州党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我們完全支持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团結而进行的斗争

在这方面我們党以严重的不滿注視着中国共产党的領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最近四年来,它們与包括在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宣言和声明中的关于兄弟党之間相互关系的結論和准則发生了尖銳的矛盾。特別是在最近时期,事情的发展已經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領導人通过自己的講話、声明、官方的文章、广播宣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代表們的活动公开地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目的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引起糾紛和分裂。

許多事实一直在证明着,中国共产党的領導公开致力于分裂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共产党,并支持在它們的党内建立反党的派別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威胁和損害这些党在政治上和行动上的一致。他們的敌对性的攻击主要是指向苏联共产党,它的列宁主义的領導。中国的宣传把它們当成是修正主义的、当作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死敌,并以駭人听闻的方式来控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在武装方面和美帝国主义者们的兄弟关

系。据说这是因为苏联签订了部分禁止试验原子武器的条约。根据中国同志曲解的逻辑，据说这一条约是反对所有国家的一种阴谋。根据他们幻想的概念是这样的结果：据说在苏联资本主义势力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他们也这样来谈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据说这些国家较高的生活水平使共产党的政策脱离了阶级立场。所以在1964年2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报纸《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就提出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实现分裂的要求。与此同时，苏共中央、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受到了骇人听闻的控告和侮辱。这些控告和侮辱从托洛茨基起来反对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政策的二十年代起，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与此相类似的。

同时，有趣的是，这样多地吹嘘革命的共产主义原则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突然在和戴高乐政府的谈判中脱离了这一原则。当然，我们欢迎法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是国家间发展和平关系道路上的一个进步和美国关于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反动概念中的一个缺口。对中国的孤立是完全不现实的和无意义的。

可是，中国宣传在这当中做了什么，这就真正引起了诧异。去年年初，中国领导人尖锐地攻击了法国同志，并控告他们，说他们没有为反对戴高乐政府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进行有力的斗争。可是，与建立外交关系相联系，他们在1964年1月2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却毫不犹豫地就把戴高乐的法国列入到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中去，而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一行列中排斥出去。这是由于它们对中国领导人的非列宁主义的概念持有原则性的保留意见。与此同时，它把英国首相霍姆和德国总理艾哈德针对美国的一些话解释成，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能起某种反对美国势力的作用。

甚至在目前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暗示，即说什么伦敦、巴黎、北

京和东京为未来考虑出某一种反美和反苏的路綫将是可能的。这些消息一直在传播着，对此中国任何一个人也沒有予以反駁；看来，这并不是不合中国首領的口味的。

像你們知道的那樣，苏联共产党、我們党以及一系列其它兄弟党对中国共产党領导迄今的攻击采取了克制的立場，并于去年秋天向中国領领导人提出了許多停止公开論战的呼吁。最近时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經濟和貿易合作、保证在国际民主組織中以及在关于重要的国际問題的討論中采取統一的作法的积极建議。可是，这一切都沒有得到答复。虽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支持苏联同志們这一創議的其他兄弟党作了这一切，并期待着中国領领导人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停止自己的攻击，不要再使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間的分歧中得到其它好处。但是，很可惜，沒有这样。相反，在最近几天，中国領领导人的攻击越来越多了。

像你們知道的那樣，2月初，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會議，会上也討論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領导的攻击和中国領领导人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全部作法。在这次會議上苏斯洛夫同志作了报告。他的报告在这几天已經发表了。

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分析，这种分析对中国領领导人有害的、冒险的路綫作出了现实的、客观的評价，中国領领导人想把这条路綫强加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用它来代替1957年和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所通过的文件中列宁主义的行动綱領。我們完全同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中国領领导人极端錯誤的观点以及他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別活动所进行的原則性的批評。我們还支持苏联共产党为了加强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团結以及克

服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間的分歧所作的不懈努力。

我們也声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这种立場同我們党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我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路綫，它符合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原則，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利益，并完全符合 1957 年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声明中加强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一致和团結的結論。

因为中国同志在近几周拒絕了終止公开論战的每一种努力和建議，相反全面展开了自己的分裂活动，公布对中国同志們的行为的公开立場，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决定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一个新的证明是《人民日报》1964年3月31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除开粗暴地攻击苏联共产党之外，还中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粗魯地歪曲它从 1945 年以来的政策。它的全部分析歪曲了我国事态的进程，目的是要证明，說什么我国工人階級在 1948 年 2 月不是和平地而是用暴力方式、借助国家机器和軍隊来夺取政权的。可惜的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散布关于二月的这种謊言已达十六年之久。当然我們将在适当的时候有分寸地回答中国同志們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我們也正是这样对中国领导人初次公开提出的要求采取了原則性的立場，他們說什么需要略微修改莫斯科声明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公式，这里也就是修正包含着的“弱点和錯誤”。

同时，最近几个星期，中国代表在国际民主組織中的分裂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证明这种情况的实例是他們不久前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学联、在华沙举行的和平运动、在索非亚举行的世界工联执行机构的會議上以及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团結委员会會議上的作法。

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利益要求为維護它的列宁主义路綫进行不懈的斗争并向中国同志表明：大多数兄弟党都譴責

他們的极为有害的路綫，只有在承认和尊重 1960 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的原則和結論的基础上，任何接近才有可能。只有这样，才可能抵制中国共产党使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解放运动分割开来、把苏联的国际主义政策同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等同起来、把自己的野心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联系起来，以便使北京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中心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的这样一些托洛茨基宗派主义的企图。同时，必須为举行一次新的国际共产党會議——最好是在今年召开——积极准备条件，这次會議将会維護和加强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行动一致，反对从事国际宗派活动的作法。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其他数十个兄弟党的立場，它們将片刻不息地努力迫使中国共产党领导采取一种共产党人的負責态度。所以，所有的党，其中也包括我們党，将同他們一道繼續为所有共产党人都視為最神圣的东西，为他們基本的国际义务，为实现思想和行动一致，为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爭取和平和共产主义、爭取各民族的自由的斗争中保持国际联盟的战斗的革命团結而坚决奋斗。

当然，我們不能够掩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主义政策不仅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而且也危險地帮助了帝国主义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尽管西方有一些良好的表現（这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政策巨大影响的結果），但直到目前在談到帝国主义政策的侵略性质时，我們并不制造任何幻想。尽管今天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中正在散布一种信念，即核进攻的道路、战争的道路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也不为自己制造帝国主义将抛弃自己毁灭社会主义国家的計划的幻想。当然，这里也存在着帝国主义势力——不論在美国还是在西德的复仇主义者——他們认为，核战争是可能的，他們并頑固地在北大西洋公約的范围内外进

行着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威胁。

在帝国主义的政策中（这种政策一点也没有减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仇恨和敌视），只是策略在改变，这一方面是由于迄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成就和世界上同情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越来越多所迫使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势力和经济矛盾的不断增长所迫使的。这一切迫使它们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所以甚至西方的一些统治集团也表示愿意进行我们所支持的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相互贸易，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掩盖，帝国主义者正在加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那里我们必须随时戒备着，因为帝国主义者把具体的政治目的硬塞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去。目前，他们基本的策略观点绝不是从实力地位出发以正面的进攻来毁灭社会主义，因为由于苏联火箭和原子的优势他们还没有力量这样作；而是改变它、取消决定它的实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基本性质。这就意味着通过一切可能的道路和方式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风、倾向带到社会主义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生活中去，然后再把使之解体的观点和理论带去。其目的就像不久前《纽约时报》杂志所承认的“把共产主义转化成自由的和多样化的社会”。

所以，帝国主义者一直竭力把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更集中地引导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战线上来，尽管他们没有取消各种形式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他们在对人们思想中的各种残余进行投机；对一些小市民和知识分子当中个别的一些人头脑中的糊涂思想投机；对民族主义的偏见投机；他们要依靠这些人来传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3月初，大家都熟悉的美国前任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曾宣称，他们正在努力，要使“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得到完全的独立并恢复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自由世界的正常关系”。同时，他也不掩盖，他

們所說的主要是在這一方面：即為了破壞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聯盟，特別是和蘇聯的聯盟（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共同的和領導的基礎）；也為了復活民族主義傾向的影響，以便使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樣子，和別的国家不同，以便能夠在那里竭力灌輸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毒素。

今天對他們來說這是一條戰綫，在這條戰綫上他們正在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去進攻社會主義國家公民的思想，以便破壞他們相互之間的一致和各共產黨的團結。他們的全部利益都服從於這一點並利用所提供的每一次機會。由此，我們必須充分地認識到，不允許放鬆意識形態上任何消極的東西，而是必須站到反對進攻的行列中去，去反對這些企圖。

我們正經歷着思想方面的巨大沖突，這一沖突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反動勢力和進步力量之間誰戰勝誰的國際階級鬥爭的反映。這使得我們知道，哪里是我們的障地，要永遠堅定地站在黨的——社會主義的立場上，要堅決地捍衛它，並通過和平共處政策來向全世界傳播真理和社會主義的成就。所以我們並不拒絕和西方進步文化的代表人物進行最廣泛的合作，我們為國際旅行开辟了可能性，我們正在發展國際貿易，我們還作了其他一些事情。但是，同時我們必須永遠知道，我們為什麼作這些。我們這樣作是為了：加強社會主義的障地（不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中），有助於和平和進步事業以及用全部力量去加強社會主義的思想。對小市民的道德或者貼着社會主義標籤的思想和意識不能作任何一點點的調和。所以，我們非常緊迫地把今天我們所必須作的一切擺在全體勞動人民面前，以便使我們都能到達未來我們在政治思想上所要到達的地方。

（譯自1964年4月6日捷《紅色權利報》）

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党的生活》杂志社论

前些日子在《红色权利报》上公布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月会议的材料，在这次会上讨论了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有关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欢迎公布这些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包括了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路线的列宁式的原则性答辩，同时也揭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行动纲领和他们掩饰不住的，企图通过广泛的、多方面的派别活动，来分裂世界共产主义的力量。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正象州的党代表会议再一次着重肯定的那样，表示毫无保留地赞同苏联同志的观点，坚定地站在他们的一边，站在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边。这些党为了和平和共产主义决定坚决地反对中国领导人把混乱带入革命运动和把它引向歧路的企图。

众所周知，尽管中国领导人在1960年签署了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的文件——声明，但他们不仅不打算遵守它，而且竭尽全力对它进行总的修改。包括在他们针对苏共中央委员会的、1963年6月14日信中的著名的二十五点建议的真正意义就是如此。这个行动纲领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证据，而且也是他们离开阶级立场的明显证据。

* * *

让我们举几个例子。中国领导人首先虚伪地解释与目前时代

的特点、革命进程的内容和国际工人阶级以及其他进步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地位有关的问题。按照1960年声明的说法，世界革命运动的特点和内容应当是这样确定的：目前的四股基本力量汇聚成一股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潮流。四股力量就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所有的民主运动。

同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确定人类社会现代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正在确定反对帝国主义，为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而斗争的力量。中国领导人开始宣称，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目前时期是世界革命过程的主要因素。他们断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事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个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策源地。

民族解放运动代表了世界革命过程中极其巨大的力量，而我们完全没有低估这种力量。但是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基地，因为它们首先要解决的是与民族解放和保障独立有关的民主任务，去消灭殖民主义制度，而且还不能破坏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和大城市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是革命力量的主要基地和基础。中国的观点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因为他们的观点忽视工人阶级在争取世界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变革的斗争中的基本作用和历史使命。

1960年的声明明确地说，目前时代的中心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成果——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解决革命运动的其他各项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和它的力量的增长。在目前时期，社会主义体系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

为三分之一以上。但是，在最近时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这首先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生产增长的速度普遍下降了。因此，在我们同资本主义竞赛时为了赢得时间，保证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成了今天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经济政策阻碍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的发展。中共中央委员会完全忘记了列宁主义的定理，即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来对世界革命的发展产生主要影响。同时明显的是，脱离社会主义国家所提出的任务——在不远的未来，在人类活动决定性的范围之内，在物质生产中击败资本主义——将会严重地威胁我们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最近时期，中国的领导人正在攻击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基本原则。他们把这种分工同帝国主义者垄断联合的企图相比，甚至于他们还攻击经济互助委员会本身的存在。

同时他们还毫不犹豫地自己的杂志上宣传这样的观点，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说什么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不负责任的，和与在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相矛盾的。

* * *

中国领导人观点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充分表现在战争与和平、争取和平的斗争以及和平共处的問題上。为了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共产党人必须代表各国人民来完成所有的一切，因为在新的世界大战中可能要死掉几亿人，这样的战争对共产主义的事业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损失。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正在削弱帝国主义的障蔽，正在孤立它的最富于侵略的集团，正在鼓舞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正在为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争取进步、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安·諾沃提尼同志在中斯洛伐克州組織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中說：“我們正經歷着思想方面的巨大沖突，這一沖突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反動勢力和進步力量之間誰戰勝誰的國際階級鬥爭的反映。這使得我們知道，哪里是我們的陣地，要永遠堅定地站在黨的——社會主義的立場上，要堅決地捍衛它，並通過和平共處政策來向全世界傳播真理和社會主義的成就。”

我們的革命樂觀主義是通過這一信念表現出來的，即可以挫敗侵略勢力，可以制止熱核戰爭，在和平共處的條件下，世界革命進程將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有成效地發展着。針對這一點中國領導人是如何來表現自己的“樂觀主義”呢？他們說，如果發生了核戰爭，說什麼世界上的居民最多將死去一半，而不是全部的居民。與此有關，他們還宣稱，至於談到未來，我們是樂觀主義者。

中國的領導人一味地反對和平共處政策，這都是他們多次公開強調的。他們知道，他們加劇國際緊張局勢的冒險主義路線遭到了反抗，在最近時期他們竭力用各種詞句來為自己解圍，儘管他們還一直在堅持以前的立場。在他們看來，和平共處不能成為共產主義運動戰略步驟的問題，而它僅僅是應該服務於戰術的，和平共處應該是戰爭的某一種序幕，正象中國共產黨領導所認為的那樣，為了世界革命的最後勝利同樣必須發生戰爭。

中國領導人新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冒險性在他們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道路和形式的概念中就可以說明。他們的這種概念是建立在不惜一切代價，不顧群眾的思想，不顧對於社會主義革命來說客觀和主觀條件的成熟性，不顧內部的和外部的情況來煽動武裝起義的基礎之上的。當資本主義國家兄弟黨的領導人拒絕中國的假革命的教條時，他們就一味地把這些領導人宣布為變節者、叛徒和帝國主義的走狗。

與此類似的中國的观点還表現在目前所有其他的關鍵性的問

題上。特別瘋狂的是他們反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整個路線的運動和貶低反對個人迷信的鬥爭。這並不奇怪。中國領導人一向不惜一切代價企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占據壟斷地位，他們自己把自己說成是我們學說的最有才干的解釋者。他們正在把自己的偏向當作自列寧時期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原則的最高發展而拿出來，他們已經毫不掩飾地說這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與此同時他們把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捧上了天，把他和經典作家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並列起來。

* * *

由於中共領導去年六月份概要地宣布自己的綱領而恢復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公開論戰。此外，在蘇共和中共領導人於莫斯科會晤（在這次會晤中，由於蘇聯同志的倡議本應討論存在的觀點分歧）的前夕，他們就公布了這個材料。眾所周知，蘇共中央委員會通過公布自己去年七月十四日的公開信對這一挑釁性的行動進行了反映。在這封信中，蘇共中央委員會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進行了原則性的回答，同時進行了思想上的列寧主義的答辯，這些思想是所有共產黨人在為爭取世界和平和共產主義的鬥爭中的共同綱領。絕大多數的共產黨和工人黨都毫無保留地贊同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觀點並堅決譴責中國領導人的分裂行動。

中共領導不僅使去年七月同蘇共領導人舉行的會議不能取得肯定的成果，而且開始有意識地加深出現的分歧，使公開論戰更加尖銳化並進一步地加強了自己對蘇共和其他共產黨的敵對攻擊。

從 1963 年 9 月起，中國的首領們便在自己的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上開始逐步公布一些對蘇共中央委員會 1963 年 7 月 14 日公開信的無恥的評論。直到今天，除了發表的幾百篇其他材料外，他們一共發表了八篇包羅萬象的評論文章，這些評論文章實質上已經與意識形態問題毫無共同之處，而是一系列最粗暴的誣

蔑、捏造、对事实的歪曲以及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敌视性的诽谤。他们这样作，唯一的企图是想使世界进步公众迷失方向，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公开分裂准备合适的土壤。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曾多次指出，挑起的公开论战是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利益针锋相对的，公开的争论只能给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他们会向中共领导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并且主张把注意力集中在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统一的、共同利益的问题上。特别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在力求制止事件不能容忍的发展和加强兄弟党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方面表现了最大限度的善良愿望、克制和慎重。仅仅在最近时期苏共就曾几次呼吁停止论战。在赫鲁晓夫同志 1963 年 10 月 25 日和 11 月 7 日的发言中都这样做了，而后在 1963 年 11 月 29 日苏共中央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又重申了这一点。

苏共中央委员会不断强调，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存在分歧的问题上，因为生活本身将会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性，而是要在那些存在着有利的可能性的领域中展开合作。中共中央委员会对于这样一封语调温和的、同志式的以及包括一系列建设性建议的信三个月以来都完全没有回答，而相反他们却不断加强公开的反苏攻击，这种攻击已经发展成了歇斯底里的敌对运动。

在对苏联的攻击中，中国领导人采取了官方的政策，他们甚至于开始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来反对它。直到他们得出了在所谓中间地带的国家，这就是处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那些国家某种联盟的定义，说什么这些国家的利益要求共同反对这两个大国。他们不仅开始把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而且甚至于控告苏联同志，说他们为了统治世界和美国进行合作，实行“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

量、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

对苏联共产党明显的敌对行为、致力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假革命的空话——这就是軍火庫，中国领导人就用这些开始了反对共同談妥的世界共产主义綱領性的路綫。为了推翻苏共领导和那些彻底遵循这条路綫的党的领导，甚至于在呼吁面前也沒有停止攻击。他們还千方百計地支持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形形色色的变节分子。他們粗暴地干涉各个党的內部事务，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在国际范围内使自己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行动綱領得到最大的組織基础。

在各兄弟党内，例如在澳大利亚、美国、瑞士、印度等等，力图攫取領導权的、贊成中国的集团开展了明显的分裂活动，某些地方，例如在錫兰、比利时和巴西这些叛徒集团宣布自己是独立的、宗派主义的党。这些党是由右傾取消派一直到极端的左傾分子形形色色的人所組成的。

同时，正在发生着真正的自相矛盾：中国领导人控告那些为了自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活动而遭到反动統治集团各种迫害的共产党的背叛，同时他們贊揚这些党的叛徒，同一个上述的反动集团給这些叛徒在分裂活动中和传播宗派主义的观点中提供着各种援助，甚至于还通过印刷、广播和电视来帮助他們。

中国共产党的領導把分裂活动带到了国际組織——世界工会联合会、保卫和平运动、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等中去。中国的代表們竭力从內部来破坏这些組織，让民主和革命的力量互相对立起来，以便他們去建立最广泛的反帝战綫来代替这些。

由于使中共領導相信他們的行动的危害性和克服存在分歧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所作的各种建設性努力，沒有得到任何反应，所以已經不能再沉默下去了。这尤其是因为，中国领导

人把兄弟党良好願望的表現开始宣布为在公开論战中的軟弱和害怕失敗。

我們全党坚决譴責中共領導目前的立場和分裂活动，这种分裂活动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及其綱領性的路綫。我們全党坚决拒絕對苏联共产党进行的荒誕的誹謗。作为革命先鋒队的苏联共产党，由于为爭取国际工人階級的利益，为爭取和平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英勇的和始終不渝的斗争，博得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們的尊敬和爱戴。

共产党和工人党坚决反对中共領導的冒险主义的和具有危害性的行动綱領。这个綱領是对表达在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的綱領性路綫的总修正。中共領導無論以任何的政治命令，甚至于分裂活动也从来没有能够使共产主义运动离开他的战略和策略目标以及他的历史使命。

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将采取一切措施，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領導人的小資产階級的、民族主义的和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傾向給共产主义革命陣綫造成的損失。

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将永远象过去一样，为了和平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胜利和苏共以及其他兄弟党一起来完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

（譯自 1964 年第 8 期捷《党的生活》杂志）

本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精神团結起来

《紅色权利报》社論

过去几天，我国人民了解了一个特別重要的文件——1964年2月14日米·安·苏斯洛夫同志在苏共中央全体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所表达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分裂活动的立場。

对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一系列攻击的明确的和簡明的回答也是我們的立場。这一回答也表示了所有珍視运动的切身利益，进步、民主和世界和平的利益，以及坚决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人們的态度。安·諾沃提尼同志也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州党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代表全党表示了意見，他說：“我們完全同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中国领导人极端錯誤的观点以及他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別活动所进行的原則性的批評。我們还支持苏联共产党为了加强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团結以及克服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間的分歧所作的不懈努力。”

州党代表會議的代表們也根据这种精神自发地发表了講話。

中国首領們的分裂主义企图受到了党中央委员会十二月全体會議以及后来的民族陣綫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議的坚决譴責。可是，我們曾尊重过苏共关于停止公开論战的呼吁。我們曾經設想，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信件以及对加强經濟和貿易合作、在国际民主組織中以及在关于重要的国际問題的談判中采取統一的步驟

的一些建議有所表示，至少是在有可能準備關於爭論問題的談判以前這段時間內停止公開論戰。

但是，就像所證明的那樣，中國首領們最不希望克服分歧，他們在自己的中央機關報上發表了一系列一篇比一篇長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們傲慢地、煞費心機地對那些不同意他們的觀點的人進行粗暴的譴責和誹謗。

他們在最近二月和三月的兩篇文章中超過了迄今他們在這樣糟糕的方面所作的一切。他們甚至不知羞恥地控告蘇共整個領導和美帝國主義聯合起來，蓄有某種反對其它所有國家的陰謀。他們實際上是號召蘇聯人民去推翻說什麼是“叛變的”、“修正主義的”蘇共領導。特別是他們不能夠想到尼·謝·赫魯曉夫同志的一點好處。因為赫魯曉夫毫不妥協地捍衛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是我們時代最先進的人物之一，是不倦的戰士——列寧主義者，這一事實本身，以及他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恢復黨工作的列寧主義原則方面、在蘇共和蘇聯威信的提高方面、在團結反對帝國主義的進步力量和避免世界核戰爭方面的無限功勳，妨礙了中國首領們。

這證明了，中國首領們需要通過公開論戰達到特殊的目的。這裡所說的不應該只是交換不同的觀點和尋找共同的立場。假革命的詞句、世界革命利益的“誓言”，這一切都只是為了掩飾民族主義的大國主義和不惜一切代價力圖損害蘇共。顯然，他們想利用目前他們公開挑起和加劇的分裂為自己在國際革命運動中確立自己的霸權地位。

他們把自己的言論和鬥爭方法都服從於這個目的。不久前他們還“保衛”宣言和聲明，控告蘇共和其他黨，說什麼他們正在破壞這些文件的原則；說什麼只有中國首領們捍衛運動的團結，儘管他們反對大多數黨。現在，他們又帶來了這種說法，說什麼所有一致

的东西，都有着分裂为两个部分的倾向。也就是说分裂是必然的，说什么也需要按照中国的建议修改宣言和声明。可是，中国首領們提出的全部“修改”，在于拒绝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讨论中所表现出的，其基本思想固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文件中的列宁主义方针。目前，中国首領們动员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反对无限地提高了苏共的威信和加强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力量的这一方针。

资产阶级反动集团清楚地了解到，他们的这种活动在怎样地损害着共产主义的利益。甚至共产党都是非法的那些地方的政府，（例如像佛朗哥的西班牙就是这样），它们都非常自愿地允许自由地散发中国的印刷品就是证明。中国首領們反对苏共以及其它共产党“背叛革命”的斗争，例如，甚至在伯尔尼都没有遇到任何的反对。就像波恩“总汇报”的通讯员非常惊奇地评论的那样，在伯尔尼中国人在大使馆里建立了一个“为了亚洲以外的所有人的庄严的中心”，那里有三百个人在工作。

中国首領們在完全忘记了阶级斗争并以种族沙文主义的态度来代替它的同时，以最大的努力企图建立自己的国际组织并在所有的民主组织中挑拨非洲和亚洲人民的代表反对“白色的帝国主义者”，而且，与此同时，他们把主要的火力（这好像令人不能相信）去反对苏联。他们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以及其他地方也都这样作了。

这就是中国领导人自己所想像的自己正在为世界革命进一步的发展服务！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最强大的支柱是苏联。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目前一切革命力量的主要堡垒，世界和平的可靠支柱；它使得帝国主义不可能进行反对正在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各国人民的反革命行动，并有效地帮助这些人民建设自由的生活。这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事实。我们整个运动的命运在很大

的程度上依赖于每一个革命政党理解这一事实的程度，依赖于它们怎样按照这一事实来开展自己的活动。但是，中国首領們除了自己的威信方面的利益以外，什么也不願意看到，甚至在面临着削弱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候，他們也沒有停止加强自己在运动中的領導权的幻想。

現在大家應該已經明白，这里所說的不是單純的理論上的爭論，而是关系到我們运动的基本的切身問題、关系到运动的发展和远景。不能消极地对待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整个工人运动从属于地理和种族观点的理論上的臆断。当有人濫用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去散布为对那些正在和資本主义斗争，以及在新社会的建設中走得最远、作了和正在作最多工作的国家侮辱性的攻击进行辯解的观点时，不能沉默不言。

中共領導人这样来为自己的分裂活动辯护，說什么他們的党代表着国际革命运动“新的”“年輕的”潮流，而其它大多数党都“烂掉了”。这种同时又被当作是列宁主义的“理論”應該准許在各个党内部建立派别小集团并應該准許在相互誹謗的基础上展开党内斗争。中国領導人根据这种“理論”的精神，到他們所能够去的一切地方招募了一些同盟者。形形色色的破产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在反苏叫嚣中身敗名裂的叛徒都向他們报名，对他們來說也完全无所谓。

中共領導人走的太远了。他們的分裂活动未必有前例。首先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帝国主义者为他們的活动感到高兴。四月一日，美国的《紐約时报》評論道：“当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用目前某个时候在統一的世界共产主义中所爆发的全面矛盾的政治斗争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的时候，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会最好地服务于人民。”这不是偶然的。

誰想投机地利用我們运动中的弱点，誰认为中国領袖們不負

責任的攻击会把混乱帶到共产主义中来，他将会大失所望。大部分共产党現在和将来都要忠于列宁的旗帜、忠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以及宣言和声明的結論。中共首領們的分裂活动使所有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結成統一的战斗联盟去捍卫革命的国际运动和創造性的列宁主义。

为了巩固这一联盟，就像諾沃提尼同志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講話中所說的那樣，为举行新的国际共产党會議作准备已是时候了，这次會議將維護和加强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統一行动，去反对任何开展国际派別活动的企图。

以創造性的列宁主义精神团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反对中国領導人的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的和派別活动的政策是現在首要的任务。这是为了共产主义、民主和和平的新胜利和帝国主义进行順利斗争的必要条件。

（譯自 1964 年 4 月 7 日捷《紅色权利报》）

党的科学和意识形态工作(节译)

弗拉基米尔·考茨基 1964 年 4 月 3 日在
捷科学院全体会上的讲话

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观点：在最终消除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残余中，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捆束着我们的双手。但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略与策略，毕竟不是主观意志和主观愿望的事情；我们不能用从我们的思想意识的武库中勾消这一概念的办法（正如某些幼稚的谋士所建议的那样）来消除客观存在的修正主义危险。同样，我们也不能用这种简单勾消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概念的办法来消除它们的根源、它们生长的土壤以及存在的具体表现。除其它许多方面以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的思想基础和实际行动不断地使我们确信，这不是特殊的历史概念，而是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概念。三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又发表的对苏共和我们党的粗暴攻击——对此决不会不予以公开答复——在这方而提供了比太阳还明显的证明。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对中国的非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肯定，谁也不会怀疑，我们的党在为全力贯彻创造性的列宁主义，反对僵化的教条主义和具有破坏性的宗派行为——中国首領們首先是其险恶的传播者——而作的努力中，将彻底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译自1964年4月11日捷《红色权利报》）

捷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当前形势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过去的几次会议上——特别是在1963年12月和1964年3月研究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有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的局势。中共领导人越来越远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目前已经明显地把分裂世界革命力量 and 在北京建立背叛者的中心当作一种任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自己霸权的目的，制定了意识形态的綱領，这一綱領意味着对表达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文件——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綫的总修正。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特别是在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上就已经起来反对中国领导人的不正确观点。我党中央委员会在1963年7月的声明中就表示了对中共领导人的政策的不滿和担心，同时坚决譴責了中共领导对苏共列宁主义政策的攻击。捷共中央委员会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了挑衅、歪曲和誹謗，以便損害苏共和其它兄弟党的政策。中共领导人一直在故意地和系統地加强对兄弟党的攻击；推行虛伪的控告和破坏活动的政策来反对它們；强迫它們接受反列宁主义的方針。在現时代，这一反列宁主义的方針对世界革命陣綫，对国际爭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来說是最大的危險。

如果中国领导人挑衅性地把各馬克思列宁主义党为了运动的团结不願进行公开論战的良好願望当成公开斗争中的論据不足和

害怕失敗，那麼，對這種作法除了理解成企圖號召分裂以外，不能作別的解释。中共領導人對兄弟黨迄今的許多停止公開論戰的建議是這樣反應的：中國領導人越來越多地開展了不友好的運動，同時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搞派別活動，目的是分裂共產主義運動和在国际範圍內為自己的綱領建立基礎。因此，中國領導人在各個國家中動員和拼湊各種各樣的反黨分子、各種各樣的托洛茨基分子、叛徒和道德敗壞的人，在必要時建立起各種各樣的派別集團，並竭力把它們說成是“新的共產黨”。

他們在這方面客觀地幫助着世界帝國主義反動派。世界帝國主義反動派把這種行為看作是削弱共產黨人的活動和影響的一種值得歡迎的幫助，並且，他們還以各種形式來支持這種分裂活動。

中國領導人的不良行動也反映到對我們黨的關係上，甚至反映到和我們國家的關係上。從根本上縮小了相互之間的外貿總額並不是我們的過錯。中國方面粗暴地違犯了我們的法律，因而導致停止了布拉格的“新華”通訊社的活動。令人感到十分遺憾的是，中國官方把中國公民干涉我國事務和破壞我國法律制度當作有功的活動來評價，並且還公開地贊揚了肇事人。

同時，我們拒絕中國報刊對於捷克斯洛伐克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所作的随心所欲的和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解释。這是歪曲由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列寧主義思想的表現。

由於自己的狂妄野心而變得昏迷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失去了判斷力，在任何東西面前都不停下來。他們應該對削弱團結和瓦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負全部責任。

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的粗暴攻擊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人和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全體勞動人民感到極大的憤慨。這種攻擊以其內容和語氣來說使人們想起了帝國主

义集团武庫中的罵人話。当中国领导人号召世界輿論反对苏联的政策(苏联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是支持世界进步的和革命的力量以及各国人民之間友好关系的政策)的时候,表现了中国领导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无原則性。

我們党高度评价苏共的作法,它曾多次通过建設性的努力去制止危險的发展并达到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为了克服現存的分歧和使中共领导人了解到自己的行动的危害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表现了为其它兄弟党所支持的极大的耐心、善意和冷靜。

但是,苏共和其它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作法在中国领导人那里并没有得到适当的反应。

我們和其它許多兄弟党得出了一致的結論: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贯拒絕停止公开論战的一切建議的破坏活动,出現了一种局势,在此时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直接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坚决、公开地起来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和它的列宁主义的綱領性路綫。

捷共中央委员会(最近几天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各州代表會議一致肯定了它的立場)表示完全同意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行动和作法。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公布的二月會議的材料給了中国领导人以原則性的答复。

苏联共产党一直在通过自己的理論和实践活动說明,苏共正在坚决地把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所表达的共同商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貫徹到生活中去。这是今天每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的主要标准。

捷共中央委员会完全贊同苏共中央关于立即召开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的建議。捷共中央认为,在这次會議上应当从原則上討論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討論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根

据共同制訂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来巩固世界共产主义力量团結的有关問題。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譯自 1964 年 4 月 12 日捷《紅色权利报》）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兹德涅克·布拉达奇

从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和全世界革命战士思想上与政治上的一致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建设的基石。它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力量的主要源泉之一，因此维护国际主义就成了每个共产党人最重要的职责。反对现代极左的宗派主义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攻击的有效斗争要求每个党员完全搞清正在发生的事件，弄清它们的本质、内容和意义。米·安·苏斯洛夫的报告《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和苏共中夫委员会二月会议对此报告所通过的决议详细地分析了这些问题。

由于中共领导在翻译好的、散发到全世界的材料中运用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学说，并把自己当成这些学说唯一“正统的”解释者，但是实际上他们歪曲了这些学说的内容并竭力把符合自己宗派主义方向的思想强加于他们，因此彻底地研究这些和其他文件就更加重要了。

中国的教条主义者首先攻击苏联共产党、它的中夫委员会和苏共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个人，这决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知道，在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而进行斗争的历史中成长起来的苏共的伟大的国际威望是他们在建立

共产主义运动新中心的分裂主义计划的主要障碍之一。为了破坏这种威望，中国党的领导不仅粗暴地歪曲和诽谤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当前的政策，而且甚至直接地假冒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

关于一个“历史的比拟”

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行动有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中国领导人采取和宣传旨在坚决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步骤。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他们庄重地宣称自己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且甚至把他们自己说成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唯一的和一贯的捍卫者。

他们为上述口号和自己分裂活动之间这个明显的矛盾辩护，编造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历史的比拟”。他们竭力引起这样一种印象，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目前的状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国际的情况相似。当时，在五十年前，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列在反对第二国际政党的机会主义斗争的前列，为争取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成熟的因素脱离改良主义的政党，并争取使它们在新的真正的革命组织——共产国际中团结起来。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说法，说什么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政党内机会主义占了上风，而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时期担负起了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弗·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所担负的责任。由此产生了中国的“理论”：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曾由德国转移到俄国，而目前时期又正在移向东方——中国。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事物的本质，就会立刻不能容忍这种“历史的比拟”。每一个至少大体上熟悉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

在二十世紀的工人运动中，布尔什維克党历史性先鋒作用的源泉是，它有能力联合反对在第二国际中占統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有能力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論的創造性发展为新的更高的阶段作准备，以便符合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条件。弗·伊·列宁的伟大和布尔什維克党的历史作用在于，他们在理論和实践中，在解决为无产阶级革命，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而进行斗争的基本問題中给国际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的道路。苏联經过了资本主义包围和国家經濟落后的极其艰苦的条件，經过了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出現和增长有关的严重的消极現象，第一个在实践中证实了，迄今还仅仅作为科学概念存在于革命者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能够变为事实。社会主义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內把弱小的俄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并且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考驗中取得胜利。

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以自己的榜样加快了其他一些国家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形成和成长，这些党在共产国际的範圍內参与了解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問題，它們以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为共产主义运动理論上的武庫作出了貢獻。把脱离列宁主义准則的因素帶到各共产党之間的关系中以及党的內部生活中来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严重地損害了苏共和其它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創造性的思想和政治力量的发展过程。但是在三十年代的后半期反对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問題的新的解决方法——这些新的解决方法发展了列宁原来的思想——证实了，甚至于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也沒有能够中断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成了新时期的开端。代表大会用自己的結果和对个人迷信的原則性的和公开的批評不仅阻止了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

暴破坏，同时也根据列宁主义的傳統精神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創造性繁荣的新阶段开辟了道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自己的历史上，在按照各个国家的特殊条件寻找通往社会主义革命途徑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各种可能性和形式时，从来沒有像苏共二十大所开始的时期那样经历了創造力如此大規模繁荣的时期。当然，这个多样性不仅沒有破坏，而且相反，在理論和战略的基本原則上、在关键性的国际問題上还提高了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結的必要性。

在过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并肩前进的时候，也曾以很多宝贵的知識和經驗对丰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論武庫作出了貢獻，特别是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問題上。但是很明显的是，近几年来，当中共领导脱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路綫的时候，在他們的文件中我們找不到任何分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的新条件和可能性的重要的尝试。中国领导人竭力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綱領实际上就意味着企图改变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創造性发展，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虛伪的标签下否认和咒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发展的現阶段基础上所得出的新結論和知識。在一系列的問題上中共甚至恢复和宣传早已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前的发展所克服和駁斥了的某些反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

如果中国的評論文章企图人为地編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国际中布尔什維克党的作用和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行动綱領”的作用之間的某种“比拟”的話，那么这就完全是荒謬絕伦的和可笑的。实际上所說的是完全相反的現象：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維克党在理論和实践中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出了前进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企图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倒退，

并成为它的障碍。尽管中国领导进行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诽谤性攻击，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仅真正地保持了作为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力量的伟大的威望，而且也是——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在目前条件下对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作出了最显著贡献的力量。

中共“行动綱領”的历史地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和現在都把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但是不能允許任何人通过不負責任地歪曲一些概念和任意分送各种“外号”来遮掩真正的修正主义和创造性的馬克思主义之間的区别。反对現代教条主义者这种不負責任的企图的一貫斗争就更加重要了，因为現代帝国主义的宣传也在追随着同样的目的（尽管它是从另外的立場出发）。这种宣传竭力抹煞创造性的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态之間界限，以便使資產階級的理論很容易地“滲透”到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武庫中去。

中国领导人在反对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列宁主义政策的斗争中所使用的不是什么新方法。国际工人运动在自己的历史中曾必須不止一次地进行反对各种极左的少数派的頑强斗争，这些少数派的代表把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称为“修正主义者”，他們天花乱墜地談論“世界革命”，但是实际上他們不能够在目前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为实现世界革命进行真正的斗争，他們也沒有以自己总的态度来进行反对資產階級意識形态、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与其說他們是支持这些斗争，还不如說他們是破坏这些斗争。

因此整个一生对右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彻底斗争的

弗·伊·列宁經常強調指出，共产党人必須永远确切地知道这个斗争的界限，任何时候也不允許它变为“运动”。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弗·伊·列宁在《給德国共产党員的信》中写道：“世界上誰也不能阻碍共产主义者去战胜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如果共产主义者自己不阻碍自己的話。但夸大，哪怕是少許的夸大，也是会阻碍胜利的。夸大同中派主义的斗争，就等于挽救中派主义，巩固它的地位和它对工人的影响。”（《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8—509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前反对极左的少数派斗争的结果是有教益的。这些少数派把目前斗争不可避免的远景称之为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左的、宗派主义的危險。当过去这些“极左的少数派”的代表頑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見的时候，他們就必然失去了在工人阶级之中的影响，并或早或晚地分担了他們給革命先鋒队准备的命运，使自己变成沒有意义的政治派別。讓我們来想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破产吧，連布尔什維克对于这个运动來說也是“不太革命的”。从1920年至1922年，在共产国际里形成了滿口只說假革命空話的“极左的反对派”，这个派別“从左边”进行反对列宁的斗争，并且在某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试图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和建立自己的“党”；众所周知，这个派別在工人阶级当中尽管在开始时有一定的影响，表面上很激进，但它很快地就威信扫地和瓦解了。在二十年代，托洛茨基分子也在共产国际里企图創立專門的“少数派”，他們把这个派別当成是爭取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忠实的战士，甚至把它称之为“列宁主义的反对派”。一九二七年他們脱离共产国际以后，就成立了自己專門的国际組織——所謂的第四国际，但是这个国际沒有在一个国家里对工人阶级有比較明显的影响。

中国领导人当前的思想綱領和分裂主义的策略正是繼承着过

去这些极左派的“传统”。它们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分子所遵循的观点和实践非常类似。当然，这不是，也不可能是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简单的重复。很明显，今天已经没有人面对现实而去宣传二十年代托洛茨基关于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旧论点了。在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中掺杂其他的影响，其根源是他们国家过去尚未克服的思想遗产（种族偏见、中国特殊的民族主义、孔夫子哲学的因素和其他）。

枪杆子不能改变世界

在战争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上本质相同的观点是中共今天的行动纲领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基本连接点。托洛茨基分子曾把战争当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原动力”，他们反对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政策。他们曾宣称，共产党人不应阻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战争冒险。因为新的战争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削弱帝国主义的势力，会把武器送到被动员参加到资产阶级军队中去的工人的手中，因此就容易把帝国主义的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这样就能够保证在其他国家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托洛茨基分子在三十年代粗暴地谴责苏联为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和平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所作的努力，共产国际为发展反对战争的和平运动而进行的斗争，甚至还粗暴地谴责人民阵线和集体安全政策。他们诽谤这些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向资产阶级投降”和“对世界革命的背叛”，尽管很明显，正是这个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备战的政策正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群众中为各共产党赢得巨大威望，并且正成为聚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中国共产党正把从同样的反列宁主义理论基础出发而得出的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传播到全世界去。今年三月底在《人民日报》和《红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特别明显地阐述了这个“概念”。下面从毛泽东选集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抄来的解决目前世界矛盾的“包罗万象的处方”就是它的中心的思想：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战争解决纠纷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是在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概都是对的。”文章继续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接受了中国的新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并且对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的群众这样说：“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目标，这个目标同样也表达了你们的利益，它正在把你们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下解放出来，随着新社会制度建设的发展将越来越充分地保证实现你们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将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却成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从目前军事技术的水平来看，这样的战争只能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热核战争。在这样一场战争中，虽然要死千百万人，也许人类的一大部分和整个民族将会从地球上被消灭掉，但是在被热核战争破坏了的地球上剩下的人类将开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幸福时代！

谁能当真地相信这样的“纲领”会成为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全世界劳动人民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呢？很明显，连中国的领导人也不太相信这一点，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在各种机会中至少是在口头上保证，说他们拥护和平、拥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拥护普遍和彻底裁军，尽管他们在实践中违背自己的保证，粗暴地攻击苏

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旨在缓和國際紧张局势的每一个实践的步驟。他們竭力貶低原子武器的破坏力和将来战争危险的規模。

但是任何的“策略”也不能永久掩蓋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根本的切身利益相对立的中国观点的真正的反列宁主义和反人道的內容。因此这些宗派主义的观点不可能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絲毫共同之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真正实质在于它表达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切身的和和平的利益，并且把它同为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如果中共的领导人不及时了解自己的錯誤，那么迟早要在国际范围内和最終要在自己的国家内逃避不了托洛茨基“极左”反对派所遭到的命运。

（譯自 1964 年第 9 期捷《党的生活》杂志）

学习列宁，在每天的工作中 发展他的遺訓(节譯)

弗拉基米尔·考茨基 1964 年 4 月 21 日在捷共中央、
捷共布拉格市委会和中捷克州委会举办的
紀念列宁誕生九十四周年晚会上的报告

以我們工人階級的二月胜利达到頂峰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新的人民民主基础上的恢复，是我們党的列宁主义政策和創造性地运用关于民主革命和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說的伟大胜利。与会者中的許多同志一定清楚地記得，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期間，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四月提綱》是怎样有效的教益和直接的鼓舞，对党中央制定同国内資产階級決战的战略和策略，是怎样无可估量的帮助。

二月胜利是关于工人階級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这一馬克思列宁主义論断的光輝的实践的证明。只有那些陷入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局限性中去的人，才会不考虑我們光荣的二月的这些历史經驗。如果說今天中国的所謂理論家們在我国的叛国逃亡分子的热烈附和下，几乎把这些經驗看作当时的国家机构的行政措施，那么我們的直接的国际主义义务是严厉地拒絕他們的这种企图，这种企图只证明他們努力不惜一切地攻击对列宁主义思想的一切創造性发展和貫徹列宁主义的盲目性。

当前以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为一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为另一方的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之間的世界斗争断然要求，要我們与苏共和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并肩，为了达到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在 1957 年的宣言和 1960 年的声明的基础上的团结而作一切努力。目前，中共领导的活动成了这种团结的危险威胁，中共领导挑起了肆无忌惮的和充满仇视的运动，反对那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保持忠诚和拒绝接受从北京推行的歪曲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的革命力量。

他们用最放肆的诽谤首先向苏共和它的列宁主义领导，向二十次代表大会所踏上的道路开火。把最重的罪名强加在苏联共产党人的头上，苏联共产党人被无耻地称作历史上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走狗，被指责出卖社会主义革命。

中共的首领们显然从这点出发，即只要他们不破坏掉列宁的党的巨大威望，他们的分裂活动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在这方面他们已失去任何分寸感和控制了。

我们还记得很清楚，就在不久前他们还把自己称作莫斯科文件的唯一正统的捍卫者，而指责别人违背这些文件。但现在他们已自己宣称宣言和声明有缺点了，并公开要求修改这些文件和使这些文件适应他们自己的不正确的理论。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他们的思想纲领只看作是一种掩盖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完全不是思想目标——的外衣。

他们的这种行动，是从背后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的打击，国际工运的团结能够和必须以共同通过的路线作为依靠。任何党，只要它不摒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甚至举手赞成共同的路线，就没有权利在一段时期以后说：我们不认为通过的文件是必须遵守的。这里是我們自己的纲领，国际革命运动现在必须根据这个纲领进行工作。

中国领导人恰是这样做的。他们不仅抛弃了国际革命运动内部所必须遵循的民主原则，而且强烈拒绝列宁所捍卫过的原则：列宁写过：“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才是工人运动的准则”。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破坏世界革命力量的团结，而且根本否认它的必要性。就好像它没有看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必须筑起统一的堤防来对付在反共斗争中是一致的帝国主义那样。我们读到担任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怎样从理论上把革命运动中的分裂作为规律——因为一切“都一分为二，即分为两个相互斗争的部分”——来论证的时候，以及如何在这类的文章中直接赞扬分裂行为和派别活动的益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自然产生这样的问题：中国首脑们为什么现在决定否认在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商定的路线。从他们的大量宣传攻击中，从他们积极参与分裂革命政党和在一系列国家中组织反党集团，只能作出这种结论，即他们企图把自己的冒险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方针强加给其它党。他们的行动的目的是明显的，即攫取国际革命运动的当之无愧的领袖的角色，攫取有无上的权利，决定什么是革命，什么不是革命的最后裁判人的角色。这种领导权显然能满足据各种情况来看在中共领导中占了上风的民族主义野心。

同志们，请允许我谈谈这个问题。列宁在他写的《共产主义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的序言中捍卫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征对国际革命运动是普遍适用的。在这以后，他在其它著作中科学地和极其客观地规定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取得了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成为其它国家的范例的标准。而列宁的解释非常令人信服地表明，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范例的概念与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熟程度**不可分割地和明显地联系在一起。喜欢以列宁遗训的最高捍卫者自居的中国领导人，对此应该加以思考。或许他们认为，列宁主义的准则是可以冗长的言论输出的？或许他们以为，他们至今建设新社会的经验，比无法比拟的成熟的苏联在几乎半个世纪中在各个方面的积累的巨大经验，是革命运

动吸取教益的更大泉源？

中国首領們的力图不择手段地强加于革命力量的路綫究竟是怎样的路綫呢？簡而言之，它决不复杂。按照他們的看法，只有承认暴力政变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武力夺取政权，用战争解决爭端問題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只有枪杆子才能改造整个世界”。

正如他們自己所說，他們的这些著名言論是什么战后年代无产階級和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經驗的表現，应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論和实践的基础。只是这种指南有一个无法医治的缺点：它絲毫也沒有告訴究竟一个党怎样引导群众去决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除此以外，中国的理論家們忘記一件“小事”，即他們所指的對“世界的改造”，將不是用枪杆子，而是用完全不同的手段来实现。其結果將只是世界各个角落中的不堪設想的毁灭。

列宁的下述話证明，把暴力的任何絕對化与列宁是多么深地格格不入。他說：“在一定的条件下暴力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和有益的，而在其它的条件下暴力則不会带来任何結果”。他还說：“暴力革命仅仅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刻，仅仅在一定的和特殊的条件下是革命的必要的和必然的因素，而組織无产階級群众，組織劳动者是这一革命的更为深远的、經常性的属性和它取得胜利的条件”。

中国首領們正是在这些問題上反列宁主义地修正莫斯科声明的企图，只是对工人階級的力量，对社会主义力量的小資产階級的不信任的表現。列宁曾經指出，对小市民來說，无产階級的紀律、細小的耐心的工作是如何格格不入，而假革命的急噪性是它所固有的。革命的詞句正好对中国領導人的政策來說是典型的。还在几年之前他們宣称，他們將在最短的时期內，在工业生产方面超过英国，中国將在世界第一个建成共产主义。当非现实主义地实

現这些目标沒有成功相反地造成許多困难时，他們沒有从中吸取教訓和受到教育，完全放弃了經濟竞赛和共处，今天并說竞赛和共处是修正主义思想。他們用新的革命詞句——用枪杆子改造世界，代替了爭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斗争。

可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什么都沒有像正好对革命詞句那样輕視。他清楚地知道，它的很大危險和它直接的陶醉力量在于什么，它对于那些小資产階級阶层和觉悟不高的人，某些时候似乎是具有很高革命情緒的一部份工人階級來說是很容易“接受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足够的經驗和力量不被拖上中国首領們力图强加于它的危險道路。这是一条冒险和分裂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們使用最粗暴的方式去歪曲其它党的观点，以便找到反对它們的借口。

我們同大多数兄弟共产党一致认为，对中国首領們的所作所为不能再无动于衷了。首先我們的党坚决拒絕他們对苏共、苏共領導的列宁主义政策和对赫魯曉夫同志的攻击。我們认为有必要重新明确声明，我們的党坚定地与苏共并肩站在一起，完全一致的观点将它同苏共联在一起，这种一致是任何东西都破坏不了的。在我們党之間存在坦率的、完全平等的兄弟关系本身，已是对国际派別分子对苏联共产党人所散布的所有侮辱和誹謗的有力駁斥。

值今天紀念列宁誕辰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高度评价苏联共产党人对革命理論和实践的发展的不容置疑的功勋。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复兴結論为制定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綱領性的文件奠定了基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世界革命力量的团結太宝貴了，它不能容許中国領導人不負責任地把它当作儿戏。我們完全支持苏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會議的建議，以便討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目前的状况和与

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并根据共同制定和通过的列宁主义的綱領性路綫巩固它的团結有关的問題。

（譯自 1964 年 4 月 22 日捷《紅色权利报》）

我們时代的主要矛盾和中国 首領們的民族主义理論(节譯)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共产党的成长、克服个人迷信制度的有害后果和残余、加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发展的影响——这一切給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世界革命力量成功地解决今后的任务开辟了新的远景。

在弄清楚我們运动的这些新前景以及用新的方式解决我們时代的主要問題的有利可能性之后，中国共产党領導人的理論观点和实践措施的危害性、冒险性和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了。虽然这个党的領導吹嘘自己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吹嘘在解决我們时代的主要問題时自己的階級态度，但今天越来越明显，中共領導人正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立場轉到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場上去。他們的关于自己忠于莫斯科文件的保证仅仅是一个烟幕，为了在它的保护下能够进行一系列对苏共，特别是对赫魯曉夫同志的誣蔑、侮辱和誹謗。特别是从1963年秋天开始，在发表的一系列專門性的长文章中，他們控告苏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世界各国人民。他們对苏共和苏联不共戴天的忿恨发展到肯定苏共領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苏联的政策和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一同是各国人民的死敌。

但是，厚顏无耻地想給其他人上关于具有階級性的无产階級

观点的一課的中国首領們自己却以小資产階級的民族主义代替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证明这一切的是：他們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藐視态度；对国际工人階級斗争的藐視态度；当两个基本的对抗性的階級（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在許多国家有着国家权力的时候，他們低估我們时代的主要矛盾——資本和劳动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矛盾，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資本主义之間的矛盾。忽視現代的主要矛盾，忽視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体系——之間的矛盾，必然会导致不正确地了解 and 解释其他矛盾的发展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形式。

与此同时，各共产党有理由认为，我們时代的主要内容是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新的民族向社会主义道路过渡的时代。中国領导人修正了声明的这一基本論点（它是制定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整个一系列其它理論和策略結論的出发点），中国領导人代替了这个观点而宣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集中了目前世界的各种类型的矛盾，这些地区都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国际无产階級革命的全部事业依赖于占世界絕大多数居民的这些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結果”。中国首領們就是如此說出了无产階級革命的观点！实际上这不是別的，而是与为了在人口众多的民族解放地区建立中国的领导权的大力煽动混合在一起的民族主义的激进理論。虽然煽动和各种語言上的裝飾能够作为一种为获得暂时的好感服务的工具，但是目前重要的是：真正的革命利益，不仅是国际工人階級的进一步的社会进步，而且也是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进一步的社会进步。中国的激进詞句只会掩飾解决民族革命和无产階級革命的方法。

在革命动力的問題上中国领导人的錯誤态度的实质是什么呢？

中国领导人竭力在“忽略”这一事实，即主要矛盾的发展，也就是两个世界社会体系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这一影响的程度是和两个世界社会经济体系之间的矛盾的发展程度成比例的。

当1917年帝国主义阵线被突破和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两个对抗性的体系之间的矛盾成为世界的基本矛盾，那时候这种矛盾已经开始对非社会主义世界的进程有着无比强大的影响，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起就已经使刚开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矛盾深化了。从这一事实出发，列宁强调：“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全世界国家体系内的特点，就是少数帝国主义民族集团反对苏维埃运动，反对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的和殖民地问题，哪怕这个问题只关系到世界上某个最偏僻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0—211页）但是，这种列宁主义的概念和解决一切矛盾的无产阶级的途径中国领导人是不能接受的。他们的反苏仇恨、自己的大国民族主义的野心、建立中国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的主观愿望（即客观上这些葡萄对他们说来挂得太高了）妨碍了他们这样作。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有一些国家和人民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两个体系之间的矛盾深化了，并越来越强烈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扩大（同时，这些矛盾内容的尖锐化并不必然表现在解决它的形式的尖锐化上）。当由于两个体系的經濟、科学技术和政治竞赛，社会主义力量在数量以及在质量上增长了的时候，这就是进入资本主义矛盾第三阶段的主要原因。对中国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来说，明显的是他们默默地避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阶

段這個問題，特別摒棄關於它是在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的條件下出現的思想，甚至於拒絕世界局勢發生了變化這個事實本身。今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宋慶齡在科倫坡發表的演講中指出：“一些人說世界局勢變了。但是他們提不出任何微小的證據來證明這點。”如果他們這樣估價世界形勢，他們又怎麼會簽署聲明的呢？

中國領導人忽視基本矛盾具體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首先是，他們低估基本矛盾對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鬥爭的影響。第二是，他們低估基本矛盾對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發展的影響。最後是，他們低估基本矛盾對帝國主義國家和為民族獨立而鬥爭的各國人民之間的矛盾發展的影響。

顯然，在非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勝利的內部條件是它和廣大的非無產階級群眾的聯盟，首先是和農民的聯盟。至於說到外部條件，中國領導人宣稱，民族解放鬥爭的發展對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的勝利是決定性的。他們的論點的弱點在於抽象；在於他們不願考慮現時代的特點；不願考慮世界革命進程現階段的特点，以及首先不願考慮世界被分成了互相對立的兩個體系這一事實。他們不願意考慮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產生和世界上的階級力量對比的程度。這就是在下述情況下他們必須承認蘇聯——共產主義的強國的客觀作用，自然，這種客觀作用不符合中國領導人對世界領導權的冒險主義的渴望。所以，據他們看來，世界革命進程的客觀基礎不是世界上的力量對比和蘇聯的威力，而是政治路線，縱然這一路線是十分主觀地和不考慮事實和規律而制定的。但是它要是毛親自制定的，他的思想總是勝利的！

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不考慮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群眾鬥爭的這種外部條件，像無產階級的國際專政的存在，主要是蘇聯的威力，這將是根本的錯誤。根據對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對比的錯

誤估價而確定作為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人民的主要同盟者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方向，使得國際工人階級活動的可能性縮小並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它們失去方向，因為它將使主要的打擊路線轉到不是歷史因素所確定的另一個方向上去。

至於第二類矛盾，即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中國領導人強調指出，從帝國主義者的直接的利益的观点出發，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比帝國主義者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更為急迫、直接和現實。毛澤東把戴高樂稱作自己最親密的同盟者，把帝國主義的法國稱作反對美國，甚至於反對蘇聯的民族革命力量不是偶然的。在同法國議會代表團座談時，毛澤東說：“現在有兩個大國想控制世界，他們不同任何人商量。難道他們問過戴高樂將軍和我嗎？沒有。”他還補充說，法國和中國不能允許這兩個大國在他們的頭上拉屎撒尿。在毛澤東對世界階級力量所作的這番分析之後，我們就更清楚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什麼。

據中國首領們看來，對帝國主義者來說，最急迫的，也就是確實現實的不是兩個對立的社会體系間的矛盾，而是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所以他們不僅把戴高樂，而且還把德國復仇主義者算到所謂中間地帶中去，按照中國的死板公式，阿登納甚至是反帝的民族戰士。只是我們不知道，根據什麼，中國首領們胆敢提醒別人提高革命的警惕性。

中國關於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最為急迫的論點，就其教條主義性質和肤淺性來說甚至超過約·維·斯大林在他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的類似論點。還在1952年斯大林的類似論點已經落后於發展和社會主義外交的需要，這是由於他們的論點都是抽象的、教條主義的。類似的斯大林的論點是社會主義國家積極的外交政策的障礙。因此今天機械地重復它以及忽視新的歷史時期的經驗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了。

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客观上肯定存在和正在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帝国主义者的直接利益来看,今天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比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更现实和更迫切。如果我们接受了中国的观点,我们将会低估在社会主义体系存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者的阶级“团结”,将会低估帝国主义狂人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军事冲突的危险。对苏联或民主德国来说,由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复仇主义的趋势,如果接受中国类似的概念就更危险。

上述中国的理论最终将会导致过高估计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潜力的可能性。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地看一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首領们来说是他們进行政治拍卖的全部货色,这就是帝国主义与正在争取民族、政治和经济的完全独立的各国人民之間的矛盾的问题。

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中国领导人今天把这一矛盾宣布为时代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矛盾的焦点,帝国主义鎖鏈上最薄弱的一环。由于这个原因,据说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任务。

认为“三个 A”的大洲,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是正确的嗎?绝对不是。

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补充:在现时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部分国家已从第一阶段(获得政治独立)轉入第二阶段(为经济独立而斗争)。但是,中国理论家們完全忽视了这些阶段的差别。所以他們同样不能够正确地去区分各种不同的国家(因为他們是按照大陆,而不是按照他們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斗争的水平来区分它們)。我們总归必須看到:那个大陆上的一些国家正处于第一阶段;但是另一些国家已經处于第二阶段。而且就是那些已經获

得了国家独立的国家也不能一概而論。在有的国家中是贊同帝国主义的資產階級集团掌握政权；在另一些国家中是反帝的民族資產階級掌握政权；在第三种情况下是以寻找自己国家发展的进步的、非資本主义道路的革命民主力量为首的人們掌握政权。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大洲的国家不是，也不能由于在这三大洲的大部分国家还没有解决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矛盾这个一般的理由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虽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机会強調：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引导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这三大洲的国家給予帝国主义直接的打击；它們也就是反帝斗争的主要力量。但是，中国的这些論证只证明了，中国领导人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完全不同。他們沒有根据列宁学說的精神把帝国主义首先理解为国家垄断資本主义，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后阶段；而是把它理解成外国行政式的軍事殖民統治的制度。据他們看来，必須用武器赶走帝国主义，这样帝国主义就将被击潰和被鏟除。因为中国首領們和他們的宣传家忽視帝国主义統治的經濟本质，以致于譴責两个社会体系的經濟竞赛，拒絕那些获得国家主义的国家发展的非資本主义道路，他們不願承认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旧制度的經濟措施的决定性意义。

中国首領們正是这样行事的。他們經常显示自己虛假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忘我精神。但是，又如何来比較他們把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小老板式的自夸和不久前毛泽东对法国議會代表团团长貝納尔的談話呢！他說：“如果美国人离开台湾的話，沒有理由他們不能成为我們的朋友”。如果只是美国占領台湾是中国大叫大喊地反对美国的原因的話，那么这不是中国领导人的反帝的階級立場，而是他們对中国一部分領土的占領者的民族仇恨。我們理解这种仇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能表现出馬克思主义

的态度。这一个例子也证明了，中国首領們沒有以列宁主义的态度理解帝国主义的压迫制度，所以沒有从階級立場上領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只是从民族主义立場出发。那么，我們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苏联政府拒絕把原子彈交給为了大国主义的分裂目的的中国領導人以后，中共領導就把苏联政府和美帝国主义者等同起来。显然，这里所說的是中国首領們的受到侮辱的民族自尊心和狂妄性。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些也能解释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在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中的作法。对苏共领导和苏联政府的許多誹謗和攻击也是淵源于中国領導人民族主义的仇恨。

中国首領們夺取領導权的努力

在今后世界发展中中国首領們的領導权問題在中共領導的計劃里起着特殊的作用。还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上邓小平在和苏共代表团的辯論中就已強調，說什么共产党中必須有一个党居世界革命运动的“領導地位”。当然，那时候他曾几次补充說：“居領導地位”并不是容易的。这只有苏共能这样作。可是，很久以前中共領導就已在考虑这一問題，当然今天中国宣传已在演奏別的調子。以前，对他們來說，重要的是坚持世界共产主义的“头目”的这种思想。在現时代，一切都证明了，他們认为居“領導”地位的时机已經成熟了（至于說到，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顛覆活动以誰为首，那么，在这方面是沒有分歧的，中共領導确实站在分裂活动的前列）。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可以更仔細地注意一下中国領袖們的邏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年2月4日的文章中写道：“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个或者那个国家

的无产階級及其政党走在这一运动的最前列。英国的工联运动、法国工人的政治斗争曾先后处于各国无产階級运动的前列。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德国工人处于斗争的前列。在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处于国际无产階級运动的前列。但是，就是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

这里我们抓住了事物的核心问题。不久前已经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不是偶然的。这一论点旨在表明世界所处的条件改变了，旨在表明革命的中心已转移到东方，具体地说已转移到中国。为了证明革命的中心已转到中国，他们不惜挑衅性地滥用列宁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那时候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在先进的欧洲当权的是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欧洲才是先进的。列宁自己这样来阐明了这种说法的含意：“怎么？这是不是說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从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发出光辉呢？恰恰相反。这是說，东方已完全走上西方的道路，今后又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3页）这是对欧洲和亚洲革命力量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的、阶级的和革命的估价。

在列宁强调当时还在欧洲和亚洲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主的反动作用的同时，中国的宣传家们却放弃了阶级立场，他们开始用大量的恶毒语言把“如此”亚洲的先进性和欧洲的落后性对立起来。例如，金少和曾这样来评论列宁的文章：“由于亚洲、首先是中国人民的觉醒，世界上出现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种局势”。这种非阶级的、种族的、可以说是大洲性的理论是各个中国领导人实际政策的纲领，他们企图把亚洲、非洲和一切白人隔绝起来，企图把苏联的领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等从亚洲组

織中排擠出去。

中國領導人在奉行自己的民族主義和大國主義路線的同時，在一切國際組織——在工會和和平運動中，在青年、學生、新聞工作者等組織中進行了狂熱的活動。同時，企圖在種族的、區域性的基礎上建立宗派組織。為了在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以及在各個黨中建立中共霸權的目的，他們竭力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內加強政治、組織和意識形態方面的破壞活動。在那些地方他們所施展的手腕不成功時——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此——他們就使用最惡劣的托洛茨基的方式和方法，以便至少是阻礙共產黨和民主組織的工作。就像古代的一種野獸一樣，它企圖攫取它所能攫取的一切東西，它不能攫取到那種東西時，就企圖用誹謗和謊言這些髒東西來污染它。中國的代理人和奸細的行動對帝國主義者來說，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中共領導的行動正在挽救已經處於非常困難和在許多方面已失去了希望的帝國主義者。

蘇聯共產黨和同它一起的其他兄弟黨作了巨大的努力，以便使中共領導放棄他們的不良行動。它們曾幾次努力停止公開論戰。中國首領們用惡毒的格言回答了這些努力：如果繼續論戰，天掉不下來，草和樹木將照常生長，婦女將照常生孩子，魚仍將在水中游來游去。由於中共領導繼續進行攻擊和誹謗，已經必須要公開回答它的挑釁性的誹謗了。

我們同蘇聯共產黨認為，需要最強烈地譴責中共領導在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中的路線，並拒絕他們的非共產主義的觀點。在目前的局勢下只有這樣才能反抗中共領導破壞世界革命運動的托洛茨基主義—宗派主義的企圖。

（譯自1964年第5期捷·新思想雜誌）

战斗的国际主义和内部 团结的节日(节译)

《红色权利报》社论

没有比加强劳动人民的团结更为神圣的任务了，在这里团结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着最紧密的联系。这种团结是建设新世界的基础。这种团结是反帝革命取得成就、伟大的变革(它是我们时代的内容)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不论在怎样的词句的掩盖下，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也加入到了那些破坏国际团结的人们的行列之中。他们对苏共及其它兄弟的共产党的攻击，他们对领导权的欲望及大国民族主义，在无限地损害着国际无产阶级、全体劳动人民和正在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各国人民的事业。

他们对今天的主要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样使各国人民感到愤怒。在当前的条件下，什么也没有像玩弄革命词句和与希望通过战争进行革命相联的冒险主义方针这样有害。

(译自1961年5月1日捷《红色权利报》)

将会来的……！（节译）

伊瑞·弗拉涅克

遺憾的是，在这个条約上一直还缺少人民中国的签字。遺憾的是，我們盼到了五一，但在五一前中国领导人弄錯了对象，不是对帝国主义，而是对苏联开动了宣传火力。人們問，原因何在。爭吵的中心点在于，这些中国的领导同志在开初所要的伎倆之后，拒絕接受一切新的、复兴的和非常生气勃勃的思想，苏联共产党历史性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我們首先热烈地討論了这些思想。他們不是这样做，而是做了个人迷信的辯護士，并按照这来行事。

他們目前的政策（这是运动的过去或者是运动的被揭露的和受到譴責的部分），为了拚命地維持着生命，甚至不惜同各种职业的破坏者称朋道友。但是过去是不会取胜的！不管这将进行得如何艰难和复杂，有朝一日，我們同样又会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的同志般的团結之下，在活跃的和卓有成效的团結的气氛中庆祝“五一”。

（譯自1964年5月1日捷《紅色权利报》）

誰正在走上分裂的道路

弗朗基舍克·哈夫利切克

从分歧走向彻底的修正和分裂

这几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各个共产党的原则性的理论学说和实践活动进行了批评，而这些共产党是在共同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文件——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活动的。最近中共领导对兄弟党、特别是对苏联共产党所进行的攻击更带有特别辛辣的性质。

早在去年7月，我党中央委员会就在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总路线的建议的声明中确认，中国领导人在随心所欲地和错误地解释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件，他们以自己的路线来代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战术原则，并力图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其他党。我们曾明确地谴责了中共领导对苏联共产党列宁主义政策的攻击，并且指出，中共领导正在利用煽动和诽谤来破坏苏共和苏联政府政策的声誉，中共领导自以为拥有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的专利权，实质上他们是在歪曲和拒绝宣言和声明。

我党中央委员会同苏联共产党一起曾几次呼吁中国同志停止公开论战，努力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尽管兄弟的共产党表现出了最大的善意和耐心，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共领导的罪过，他们同我们的分歧大大加深了。如果中共领导的立场同多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有明显的不同，这今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领域内已经不是唯一重要问题了。因此，在今年四月十

二日公布的捷共中央声明确认：为了自己的霸权的目的，中共领导人制訂了意識形态的綱領，这个綱領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綫的总修正。

目的和方法

在世界革命运动内部組織分裂的道路上，中国的首領們最早是伪装着保证自己忠实于莫斯科的文件，但是，今天他們自己已經公开地要求修改宣言和声明中的某些論点了。

中国領導人在今年3月31日《人民日报》的編輯部文章中写道：“必須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的……。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問題的提法有必要稍加修改。”虽然他們曾經两次签名同意了关于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各种途徑的可能性的論点，但現在却又在这篇文章中几次強調說：武装起义是每一个革命的絕对的規律。由此可見，不是国际工人階級爭取自己解放的斗争經驗和某一国家具体条件的分析，而是毛泽东的枪杆子出政权的論点应成为各个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和战术的出发点。

中国首領們和他們的追隨者甚至对苏联共产党建設共产主义进行指責。据說，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进行共产主义建設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相矛盾的。还說，当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全世界完全胜利的时候，当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和平是没有保证的。如果和平没有保证，那末，共产主义建設的計劃据說就是不能正确指导革命运动的主观主义的計劃。

什么是中共領導的反列宁主义方針的实质呢？否认社会主义

体系对世界发展进程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所持的蔑视态度，将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阶级相对立起来。这就是他们在对外政策中的冒险主义和保持及增强冷战气氛的企图；过低估计原子战争的后果。还有在革命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捍卫和运用受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谴责的个人迷信系统的方法。最后是为国际共运和各个党内的派别斗争辩护。

什么是中国首领们的特殊方针的战略意图？这便是努力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服从他们的利己主义的大国主义利益，为了这种自私的目的，他们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所有基本点，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并对苏共和苏联，对大多数共产党，对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久经考验的工人阶级的领袖使用最恶劣的煽动和诽谤。

特别是《人民日报》的这篇声明对苏联的憎恨达到了高峰，声明说：“苏联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性质……由于实行了一系列的对内的和对外的错误政策，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在所有生活领域内——在政治领域内，在经济领域内，在文化和思想领域内开始泛滥起来……”这种完全与苏联生活实际情况相矛盾的说法是一种诽谤，中国首领们所进行的诽谤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教师们。如果说他们现在正从这种诽谤走向直接的分裂活动的话，那么，这已经是按他们的逻辑而采取的路线。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国主义的计划，他们竭力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力图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正如我们还要谈到的一些具体事例那样，他们利用革命运动中的各种变节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徒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情况和估价中国首领们的分裂活动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声明中确认：**中共领导越来越远离马克思**

思列宁主义，現在他們把破坏革命力量 and 在北京建立宗派主义的
中心当作自己的任务。

中共领导以对待較好事情的那种努力去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和各个党以及民主組織，但是在革命运动中，宗派主义者和破坏
分子有着最坏的名誉，很自然，中国领导人必須把自己进行分裂活
动的罪过推給別人，同时把自己扮成拥护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角
色。

在今年2月4日发表的題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
义者》的文章中說：“中共对于維持和加强社会主义陣营团結和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事实(除了誹謗，
他們什么也沒有做。——弗·哈夫利切克注)完全清楚地說明，苏
共领导是分裂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社会主义陣营和分裂
許多兄弟党的創始者。”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是在賊喊捉賊！但
是，为了使我們不只是停留在單純的，但是真实的結論上，那我們
的任务就是把我們和中国的观点同真正的现实、同事实作一番比
較。这将最好地說明，这几年来誰在竭力从思想上和組織上来破
坏共产主义运动，誰在破坏各个共产党相互关系之間的准則。

中国对弗·伊·列宁九十誕辰的“貢獻”

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分裂活动已經“庆祝
过”第四周年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領袖和导师弗·伊·列宁
的九十誕辰被利用来作为这种活动的公开的开幕式。中共中央委
員会为这个誕辰出版了包括三篇文章題为《列宁主义万岁！》的专
集。利用列宁的誕辰以及那几篇旨在反对苏共第二十大和1957年
各国共产党《宣言》的文章的內容的整个性质是一顆不祥的种子，
随着時間的推移，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群众組

織的队伍中的大規模的宗派主义活动就从这颗不祥种子成长起来了。

这一事实充分地說明了中国的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的性质,即:正是在这本小册子里宣布了这种挑衅性的論点,說在牺牲大部分人类的世界热核战争以后,人們将会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很快地建立起更加美好的未来。各个共产党坚决地駁斥了和譴責了这种热核战争的“优越性”,并且憤怒地拒絕了它。

中国领导人不断強調指出,說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开始論战并不是他們的罪过。这个問題就能回答了:誰在当时开始了論战,誰出版了反对1957年《宣言》和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新阶段的开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苏共第二十大的主要結論的《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

中共领导利用了1960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会理事会會議。中共领导想通过世界工会的決議把自己不正确的观点、特别是关于战争和和平的观点推广到世界上来,他們还想通过工会运动来攻击其他共产党。中国首領們要求在工会的文件中批評那些拥护和平和裁軍的人,等等。他們要求把这种修改也列入报告,尽管这个报告已經被世界工会理事会秘书处和当时在这机构内的中国代表所通过。

为了影响世界工会理事会的會議,中共领导邀請了某些领导人吃晚飯,在吃晚飯当中,中共总書記在事先沒有宣布的講話中攻击了其他的共产党,特别是攻击了苏共和十七个西欧的兄弟党。那些出席的工会工作人員回答得好,他們說他們是世界工会的干部,中共领导如果要反对这些和那些共产党的話,最好是通知这些党的领导。仅仅是由于工会领导干部所持的坚定的和原則性的立場,中共领导的宗派主义的企图才遭到了反对,工会理事会會議才在反对中共领导利用世界工会的企图中胜利地結束了。

为了巩固各个共产党的团结和消除在当代许多原则的问题上的分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聚会在一起，讨论了国际局势的迫切的问题。会议的参加者通过了关于会谈的公报，并且强调指出，国际事件目前的整个过程都充分地证明了《宣言》和《和平宣言》中所包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正确性。会议的参加者强调了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结论的完全有效性、在现阶段消除战争的可能性和各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形式。与会者有责任继续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团结。

三十八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参加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他们也一致赞同了公报。

但是各国共产党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不仅只证明了《宣言》和《和平宣言》的正确性，而且还看到了继续丰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思想宝库的必要性。因此达成了1960年年底在莫斯科召开所有共产党的会议的协议，来讨论和通过各共产党的新的共同文件的草案，这个草案将总结新的变化的结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的三年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出现了新的问题，对于这些都需要作明确的和原则性的回答，需要说明世界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过程，需要向劳动人民指出他们的前景。

来自世界各个部分和革命斗争各个区域的几十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集体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必须说明的是，为了克服中国代表团无穷无尽的保留意见和准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声明》草案，这些领导人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并且要有耐性。这个文件以新的、重要的结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出并强调了用新办法来解决人类进一步发展的一系列的非常重要问题的可能性。而中共领导正是以沉默来回避这些方面，他们否认它们的普遍性，攻击那些在工作中遵循这些

結論的共产党。

中国领导人伪善的行徑

这几年来，中共领导特别指控苏联共产党为修正主义，指控它背叛了共同通过的文件（1964年3月31日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制订《声明》中正是苏共起了主要的作用，而中共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制订纲领中却起了阻碍作用，直到自己发现完全孤立的时候，才签署了声明。

这一点说明了中共领导对待这个文件的态度，虽然他们发誓说自己忠实于《宣言》和《声明》，但是他们却向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自己的包括二十五点的“新的”总路线。如果已经有了《声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需要新的总路线干啥呢？这样，尽管中共领导指控其他党背叛共同的共产主义文件，而实际情况是他们自己不承认这个文件，践踏了自己签署的，但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文件。在《声明》上签署，对于中国的首领们来说，只是摆脱困境和孤立的出路，只是政治欺骗的工具。

中国首领们利用莫斯科会议的秘密性质，在世界面前歪曲地宣扬自己在会议上的活动，指控其他党背叛《声明》。因为中国首领们自己破坏了莫斯科会议的秘密性质，因为他们完全歪曲会议的过程，在颠倒黑白，所以最后有必要来揭露他们的非共产主义的行径和谎言。

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向把自己当作《声明》的最彻底和最忠实的捍卫者，但事实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想把自己特殊的路线、至少是自己的解释强加到这个文件里去。在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的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的编辑部文章中就直截了当地谈到了这一点。文章写道：“一九六〇年莫

斯科會議的整個過程中充滿了兩條路線的鬥爭。”

這一事實首先證明了中共領導有着自己的路線，這就是在當時（正象他們自己所承認的那樣）他們已經否定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開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新階段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意義。在上面提到的1963年9月6日的文章中寫道：“關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問題，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問題，雖然我們都是有不同的意見的，可是我們同意在聲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關於這兩個問題的文字。”

但是如果沒有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就不會有《宣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不會根據這次代表大會的結論來制訂出這條路線。是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誠然是一個黨的代表大會，但是它的關於國際形勢的分析，和關於在當代消除世界戰爭的可能性、關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關於各個國家間社會主義過渡的多种形式、關於工人階級達到行動一致的有利條件的結論，有着原則性、世界歷史的意義，超出了一個黨行動的範圍。因此，各國共產黨歡迎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歡迎它對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所作的批評，歡迎作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伟大復興起點的這次代表大會的新立場。

中共所採取的不同立場和這種立場的嚴重性正好在於：它攻擊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開始的復興的變化。如果中國領導人力圖拒絕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結論和扭轉由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開始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那麼，我們明確地聲明：不能離開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路線，只能根據歷史條件的發展使這一路線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但決不能用中共的特殊路線，民族主義的、宗派主義的、冒險主義的路線去代替它。

中共中央代表團反對譴責宗派主義的活動，絕不是偶然的。他們在上述文章里就寫道，由於他們的功勞，才拒絕了關於在共產

主义运动中反对宗派主义活动必要性的論点。同时他們又強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必要性，当然，現在可以看到，这里指的是在他們特殊的民族主义概念的基础上的团結。中共这条特殊的路綫是他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宗派主义活动的基础。

因此，中国领导人是否将再繼續进行宗派主义活动的这个問題，使各共产党的許多领导人感到不安。中国领导人的立場是他們想繼續进行宗派主义活动的证据。中国领导人为了在會議以后能够繼續在国际群众組織——工会、妇联、青年等組織的内部进行分裂行动，他們的行為是无原則的，鬼計多端的。早在1960年11月，非洲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就声明說道：我們了解那些具有托洛茨基性质的人的活动，这些人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是沿着改良主义路綫走的，认为苏联背叛了革命的利益。他們想以自己极端革命的詞句来迷惑群众。因此，我們必須注意随时反对中国领导人的立場。

正如历史进一步的发展表明的那样，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的担心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理論家們在認識論方面的詭辯术

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领导的立場陷于完全孤立，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出版了包括有两篇談真理的全面性和真理发展过程的专文的《紅旗》杂志第21期和第22期合訂本。文章的思想是想证明，大多数的共产党同中共和他的領袖毛泽东的分歧是在于：大多数的共产党不是全面地和“两方面地”，而是片面地分析我們时代的重大問題。由于这个原因，据說其他共产党的結論也是不正确的，而現在客观现实的发展和他們的認識将证明，真理属于誰。

在《論真理发展过程》这篇文章中带有这样的意图写道：“我們不能作出結論：凡是許多人承認的便是客觀真理，例如各種宗教的概念，關於存在着上帝的說法，曾經被許多人所承認，難道能說它們是客觀真理嗎？相反，某些科學真理在開始的時候，往往只被少數人所接受，遠不及那些已經流行的謬見普及。哥白尼關於太陽系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曾經被看作是錯誤的東西，但它們擊敗了各種進攻，最後才取得了人們的公認……。如果一種學說同客觀實際不符，儘管它暫時地被多數人所承認，也決不是真理，它的虛偽性最終會被社會實踐的發展所揭穿，而在群眾中破產。”

中國的哲學家們借助於這種比擬來偷換研究的對象。他們拿現代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結論同宗教的概念相比，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的覺悟和科學的認識都被置於落後人們的偏見之列。根據哥白尼和達爾文的認識的科學正確性的歷史事實（他們是反對未覺醒的群眾的），中國哲學家們想喚起人們這樣的印象，就是，今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根本就沒有掌握真理，而掌握真理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即使他們是被孤立的。

中共領導和它的宣傳家們如何對待作為真理的標準的實踐這個問題，在這裡特別值得注意。如果馬克思主義者談到作為這些或那些科學結論的真理性的標準的實踐的話，那麼他指的是人類實踐的總和，他不僅強調未來的實踐的意義，而且也強調過去和目前的實踐的意義。但是關於作為人類認識標準的實踐意義的列寧主義原理，被中國領導縮小到僅僅是未來的實踐，說什麼只有未來的實踐才會確認或推翻這個或那個論斷。因此他們在1960年11月就要求把爭取避免和從社會生活中排除世界戰爭的鬥爭問題，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各種形式的可能性等問題從議事日程上去掉，因為只有未來對這些問題才能給予答案。如果我們考慮到這種要求的結果的話，則意味着，我們今天就不能夠對我們的鬥

爭的任务有任何真理性的認識，而只有将来才能获得这种認識。但这样，就要把对迫切問題的解决无止境地推迟下去，因为可以一次再次地提出由未来的实践验证一定論点的要求。

自然历史将会提供新的材料和新的事实，这些材料和事实的总结将补充和加深正确的馬克思主义的学說，并使之精确化。真理是一个过程，它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并用新的真理使之具体化。但是正象列宁所指出的，不能把实践的准则絕对化起来。“实践的准则是出自于事物的本性，实践的准则从来也不能够完全证实和完全反駁任何人类的概念。这个准则是如此‘不一定’，人类的知識是不允許它变为‘絕对化’的，可是同时它又是如此一定，它不調和地粉碎所有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变种。”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等待实践证实或推翻某种思想的要求，是他們对解决当前的迫切問題采取的詭辯态度的又一实例，簡而言之，他們想为自己爭取进行教条主义和派別活动的時間。

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是动員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为在全世界建立永久的和平和进步的胜利而斗争。因此，他們不能消极地等待，是否要发生世界大战，或者是否实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因为各共产党的結論本身就包含了作为真实性的的重要因素的各共产党的积极、鼓动和組織工作。

自然，我們也并没有把例如通过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論点絕对化，我們是努力把现实的可能性变成事实，这就需要借助于人們积极的行动。但是，中国首領們在各个共产党內和許多群众組織內以自己的宗派活动进行破坏这些組織的活动，妨碍了爭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他們的宗派主义观点和他們想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力量和民主組織分裂的宗派主义活动的极其大的危害性就在于此。

况且我們的任务是保护和捍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革命

力量的團結。揭露中共領導的派別活動的具體事例，是爭取我們的運動的真正團結，即基於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之上的團結的鬥爭形式之一。對他們的錯誤觀點默不作聲，不談他們的派別活動的真實情況，則意味著無限地損害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則會阻礙我們勝利前進。

這樣做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中國領導人遠遠不能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人類絕大多數最終會理解他們的真理的預言為滿足，最主要的是，他們實際上在進行破壞各個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活動。他們在被各國共產黨開除出來的人中間收買自己的信徒，用極端革命的教條主義的詞句竭力把小資產階級的激進派拉到自己一邊，並利用他們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把托洛茨基分子、冒險分子和道德敗壞的人拼湊成各種宗派主義集團，並說這些集團代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這點就已經說明，中國首領們並不太相信自己理論的效力和說服力，他們更多地依靠對進步力量的誹謗和破壞。

中國煽動者的分裂活動的實例

在1963年8月澳大利亞共產黨開除了這個黨的領導成員埃·弗·希爾，原因是他進行了宗派主義的活動，違反黨章和拒絕執行黨的決議。9月25日在墨爾本舉行了有幾個希爾門徒參加的會議，通過了三個決議——除其他以外，有《關於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是一個大騙局決議》。《人民日報》詳細地刊登了關於這次會議和它的決議的消息。11月底，希爾集團公布了《澳大利亞共產黨人宣言》。《宣言》對蘇共和澳共進行了一系列的攻擊，並對中共領導和希爾的活動大加吹捧。因為根據希爾的看法，澳共已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了，所以他宣布自己為未來馬克思主義澳共

的核心。

澳共政治局声明在关于希尔的这些野心的部分中說道：“这个新的‘党’将由希尔和一小撮叛徒組成，这些人背叛了共产党，他們想把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綫强加于党的企图遭到了可耻的失敗……。这个集团的目的就是分裂，它們的基本立場就是攻击和企图瓦解党的队伍的立場。这个集团在工人运动中不能起积极的作用。”澳共政治局声明譴責了中共干涉澳共內部事务，声明說：“中国共产党由于公开地干涉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內部事务，粗暴地玷污了自己的荣誉，它現在仍在鼓动和支持希尔并公布他的謊言。”

希尔分裂集团在中国的帮助下正在出版机关刊物《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希尔本人对苏共和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誹謗。他在电视演說中宣称，苏联已經“完全放弃共产主义了，它已經对社会主义沒有很大兴趣”。不久以前，周恩来在北京机場欢迎了希尔，中国宣传家把他称之为澳大利亚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主席。

在阿根廷，一些早就被阿根廷共产党开除出党的某些托洛茨基集团和分子支持中共的路綫。这就是：号召自己的追隨者支持“中国同志二十五点”的托洛茨基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同声附和“中国的世界共产主义总路綫”建議的叛徒集团；反对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托洛茨基集团；最后还有因苏联执行和平政策而加以反对的托洛茨基集团，因为他們认为，“只有在所有国家中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才能够阻止世界大战”。这些集团在中国的帮助下正在出版一系列反对苏共和阿根廷共产党的材料。此外还有許多刊物直接从中国运送到阿根廷来。尽管邮局沒收馬克思主义的刊物，但是它并不反对散发这类的刊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智利共产党內尽最大努力制造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智利中国友好协会和某些其他組織

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全部話几乎都是用来攻击智利共产党，贊揚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奉行的路綫。中国的领导人們从智利社会党的内部开始了自己的活动，特别是反对薩尔瓦多·阿伦德，他是人民行动陣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是受到智利共产党支持的。

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阿尔巴尼亚駐維也納公使館的工作人员巴尔卡斯和奥地利共产党以前的成員斯特劳布尔正在建立奥地利“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小组。他們通过出版《告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传单开始了自己的活动。传单的内容是反对党的领导，捍卫中共的“总路綫”（二十五点）。以后他們又出版了由“奥地利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临时领导”的成員斯特劳布尔签名的《給党员呼吁书》，其内容反对揭发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在瑞士，瑞士劳动党以前的某些成員“建立”了“新的瑞士共产党”。1964年1月，这个集团开始出版新聞公报《火花》，它以鮮紅的封皮为“新党的革命性”的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人还在以下許多国家执行自己的使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芬兰、意大利、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魯、美国和錫兰。他們活动的内容，目的和方法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他們攻击的主要目标特别是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和平共处政策，他們挑衅性地把在各个国家的武装斗争問題和世界革命問題当作是争取和平斗争的主要道路。他們的活動方法也是从托洛茨基的軍火庫中撿来的。

中国首領們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計劃的規模是巨大的。1963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委員周揚在中国科学院的會議上強調建立中国理論家和宣传家的强大队伍的任务絕不是偶然的。“这是个既紧迫，同时又具有长期的战略性意义的任务”。他宣称，到处人們总是把自己增长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以及那些正真的馬克思

主义小组和个人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据说就必定要出现真正代表革命的政党。

从这些话里不难看出，他是想从理论上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宗派主义集团找根据，然而，实际上，这些宗派主义集团的出现并不是由于革命过程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是由中共领导和他们的代理人的分裂活动所造成的。为了中国首領們的战略计划，应当为远景为五十至一百年培养合式的理论和宣传干部。

爭取和平的斗争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相对立嗎？

中国领导人对他们在民族解放运动队伍中的活动寄予特殊的希望，首先是想利用民族解放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力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分立的工会、新闻和体育等组织，使这些组织与国际组织对抗。为此目的，较长时期以来他们就提出了种族主义的口号，例如白人是白人，有色人是有色人；只有亚洲人、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彼此是亲近的，因此他们能够相互了解，而白人不能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问题。

中国领导人强烈地反对和平共处，反对逐步削减核武装和全面彻底裁军的政策。他们为了迷惑三个都是以“A”开头的大洲的人民，教条主义地把争取和平、裁军和民族解放斗争问题对立起来。

即使中国的领导人想通过自己的分裂行为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国际组织中制造一系列的困难，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常常产生与中国领导人所期望相反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斗争的大会成为各国民族解放运动青年干部的政治学校，很多来自民族解放斗争区域的代表已经能识别中国观点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性质。很多时候只有中国领导人从北京带来的各国

人民的“代表”才拥护中国的观点。

因此，在非常困难条件下为反对法西斯种族隔离制度而斗争的南非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声明中说道：“我们，南非的居民，象其他所有的为争取非洲自由的战士一样，理解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声援以及给予我们的道义上和实际的支援的伟大意义……。最新历史不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所有说什么苏联或者和平共处政策和裁军的要求损害了殖民地和以前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或者阻碍了这个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的捏造”。

普遍裁军不仅会解除人类灾难性的核战争的威胁，而且特别会帮助民族解放运动打掉帝国主义者手中的武器。争取裁军运动并不损害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而是损害制造最新式武器并且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者们的利益。

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不是孤军作战的，它依靠着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支援。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成绩以及最终胜利的保证，其原因就在于所有反对共同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和进步的力量们的合作和相互支援。因此觉悟了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员反对中国领导人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孤立于资本主义国家进步的反帝运动之外。

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声明中明确地谴责了中国领导人的根深蒂固的错误和有害的路线以及宗派主义的活动。并且强调指出，观点只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通过的莫斯科文件的基础上接近。我们的党象绝大多数兄弟党一样欢迎苏联共产党公布的文件，并且完全支持包括在文件之中的观点。我们深信，在目

前情況下，我們只有通過公開揭露和批判中國領導人不正確的观点才能夠象防止他們企圖使民族解放運動孤立于其他革命力量之外一樣，來防止中共分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的企圖。

儘管中共領導以其派別主義的行徑已經走到了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的邊緣，宣揚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完全背道而馳的观点，但我們在力圖尋找消除分歧和防止國際共運分裂的途徑。當然，為爭取消除由中共領導引起的深刻的分歧而進行的鬥爭將是長期的、艱巨和複雜的，尤其因為很明顯地中國領導人想繼續捍衛自己的錯誤路線和開展派別活動。尤其是因為我們必須同其它各國共產黨一起並同蘇共並肩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捍衛共運的一致和團結，捍衛所有為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力量的團結。

我們表示過擁護召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國際會議，應該對當前的基本問題作出判斷，並確定借助于它我們將為維護和加強各國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團結而鬥爭的手段和方法，人民群眾的利益，反帝、爭取鏟除一切剝削和壓迫、爭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勝利的鬥爭利益，迫切地要求加強這種團結。

（譯自1964年5月5日捷《紅色權利報》）

不体面的干涉方式

楊·沃依吉克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已在去年二月事件十五周年的时候，向我国驻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机构的一些代表寄发了“贺信”，信的内容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情况的独特的评论。

这指的是对苏联共产党的众所周知的指责，指责它是修正主义，背叛宣言和声明的原则（让我们提醒读者，在《人民日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这些文件成为了首要的批评对象。说什么中国领导人——正如他们现在所断言的那样——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某些论点，但是外表上没有表现出来，而是签署了文件，因为他们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它党自己也将放弃这些论点。自然他们所指的首先是对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及其对国际革命运动的结论的评价），破坏运动的团结。信同时把我们党的地位描写为，好像是由于“修正主义领导”的罪过我们才陷入从属于苏共的地位。信的意思就是号召去反对这种从属关系和保证中共和中国人民（信代表他们讲话）将站在我们这一边，帮助我国人民进行“反对一切强奸独立和主权原则的外国影响”的斗争。

我们对这种不能容许的“联络”方式曾表示了不同意。对我们的抗议的答复是“简单的”；说什么这是捏造。

但是情况表明，这些“捏造”在继续履行着自己的可疑的作用。“中国人民对外文化（?!）联络协会”重又发言了，重又以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名义，在今年值苏军解放我国十九周年之际发出了新的“贺信”。

在信中担保，说什么我们党的领导在对中国的关系中被迫采取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愈来愈触犯中共。据信所说，由于我们要求召回中国通讯社的代表、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中国大学生，从而犯下了“高度挑衅性的行为”。

但是在这封信中，（它的作者在其它段落中对我们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我们的主权表现了感动人心的关怀）缺少对这种事实的解释。在这封信中毫未谈到，正是中国当局的工作人员的粗暴挑衅，才迫使我们采取这些步骤。我们确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容许任何人触犯我们的主权。

整个信相当长，并重复中国文章中常见的说法。尽管如此，我们愿意引用它的最明显的几段，形象地说，以便每个人能够判断通过这样不寻常的途径向我们推销的货品的内容和包装的真正价值。信的作者向我国代表机构的代表们硬说什么捷共对他们“恶意地掩盖真实情况，不加区别地压制关于中共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的报道（这种态度曾在去年6月14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中阐述了，而这封信曾于去年7月15日在我们的报纸上全文登载——对此中国的批评家们是能够知道的）。因为你们的首领们在大国沙文主义的统治下被迫重复来自莫斯科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歪曲消息，我们认为向你们介绍情况，指出由于你们奴隶般地跟随赫鲁晓夫集团的明显企图而产生的严重危险，是自己兄弟般的责任（！）”

但是，正如上述话最终表明的腔调，这种“介绍情况”具有特殊性质。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的泛滥”而受到严重威胁这种说法，是作为出发点的论点。据中国作者看来，何处隐藏着这种“泛滥”的根源？

“最近几年来的事件表明，”他们回答说，“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首领们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最大的分裂者。在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間，苏共首領們形成了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从这时起，他們就力图把它强加于各个兄弟党。他們違反了兄弟国家关系所遵循的原則，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从而破坏了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

你如果想找到这些荒唐的說法的根据，是枉費心机的。归根結蒂，这属于中国論战者們的慣有的“风格”，他們常常用指責来代替分析。喋喋不休地重复，說“有人”要求他的話具有“圣旨”一样的效力，但是实际上他們自己所要求的决不是任何別的东西，他們的写法就好像他們的結論是現代聖經的圣灵的真理一样。

在一个地方誹謗的作者透露：

“苏共的首領們，”他們繼續說，“以国际劳动分工的名义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設社会主义和在独立的基础上发展他們的經濟的政策”。

謀求社会主义国家最大效果的經濟合作的努力，用依据合理的劳动分工、利用每个国家的資源去发展各个国家和有利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来抵制資本家的国际联盟这种努力——据說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用这样的“論据”来为局限性的民族主义态度找根据，同时从这样短見的态度去指責別人，只能令人奇怪。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間的經濟合作——然后在实践中綱領性地削弱这种合作——同时并要求共同利益和对国际主义的忠誠，对此的确需要惊人的宣传“胆量”！信的作者——正好从中国方面听到这点，这有些奇怪——甚至談到“封建关系”和“封建专制君主純粹的、簡單的思想”。

当然，“介紹情况”不是唯一的目的。信終于是相当直截了当的：

“尊敬的同志，”他們在自己的号召結尾時說，“我們相信，當你們仔細考慮事實的時候，你們將同意我們的立場是唯一正確的，由於蘇共首領們的分裂企圖，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團結和革命覺悟處於嚴重危險之中”。

這就是使中國人士這樣不安的我們黨的“團結和革命覺悟”。我們會馬上看到，究竟什麼妨礙我們尊敬的批評家們和他們希望我們今後怎樣發展。讓我們再來看信本身：

“不久前所有兄弟黨還認為捷共是東歐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堡壘，這正是你們應引為驕傲的事實。但是最近時期以來，你們的首領屈服於赫魯曉夫之流的壓力，你們黨內的進一步發展使中共和其他許多兄弟黨十分不安。我們大為吃驚的是，在安托寧·諾沃提尼領導之下的捷共竟允許它被引導到做出那些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不相容和違背你們的光榮歷史和傳統的行動。正如你們自己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所知道的，包括肆意解除忠實的同志黨內負責職務、為反黨的罪犯恢復名譽和使他們重新登台的行動，必然使曾經是繁榮的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政治和經濟混亂，從而為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幫大忙”。

我們所引用的片段，幾乎不需要特別的評論。教條主義的邏輯是很明顯的：只要對絕大多數共產黨表示贊同，負責地對待——和中共不同——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概括的歷史經驗，拒絕個人迷信，繼續鞏固同蘇聯的友誼和支持審慎的和平共處政策，我們的國家必然瀕於復滅之中。不同意中共領導人甚至於就等於為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服務。

信的結論，很難說它是純粹的挑釁、不利地影響我國事件進程的粗暴企圖，還是由於不可控制的盲目性而產生的極端幼稚的表現。中國宗派主義者的邏輯以直接的呼喚達到頂峰：

“作為你們黨和人民負責的和有影響的代表的你們，應該行動

起来的时候到来了。在即将到来的全民选举中，你们必须努力使那些坚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被选入你们的国民議會、各級人民委员会和你们的法庭”！

这确实是駭人听闻的！按照中国的概念，誰是这些“坚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中国鼓动家們願意看到誰在我們党内和我們国家的领导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呢？看起来，他們失去了判断力。

对苏共、对列宁的党和国家的友好关系，我們过去、現在和将来都繼續把它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坚定性的最重要的准绳之一。列宁的党过去和現在都对各革命政党之间的国际主义关系贡献最多。我們繼續把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实际努力（不是仅仅是口头上的努力），支持世界上的革命运动和以自己的榜样证明共产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作为这种准绳。

信的作者还利用我們这里的一些受到党的批評和党坚决摒弃的現象进行投机。他們为自己的深远的理論和起来“保卫列宁主义的純洁性”，以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名义干涉其它党的事务的“权利”寻找令人討厭的“論据”。他們力图用一切办法詆毀各国共产党内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之后的复杂的健康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无限的国际意义。但我們的党将不顾中国謀士們的一切憤怒，依据列宁的指示，繼續沿着真正的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前进，并将繼續不断地抵制来自“右边的”和“左边的”攻击。

我們向北京的鼓动家們保证，沒有他們的糾纏不清的、有着明显的领导权动机的指示，我們也过得去。我們还可以向他們保证，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我們的人民将根据自己的考虑选举自己的代表。如果信的作者的确想证明，我們国家的命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对他們來說很重要，我們只建議他們：放弃挑畔和一

切分裂活动,走上团结的道路!

用像散发诽谤性的挑衅信件煽动反对其它共产党领导的这种不体面的方式,违背确定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原则。这种方法只能进一步加深不一致,并增加达成协议障碍。他们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等待他们的只有共产党员们和我们人民的广大阶层对他们反列宁主义政策的坚决不同意和反对。

(译自 1964 年 5 月 24 日捷《红色权利报》)

把为实现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決議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节譯)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4年5月28日在捷共
工厂党組織主席全国代表會議上的报告

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活动

同志們!

在我們的活动中，我們一直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設是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大家庭組成部分的我国的任务以及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环的我党的任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我們也認識到，只有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存在的条件下，特别是和苏联共产党思想一致以及与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結成国家間牢固的政治联盟的条件下，我們才能取得目前的成就以及达到未来的目的。

在自己的活动中，我們也根据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結論出发，在我国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运用这些結論。

同时，我們也要尽一切力量去促进反对各式各样的反共产主义的学說以及帝国主义者从外部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的行动的坚决斗争。我們也要促进从根本上击潰和战胜或者是在修正主义的旗帜下，或者是从教条一宗派主义的立場出发想从内部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歪曲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綫的企图。

我們黨在解釋和積極貫徹 1957 年和 1960 年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所通過的共同文件的原則時，就採取了這種原則性的共產主義態度。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證明了這一政策的正確性並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政策。

所以我們必須在我們代表大會的討論過程和結論中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行徑說出原則性的話，中國代表向代表大會轉達了它的觀點，這些觀點再次表明，中國領導人反對共同協議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和策略，並違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團結利益而推行自己的方針。

但是，我們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呼喚就像其他共產黨希望中國共產黨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修正自己的錯誤觀點、站到各國共產黨的統一的戰綫中去的無數呼喚一樣，沒有得到肯定性的反應。相反地却遇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不斷增加的敵視、爭論和挑釁。

最近時期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實質上是在使自己不受國際共產主義紀律的束縛。在 1960 年莫斯科會議上它的企圖沒有得逞並因自己的觀點而陷入孤立之後，它便力求激起一種印象，好像它的教條主義政策是什麼對莫斯科聲明的唯一正確的解釋。

在國際民主組織中中國代表的行徑也與他們所談的結論背道而馳，最近兩年以來，他們在這些組織中把爭取和平和裁軍的鬥爭同反帝鬥爭、民族解放運動和爭取鑷除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的鬥爭不可調和地對立起來。同時他們違背各種和平和反帝鬥爭的潮流的共同努力，強調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三大陸由於地理上的聯結而產生的某種特殊利益。

這些傾向是承認中國不同意莫斯科文件中的基本原理，並明顯地表現出變中國為某種新的國際革命運動的中心的方針。當我們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破產了的試驗——它的目的是越過社會主

义建設的不可缺少的阶段，在最短的时期内把中国变为第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同这一切联系起来，那么，那些用来支撑中国对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中的霸权要求的主要因素，就了如指掌了。

你們知道，在去年7月苏联共产党的公开信中以及在数十个兄弟党的答复和其它材料中，对中国共产党站不住脚的立場再次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以便使中国领导人在尚还来得及的时候，在自己錯誤的道路上止步。并向中国领导人再次轉达了苏联共产党和其它兄弟党关于中断公开論战和开展积极的合作的建議，以便有可能在原則性的基础上逐步达到观点上的接近和分歧緩和。

但是中国领导人的行徑提供了明显的证据，证明中国共产党現在公然把否认和修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构成当代革命理論、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綱領的一切东西的努力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挑起分裂的深思熟慮的攻势結合起来。

至于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政策，实际上沒有一个問題不成为中国首領的沒有头脑的、脱离健全理智的批評的目标。据他們看来，說什么为爭取和平共处而斗争意味着推行“符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和帮助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的路綫，据說彻底裁軍的要求“只是麻痹各国人民的純粹的鴉片”，达成部分禁止原子試驗協議是“苏联和美国获得世界霸权的阴谋”，“在武装方面和美帝国主义者結成兄弟友誼”的表現，据說，其目的是“对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政治敲詐”。同样据說苏联政府和平解决国际爭端的建議是“反动思想”和“美化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

与此相反，按照所謂“中国化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的直接斗争，是唯一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配方，这种斗争不迴避原

子战争的危險，說什么原子战争会最終证明帝国主义内部的腐朽和是紙老虎的原子武器本身的腐朽。然而，这种“英雄气概和决心”本身是紙的。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自己在苏联的原子和火箭的袒护下是安全的时候，很容易进行这种空洞的吹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行动使共产主义的敌人十分滿意，因为这与他們想削弱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以及各国共产党的团结的目的相吻合。同时，他們不害怕中国的建設社会主义的“范例”，增强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的危險并不威胁着他們。

絕大多数共产党支持苏联共产党的审慎的和建設性的立場，那些在一些共产党內以中国观点的捍卫者而出現的个别人士或小組，沒有任何影响，他們是从托洛茨基分子到教条主义者以至修正主义者的大杂糅。

我在班斯卡·比斯特里查举行的斯洛伐克共产党州的代表會議上已經指出，在适当的机会我們將对中国关于我們 1948 年二月事件的观点表示意見，中国的宣传歪曲了二月事件的性质。

我們坚决支持苏联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政策

我們党一貫捍卫莫斯科文件中的列宁主义观点，即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必須根据局势运用一切手段和开展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群众将受到革命的教育，使他們作好准备，如果资产阶级要以反革命的暴力捍卫自己的地位（当和平的目的达不到的时候），他們就拿起武器。我們是这一列宁主义原則的坚决捍卫者，因为它完全符合我党的經驗。我們一貫遵循这一原則，1948 年二月事件证明了党的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在 1948 年的二月事件中，革命的发展通过和平的道路从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工人阶级最終夺取政权。

当然，中国领导人不喜欢（这些），他们诽谤性地教训我们，说什么我们自己欺骗自己，并违背事实和按照自己歪曲的概念“修改”我们党的历史。例如他们硬说，在1945年之后，在我们这里马上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资产阶级的政权不是被和平夺取的”，而相反地我们在二月事件中所以赢得胜利，是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利用了武装力量，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他们还断言，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国家机器，用自己大部份的武装力量”镇压了资产阶级的政变。

第一眼看去就很明显，（恰当地说）这是对情况的完全无知。你们自己最清楚，在二月事件时期，为了使军队站在事件之外，以便使以贝奈斯为首的反动派不能为实现反革命目的去利用它，以及为了使军队中的爱国进步力量能够在政治上拥护人民的事业，曾需要进行很大的政治努力。中国的关于武装部队的决定性作用的胡说，在阳光之下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它并将中国领导置于奇怪的比邻关系之中。从1948年2月以来，贝文、杜鲁门、阿登纳、杜勒斯也有过类似的无稽之谈，冷战的各种各样的重要人物直至今天还重复这些论调。

在这件事情上明显的是，中国首脑们有意识地伪造我们党对1948年二月事件的估价。他们在1964年3月31日的文章中引用了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在1948年11月17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人引用了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的这些话：“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机器已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机器在这个意义上起了特殊的作用。”同时从这一不精确地翻译的引语中，删掉了一些不证实他们关于在二月事件中国家机器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论的“小事情”。在……“国

家机器已不是为以前的各統治階級，而是为一些新的階級服务”这句话后面，接着是克利門特·哥特瓦尔德的这句话：“在这方面有顾虑，自然，爭取国家机器的斗争不是任何小事情”，我特別提醒“爭取国家机器的斗争”这句话，因为显然，工人階級曾必須为获得国家机器而坚决地进行斗争，国家机器并不完全在它这一边。克利門特·哥特瓦尔德由此也不是为过去，而是为未来作出了結論，这一結論也被中国人删掉了。我把这一結論引证如下：“对工人階級來說，这是作为統治階級的它如何关心‘自己的国家机器’的生动教訓”。在引用时不能以希望代替事实，因为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厌恶的欺騙。我們自己清楚地知道，事情是怎样进行的，誰也不能給我們上成問題的有教育意义的一課。由于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除了武装的道路以外完全否认固定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不令人羡慕的任务，所以我們把补充他們記憶中的重要缺陷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实际情况是，在苏軍將納粹占領者从我国驅逐以后以及我国人民以1945年5月9日結束的反对法西斯匪徒的武装斗争之后，我們这里，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但是，除工人階級外，資產階級也参与执政，資產階級还占有相当大的陣地，它并借助于在其它政党帮助下掌握的一部分国家机器，在經濟中运用这种地位。所以三年来，在从1945年12月起我国就在沒有任何苏联军队的条件下，进行了誰战胜誰的尖銳的政治斗争。我們的党使自己的工作，以加强它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地位、克服反动派的破坏活动、和平发展民族民主革命、在它的活动范围内（即巩固了它和人民的联系以及巩固了作为全民族代言人的工人階級的作用）实现和完成社会結構經濟变革为方針。由于来自下面和上面的政治压力，特別是1946年选举后，那时党在已取得的地位的基础上，由于彻底地貫徹了和苏联联盟的方針，将1948年2月試

图通过內閣政变改变事态的发展而有利于自己的資產階級反动势力从一个个陣地上排除了出去。由于党在1948年2月所开展的政治活动——如总罢工、团结在复兴民族陣綫中的其它政党的左派力量、宣布进一步国有化和完成土地改革等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和使人民在階級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其他工作，使資產階級反动势力陷入了完全的孤立。当危机达到高峰，出現反动派准备采取武装冲突的警告信号的时候，工人階級的成員手中也获得了武器，建立了人民糾察队，以預防反动派方面的任何挑衅。这确实使它們的头脑清醒起来了，沒有发生任何武装冲突，也沒有这种需要。同苏联的同盟也拯救了我們，这个同盟不可能引来反动派或者迫使帝国主义不能从外面进行干涉。

党的主导思想是利用城市和乡村的劳动人民的政治活动，根据議会的慣例并依据当时有效的宪法，去代替正在离职的反动部长。这完全成功了。在克利門特·哥特瓦尔德的领导下成立了复兴的民族陣綫的政府，包含着明确的社会主义要求的政府綱領坚决宣布从1946年选举的、共产党人不占多数的国会中退出。

1948年2月25日，当时的資產階級的总統貝奈斯任命了复兴的民族陣綫的政府，1948年3月9日国会并批准了复兴的民族陣綫的政府的組成和綱領，它将民族民主革命引导到底，并将人民民主发展为无产階級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同时工人階級是通过和平途徑掌握了政权，甚至于是在1920年資產階級自己規定的資產階級民主宪法的基础上。当时这一宪法保证了資產階級在慕尼黑协定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統治。

我們公开地譴責中国的不能容許的驅使我們党的黨員展开撕毀我們的党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兄弟关系的企图。几天以前，一些干部將他們收到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信件交給了中央委員會。确实我們不知道應該怎么想，因为这封詆毀书的内容，好像

是来源于自由欧洲的渠道。这是挑衅性的呼吁，它号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努力不从属于苏联共产党，因为它的政策是什么“封建专制君主的思想”，因为说什么它把共运看作“某种封建党羽”，它的立场是我们的党必须遵循的“圣旨”。他们用可耻的方式煽动我们的干部同我们党的领导宣战和除掉我们党的领导，因为它是莫斯科的僕从，并要我们的干部力求在选举中使“坚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被选入国民议会、各级人民委员会和法庭，显然，这些“坚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执行中国的这种指示。我肯定说出你们的心声，如果我說，誰要以为他用这种对我们同苏联共产党关系的瀾天誹謗和反对我们的共产党的号召会取得成功的话，那么等待它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鄙視和我们劳动人民的鄙視。

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局面，要求做出集体判断，新的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是它的唯一方式，同我们的党一起已有数十个兄弟党表示同意召开这种会议。

看起来，中国领导人害怕这种集体协商会重新证实他们是孤立的。但是在1964年5月7日的最后一封信中，他们突然以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捍卫者的姿态出现，说什么为了团结应把会议拖延四年至五年的时间，或者完全不召开。

我们重新公开地说，我们十分严肃地判断共运中的形势，我们并不把共运中所产生的复杂问题简单化，但是我们不会陷入悲观主义。

(譯自1964年5月29日捷《紅色权利报》)

兄弟党譴責中共領導人的分裂活动

米洛斯拉夫·施奈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經歷着决定它今后发展的严肃的和特別重要的問題的时期。几年前中国同志們所强加給所有兄弟党的爭論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开始严重地威胁着某些共产党内部的团結以及严重威胁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

去年一年，中国同志們故意坚持爭論，不断地把爭論扩大到另一些新的問題上去，后来，直到去年年中，他們发表了自己强加給整个运动的总路綫的建議。由于絕大多数的兄弟党坚决拒絕了这个建議，他們就加强了自己的分裂活动；开始竭力通过各种方式在一些国家中支持和建立派別小集团，并通过它們傳播北京的政治路綫。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非常危險的局勢。他們开始在国际民主組織中比前几年更积极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并通过自己的講話严重威胁民主运动的团結和行动能力。

这几个月以来，苏联共产党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性，自己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誠以及自己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所作的努力。尽管中国共产党領導人明显地表示对談判沒有兴趣(除了其他方面以外，还表現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关于改善关系的一系列具体提議都长期沒有得到官方的答复)，但苏共中央委员会表現了最大的耐心并提出了一系列停止公开論战、开始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双方之間談判的建議以及为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的准备步驟的具体建議。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頑固地拒絕苏共以及其他許多兄弟党的一切建議，不断地使論战尖銳化，不断地对苏联共产党和赫魯曉夫同志进行新的譴責。由于今年二月和三月份公布了目前來說最近的两篇侮辱性的評論：“苏共領導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和“无产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他們的惡意运动达到了頂点。

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會議的講話中談到了这两篇評論中的第一篇，他說，就这篇文章的論据而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那篇文章中可怜地幼稚地写下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而这篇文章的实质是在理論上为革命运动分裂的必然性找根据，不尋常地、猛烈地攻击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魯曉夫同志，但奇怪的是，它沒有要求大力改变苏共领导和它的政策”。

当苏联共产党及时地把自己的这一准备好的步驟通知兄弟党时，被迫公开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駭人听闻的攻击。在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中，苏共严肃地、詳細地和实事求是地駁斥了中国同志們的“論据”并坚决地摒弃了这些“論据”。苏联共产党非常負責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和实际政策給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危險，并重新表示自己願意尽一切努力克服整个运动的分歧和加强团結。遺憾的是，就連这一次苏联同志的呼吁在中国领导人那里也沒有得到任何反应。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团之間的双边會談以及召开世界共产党會議的筹备問題，中国的同志們一再要求拖延，并提出另一些条件。

所有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兄弟党都十分严肃地判断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当前局势。它們以很大的努力保持着对所有共产党员來說过去、現在都永远可貴的团結，因为它是革命力量在世界範圍內取得进一步胜利的基本前提。同时，它們从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明确的和坚定的立場出发，重新研究了分歧問題，并

对时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实行和平共处的策略、争取裁军的斗争的问题、彻底铲除殖民主义、世界革命今后的进程问题、以及对争论的方法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努力问题表示了自己的观点。

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内，至今已有五十个党正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这些立场的结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非常不利的。兄弟党表示自己忠于和支持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及共同通过的文件——宣言和声明。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至少引几个兄弟党的观点。在希腊共产党第七次中央全会上科利亚尼斯同志的报告中说：“在新的复杂的内外条件下，教条主义的危险在增长，中国共产党的首脑们正积极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我们的会议必须显示出党赞同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其目的是保卫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莫斯科会议共同制定的路线的基础上的团结”。

1964年4月在《呼声报》和《消息周报》上刊载的叙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巴格达什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态度的文章中說：“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想和他们（中共领导人——作者注）在原则问题上的一些荒谬观点进行斗争。这些原则问题是：像和平、和平共处、裁军、使人民避免核战争的可能性、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和非和平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社会主义体系对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对每个国家的发展的影响以及为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体系对解决最重要问题的现实可能性的影响。我们叙利亚的共产党人，像我们兄弟的阿拉伯共产党一样，曾在许多决议、论文和文章中表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和苏共同志们以及世界上所有其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观点完全一致的”。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雷曼在自己5月20日

发表在莫斯科《真理报》上的文章中談到了中共領導人对西德帝国主义的态度以及与此有关的他們的所謂“第三个中間地带”的“理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态度就是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的。雷曼同志写到：“尽管我們有最大的願望，我們还是不能够了解，他們怎么可能在面临着其全部思想和努力都致力于加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軍事集团的西德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危險的时候，如此盲目和像駝鳥一样把头藏到沙子里去。很难相信，中国的某些首領們就像一些受到催眠术的家兔，他們虽然看到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危險，但是他們不了解，軍事上强大的、富有侵略性的西德軍国主义的危險也不小”。

我們对德国軍国主义者有着切身的體驗和最坏的經驗的全体人民肯定完全同意德国共产党領導人的这种彻底的国际主义的态度。正好是在这几天，西欧的各国人民由于波恩政府的部长賽波姆荒誕的、复仇主义的講話重新充分地認識到，今天的西德軍国主义對他們來說是如何地越来越危險。

最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人以完全特殊的努力和用对待比較好的事情的毅力試圖把民族解放斗爭和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例外）隔离开来。这种企图是非常危險的，首先将会給那些正在为对帝国主义的完全和全面独立而斗爭的国家本身带来困难的后果。中国同志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运用了从甚至沒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能够成功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的“理論”根据，一直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荒誕的誹謗：“他們拒絕和破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爭”等一切手段。

人民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着民族解放斗爭的国家的兄弟党，沒有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人代表他們講話。他們有足够的經驗去識別真理和謊言，善与恶。他們高度評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过去和現在所給予他們的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人可以过

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讲话中或者最近三个星期以来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本·貝拉在访问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时的讲话中来证实这点。

厄瓜多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也把自己的经验和中国同志们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与他们完全相反的结论。会议的决议中说：“当中国同志们谈到苏联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由于在革命风暴面前害怕地发抖而用一切方法企图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离开革命斗争的时候，他们所进行的可怕的诽谤和歪曲是从哪里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们怎么能够想出这样荒诞的事情，即苏共和它的领导人害怕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坚决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同志们对苏联所进行的这种控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甚至一点也不符合我们的革命经验”。

正在为完全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国家的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之间的联系。毕竟是近十年来，也就是正好在社会主义成长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并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创造了这样新的、更好的条件的时候，五十个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将楔子钉入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努力是不会成功的。各国人民任何时候也不会否认社会主义世界是他们的支柱。

各兄弟党以最大的愤怒心情拒绝对苏联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的攻击；拒绝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在各个党内分裂的必要性的理论根据；以及拒绝他们反对党和运动团结的实际步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诽谤性的攻击具有完全相反的结果。各兄弟党重新审查了苏共的经验、它的援助、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对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意味着什么。例如，意大利共产党把对苏共的攻击看作对整个工人运动来说是危险的。马·雷曼同志（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日《真理报》的文章中）写道：“我们

整个心都和苏共在一起，苏共英勇的斗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革命工人运动和全体劳动人民重要的灯塔”。

今年秋天，共产党人和世界上的一切进步力量将庆祝第一国际成立一百周年。实际上一百年前已经开始实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个口号。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一直到现在都相信并且将来也相信，即必须把主要的努力致力于不断巩固自己的队伍：团结就是运动的力量——建立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牢固基础上的行动一致是运动的力量。漫长的十年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所有国家革命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这些行动所得到的国际支援的结果。这些过去是，并将继续是革命斗争的基本知识。正好是在今年，中国同志们发表了关于在各个党内以及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的必要性的“新的”、“革命的”理论。依他们看来，说什么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修正主义。据他们看来，真正的革命者的任务已不是为党和运动的团结而斗争，而是为破坏党和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同时，当然，这种关于分裂的必要性的新“规律”是在那些中国同志们称之为修正主义的那些党内发生“影响”。否认宣言和声明、开始诽谤苏共、接受中共的总路线就够了，“规律”将失去其作用。将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恢复团结。

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的声明中说：“这一事实会有特别危险的后果，即：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兄弟党之一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硬说，现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形成的条件下，在国际范围和各党内的分裂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发展的辩证法是‘团结’，斗争，甚至分裂，然后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认为，这意味着为分裂提出理论根据，这意味着号召分裂。”

法国共产党今年5月14—1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同志们的这些新的“理论”观点也采取了自己的立

場。代表大會的決議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所制訂的路綫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綫相違背的。他們在各個國家所進行的分裂活動，對各個黨內分裂出去的小集團所提供的物質上和道義上的支持，給整個‘運動、和平和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無可估量的損失。各兄弟黨不允許在任何的、甚至‘理論’的借口下將分裂的政策強加給自己”。

為加強國際共產主義的團結而進行的鬥爭將是緊張的和長期的。中國領導人在這一鬥爭的道路上設置了許多障礙：從侮辱性的攻擊直到在一些國家里建立分裂主義的黨以及在一系列國家中建立派別小集團。但是，捍衛宣言和聲明的路綫，努力鞏固運動的團結的各兄弟黨卻表現了最大的耐心；它們原則性地譴責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路綫；他們努力爭取使會議的準備有助於完全揭露和粉碎中國同志們的宗派主義路綫，並同時有助於在弄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必須解決的任務（不考慮內部的分歧）的時候，創造性思想的新的、進一步的發展。除了宣言和聲明中規定的原則以外，它們也正在尋找解決各黨之間爭論問題的新的方法和手段。

儘管中國首領們的政策嚴重地威脅着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和削弱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但共產黨人是樂觀主義者。階級敵人对“共產主義運動瓦解”的投機活動像過去許多次一樣，又一次破產了。共產主義運動有足夠的健康力量，以便使共產主義運動在自己存在的第二個世紀起就能夠擊退從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立場出發對自己革命路綫的攻擊，並在為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取得新的成就。

（譯自1964年第12期捷《黨的生活》雜誌）

我們完全贊同蘇共的立場(節譯)

波胡斯拉夫·拉什托維奇卡 1964年6月17日在
波蘭統一工人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我認為必須向你們的代表大會，對由於中共的分裂活動所引起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現在的局勢表示我黨的立場。

我黨堅決摒棄中共領導的派別的政治路線、思想綱領和分裂活動，這一切是與馬列主義科學格格不入的，它給革命力量為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造成嚴重的損害。中共領導企圖達到自己的大國的民族主義目的，並企圖非法利用整個革命運動來達到這些目的。

中共領導想要兄弟黨離開蘇共，想要得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高的地位。對蘇共及其主要活動家和其他兄弟黨，其中也包括對捷共，進行攻擊成了中共現在的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

兄弟黨制止局勢不利的发展和克服現存分歧的一切努力至今一直遭到了完全的抵制。

為此，我們對蘇共中央的立場表示完全的贊同，蘇共中央通過公布二月全會的材料給中共領導人作了原則性的回答，對中共領導人的活動作了全面的分析。蘇共堅持不渝地捍衛共同商定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就反映在莫斯科宣言和聲明等文件中。

我黨中央認為，為了分析和討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現存的非常嚴重的局勢，必須召開所有兄弟黨的新會議，必須不能象中國領導人企圖的那樣，用各種借口把會議無限止地拖延不開。

(譯自1964年6月18日捷《紅色權利報》)

政府声明(节译)

約瑟夫·列納尔特 1964 年 6 月 23 日在捷新选出的
国民議會會議上的报告

我們把完全根据 1957 年和 1960 年莫斯科會議宣言和声明中集体制訂的路綫全面地帮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和团結的进一步加强当作自己的国际主义任务。

至于我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們反对把意識形态的分歧轉入国家关系的領域中去，我們將繼續致力于发展友好合作。但我們坚决反对中国领导人旨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和实际措施的有害的分裂活动。

(譯自 1964 年 6 月 24 日捷《紅色权利报》)

宗派主义的哲学論据

拉基斯拉夫·托馬謝克

中国领导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选择了一条可疑的主观主义的道路。他們在口头上強調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結，但在实际行动上却破坏了这种团結，并損害了国际工人运动在同世界資本的斗争中的創造性的活动能力。他們的进攻具有正面的特点。辯論关系到正在执行 1957 年和 1960 年的會議所通过的政策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实践的最深远的哲学根源。

中国领导人还力图证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絕大多数人在哲学方面对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揚 1963 年 12 月 26 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十分公开地、具体地、长篇大論地談到了这个問題。

他在講話中涉及到一系列原則性問題，其中很多显然是世界觀問題，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問題。他用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引文来证明奉行和平共处路綫并創造性地解决当前理論和实际問題的苏联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的修正主义內容。

可以把这些指責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問題：

說什么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质被主观唯心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所代替。

否认对立面的統一和斗争法則的客观存在，从而抛弃了階級斗争和无产階級专政。

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論被資产階級人道主义和人性論所代替。

中国领导人想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分裂活动提出理論根据的这种企图，其有趣之处，与其說是他們的沒有带来多少新东西的論证內容，毋宁說是他們的論证方法。他們想用这种方法力求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概念以及每項政治活动提出不負責任的解釋。我們首先要談的就是这种方法，因为对辯論的內容問題，我們的讀者已經从許多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里有了足够的了解。^①

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創造性 的馬克思主义

周揚逐字逐句地說：“現代修正主義者在政治實踐上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實用主義哲學代替無產階級的辯證唯物主義。”他並沒有認真地從哲學方面證實自己的論斷，而是簡單地斷言：“現代修正主義者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否認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他們不相信歷史的發展只能是人類毀滅核武器，而決不可能是核武器毀滅人類。他們宣揚，在核武器面前，原則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原則已被消滅了……這就是他們的實用主義的保命哲學……這就是他們用苟且偷生的市儈哲學代替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哲學的方式。”

每一個注意社會主義國家政策的人都會證實，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恰恰是基於人毀滅核武器的思想之上的。他們對這種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的理解顯然完全不同於中國領導人的想法。他們不把這種必然性理解為“人”對核武器的抽象的反抗（或在戰爭衝突中的反抗，我們對戰爭衝突對人類的結果不抱幻想），而是把它理

^① 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正對所謂蘇聯知識界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進行“理論上的批評”。而周揚則集中地、有意識地從哲學上進行分析。因此我僅限於談他的觀點，雖然我也默默地考慮到在中國其他的文獻里所發表的觀點。

——原作者

解为消灭这些武器的不断的斗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战争和核武器的整个运动的积极斗争。正当我们不再呼叫宿命论的“历史必然性”，并开始以现实的态度对待世界体系、阶级力量和社会运动的问题时，作为具体实现革命政策问题的原则问题就提到我们的面前了。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从科学地分析现时代的特点出发的。现时代的特征之一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决定着现代世界发展的动力、特点和方向。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体系掌握着足够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的潜力，这种潜力能够制止战争，并以和平手段解决世界的阶级对抗问题。

和平共处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重视历史时代的这种新的性质，并且恰如其分地估价阶级力量的组合和社会主义在世界发展中的经济和道德的意义。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政策不需要输出革命。但同时它也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社会主义也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反革命输出。

资本主义不能用武器来扼杀革命运动，不管它愿意不愿意，都必须进行经济竞赛，在竞赛里将最终地检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揭露帝国主义深刻的矛盾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正对社会主义阵营加剧进行思想意识上的破坏活动。

不相信在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和思想政策上的潜力，从而也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本质。武器在一定条件下是打通社会主义道路的手段，但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行；假如具体的历史形势迫使工人拿起武器，武器才能解决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已经成熟的东西；但不能把社会主义仅仅建立在暴力之上。暴力在任

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手段。中国领导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完成革命要以世界革命的完成为前提，反之亦然。他们先验地从下面一点出发：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取得胜利，因而共产主义不能够在局部取得胜利，〔更不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他们认为，必须首先集中全部力量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甚至为此发生世界冲突也在所不惜，然后再把力量集中在经济方面。他们不理解，这种胜利将是皮鲁士式的胜利。

归根结蒂，这种概念的根源是对全世界人民力量的不信任。他们笼统地谈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实际上却把更大的希望放在政权机关上，而不是放在人民的本身上。他们用与资本主义世界实行隔离的办法和行政压力代替对群众的耐心改造及其逐渐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这个自我教育的长期过程。他们不以改造人为方针，而以摧毁政权和使“旧社会的残余”在道义上不再发挥作用为方针。这也是与中国对国家消亡的论断所作解释相联系着的。他们把各国人民对自身生存的忧虑称作“苟且偷生的哲学”，其令人难以置信之处，在于他们甚至在术语上也和那些以同样的语言谴责和平共处思想的帝国主义最富有侵略性的思想家们一致。然而，因为他们企图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和数百万人的生死问题归咎于“原则”问题，并把自己摆在捍卫理论的地位，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理论吧：“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当作必须坚持的真理，而把它当作临时应付的工具，任意加予篡改和伪造，作为可以随时适应他们的眼前利益的辩护学。”（周扬）

事实上，共产主义运动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当作“必须坚

持的真理”，而是把意識形态看作揭露社会现实实践过程的工具，認識的方法和实际行动的依据。在这里，过去和現在都沒有修正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馬克思主义学說，是和神話、盲目的信念格格不入的。然而我們不能忽略这个事实：馬克思主义是对劳动人民希望階級和整个社会获得解放这一现实信念的第一个科学的答案。不过，这个信念如果不是以科学的認識作为出发点，那么信念本身就不足以成为走向真正自由的手段。教条主义过高地估計信念的作用，它用形而上学的理解的理論来补充这种信念。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力求克服盲目的信念，这种信念正对共产主义运动中潜在的主观主义敞開大門。

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以認識同反映的现实一致这一列宁主义的真理定义为出发点，任何主观主义实质上对它都是格格不入的。社会现实作为客观实际的最活跃的一部分，近几年来正在經歷一系列特別显著的变革。因此很显然，客观真理是受这些变革綜合的影响的。对社会的認識，如果不想失去客观真理的性质，那就不能不受到社会变革的进程的影响。

教条主义者所固有的思維方式是公式化的，他們把客观真理和絕對真理等同起来了。因此很自然，他們把真理的辯证观点，特别是它的具体运用說成是对馬克思主义辯证法的实用主义的歪曲。

真正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是什么呢？实用主义哲学认为凡对个人和集体有用的社会認識就是真实的，換句話說：它把真理的标准从純粹客观的領域移到主观活动的領域。它用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說法代替客观真理的理論。

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客观真理的辯证法，即認識的真理标准是人們的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来檢驗認識与客观现实的一致性。馬克思主义对客观现实的态度是不否认主观的积

极作用。它不同于教条主义之处（这是本质的）就在于，创造性的馬克思主义不是死板地、机械地、宿命論地看待客观现实，而是細心地研究它的运动，考察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各种情况下的变化关系，中国首領們指責我們，說我們由于害怕全球战争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則面前成了逃兵，因而才对馬克思主义进行实用主义的修正。然而他們却忘記了，就其本身說具有絕對真理性质的原則，从来不能在人类活动的自身里、在真空中变成客体，而是永远在一定的具体历史形势下变成客体的。問題不在于“害怕”或是其他主观的感情，而在于要科学地認識到，在現时代，社会主义的胜利不需要以世界的核毁灭作为自己必不可少的伴随者。

教条主义用宿命論来歪曲唯物主义的決定論，利用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来扼杀社会主体的积极活动，从而使理論上主张定命的宿命論与实践中的唯意志論在这个主体里結合起来了。此外它还為个人的主观主义和把群众判定为只能担任历史客体的角色創造了哲学的基础。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伟大貢獻也在于：它強調指出，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时，主观因素的作用在不断增长。劳动人民的逐渐解放加强了主体对客体的反作用的因素。当然，主体的积极作用不在于去破坏客体的規律，而是在于認識这些客观規律，在于实际創造能調整規律的作用的社会条件。

教条主义者簡單地认为，整体对局部、集体对个人、客体对主体等等具有唯一的決定作用，这样我們就看到，問題不在于承认不承认決定論。不过，假如我承认它，那么我就要辯证地去解释它。然而，教条主义者是看不到这一点的。教条主义者不理解恩格斯的这一句話：人不仅生活在历史里，而且也在个人和社会的可能性的范围内創造历史。

中国教条主义的代表們沉醉于这样一种幻想，即认为他們的

政策依靠的是严格地尊重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的哲学；实际上，构成这种哲学基础的是对社会现实的保守看法，这种看法得到了一种类似现代教义问答的东西，而这种教义问答不是充分符合生活需要的。

教条主义者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是把教条当作真理性认识的标准，即用认识作为衡量认识的尺度。因此他们正陷入这种局面之中：对他们说来，现实关系和可能性已不再是行动的出发点了，他们从现实中只选择那些自己感到对现实直接目标的事先设想有用的那些现象、可能和因素。这样，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必然变为实际上的实用主义；由于自己对世界革命的简单化的看法，教条主义者宁愿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牺牲各国人民的利益。“必须坚持的真理”变为神明，不管什么手段都为这神明服务。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以辩证的态度，即以具体的历史的态度，有区别地来对待客观现实，特别是社会现实的。它把社会现实当作生产和一切社会关系、利益和观点的变化着的过程，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待这一过程。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考虑到在世界政治领域里发生了一系列质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总和正从根本上影响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政治概念。根据对正在进行的世界过程——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本质的认识，它选择了日益丰富多样的、但却永远推动这一过程前进的斗争手段和斗争形式。

形而上学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

周扬引用的对矛盾问题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简单化提法，证明说空话对于在理论上论证中国领导人的分裂实践起着怎样的作用。他说：“矛盾是普遍存在、永远存在的。矛盾有非对抗性和对

抗性的区别，但是没有什么可以调和和不可调和的区别；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通过斗争来解决。……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了融合矛盾、调和矛盾的理论，来为他们的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提供哲学上的根据。”

把矛盾的范畴提高到先天论的尺度，用这个尺度就能够不加分析地对待任何现象，使这些现象在我们面前分解为相互对立的部分；这种企图毫不新鲜，虽然它的不加掩饰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企图的诡辩术在于它力图严肃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捏造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还是“不可调和的”。在马克思主义里从来就不存在自在的矛盾，而始终只有被考察的现象的矛盾方面或对立方面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在今天两个体系的关系中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地上所发生的社会过程、现象和事情。只有在具体指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阶级的实际地位和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具体地谈论阶级的统一和对立。

在周扬的概念里，阶级是作为纯粹的范畴、作为同客观的历史条件毫无关联的利益的对抗而抽象地出现的。所以他把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类型机械地搬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中来。

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里，阶级对抗的基础不在于人类的不变的内在本质，而在于人们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地生活在其中的经济关系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的不只是从肉体上消灭非无产阶级的人的本身，而是要铲除能导致阶级对抗的产生和支持其生存的条件。工人阶级的目的不是阶级对抗，而是无阶级社会的社会协调。

显然，这种协调不只是在虔诚的愿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是通过群众的积极性而建立起来的。由于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把阶级只理解为变化的客体，而不是变化的主体，所以他们认为，在

完全从“肉体上”排除阶级以前，必然进行着阶级矛盾的对立冲突。他们不重视，正如列宁所教导的，阶级斗争不仅是阶级同阶级的斗争，而且还包括阶级争取阶级，特别是争取小生产者的斗争。

因此，他们就忽视影响工人阶级本身质变的客观条件和原因。实际上他们必然以工人阶级是一个不变的实体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为什么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对抗也加以绝对化，我们就不会感到惊奇了。把经济 and 思想方面的政策绝对化，也出自于同样的原因。

中国的概念明显地把政治置于经济 and 思想之上。他们预计，直到共产主义还有阶级对抗。据他们看来，如同国家会突然象蜡烛的火焰熄灭一样，对抗性也会突然变成非对抗性。他们不是寻找阶级接近的道路，而是选择人为地通过国家使对抗尖锐化的道路。因为他们默默地从阶级的心理的和政治的实质是不变的这一前提出发，因此在他们看来，通过政治暴力而达到世界工人阶级的绝对胜利，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因此他们低估使各个阶级的利益接近起来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增长着的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影响，以及它对社会的社会主义平等的变化的影响。他们不能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创造使阶级利益接近的一系列条件。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究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的建设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准备阶段。

没有能力真正从理论上分析阶级之间的关系，抓住正在进行中的趋势，并有意識地去影响这种趋势，这使得他们完全非辩证地混淆阶级之间的矛盾、经济地位的差别以及在劳动分工中的差别，从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要还有旧剥削阶级的残余，还有新资产阶级分子重新产生的可能性，只要还存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

間的差別，无产階級專政就沒有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周揚）曾經有過一個時期，毛澤東試圖具體地規定社會主義社會中各階級和各社會集團之間的关系。今天他們用簡單化的詞藻打發這一切：“在所有這些國家（即社會主義國家）中，都無例外地還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當然共產主義運動不能接受類似的“矛盾論”，因為這意味着使馬克思主義失去了它的基本性質——成為具體的、革命的批判性的理論。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的這種解釋，不能揭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趨勢，這種趨勢當然也是在矛盾的关系里產生的，但它們不是只和階級关系有联系。正因為如此，這種解釋在本質上是消極的，同時也是防禦性的。

凡是在實際的政治經驗明顯地表明中國領導人的行為是冒險主義的和不正確的地方，周揚所用的抽象的說法，例如“一切都是一分為二”這種說法，就不難成為理論上的論據。這首先涉及到他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裂活動。

中國對矛盾論的解釋，說明了把理論理解為“必須堅持真理”意味着什麼。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也會導致在理解社會現象和社會規律上的宿命論和唯意志論，因為它不能運用理論上的結論去認識新的事實，並有意識地對這些事實加以影響。相反它卻能導致那種會掩蓋一意孤行的實踐的一般假設。

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和宗派主義

中國方面進行反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辯論的方式，明顯地表現出對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概念的解釋上。周揚指責“現代修正主義者”“把所謂人道主義的概念和科學的共產主義的概念等同起來，把科學的共產主義完全融合於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之中”。他

以苏共綱領中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是最人道主义的思想的提法作为证明，并不容置疑地断言：“我們反对把共产主义說成是人道主义，反对把人道主义置于共产主义之上。”

就象在其他許多情况下一样，在这里周揚也把真理同非真理混淆起来了。他用廉价的詭辯术把人道主义說成是资产阶级的_{人道主义}，把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内容，說成是把人道主义置于共产主义之上。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党不在进行反对右派对人道主义的庸俗化、反对脱离实际的阶级基础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斗争；且不說反对明显的资产阶级的所謂人道主义的斗争。周揚板着严肃的面孔教訓說：“共产主义作为社会革命論，主张通过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去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人道主义則鼓吹通过一切人之間的‘博爱’，实际上是剝削阶级和被剝削阶级之間的‘博爱’，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实现它的社会理想。”

照这样說来，拒絕人道主义的根据是在于在剝削者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阶级斗争的观点好象是排除人道主义似的。“阶级”的抽象化和“人”的抽象化死板地对立起来了。当然，馬克思主义未战胜资产阶级的脱离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自然”人、抽象人的理論，所以同样要以不变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同样抽象的理論来取而代之。

科学共产主义把人看作是一个为自己在一定的社会經濟结构的一定关系里的地位所决定的具体的实体，并证实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的斗争最終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对抗阶级的消灭，最后完全消灭阶级。原来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理解为人的社会解放、从而也是人的_{人类解放}的必要媒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否认这种必要的媒介，因为它完全否认社会对人的决定作用。教条主义則把这种媒介絕對

化、永久化了，因为它把人降为阶级并且没有理解阶级的历史局限性。

对宗派主义者说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机械的结果，他不是行动的目的，而只是可以任意使用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看，结果就是为了未来的远景而忽视了人的日常生活的利益。中国领导人为了共产主义人类的光辉未来，情愿在核战争中牺牲千千万万的生命。

照教条主义的信奉者们的设想，抽象的全社会的利益要吞并个人的利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辩证法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他们领悟不到，把全社会的利益绝对化，既推迟实现个人的利益，又推迟实现全社会的利益。同时，一定的历史情况会迫使推迟更广泛地满足人们的个人利益，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在帝国主义包围苏联的条件下就是这样。但是不能根据这些特殊情况得出一般性的概念。

从哲学上看，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降低全社会的利益的优先地位。然而他们是把社会利益的优先地位当作实现个人利益的基础和必不可少的条件。

周扬对协调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复杂的刺激问题，没有试图作任何较严肃的分析，就宣称：“现代修正主义者根本抹煞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反对把提高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政治教育摆在首位。他们一直沉醉于自己宣扬的‘个人物质刺激’，结果只能是引导人们单纯追求个人利益，助长个人贪财谋利的欲望，鼓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在实际上，他们用对个人的‘物质刺激’、‘物质利益’的口号偷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

在哪些方面物质利益原则与“按劳分配”的原则相违背，这仍然是作者的秘密，他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共产主义不能只

建設在积极性上，这个思想列宁早在取得社会主义建設的第一批經驗之后就提出来了，而且社会主义的实际建設的几乎整整五十年的經驗都证明：必須把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与精神鼓励結合起来。从哲学上看，社会主义建設是人們对世界的实际改造以及他們意識到自己在这一改造中的作用这两者的統一，是人們的个人經驗和集体經驗的統一，是日常經驗的形成和日常經驗与目标相比較而言的被超越这两者的統一，这些目标是馬克思主义政党在自己的組織、政治和教育活动中提出来并予以實現的。也可以撇开这种具体的辯证法，用对积极性的自动力量的信仰来代替。当然，实践对这种思想活动是不会照顾的——“相信积极性”的人很快就不得不以政权的力量来代替教育的力量，因为只能以群众本身的物质的經驗去进行說服这一說法終究是有效的。

因此，中国领导人要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那个时期所固有的方法辯护，这不是偶然的。他們滿足于热忱的信仰和簡單的鎮压，这两者联合成了一个整体，当然在另一方面，它們却引起了党的威信和党的領導作用的下降，也引起了群众的积极性的下降。

今天，中国领导人完全否认个人迷信时期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他們的認識論是以黑白分明、形而上学的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为依据的。他們对資本主义不加区别。因为他們过高地估价国家的作用，而对資本主义国家的反对派的影响和力量則沒有給予足够的估价。由于这些原因，社会主义對他們說来就成了絕對完善的社会，它不需要改进，也不必有任何发展。这种对社会真理和社会发展的絕對主义的看法，結果是导致了停滯，阻碍了发展。他們认为，社会主义的絕對真理将代替資本主义的絕對謬誤。他們忘記了，社会的发展是連續性及非連續性的辯证法。他們的态度实际上是排除了在社会主义时期犯錯誤的可能性。他們把明智和愚蠢摆在对抗性的矛盾之中。这当然是非辯证的、不科

学的，也是不正确的。

共产主义运动揭露了个人迷信时期的歪曲，其目的是为了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再重复社会主义发展上类似的弯路。我们的运动抛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死板想法，并发现了共产主义发展的具体远景。我们的学说的革命的、改造的实质发展了，从而恰恰突出了它的人道主义的内容。中国领导人又在想把马克思主义关闭在死板的概念和抽象的公式里。周扬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毫无疑问，这种远景（或许一般说来是可以接受的）的本身，对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毫无贡献，不能动员他们行动起来。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哲学的任务就是以提出和实现日益具体的目标，并在为了这些目标而进行的具体斗争中，引导人们走向未来。这就是在理论上对中国教条主义的批评的社会意义。

（译自1964年第7期捷《新思想》杂志）

談中共領導今天的 行徑的某些原因

雅洛斯拉夫·季維士

能够用以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目前分裂政策的原因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要涉及到社会的、经济的、认识的和社会性质的一系列原因。由于国家目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國革命的特点的主观主义态度，首先是确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目前分裂主义路线的民族主义、大国主义倾向和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逐渐增长并占上风的主要根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性质的原因是在广泛的和持久的个人迷信的背景中增长起来的。就是这种原因也渊源于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天想竭力把这种态度强加于全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

与中国在民族解放斗争过程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客观特点相联系的一系列问题，是由革命前中国的整个情况和生产力的水平所决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经济上属于世界最落后的地区之列。它实际上没有工业。农村水平之低，令人难以置信。整个国家处在各主要帝国主义大国的猛烈的、集中的殖民主义压力之下。强烈的自然因素，是中国经济的特点，这种特点是经济与构成居民绝大多数的农民——至今仍然如此——紧密联系所赋予的。各经济地区（常常只是农村）的隔离，也与此相联系，因此，由于这个原因，在整个中国的比较新的历史中，谈不上整个国家有统一的经济。这些实际情况后来确定了中国革命的策略和方式。

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原始水平使得中国每一个从事劳动的人必须总是顽强地和艰苦地进行劳动。但是，同时每个人还经常被迫参加全国性意义的大活动。在长期的过程中，为了建成巨大的建筑物而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活动，几百万群众参加了这些巨大建筑物的建设。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每一个普通的从事劳动的人的劳累，作为个体的每一个普通的从事劳动的人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个人的命运什么也谈不上。同时，所进行的类似的活动也增加了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当然，从积极的意义来讲，这也有利于提高对集体团结的认识。

拥有庞大官僚行政机构的专制统治，是中国历史的典型特点。基于这种一致和个人盲目服从之上的统治，构成了中国国家的思想。由于不存在国家经济上的一致，孔夫子主义的统一思想，便是国家的这种一致的象征和它的工具。孔夫子道德的影响首先在于严格的等级从属和绝对服从的关系，以及相信英明的统治者“绝对正确”。

必须看到，中国这个国家的文明和文化的发展达三千年之久，而与此同时其它古老和发达的文化被毁灭和早已灭绝了。在民族主义的倾向不断增长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不仅会导致民族独特性的概念的产生，而且会强调民族独特性和得出结论，即今天的国家——作为国家，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迄今整个发展的顶峰，它应该成为全世界的榜样。

因此，最近时期以来，在中国的报刊上我们能够读到说什么欧洲人还像野兽一样生活在森林中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已有很高水平和悠久历史，关于不是哥伦布、而是中国的佛教徒发现了美洲的消息，就不足为奇了。人口众多也促使形成民族伟大的概念，而这后来在“大跃进”期间表现为，人口众多被描写为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主要源泉。

自然，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必须寻求如何使成百万农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的道路。乡村成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根据地。首先在乡村取得政权，然后再攻占大城市的思想，成了中国革命的策略。大部份参加革命斗争和入党的革命干部和党的组织工作者是来自农民的队伍。就是今天的情况也不会是另一个样子。最近公布的关于党的组成的材料虽然是一九五八年的材料，但是从这个时期起不能发生根本的变化。按照这些材料，中国共产党是由三分之二的农民和三分之一的工人和知识份子组成的。

这个事实本身就带来了党的不正确的、非布尔什维克化发展的危险，在党内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会占上风。在中国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会成为小农群众决定社会主义胜利的观点增多的泉源。过低估计，甚至于轻视工人阶级作用的危险也与此相联系。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人数不多，一九二七年以后，它的革命部份基本上被从肉体上消灭了，革命根据地在远离工业中心的地区。

列宁曾多次指出在那些小资产阶级分子起着自己的作用的那些党里，小资产阶级思想日益增长的影响的原因。“革命政党在它直接或间接实行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联系、联合和结合的情况下，在革命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急剧的转折的情况下，最容易害革命空谈病。”（《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过去曾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显然，只有彻底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不断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防止它的唯一的途径。毛泽东曾写道：“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第993頁)

从某个时期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忘记了上述基本真理。党过去的“强调”党的领导人“无产阶级出身的必要性”的决议开始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农民们被当作是现成的革命家。中共领导已停止抵制在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在增长、一整套左倾的假革命词藻在增加、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以及中国领导人目前政策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主要根源。

中共领导在对内经济政策中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表现之一，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急躁，不仅表现在提高生产的速度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要把农民在很短的时期内变成几乎是共产主义的人的态度上面。

后来，由于这一冒险主义的政策——它向人民允诺勒紧几年腰带就会世世代代幸福——，在中国的經濟中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由于经济上的失败，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中心，转入到政治领域。就这样，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也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中。拒绝和平共处政策，相反地却号召进行革命战争——永远和到处进行武装斗争应该是革命战争的唯一手段——就是它的表现。

与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狂热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民族主义的倾向增长了。表现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对立起来的民族自私性和局限性。民族主义成了目前中国领导人政策中的推动力。民族主义导致中共领导越来越想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建立自己的霸权和制定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政治纲领。为了这些目的，中共领导从意识形态争论的领域转向对苏共和苏联采取敌对的政策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大规模的分裂活动。

对苏共的威望和苏联的和平政策所进行的完全恶意的诽谤运

动恰巧证明了是肯定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地煽起边境冲突、中国领导人对待原子武器问题的态度以及对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非无产阶级的作法也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民族主义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始过份地强调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特点的意义，把这些特点作为所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例。刘少奇在一九四三年（那时他已是中共中央的书记）写了一篇题为《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发展中，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比其它任何党都远为丰富的经验。这意味着所取得的经验比苏联共产党多。

把中国共产党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的特点强调为目前时期的范例还证明，中国领导人混淆各种历史阶段，公式化地、对形势不加新的分析地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搬到变化了的今天的形势中去。

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整套不正确的观点都渊源于错误地估价我们目前的时代、虚伪地解释现时代的主要矛盾、不了解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出现和发展而出现的新的质变和新的力量对比、低估核战争的危险——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僵硬的坚持中国革命时期的旧公式和企图把中国的革命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范例而得出来的。

过高估计发展特点和把这些特点与普遍规律相对立的这种主观主义的企图，在目前时期还表现在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方面。很明显，中国是在落后国家的复杂条件下，带着糟糕的经济和政治遗产以及对目前的思想有着巨大影响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残余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为了打碎封建主义的镣铐，保证从封建的依赖性和落后性向社会的进步过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自己特殊的形式，这也是自然的。但是，在某个时期

以前，就連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也沒有把这些特点与社会主义建設的普遍規律对立起来。大約到一九五七年，中共領導基本上採取了正确的方針，特別是以国民經济和农业合作化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为方向。同时，把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緊密合作放到了首要地位。当然所有的这些国家都非常愉快地注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所取得的成就。

显然中国領導人因成就而冲昏了头脑。小資产階級的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野心，在他們的头脑中激起了迅速取得領導权的可能性的想法。他們开始过高估計自己的力量，并愈来愈把基于无产阶级原則上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合作置于与“依靠自力更生”方針相对立的地位。在1958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上发生了走向更坏方面的公开轉变，当然，这种轉变早已成熟了。这次會議的結論是以所謂三面紅旗（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和上述的自給自足的方向——走不同社会主义陣营其它国家合作的自己的道路为方針。如果中国的报刊和中国領導人实际上是从这个时期起就忽視涉及到包括在莫斯科文件中，特別是1960年声明中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普遍規律的話，这絕不是偶然的，是与上述的發展有联系的。

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从意識形态的爭論轉到了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大規模的分裂活动，把分歧也带到了国家关系中，这一切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領導今天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并且他們力图把自己的領導权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領導开始加速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設共产主义的方針，无疑地出自这种企图。人民公社旨应成为新的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更为先进的、主要是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走向按需分配和消除城乡之間的差別的中国的范例。同样，旨在反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結論的中国共产党的目前的

思想綱領被作为中国的范例而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綱領是与1957年和1960年通过的莫斯科文件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总路綫是完全相违背的。

作为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的一部份、今天并渗透到整个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去的所謂毛泽东思想，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部政策的基础。在个人迷信的帮助下，毛泽东被逐渐抬高到立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絕對正确、永不犯錯誤的領袖的地位。1945年4月中共中央七中全会的決議中就党的历史談道：“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論，創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学說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說。”（《毛泽东选集》第3卷，捷文版第257—258頁）

毛泽东的話被說成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应毫无异議和毋庸置辯地具有法律的效力，并是解决每一切身情况的指南。毛泽东的著作被崇拜为聖經。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进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的运动。报刊宣传那些学会背頌毛泽东思想的人，并十分严肃地建議每天至少讀五頁毛泽东的著作，并給这些或类似的語言以篇幅：“太阳也不能和它（毛泽东思想）相比。太阳只在白天发亮，毛泽东思想日夜射出光芒。”

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已公开地說毛泽东思想具有普遍意义，特別強調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具有普遍意义，并愈来愈經常地把它說成为“我們时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称这一思想是对所有人民、特别是东方人民的解放斗争的重大貢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迷信的保持和增加是中共领导对苏共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采取否定态度的明显的原因。今天，中国领导人——和过去不同了，一开始时他们甚至赞同了代表大会的结论——公开地和全面地宣布了他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否定态度。坚持个人迷信时期教条主义的思想，把中国自己的经验教条地搬到今天，这一切是和中共领导在实践中拒绝在新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的首領们对作为建设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物质基础问题——的忽视态度或者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质上的拒绝态度等就是这一切的证据。

这种态度也证明，力图将毛泽东置于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上，使他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党的政策和活动的所有问题的最高仲裁人，是中共今天对苏共二十大的态度和对消除个人迷信和恢复党的工作的列宁主义准则问题的态度的动机之一。

无疑，力图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恢复到个人迷信时期和把自己的领导权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现在的态度和分裂主义路线是不符合客观情况的，因此虽然它还能继续一个时期，但是它不能以胜利而结束。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现在再一次坚决谴责中共领导的路线，并力求采取制止这种行动和加强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团结的措施。这就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路线、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团结最终必须和必然胜利的保证。

(译自 1964 年第 14 期捷《党的生活》杂志)

中共的“三面紅旗”政策

瓦茨拉夫·霍拉克

中国共产党于 1958 年开始实行的“三面紅旗”政策——即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所謂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中就表明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把中国的国民經济引入尖銳的不平衡和严重的困难之中。尽管从 1961 年开始，实际上放弃了这一政策，但这所謂的“三面紅旗”直到今天还受到頌揚，虽然劲头在減弱。中国領導，首先鉴于使得生活水平有很大降低的困难的經济情况，不敢对 1958 年至 1960 年这段时期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評的估价。在这段时期中，这一政策是中国不顾其它各兄弟党的意見自己主动在全中国执行的。

同时，中共領導对这“三面紅旗”的态度本身也不是沒有趣味的。继完全否认危机的形势成为站不住脚的之后，最初羞怯怯地承认“在領導工作中有一定的缺点和錯誤”，并把这些困难归咎为 1959—1961 年中国所遭到的自然灾害的規模，后来归咎于苏联专家的撤退。众所周知，苏联专家是 1960 年才撤退的，那时“大跃进”的失敗已完全明显了。此外，沒有任何苏联专家参加制定“三面紅旗”的政策。中国領導也一貫把这一政策的創作权只归于自己的名下，并称它为“中国具体情况的产物”和“把馬克思主义創造性地运用到中国的条件”。

* * *

在解釋“三面紅旗”政策的具体內容之前，必須首先来談談这个問題：中国是否存在要求改变一直执行到 1957 年年底的經济政

策的具体条件，中国领导的主观主义概念在怎样的程度上在这里开始发生作用和最后占上风。

中国的人民政权在 1949 年确实面临着巨大的任务，中国过去落后的状况、它的广大的幅员和众多的人口，更增加了这一任务的复杂性和规模。在 1949 年至 1952 年期间，尽管有朝鲜战争的消极影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把自己的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并在许多部门超过了这一水平。经过一系列民主改革，首先是土改，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巩固了人民政权。

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够着手进行具体体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中的国民经济的长期的计划发展，并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这就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以及工商业中私有资本主义成分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取得了很高的发展速度。在此时期，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 19.2%，工业产值增长了 141%。农业生产提高了 25%，年平均增长为 4.5%。中国是调动国内资源和由于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同苏联的经济互助与合作才取得这一高速度的。在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时期，这种合作对中国说来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当时无法从别处购得的全套工业设备，这些工业设备今天已成为近代中国工业的脊骨和基础（原注：在苏联的援助下以下工业部门得到改造，如冶金、采煤；或者建立崭新的工业部门，如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航空工业、石油开采等。基本的地质勘探也是在苏联帮助下进行的，这一行业在旧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冶金工业、采掘工业和动力工业等生产的增长绝大部分是依靠苏联的机器设备取得的）。另一方面，中国用原料(矿砂)、农产品和消费品(纺织品等)来偿付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机器设备，而这些东西当时在世界市场上

是沒有銷路的。

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所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也預計到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規定工業總產值約提高一倍，農業生產約提高35%。中國這時已經能夠依靠相當穩定的國民經濟、首先是工業，以及同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是同蘇聯的日益增長的經濟合作。

1956年與前一年相比，工業生產大約急劇提高了31%，基建規模約增加了62%，農業生產約提高了4.9%。但隨着生產的提高也帶來一定的困難（例如由於不適當地提高工資和吸收過多的人員就業而造成的市場供求間的平衡的破壞）。這些困難在1957年使得國民經濟、首先是農業的發展速度有一定的降低。儘管如此，中共中央全會摒棄了認為1956年的增長是“飛越”的看法，並規定提高經濟的發展速度（例如宣布增產節約運動）。之後，毛澤東提出了十五年在主要工業產品生產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

為了提高農業生產，從1957年10月到1958年3月在全中國開展了大規模興建水利工程運動（水渠、井等）。在1958年5月，已估計夏季作物的收成增加大約1,000萬噸，糧食的總產量大約增加10—20%，即增加到1,850萬噸至3,700萬噸。

在這種形勢下，於是在1958年5月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宣布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和提出這一總路綫的主要方面，例如，“優先發展重工業，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同時並舉”。

除此以外，還規定了技術革命的任務，例如“把包括農業和手工業在內的全國經濟……轉到現代化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實現城市和農村的電氣化，“使全國的大中城市都成為工業城市……，使全國各省、自治區以至大多數專區和縣的工業產值都超過農業

产值。”

文化革命的任务(消灭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等)也是艰巨的。

这些任务极其复杂和艰巨,它证明,只应该从长期的远景角度来理解这些任务,而决不是最近几年的问题。

但正是这一会议把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强调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

同时把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论断作为这一政策的理论根据。例如1955年12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这一选集所写的序言和他在1955年写的题为《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的文章中的话。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

毛的这些思想和总路线成了争取急速提高生产的运动的信号。“右倾保守观点”被看作是这些活动的主要障碍。

首先在农业中出现了大大提高生产的运动——“大跃进”的运动,在这方面由于以前兴修水利的措施、积肥运动以及巨大的潜力是存在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产量和生产的前提。“试验田”运动开始了,在试验田中达到了破纪录的产量。尽管很明显,试验田的产量并不能概括大面积的产量,但仍然逐渐发生了单纯地追求产量的纪录(把这称之为“放卫星”)和不负责任地夸大对总产量估计的情况。

在农业中的“大跃进”——由于它,“粮食作物的总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90%,按人口计算全国粮食的总产量将达到五百公斤”(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的基础上,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得出结论,“农业战线伟大成就也要求工业战线迅速赶上”,“从今天起,必须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工业管理

上”(同上),而又不放弃和削弱对农业的管理。工业被称为国民經济的基础和它的“关键”,鋼铁生产被称作“元帅”。

在这次会议上,已第二次提高了鋼铁冶炼计划中的指示数字。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月会议上,把原訂的鋼的生产计划规定为 620 万吨。在 5 月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把鋼的生产提高到 800—850 万吨。但中共中央八月会议已发出炼 1,070 万吨鋼的号召,这比 1957 年(鋼产量为 530 万吨)增加一倍。铁、电力、煤的采掘量也預計有类似提高。

自然,实现这些沒有事先經過准备的过高要求,超出了現代的中央管理工业的可能性和中央政府的物质和財經资源。因此通过宣布在乡下的合作社中和在这个时期已經形成的人民公社中建立炼鋼铁的原始高炉的运动(根据总路綫的要求,发展地方工业,从而加速首先在农村的工业化),把这一重担轉嫁到乡村,即农民的身上。小高炉也开展了“放卫星”的运动,在很短的时期內,小高炉的数量达到了天文学的数字。如果說从 1 月至 6 月底只有 11,000 个小高炉,而 8 月底就有 24 万个,仅在 9 月一个月,小高炉的数字就增加到 60 万个,而至 1958 年 10 月 1 日,大約已有 70 万个小高炉。同时,小高炉的生产、操作、大部份用最原始的工具进行材料运输(用籃子背,或者用独輪和双輪車送),要求把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轉移到这里,而这种无限的努力沒有換得相应的經济效果。除掉运输外,很快产生了质量問題和这些生铁或“鋼”的进一步加工的問題。

尽管如此,在农业和工业中仍繼續大跃进。1958 年官方的计划完成成果給人們的印象是,一切都进行得順利。地方、省党委和人民委员会为追求纪录而上报的数字,不仅沒有在公布前予以核實,而且在制定“繼續大跃进的決定性的一年”——1959 年的计划时,也是从这些数字出发的。1959 年的计划规定作为“工业战綫

的最重要的任务”的鋼的产量将提高到 1,800 万吨，生铁的产量 2,300 万吨，粮食 52,500 万吨，棉花 500 万吨。

在 1959 年 8 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八中全会上，官方第一次談到“大跃进”的政策是建立在虛报的数字的基础上的。全会修改了 1958 年的結果，降低了 1959 年的計劃的指示数字，而这个数字是在数月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月會議上通过的。

这次會議的材料說：“农业統計机关由于对这个空前大丰收的产量估算缺乏經驗，在許多情况下是估得多了”（原注：就这样地把中国领导人因失策所負責任轉嫁到低級国家和党的机关身上去），1958 年粮食实际产量为 25,000 万吨（原为 37,500 万吨）、棉花为 210 万吨（原为 330.9 万吨）、由新式設備生产的鋼为 800 万吨、生铁为 935 万吨。其余的“鋼”和铁都是小高炉生产的。与此相联系，決議指出，“鉴于今年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較紧张，所有土鋼的生产，建議由各地按照具体情况自行决定，自产自用，不再列入国家計劃。”相应地降低了 1959 年的計劃，鋼降至 1,200 万吨（原为 1,800 万吨），粮食降至 27,500 万吨（原为 52,500 万吨），棉花降至 231 万吨（原为 500 万吨）。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迹象說明“繼續大跃进”是不现实的，但中国领导繼續坚持这一盲动政策。決議宣称，1959 年将可以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劃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的任务，“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标应成为今年的基本任务”。在會議的材料中还談到，說什么“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大約可以在十年之内实现，农业发展的十二年綱領将可以在更短的时期内实现”（以后又說可以縮短五年至七年）。这次會議还強調指出，“对于实现今年的跃进來說，主要危險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傾机会主义观点，……他們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并責成各級党委会与他們进

行坚决斗争。

因而在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不顾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困难，过高估计国家的经济能力和人民群众的工作热情的主观主义看法和希望，已完全占了上风。

1959年的国民经济成果已完全表现出“大跃进”下降的趋势。按照官方的材料，钢的产量为1,335万吨，生铁的产量为2,050万吨，粮食的产量为27,000万吨，棉花的产量为241万吨。应为“大跃进”的第三年的1960年的官方材料，与前几年在宣布经济材料时所一贯伴随的大吹大擂相比较，非常简单和不完整。官方发表的钢的产量应为1,840万吨，生铁为2,750万吨。粮食提高13%，棉花提高10%。1960年的这些材料，至今是官方公布的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的最后的具体的材料。

下述表格说明1958—1960年时期，即所谓大跃进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状况（一向只列举两项主要的工业和农业生产）：

产量 (以100 万吨为 单位)	1957年 的数据	1958年 原来的 数据	1958年 修改后 的数据	1959年 的原订 计划	1959年 的数据	1960年 的数 据**	1961— 1964
钢	5.35	11.08	8*	18	13.35	18.4	未公布
生铁	5.94	13.69	9.53*	23	20.5	27.5	官方的
粮食	185	375	250	525	270	302.4	具体数
棉花	1.64	3.319	2.1	5	2.41	2.651	据

* 指拥有新式设备的近代工业企业的生产；原数字的其余部分为原始小高炉生产的所谓的钢和铁。

** 尚无法确定所列举的和“核对过的”工农业数字是否符合真实情况。某些西方数字（尽管可能缩小了实际情况）如下：例如粮食，1958年为19,500万吨，1959年为17,000万吨，1960年略超过18,000万吨。

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理论，是从过高估计中国国民经济的现实可能性和把辩证法的某些学说机械地运用到它的发展中去出发的。事先并没有进行任何准备工作，就从根

本上改变过去实行的經濟政策。这些理論的实质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急躁情緒和主观主义。对“大跃进”理論來說，很明显，从一开始就贬低了国民經济各部門的平衡发展的份量，甚至于把产生不平衡当作客观規律性。

刘少奇在1958年5月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說：“有些人又担心实现‘多快好省’的方針会破坏各生产部門之間、財經收入和支出之間的平衡。不平衡的情况一向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我們將实现这一方針，同样会出现不平衡，因为每一个平衡都总是暫时的、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絕对的平衡是沒有的”。

所謂“波浪式发展的理論”應該成为“大跃进”的“理論上的支柱”，这一理論一方面应证明大跃进是有根据的，另一方面为继它的失敗之后，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的“調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辯解。在这里也发生了对辯证法的庸俗濫用，首先是通过关于质与量关系的辯证法則的平衡論来庸俗地濫用辯证法。与此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写道：“一切事物运动的規律都是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发展，經济的运动也是这样。……可以預計，經過两三年的時間，我国工业一定会在新的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巩固、更加充实、更加提高，必将出現更好的跃进”（1961年第3—4期《紅旗》）。

张新柔（音譯）更带有特点地来描述这一国民經济的新“理論”，他写道：“……一般說来，国民經济是以高速度发展的。但在一定的基础上和一定的条件下，有时是高些，有时又不是那么高，之后它的发展又走向更高的速度。”对于为什么会出現这个波浪式的发展，他的回答是“受客观規律所規定”。根据他的看法，这些規律，例如第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經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間的矛盾”，它“在社会主义經济的波浪式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則是那些存在于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生产的量和质

之間的矛盾，等等。在这个基础上，他然后得出結論說：“在每次跃进之后必須調整国民經济各个方面、各个部門的相互关系，創造出新的平衡，”又說：“跃进——調整——再跃进，这是国民經济的螺旋式和波浪式的发展，反映出社会主义經济发展的客观进程”（1962年1月11日《黑龙江报》）。

捍卫中国领导人的粗暴錯誤的企图，使得中国的經济理論与资本主义經济周期性发展的辯护士非常接近。

* * *

1961年以后所采取的新方針完全证明，“大跃进”政策使中国国民經济陷入巨大的困难之中，而且在几年之内不可能进行国民經济的計劃建設。但是，还有必要先来談談第三面“紅旗”——人民公社，它是和前面那两面紅旗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的，也許它是最明显地表現出中国领导人的主观主义的冒险主义的傾向。

雖然我們可以在1957年农业生产社合并的过程中和1958年初（此外，与兴修水利运动有关）就可以找到人民公社的雛型，但是毛泽东1958年8月到几个合作社联合在一起的称之为公社的村庄訪問，并对这些公社表示贊揚，是对建立公社的主要推动。因此，建立人民公社的倡議出自中国领导，首先出自毛泽东。同时，人民公社也是总路綫的要求——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和“大跃进”——的結果。自然，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物质、財經和人力资源方面都相当薄弱，不能够胜任在通过原始高炉在农村进行工业化的同时，无限地提高农业生产的任务。因此在1958年秋天，在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不仅應該保证农业生产，而且應該保证工业——地方工业——生产，它领导工业、商业、教育和民兵的軍事訓練。）的名称下出現了合作社的群众性联合。并社是大規模进行的，把1957年的75万个原来的合作社合并为大約24,000个人民公社（1960年4月），人民公社平均比原来的合作社大两倍。同

时不仅在一个村子的范围内，而且还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出现了人民公社，并且和人民政府机构合而为一了。人民公社的规模（被认为是公社的优越性之一）更大了。例如在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甚至建议建立所谓的“县联社”，这样就建成了庞大的、几乎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单位。这一活动的目的是加速“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逐步过渡”，根据具体条件，“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但是，这个时期，在中国迫切的问题不是这种过渡，而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其发展还远远不符合生产关系所赋予的可能性。

与公社的大紧密相联的是所谓公社的“公”。尽管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过，但是人们认为这一概念指的是将合作社员的全部小的生产工具变为集体所有制。例如河南省“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第五条中说：“合作社员在加入公社时，除少数家养牲畜和家禽外，必须把全部自留地、私人住宅、牲畜、树木和其它生产手段都交出，作为公社财产”（1958年8月7日《人民日报》）。除其它外，这导致在入社前，屠杀耕畜，这一方面是由于害怕集体化，另一方面由于宣传公社在最短的时期内就能成为生产出各种丰富产品的天堂。须知，到处画着这样的口号：“苦战三年，万年幸福”，或老写这样口号的文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1958年10月27日《青年报》）。

关于建立所谓“劳动组织军事化”的尝试，也与这些左倾冒险主义的乖常行动相联系，它“就是组织工厂化，就是说公社的劳动组织应当像工厂、像军队那样有组织有纪律”（《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例如“劳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些口号和把大批的从人民解放军复员的军人安排到公社领导里

去都加强了这些倾向，而后他们就用民兵和军队组织来代替了劳动组织。

在报酬问题上也产生了严重的错误，在几种方式之中占优势的是所谓的实物供给，这就是在公共食堂里吃免费饭和用货币支付的奖金报酬。特别是在头几个月中，实物报酬部分占了大部分（占70%左右），而那微薄的奖金（实际上只是零用钱）也无法根据社员劳动的量和质以及熟练程度来颁发，这就导致了平均主义的倾向和劳动道德的下降。而这些实物供给——吃大锅饭等，却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劳动道德的败坏还由于这样的结论造成的：即生产队（低级单位，其大小相当于原来的合作社）的劳动成果，生产队的“赢利和亏损由整个公社承担”，这样就损害了原来的富社。在人民公社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就是使人民公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这就否认了商品、价格 and 价值的积极作用。

冒险主义的倾向还表现在过高估计力量和试图在最短的时期内进入共产主义上面。例如，“徐水”（在河南省，毛泽东访问过）人民公社的五年计划预计“到1963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而在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1959年使土地的耕作机械化并开始农村的电气化，到1963年完成高度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又例如“超英”人民公社的部分口号是：“苦战一年半实现工业化、机械化和电气化！”（1958年8月26日《河北人民日报》）不仅在乡村建立了人民公社，甚至在城市中也建立了人民公社，在1959年就有数千万居民参加这种公社。在1961年之后我们就在中国的材料中找不到关于这些公社的命运的任何消息了。它们已不存在了。

不到三年的时间就表明建立和组织公社的那些原则是站不住脚的。过多地把劳动力从农业生产抽调到“地方工业”中去、在公

社领导和报酬方面所犯的严重的左倾错误，等等，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下降，而后又由于遭到自然灾害，农业生产继续减产。

现在形势要求马上解决问题。因此，在1960年年底，人民公社进行了改组，实际上只留下一个名称，因为生产队或者生产小队又成了基本经济和领导单位，其规模大部分相当于原来的农业合作社。但明显的是，中国领导没有找到勇气去公开地重新估价人民公社运动，具体纠正的指示也没有公布。继将近三年的“胜利冲昏头脑”（它导致了民族主义倾向在中国滋长起来）之后，有了一定的清醒。

至于怎样地冲昏了头脑，毛泽东所强加的“三三制”这个例子便是证明。在夸大1958—1959年的收获量的数据的基础上做出结论，保障中国居民的吃饭问题已最终解决了，迅速和大量地增加人口，是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因素之一，这里缺乏劳动力。因此耕地面积应缩减到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留作轮休、植树造林及种植观赏植物。“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全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都应当为此而努力”（《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因此，在1958年，就在“大跃进”的印象下，放弃一年前曾广泛宣传的控制生育的运动。

作为庞大而臃肿的独立的经济管理单位、同时又是国家政权单位的人民公社的建立，并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情况所产生的。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远没有受到当时的生产关系的限制（农村中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当中国不仅还没有实现对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有影响的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而且甚至还远没有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电气化以及农业劳动的机械化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是最近若干年内的课题。

在报酬（在公共食堂吃饭）方面被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的那些

平均主义的消費現象，是建立在低級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产品丰足之上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最小的范围内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尽管中国领导人的說法与此相反。这种否认物质兴趣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基本刺激之一的平均主义傾向只能导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声誉的破坏，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人数众多的过去的小生产者即农民的烏托邦式的平均主义傾向的表现，而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第一个例子（例如在十九世紀中叶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就表現出了强烈的平均主义傾向）。

除此以外，在損害农民的情况下加速工业化的过程，把軍国主义的因素带入公社的劳动組織中去的努力，使得人們被迫把它与苏联二十年代初期的托洛茨基的类似观点相比較。

过早地把人民公社的生产資料的集体所有制轉变为全民所有制，加上“大跃进”、小資产階級急躁性的表現和跳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嚐試，是企图在这方面超过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或者首先是超过苏联，这样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里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占有领导的地位。尽管中国领导知道苏联在苏維埃政权最初的年代所产生的公社的經驗和消极結果，并向他們提醒过这些經驗和結果（赫魯曉夫同志在1958年訪中国时和毛泽东談过这个問題），但仍着手建立公社。

明显的是，中国领导实行了国家生活中如“大跃进”的政策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轉变为人民公社这样重大的变革，事先沒有經過党的最高机关，即代表大会的通过，甚至违背1956年代表大会的決議。

在国民經济中出現不平衡，对国民經济的具体状况喪失全面了解，工业化放慢，生活水平的降低，喪失社会主义建設的宝貴岁月——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面紅旗”的“伟大試驗”的結果。

对此情况的全部責任只应由中国領導来承担。把出現困难的罪过轉嫁到苏联专家的撤退或者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同苏联的外貿的下降身上的企图是沒有根据的，因为是中国領導人的行为才导致这种情况的产生。

1961年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九中全会开始实际上从“三面紅旗”政策逃跑，这次中央全会宣布了新的对内政治路綫，即所謂“調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經济水平的政策。确定农业为国民經济的基础，并把提高粮食和經济作物的生产当作关键性的任务。同时发布了抽調工业劳动力到农业中去和减少城市人口的指示。基建的規模被彻底地限制住了，工业也为了农业的需要轉而生产农业机械、工具和化肥，一些能够生产复杂的新机器的現代化的工业企业也經常这样做。同时某些分散建筑的工厂的建設未完成，某些工厂干脆不能投入生产或者开工不足。国民經济基本部門之間的关系也作了如下的改变：农业、輕工业、重工业，这就說明中国工业化的速度将在許多年内大大地減慢。尽管作了这些实质性的糾正和“三面紅旗”政策实际上遭到失敗，但中国領導人並沒有放弃它，仍繼續在国内外贊揚它、宣传它，甚而提出这样的看法，說“調整、巩固、充实、提高”新政策應該为来年“新的、更大的跃进”創造条件。

值此，不能不至少回忆起一篇社論的結論，这一結論形象地表明1958—1960年的“大跃进”的后果及未来可能进行的类似試驗的后果：“聪明的长跑家，纵然跑得不快，但跑得均匀。如果只是快跑，不均匀，就会跌倒，其結果則是‘欲速則不达’”（1962年3月9日《人民日报》社論）。

中共的不正确路綫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損失，很难用这一含糊的自我批評来挽回，更不能用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分裂活动加紧努力去轉移对自己的錯誤的注意力来挽回这些損失。

中共的所謂“三面紅旗”的政策，是助長中國領導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基本問題，首先是對今後發展、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式和方法的錯誤看法的主要根源之一。中國領導對中國對內政策和經濟問題的極其錯誤的和有害的觀點是同對世界事態發展的錯誤看法和估價不可分割地聯在一起。這構成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其實質首先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冒險主義。

（譯自 1964 年第 8 期捷《新思想》雜誌）

奇怪的撮合

阿·彼特里納

在比較引人注目的世界事件舞台的背后，一件相当不惹人注意的事情在慢慢地开始发展。它几乎躲开了人們的注意，而这个事情是喜欢迴避人們的注意的。这就是卖弄风情，相互撮合。大家知道，在調情的时候对于不欢迎的众人是不感兴趣的，最好的时候是黄昏。

調情的是两个从外表上看不是同种族的伴侶——中国领导人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某些集团。早在几个月前，法国以及后来西方的报刊上都出現了一条值得注意的消息。消息說，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同法国代表的一次談話中談到所謂中間地带的理論。根据北京的这个理論，反对（或者能够反对）美国的資本主义国家构成（或者能够构成）这个中間地带。毛泽东把法国、日本、英国……以及西德列入这些国家之中。根据这些消息来看，中国願意以某种反对苏联和美国的第三种力量的方式同这些国家建立同盟。

从这个时期起，在西方报纸上不时地出現一些評論，注意中国把这一奇怪的联盟付諸实践的嚐試。最近它們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同西德的关系上。六月底在西德的报纸上出現了这样一条消息：

“中国的新华通訊社（新中国）将在波恩建立自己的分社。这是中国官方通訊社和波恩新聞当局之間长期談判的結果……。政界人士认为，中国通訊社的这种努力是北京有兴趣同联邦共和国

建立联系的又一证明。中国人并表示，如果他们得到在波恩建立分社的贊同，他們願意取消自己在东柏林的分社”。

消息就到此为止。类似的消息还很多。

中国使自己同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嚮試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也并不是什么坏事。这种正常化是符合苏联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說明的和平共处的概念的。

自然，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也并不是什么坏事。但問題恰恰是在于，同西德寻求这种接触怀有什么目的。1955年苏联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同联邦共和国的正常化的目前的会談中，追求这样一个明显的目的：在和平共处的总的概念之内巩固欧洲的和平与安全。

自然，这一点不会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极右的集团滿意的。我們可以回忆一下，在1955年阿登納完全是在世界公众輿論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比較明智人士的压力之下到莫斯科去的。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同德意志联邦之間的談判同样地受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右翼集团的阻撓。比如就捷克斯洛伐克而言，复仇主义的报纸正在进行反对这种正常化的运动。

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們并没有开展这种运动来反对同中国可能的正常化。甚而恰好相反。例如《东方和西方》杂志在5月8日的一篇具有醒目标題的文章《中国的选择》中，把苏联对美国进行的旨在緩和紧张的和平共处的努力称之为“桎梏”。相反地却吹捧中国的目前政策。文章說：“現在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联邦共和国内也可以听到由于赤色中国的倡議而寻求双方比較能接受的东西的严正呼声，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指的是什么中国的“倡議”和“比較能接受的东西”呢？

另一个复仇主义报纸《德国东方新聞》向我們泄露了这一点。它在6月16日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

毅同西方記者的談話。在談話中陳毅談到了上述的“中間地帶”的理論。文章指出：

“在考慮德國問題時，這個論點正變成帶有刺激性的。當克里姆林宮正試圖誹謗聯邦共和國是西方陣營中緩和緊張局勢的主要敵人的時候，而莫斯科的這一總路線正好為中國關於中間地帶的理論所削弱。”

因此毫不奇怪，中國的這種“倡議”對西德復仇主義者來說是“可以接受的”。這篇文章的結尾道破了真正的意圖：

“聯邦共和國必須注意在將來更多地施展外交手段，在中國的情況下，這一切意味着處事要小心，或許要根據中國的古老的格言來行事，這個格言說：必須從自己敵人的腦後去尋找朋友。”

這一點已經相當明確了。西德復仇主義者所說的共同敵人，顯然是指蘇聯。他們應該在蘇聯的腦後去“尋找朋友”，一個在蘇聯的東部邊界，另一個在西邊。

難道中國領導人沒有看出西德的魔鬼們想從他們身上得到什麼好處嗎？

這不僅僅是某些記者的議論，全西德復仇主義者總會的主席溫茲爾·雅克施——他是蘇台德區德國人“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十字軍的捍衛者——也證明這一點。據德通社6月28日報道，他再次反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間關係的正常化。但與此相反，他宣布，“他認為聯邦共和國在北京的貿易團更為重要”。

瞧，不同的烏鴉是怎樣飛到一個樹枝上來的。那些不隱瞞自己屬於右翼的烏鴉，願意同那些自稱為左翼的烏鴉友好地蹲在一起，主要是為了使樹枝共同指向反對蘇聯。

（譯自1964年7月23日捷《紅色權利報》）

中国的首領們正在加剧挑衅

《紅色权利报》社論

1964年7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苏共中央寄出了另一封侮辱性的信件，这封信是对苏共中央6月15日的那封信（《紅色权利报》的讀者已經在7月16日看到了苏共中央的这一封信）的复信。

在苏共中央給所有兄弟党的信中，說明了对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分歧有关的基本問題的立場，在信中也提出了关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措施的具体建議。首先談到的是召开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代表會議。四年前出現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意識形态分歧越来越严重，并且已經变化成公开的爭执。如果不着手采取措施，就会导致成悲剧性的分裂，它对于革命运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的进一步发展的危害性后果，是不必怀疑的。任何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也不能不参与事件的这种发展。这里所說的不是一个党或者两个党的命运，而是关系着整个运动的命运。举行新的国际會見去制訂共同的观点已經成了刻不容緩的要求。

我們对于这一点已經习惯了，即无論就中国首領們无耻地对兄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的腔調粗暴和不負責任的謾罵來說，还是就他們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所进行的已經是公开的、毫不掩飾的和瘋狂的政治斗爭的內容來說，北京領袖們的每一个新的产物都走得“更远”了。

中国首領們以駭人听聞的挑衅来回答苏共中央謹慎的、并证

明苏共有很大耐心的信件。在苏共中央的信中說：“首先必須集中力量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經产生的困难的途徑。”在信中还表示相信，在共产主义运动局势正常化的情况下，不存在克服不了的客观障碍。

可惜，中共中央在自己签署的反对共产主义的詆毀书中，他們仅以进一步的謾罵和誹謗：“……你們失去了理智，你們胡說八道”来拒絕包括我們党在內的絕大多数馬克思列宁主义党所同意的苏共的观点和立場。按着中国首領們的看法，苏共具有“同反动派合作、阻止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丑恶特点”，它正在干着“犯罪的勾当”。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苏共的官方文件中写道：“你們自己設了陷阱，自己滾下去，落得个一命嗚呼。”

中国的破坏分子們显然把所有的这一切当作“大辯論”。他們自己把自己提升为揭露和駁斥修正主义的“严肃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他們在自己的信中写道：“你們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路綫，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首領們在很久以前就不只是攻击共产主义运动个别的綱領性的原則了。他們已經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真面貌，他們并从个人迷信的意識形态立場出发系統地攻击作为整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可是同时，他們的攻击已經完全超出了关于国际革命运动迫切問題的討論和交换观点的范围，并且变成了欺騙性誹謗的不負責任的叫喊，这是他們竭力損害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名誉的奇怪战术的一部分。

中国的首領們用憤怒的攻击来回答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国际會議上——它的召开完全是必要的——估价最近几年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总结这些变化并从中得出相应的結論所作的努力。

他們在自己給苏共的信中写道：

“你們断定‘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結束自己发展的最重要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設中接近新的頂点’,你們实际上要建立‘全民党’和‘全民国家’,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資本主义复辟做开大門。

“你們断言社会主义国家‘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协调政治行动和經濟行动’,你們实际上要兄弟国家服从你們的指揮棒的指揮,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变成你們的附屬国,变成你們的殖民地。

“你們宣称‘在目前时期’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的‘組織形式和方法出現了很多新东西’,实际上你們在宣传‘議會道路’和‘結構改革、和平过渡’的理論,和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你們认为‘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实际上你們要取消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你們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只限制在‘维护和平、确立和平共处’方面,实际上你們拒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拒絕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国家的革命。

“你們用‘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概念,代替了1960年声明規定的‘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概念,实际上你們要联合被你們称为‘明智派’的美国統治集团,你們要同美帝国主义一起統治世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你們所說的什么‘消除分歧’啊,什么寻找‘共同的东西’啊,什么要‘带着建設性的綱領来参加會議’啊,說來說去,无非是你們要强迫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的路綫。”

从中国首領們的行为和他們以信件(我們剛剛从中引用了很长的一段)而使之达到頂点的发怒的宣传运动的性质得出,他們正

在使自己的思想完全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回答的局面。在由于他们的罪过所造成的局面下，正如在包括我们党在内的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完全支持下，苏共所建议的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成为更加迫切的任务。我们党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在坚持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方面，我们党与苏联同志的观点一致，并且主张要不加拖延地召开这一会议。

召开会议决不是为了谴责谁和给他扣上侮辱性的帽子，而是为了集中努力去阐明共同的利益和寻找克服已产生的分歧的途径。在使会议的准备工作的道路上，决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东西。

中国首脑们不仅顽固地拒绝参加所考虑的会议——没有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正常化是不可能的——而且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威胁那些建议举行会议的人：“……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地宣布向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思想和组织上的团结一致进军，并且毫不掩饰自己不惜一切代价地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图。

在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同你们相反，中国共产党和其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于这些重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即大多数出身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其它变节者的各种宗派集团——《红色权利报》编辑部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表示极大的钦佩。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不可推诿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过去我们这样做，现在我们这样做，不管你们怎样咒骂，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而且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好。”

中国领导人的意图是明显的。他们拚命阻挠在最近时期召开

国际会议，因为他们认为必须首先改变力量对比，在每一个可能的国家内，建立名为“共产党的”反对党（即使它只是由几十个变节者组成）来参加会议，作为形式上代表国际运动的力量，也就是把这作为召开完全（实际上和形式上）分裂运动的会议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拖延国际水平的谈判——正像他们所说的至少要延期四年至五年——继续进行公开“讨论”的迄今的一切努力，按着中国领导人的概念当然与实事求是地解决迫切的问题毫无共同之处，而有的却是使关系紧张化，加深矛盾和辱骂他们所有的反对者，同时他们又毫不犹豫地预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代表会议称之为“宗派的”和分裂的会议。

事实说明，中国领导人走得太远了，在共产主义的队伍中，他们特殊地以引起分裂、引起纠纷为方针。这是他们在最好地为反共产主义服务。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了，阶级敌人正在竭力千方百计地利用我们队伍中的分歧。帝国主义反动派，特别是在美国，正在竭力加强自己的阵地和发展向革命和民主运动的进攻，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增加战争的危险性。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绝不能回避去完成它们的重要任务——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努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些党的绝大多数是赞成团结，赞成尊重国际革命运动的共同的国际主义利益的。中国领导人所制造的任何障碍都是不小的。毫无疑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的力量将继续占优势，它们将把自己的关系建立在列宁主义的准则之上，将共同商讨一切基本问题，尊重在各种条件下起作用的特点和在同共产主义所有敌人的斗争中团结一致地前进。

（译自1964年8月5日捷《红色权利报》）

广島和东京

茲比涅克·馬雷克

在广島举行的禁止核武器的国际代表會議成了为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本身和它的核兵工厂所带来的真正危险的共同行动的有成效工作的地点。會議举行的那几天，恰巧是由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行动，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以及目前美国在南越的战争有扩大到东南亚整个地区的威胁，这就給这一會議增加了新的重要性。所通过的要求禁止地下核爆炸、抗議法国的核試驗、反对扩散核武器和支持建立无原子区的決議证明了，广島代表會議完成了自己主要的任务——制訂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的具体行动綱領。

如果說广島會議的結果是积极的，它不同于东京代表會議的話，那么，这首先是由于广島代表會議未为分裂活动所破坏。

对前几天在东京所发生的事情，不能默不作声。我們所刊登的各通訊社的报道，对中国代表团和它所組織的人圍繞东京禁止核武器代表會議开幕所演的一場庸俗的戏已給予我們一定的概念。如果我們意識到这个會議是在1945年的广島原子悲剧周年之际定期在日本举行的話，就加倍感到所演的戏的庸俗，……尽管如此，但我們首先把全貌加以补充，以便使人們完全清楚，刘宁一和他率領的一組中国人以及他們的追隨者是怀着怎样的企图由北京到东京来的。

首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被邀請的代表团于規定的時間到金鋼飯店去的时候，发现會議已經开始，数日来中国人和他的日本

及其他助手們就在那里討論如何阻止世界和平理事會、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北京的分裂主義分子所不喜歡的其它國家的一系列代表團的發言和參加。除此以外，作為一些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已經坐在飯店大廳中的一些人，沒有任何人授權予他們，而是他們直接從北京同中國代表團一起到達那裡的，他們長期住在北京。

戲按照北京的導演在進一步發展：執行主席違背已採用的次序，（這就是按照自己國家名稱字母排列的先後發言）“忘記了”拉丁字母表是以字母“A”開始的，而越過阿爾及利亞和阿根廷的代表們，也就是他們在中國人的眼目中也找不到寬恕。然後接着而來的是一些年輕的肇事者的發言，首先是對蘇聯代表團的侮辱性叫喊以及惡意地关掉那些他們否則就無法壓制的人的麥克風，類似的行為太多了，因此無法對如何才能使廣島和長崎的悲劇不再重演這一主題着手做些什麼。

東京大會就是這樣被中國代表所破壞的。三十二個代表團不得不把這些告訴給公眾和離開以那種可耻的方式導演的“討論”。這些代表團中的許多人，今年是懷着試圖糾正一年前同樣是他們這些人在東京所造成的損失的意圖而來參加第十屆代表會議的。那時曾由於中國的不良活動，反原子彈運動遭到了分裂，而今年召開了兩個代表會議，即東京代表會議和廣島代表會議。因此，今年一些代表團試圖予以糾正，力圖通過參加兩個代表會議來克服分裂。這一旨在加強整個和平運動和實現這一運動的目標的崇高意圖從一開始就被北京代表的可耻的分裂活動以最粗暴的方式所破壞。

但是，分裂者們陷入了孤立。他們的行為受到了應有的尖銳的譴責，廣島大會能夠就事論事地研究自己主要的、崇高的使命。

在东京所发生的一切是北京所組織的可耻的分裂活动的另一个证明。这也是他們企图破坏和平陣綫的一个比較重要的例子。

(譯自 1964 年 8 月 8 日捷《紅色权利报》)

爭取團結的不可推卸的責任(節譯)

《紅色權利報》社論

中共領導人百般阻撓尽快召开国际會議的思想，和他們為了自己的態度找根據，大約列举下述三个主要論据：說什麼誰都无权召集類似的會議，所以不能举行會議；因为苏共和中共沒有取得协商一致；第三个反对的“論据”是什麼會議沒有充分准备，因为沒有举行像 1957 年那樣的事先协商。

在回答 1957 年已決定要苏共承担在和各兄弟党协商后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的職責时，中国領導人所持的立場，好像他們有反对召开共产党領導人的国际論壇的絕對的否決权。众所周知，苏共會耐心地力求与中共領導人会談，但是他們最后中斷了會談，并示威性地表示，他們現在沒有兴趣會談。他們喋喋不休地硬說，現在不是举行會談的时候（但是这究竟按照什麼能知道呢？），他們和苏共之間沒有取得一致。难道整个世界运动的問題的解决应取决于这个嗎？两个党是不能解决整个运动的問題的。《真理报》写道：“我們党坚信，坚持这样的观点意味着将回到个人迷信时期，把党分为上級党和下級党”。

这根本涉及不到苏共和中共之間的分歧，也涉及不到两党領導的分歧，而涉及到的是中共的首領們在与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問題中的反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实践。至于第三个“理由”——會議沒有充分准备，《真理报》提醒說，实际上从 1962 年起两党之間就已經进行了真正的协商，而今天的立場已經明确。在中央机构的決議、声明、双边會談的結果以及在其它許多形式

中都表达了这些立场。绝大多数党坚持不拖延地召开会议，并提出于明年年中举行会议的一致建议。因此也就实现了1957年的条件。与此相反，中共领导却说，在可能举行类似的会议之前延期四年至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是必要的，并且首先必须做巨大的准备工作。《真理报》写道，如果要是那样理解克服分歧的观点和加强团结的努力的话，那么“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已经对此作了四年的努力”。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这些问题，同意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和建议，并决定积极参加筹备会议和会议本身的讨论。

筹备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的限期和筹备会议本身的期限是足够的，因为各个党可以重新在讨论前研究材料，审议各种立场，并准备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开始交换看法的建议。1960年在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和中共领导人的立场交锋时，起草委员会曾紧张地工作了整整一个月。由于预料到这次将需要较长的期限，各兄弟党建议于明年年中举行会议。也不能排除，一些共产党在规定的日期内不派出代表参加起草委员会。对此每一个共产党自己都有权决定参加共同的工作还是不参加这一工作。但是，其它党也同样有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代表会议的良好筹备和它的顺利进行作一切努力。

中国领导人断言，在会议上不能取得任何成果，宣称它是不合法的，并力图破坏它，说什么会议旨在开除某些党，使这些党孤立。但这不是会议的目的，苏共、捷共、会议参加者的绝大多数都不是怀着这种意图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会议的。会议旨在讨论与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有关的问题，旨在集中力量拟订共同的立场，以便能最大限度地表达一切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和寻求共同克服困难的途径。关于这一点《真理报》的文章写道：“对于我们党来说象对绝大多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

样，认为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是同维护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牢固地、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将竭尽全力地捍卫自己不止一次宣布的观点：各共产党会议的召开不是为了从共产主义运动中‘孤立’这个或那个党，不是为了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任意赶走这个或那个国家和在这个会议上各共产党互相进行控告和诽谤。苏共从这个观点出发，面对着共产主义运动中观点上的分歧，首先必须努力制订共同的观点，努力使我们能够把联系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东西印发出来和寻找克服发生在我們之間困难的途径。”

《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强调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要求在会议召开之前就取得一致，这意味着不仅事先就放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过试验的、行之有效的活动方式，还意味着使它丧失创造性的建设性的作用。中国领导人硬说，只有他们有真理，那么他们为什么害怕真理，为什么不願意解释清楚和捍卫自己的“真理”呢？

以前的会议的决议和文件，宣言和声明是协商的出发点，在这些文件中规定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未来的会议一定是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即使它不能立即在所有的問題上达到完全的一致，但它无论如何都将是有益的。《真理报》在另一方面又提醒说，1960年会议召开的原因就是为了努力了解中国首領們的各种观点和立场。

新的会议将在远为复杂的情况下举行，这是事实。但是，像苏共一样，我们党也确信，纵然将不能在所有問題上取得一致，但是在那些存在这种一致的地方，存在进行合作的許多可能性，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一致上面，并旨在加强、加深和扩大这些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要举行会议的目的。所有共产党对世界运动的团结都同样有责任，也必须意識到自己对集体解决共同的問題所承担的历史責任。絕大多数兄弟党不仅感到这种責任，不希望分裂，而

凡还知道，团结既不能通过原则性的让步达到，也不能自己形成。
现在正在联合在一起的集体努力，是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途径。

（译自1964年8月12日捷《红色权利报》）

同苏联的友誼是我們的 最大保证(节譯)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4年8月27日在欢迎
苏党政代表团的捷苏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于經過考驗的、为所有兄弟共产党所通过的、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所确认的总路綫之上的共同的一致行动，对在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和成就，具有无限的意义。它的行动力量还淵源于这一事实：历史性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結論是这一路綫的有鼓舞力的和牢固的思想基础，这些結論以创造性的列宁主义的方式闡述了我們时代的所有基本問題，因而被載入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會議通过的两个莫斯科文件中。

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人和几个共产党的某些代表，从教条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企图和宗派主义的立場来反对絕大多数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这种信念，他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走上了分裂道路，攻击苏联共产党和它的領導，特别是赫魯曉夫同志，并攻击一系列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領導，包括我們共产党在內。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权提高自己的声音，要求迅速采取措施恢复和加强在共同路綫基础上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結。这种态度在坚决要求尽快召开新的共产党国际會議方面得到了体现。这一會議將細致研究当前世界局势的发展，并由此得出原則性的理論的和实践的結論，然后把这些結論概括到共同的文件中，所有共产党都将从这一文件出发来进行自己的

活动。在會議上并应共同努力来寻求逐步克服分歧和加强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致行动的途徑。

我們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它完全支持苏联共产党在同各兄弟党协商后提出的建議，是代表全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和我們社会主义祖国的劳动人民行事的。根据这项建議，由二十六个共产党的代表組成的起草委员会将于今年12月15日在莫斯科开始工作。我們党将在所提出的日期內派遣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并像过去一样，将积极参加起草文件的責任重大的工作。这些文件将根据1957年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来制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綱領性的綱領。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統一的革命意志和列宁主义的原則性一定会促进在明年举行新的国际共产党會議，这一會議将以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精神来加强世界革命运动在为爭取和平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战斗同盟。

我从自己切身的經驗中認識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同苏联人民的牢固团結以及我們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牢固一致，是我們在爭取和平、共产主义、我們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各族人民的幸福的斗争中的最大信心。因此，捷苏友誼今后也将坚如磐石，它将作为无价之宝珍藏在我們今天这一代人及今后世世代代人們的心灵中。

（譯自1964年8月28日捷《紅色权利报》）

安托宁·諾沃提尼在苏捷 声明签字仪式上的讲话(节譯)

我們双方代表团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及其目前的行动粗暴地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由于大国民族利益、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意走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统一大家庭的道路。

难于理解的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拥有这样的成就的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公然奉行分裂主义政策。如果说他们现在在谈论不仅包括自己，而且也包括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同苏联对抗的第三种力量的话，那么这就是转向了社会主义敌人方面，这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策。

我們坚持必须寻找一切可能来为重新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创造条件。当然，这要在完全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始终不渝地在当代的各项问题上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的情况下进行。

(譯自1964年9月5日捷《紅色权利报》)

牢不可破的友誼的证明(节譯)

《紅色权利报》社論

最近时期以来,中国首領們的分裂和派別活动所具有的性质,使得必須把他們的活动看作是国际共运的一致和团結的主要危险。上面談到的世界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活动积极起来,它們并对古巴、越南民主共和国、刚果和塞浦路斯进行侵略活动,这一切都应算在这种活动的賬上。开初有的人会感到这是严肃的討論,但現在让这种討論中只剩下使敌人高兴的恶毒的反苏攻击。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人的座談,便是这种誹謗运动走到何等地步的惊人例子。

(譯自1964年9月7日捷《紅色权利报》)

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反对沙文主义

尔

中国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論战的庸俗和傲慢以及重要領導人的誹謗和誣蔑——这些特别是資本主义国家駭人听聞的报纸所慣用的——早已透露出中共領導根本无意来克服分歧和解决分歧的問題。中国首領們那样頑固地、甚至很野蛮地来破坏那些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兄弟党代表的會議，又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他們先驗論地拒絕任何共同的磋商和至少要繼續进行二十年“紙上战争”的口号，是一个完全不加掩飾的分裂綱領，是我們运动迄今从未有过的对国际主义的践踏。

还在不久前——在我們获悉毛泽东主席同一批日本社会党人的談話以前——有人会觉得，力图把論战限制为关于基本理論問題的郑重討論并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证明中国宣传家們的論据沒有根据是合理的。但新的文件重新证实了这种想法：目前的中共領導人不主张原則性地去解决問題，他們片面挑起的意識形态的运动，只是为了掩盖与馬克思列宁主义沒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目的。苏共及同它一起的絕大多数党从一开始就提出的停止不体面的公开論战、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領導人在国际論壇上进行会谈的建議，显然曾是最好的途徑。各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独立的原則和它們完全平等的原則是真正的兄弟关系的前提，但是，不能把这些原則理解为：每个党好像只为自己負責，可以不关心运动的共同利益，甚至去損害共同的利益。

两个月前在日本报刊上发表的毛泽东的談話——当时有很长

的时间可以来否定它的确凿性(众所周知,不仅没有否定,相反,八月一日日本的报刊又公布了本质上与毛泽东的谈话相同的周恩来的声明)——使得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不能延期更加明显了。革命工人运动的发展向前推进了许多,以前所必需的中心领导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但是丝毫也没有解除各国共产党所承担的国际主义的义务与保证,和在反对帝国主义、国际战争势力和反动派的普遍斗争中采取统一的步骤。削弱和分裂这个共同的斗争是对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最大的犯罪。

毛泽东的领土要求,他讨好和煽动日本军国主义者反对苏联,他钦佩和赞扬那些曾进攻珍珠港、占领越南、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一直袭击到印度东部的人的“伟大”,他对苏联的骇人听闻的指责——说什么它“占的地方太多了”,他对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离心的民族主义力量所打的算盘,他威胁同苏联算账——这一切是如此荒唐和令人愤慨,以致产生这样的问题,一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怎么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只能用公开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去说明毛泽东所表达的观点,别的东西很难说明它。解释只有一个:这是想不择手段地在摆脱宗派主义者看来没有出路、没有前景的不良的内部局面的别出心裁的企图。逐步发展的经济建设,科学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将最后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与此有关的是维护和平和巩固各国人民友谊联盟的真正方向——这是各国人民在革命中能够取得胜利必须走的唯一的道路,然而,如果它要不丧失自己的成果和损害革命的名誉的话,在中国假革命家看来,这样一条唯一的道路是不能够接受的,甚至认为这是对国际主义的“背叛”。

在论战中,我们党主要是说服中国首领们,使他们相信经济竞赛和巩固不同社会体系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是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奴役的斗争不相矛盾的,革命运动的成功

是不能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战争为条件的。我们将永远认为这是冒险主义的和极其不負責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帮助了想在我们时代以战争来解决問題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今天，当进步的力量和平的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制止由于技术的无限发展会带来灾难性結果的战争的时候，冒险主义在我们的运动中就显得更加危險了。

这一切在討論中都已經談过了。主要是使中国领导人更深刻地想一想，今天能解决世界基本矛盾的唯一可能性是怎样的。我們认为，中国思想家們自然應該考虑到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

現在我們才知道，据說世界分成为地带，苏联和美帝国主义并肩而立，所有其他的国家、所有其他的民族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两个国家的控制，或者至少是部分地受到它們的強力的干涉。我們不敢相信，可是我們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嘴里听到了这样的話，他特別把注意力集中在苏联的虛构的“侵略性”上。

“苏联占有的面积为二千二百万平方公里，而只有二亿居民。”毛說，“該是制止它这样分割領土的时候了。日本占有的面积为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但有一亿居民……”当阿道尔夫·希特勒对世界宣布自己的要求的时候，从柏林也发出类似的关于“生存空間”的說話及对“公平”的同样呼吁。当时这首先涉及到我国的領土。曾流出无数的鮮血和发生无数的苦难，特别是苏联人民，才粉碎了法西斯凶手的計劃。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后确定了边界的地图，并没有画出大家所知道的在侵略史中最无耻的侵略者曾多次引证那种抽象的“公平”，而画的是我們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苏軍和他的同盟者使德国和日本法西斯遭到歼灭性的失敗以及各国人民創造阻止战火复燃的条件的意願——的历史标志。那么，今天主要的問題难道是为了怀疑或者甚至是来破坏这些成果？

自然，历史現在和将来都在不断运动中。但是，什么应该来决定这个运动呢？什么应该来影响它的方向呢？难道这应该是挑衅和努力加剧分歧、煽动仇视和不信任、挑起梦想报复的势力所期望的问题吗？我们将永远保卫与此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即加强信任和和平关系、加强在会议桌旁的慎重和清醒的谈判的道路。哪儿至今还存在着奴役，就需要支持那儿人民为争取自由生活所作的努力，支持他们为争取主权和独立所作的努力。如果美帝国主义者直到今天还在南越驻扎自己的军队，在拉丁美洲国家组织政变，还霸占台湾，这确实应该遭到谴责，这是完全不正常的。这样的情况将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但是，主权的原則与一贯引起領土糾紛、制造边界問題和把邻国的領土并入某个人为的种族整体中去的計劃（这个种族的領袖們現在把它当作特殊的使命，根据使命他們对于历史上形成的本国边界应该感到非常苦恼）沒有絲毫共同之点。人类对于这些計劃是有着非常痛苦的經驗的，不管这些計劃以何种形式出現，人类对它都不能漠不关心。

很明显，日本政府首相池田不得不为毛泽东上了一課国际法，他強調指出，他不准备在領土問題上向任何中間人求援，千島群島問題与北京无关，而与苏联和日本有关。

当然，所有致力于加剧国际紧张局势、想削弱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它們的团结是世界和平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的人，都为中国国家領導人的領土要求而感到无限高兴。某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报刊不仅刊载了毛泽东的談話，而且同时还在談話的旁边刊登了带有挑衅的标题的地图，例如《毛对于波茨坦协定是怎么想的》，这些都决不是偶然的。美国《紐約論壇报》的評論員对这些并不掩盖自己的高兴，他說：“斯大林主义的整个冰块在很多地方已經裂开了，越来越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在裂开的地方逐步滋长起来。”

他預言“欧洲将有巨大的变化”，因为他也相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离心力将要达到頂峰。

如果去考虑中国領袖們关于如果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會議他們就以分裂进行威胁这种詭詐，則是大錯誤。必須筑起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致的牢固堤壩去反对分裂主义，必須高举无产階級的国际主义的原則去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表現。这决不是通过形式的决定去堵塞任何党通往走向革命运动的队伍的道路。而是必須最全面地对中共领导人施加影响，以便使他們的行动符合共产主义原則。

正如赫魯曉夫在星期一的广播電視演說中重申的那樣，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的时机已經成熟了。我們的党也认为，在今年十二月召开由那些有代表参加上届會議起草委員會的、并願意参加这次會議的筹备工作的党的代表組成的起草委員會會議，对这次會議的筹备工作是有益的。

* * *

在最近几天，我們將要紀念第一国际成立一百周年。目前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絕不能掩盖住一百年来国际革命工人运动所发生的巨大发展。但是看起来，与中国领导的分裂活动有关的当前問題要求一切真正忠实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力量特別集中起来。空前巨大規模的分裂活动正在利用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严重錯誤的困难而复杂的过程。这个时期已經是一去不复返地过去了。在彻底貫徹列宁主义原則中——大多数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都走上了这条道路——存在有国际工人运动的新高涨的巩固基础和源泉。国际工人运动虽然可以受到阻碍，使它严重地复杂化，但是不能使它倒退。这一点完全有理由使我們乐观起来。

（譯自 1964 年 9 月 10 日捷《紅色权利报》）

国际會議的迫切性

《紅色权利报》社論

在捷苏联合声明中再次证实了我們党和苏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两党认为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會議是一項迫切任务。我們党支持苏共在同各兄弟党协商后提出的关于由二十六个共产党的代表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十二月十五日开始工作的建議。我們党将在規定的日期派遣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并将像过去一样积极参加各項准备工作。

在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以前，这一准备阶段的結果是十分清楚的。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會議表示贊同，願意积极参加它的准备工作。并表示了自己願意参加于明年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會議的意願。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認識到，只有通过共同行动才能达到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正常化和克服現有的困难，而最重要的是为共运更加蓬勃的发展創造前提。他們認識到，只有相互协商、交流經驗、对所有重要問題的集体討論、恢复和加强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結符合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实质及共产党人今天所面临的任務，这些任务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各共产党和工人党来解决的。

从最后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以来已經四年了。在这期間，世界上的事件繼續有异常迅速的发展。事态的发展一致证实了共同制定的文件中关于我們时代的性质、各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力量今天所面临的新的可能性的那些基本結論。簡而言之：

共同制定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性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

但在过去的时期中，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异常重大的事件和变化。对此共产党人必须以相应的方式予以回答。可以这样断定，即使没有中国首領們所引起的問題和困难，召开新的国际会议也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认为召开国际会议是恢复和加强团结的有效方法。在这方面，在最后一次莫斯科会议上曾通过这一明确的立场和结论：苏共应是在同其它兄弟党协商后的国际会议的召集者。

中国首領們轉入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公开政治斗争，并且示威性地表示，他們准备进一步加剧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就更加必要了。不能闭眼不看，中国分裂者的活动已经长时间来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的损失，今天，除其它外，正是由于中国分裂主义者的政治活动的结果，极右的和最反动的势力的肆无忌惮的行为危险地增加了，并正在增加着。

对中国首領們說来，同苏共和其它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斗争便是一切。在这方面他們甚至走到最荒謬的极端。他們甚至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运动也主要用来表明“苏联的丑恶面貌”。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方面，他們也显然使自己所采取的步骤服从于攻击苏共、苏联和据他們看来是修正主义的其它各党和国家的立场。

中国首領們早就把自己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带入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关系之中。他們走得这样远，比如說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人的众所周知的谈话中，实质上建議德国复仇主义者不要满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向苏联和其它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領土要求。他首先号召日本，并且也号召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反对苏联的扩张同盟。

我們完全贊同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在签署捷苏联合声明时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形势所表示的这一立场：

“很明显，在这些情况下唯一明智和正确的解决方法就是召开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的各兄弟党代表的会议。必须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为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以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为争取团结而斗争就意味着动员革命力量去反对我们的阶级敌人。为团结而斗争就意味着揭露反对我们队伍的团结的分裂主义者。当然，不是采取北京首領們及其某些同謀者的专门使用的謾罵方法，而是根据革命学說和事实来揭露他們。”

大多数兄弟党都理解到，准备召开的会议是必要的，这一会议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将有助于共产主义运动在所有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带有普遍性的根本問題上继续胜利前进，将是交换看法和相互协商的适宜的论坛。但是为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活动深感不安的某些共产党的活动家，表示这一看法：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不召开会议，最先采取初步步骤，以使观点接近起来。他們担心现在举行会议将是沒有益处的。

这种观点无疑出于善意。但是怎样实现它呢？众所周知，已經进行了一系列消除分歧的尝试。然而中共领导人不断拒絕寻找共同途径，以使观点实际接近起来，相反尽一切可能去加深分歧。不仅如此，他們显然从其它党的善意得出他們“軟弱”和自己的地位强大的結論。召开会议，不是为了“开除”誰或是宣布绝对判決。在这个会议上正是要展开实际努力，为克服分歧創造实际条件。它的意义将是积极的。为了使观点接近起来，必須聚会，在原則性的討論中估价共同的基本問題。

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致和它們的共同行动問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說来过去和将来永远是关键問題。只有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致和共同行动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目前，必須严

格地尊重各党所面临的条件和任务的特殊性，考虑对不同问题的各种观点。但这当然不意味着基于健康基础之上的牢固的和真正的国际主义团结的要求，今天不像过去任何时期那样迫切。

如果共产主义运动各个支队按照他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作，或者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或代表至今仍为最终摆脱帝国主义奴役而斗争的人民使彼此分离，并按照这些来建立各种中心，对共同的斗争将是不利的。我们只有一个基本目标，这就是为和平和世界的共产主义未来而斗争。我们只有一个意识形态，这就是永垂不朽的和创造性地发展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各共产党和工人党，首先是这些党的领导人有着特殊重大的责任。只有他们在致力于不断恢复和加强兄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致力于实现基本的、真正的历史目标中的共同行动的时候，才能够担负起这一责任。革命工人运动的光荣传统、我们亲身的经验和实践这样教导我们。

一百多年以前共产党人就在自己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的标题上写下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本着加强国际主义团结的利益去着手准备新的国际会议的。没有疑问，这一会议，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致的革命意志和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将对加强世界革命运动在争取和平和共产主义斗争中的同志般的联盟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译自1964年9月12日捷《红色权利报》）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4年9月21日 在铁托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节译)

有人企图把他們的欺騙冒险政策强加于世界进步运动，硬說和平共处政策不是革命的政策，它意味着投降和同帝国主义妥协。中国領導人的这种教条主义的理解已被生活本身所駁斥，这一点被当前的国际局势所证明。相反，我們所理解的和在实际中所运用的和平共处政策为世界上一切力量的联合、为人民解放斗争的发展、为解决当代其它迫切問題創造了良好的条件。我們所奉行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建筑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同资产阶级意識形态和帝国主义的一切反革命力量不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它灵活地理解和实现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竭尽全力加强世界革命运动。

(譯自 1964年9月22日南《战斗报》)

在兄弟般的团結中(节譯)

安托宁·米哈雷克

一点也不能够怀疑，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裂主义方针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所产生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今天的国际局势。如果我们认为帝国主义没有在竭力利用这些分歧的话，将意味着低估了帝国主义。此外两党代表团在談判結束时所簽訂的声明，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积极活动和中國首領們所繼續进行的分裂派別活动之間的相似之处。中國首領們的分裂和派別活动通过对反帝陣綫的削弱間接煽起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积极活动；中国的分裂和派別活动越来越公开地激烈地反对苏共和苏联；今天已經必須把这种活动当作是威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和行动一致的主要危险。因为例如毛泽东和日本社会党人的談話究竟应为什么东西服务呢？为和平还是为挑起边界冲突服务？为德国人民还是为西德复仇主义者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为它們的敌人服务？为团結还是为分裂服务？

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两党代表团认为，在目前的局势下，在起草委员会中經過准备之后于明年召开的国际會議上，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重新一起商榷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党和其他許多共产党一起坚持这一观点还因为某些共产党表示怀疑，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代表會議是否能够完全成功？是否将只不过是完全分裂的合法化？世界上大多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經表示同意召开国际會議，因为它們恰巧是把国际會議看作是最有威望的集会場所，它能够成功地找到今天局势的出路并制定出进一步行动的最正确的

共同路綫。至于說到我們的各个共产党，它們以自己的全部态度证明了，它們真正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它們还要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根据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以及根据 1957 年和 1960 年莫斯科會議所通过的文件，积极地促使团結的成功。

(譯自 1964 年第 10 期捷《新思想》杂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今天最有 影响的政治力量(节译)

波胡斯拉夫·拉什托維奇卡在紀念
第一国际一百周年晚会上的讲话

在目前时期，抵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左倾分裂机会主义的任务，已提到共产党和工人党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为了国际范围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进行的努力的最前列。与此同时，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必须继续进行。中国首领们为了大国沙文主义的目的，宣布了自己的思想纲领。这个纲领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和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出发，攻击世界共产主义共同通过的路线。进行颠覆活动，竭力把自己的路线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策划不能允许的对其他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分裂活动。

最近几年来，面对帝国主义没有减弱的侵略性，中共领导人奉行分裂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削弱国际主义、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and 世界和平阵线的方针。他们逐步在自己的队伍中扩大这种看法，即趋向分裂的关系发展成熟了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最近几周来，在中国展开运动，反对本国拥护各兄弟党一致的人。运动宣扬分裂是客观规律和事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表现这种思想。

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甚至公开承认，中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建议便是根据一分为二的方法制定的。文章中说，没有原则性的分歧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的，这也就是要

說，中共領導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裂是合乎規律的和不可避免的。

這種死氣沉沉的哲學概念應該幫助中國首領們說明他們進行分裂活動的理由並造成他們是站在客觀發展方面的一種印象。這種哲學是與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完全格格不入的。它實際上是在為過去和將來的一切分裂活動辯解。

在馬克思和列寧的全部理論著作中，我們找不到一點能證明中國分裂分子臆測和論斷的東西。相反，馬克思和列寧總是把國際革命運動的團結置於最高的地位。在推翻資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在實現工人階級的權力的鬥爭中以及在建設社會主義和取得社會主義在世界上最終勝利的鬥爭中，他們認為團結有決定性的意義。

今天已經幾乎在沒有一個問題上，中國領導人和國際革命運動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相背離的。重要的是，中國領導人事實上大大地遠離了世界革命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

如果今天中國領導人按照誰對蘇聯採取什麼態度來區分同情和厭惡，這就是他們對列寧主義關係的內部邏輯的表現。同時，我們把對蘇聯的關係作為主要的問題，可是和中國領導同志有完全相反的意義。在蘇聯存在的幾十年以來，對蘇聯的關係（今天對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和它的團結）是每一個共產黨人的基本準則，這對每一個共產黨人來說都是法律。因此我黨在戰前遵循着它，目前也遵循着它，因為蘇聯對我們來說不是地理概念，而是馬克思和列寧的偉大理想的最高體現，同時，蘇聯共產黨目前的政策對我們來說科學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整個世界革命運動中最先進的先鋒隊活動的結果。

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蘇聯人民將近五十年來的道路是在經濟、政治、軍事以及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中取得特殊的成就和建

設成果的鏈條。

为克服困难和恢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牢固团结的努力，遇到来自中国领导人方面越来越多的新的障碍。现在他们特别是反对通过召开新的国际会议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作的最显著的努力，这一会议将弄清某些不容拖延的成熟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最初迫切要求举行会议，现在他们为了拖延会议，并在实际上阻挠会议的召开而越来越多地堆积新的条件和障碍。他们把事情说成是，召开会议将是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顺利发展的障碍，并事先把准备中的会议的日子称作分裂的日子。

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当共产主义运动在巨大的范围内繁荣起来的时候，在不同的国家中具体条件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正好需要阐明世界革命运动进程基本问题的这种形式。

在1957年国际会议上，兄弟党曾委托苏联共产党，让它在和其他兄弟党协商以后召集国际会议。苏联共产党恰如其分地完成了这一委托。但是，目前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整个运动，并要求首先进行一系列的双边会议，然后再召开多边会议，中国领导人提出预先达到各兄弟党思想上的完全一致作为召开筹备会议的条件。一眼就可以看穿，在中国首脑们今天的方针中这个条件实际上就等于使会议破产。

所以诺沃提尼同志在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时说，必须沿着苏联共产党所通过的以及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所热烈地和完全支持的坚定方针前进。我引用几句：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它完全支持苏联共产党在同各兄弟党协商后提出的建议，是代表全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劳动人民行事的。根据这项建议，由二十六个共产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将于今年12月15日在莫斯科开始工作。我们党将在所提出的日期内派遣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并像

过去一样，将积极参加起草文件的責任重大的工作。这些文件将根据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莫斯科声明来制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綱領性的綱領。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統一的革命意志和列宁主义的原則性一定会促进在明年举行新的国际共产党會議，这一會議将以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精神来加强世界革命运动在为爭取和平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战斗同盟。”

我們全党完全贊同諾沃提尼同志講話中所表达的我們共产党中央委員會的立場。

(譯自 1964 年 9 月 29 日捷《紅色权利报》)

中国人民的节日

米

今天全体中国人民在庆祝自己的伟大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日子。从1949年的10月1日起已过去十五年了，这一天永远成为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上的最重要的分水岭，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也是中国人民新生活的开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下的中国人民长期的顽强的和英勇的斗争中诞生的。中国人民在当时就决定“按照俄国人的道路”领导人民的自己的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长期的革命风暴：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国人民在这条道路上同外国干涉者和国内卖国贼反动派进行战斗，在这条布满数以千计的失败和胜利的道路上，他得到苏联、整个世界进步公众的全力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得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其中也包括我们共和国和我国人民的支持。

在以后的年代中，热烈的同情和兄弟般的援助也伴随着中国人民。饥饿和文盲的国家迅速地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火热地建设着新的、比较公平的社会的中国，一年比一年更迫切地要求发言。古老的、革命胜利前还是半封建的中国，迅速地获得了新的面貌。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下，数以百计的新的工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了，这些工厂不仅成了中国以后的工业发展的基础，而且目前也正促进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倍增。由于工业的这种发展，中国不仅能够生产现代化机器，而且中国人民生活和

文化水平的不容置疑的提高，也是它的結果。

在這方面，蘇聯又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幾年前，中國方面對蘇聯在現代化工業基礎建設過程中的幫助還給予了高度的評價。1959年10月12日所公布的中國領導人致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的信中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同偉大的蘇聯各族人民的兄弟支援和幫助分不開的。”

任何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历史上都不能抹殺這一事實：當中國在世界上還處於孤立、在經濟和軍事上都還脆弱的時候，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有效地促進了它的經濟發展。僅僅在1953至1959年期間，蘇聯對中國工業建設工程的供貨量提高了七倍，在蘇聯的幫助下，建設了二百多個現代化的工業企業。且不談蘇聯專家在掌握生產、培養技術和科學幹部方面給予的幫助以及在蘇聯學習的大學生等。

最近兩年來，中國的國民經濟克服了前幾年在中國所發生的嚴重下降。特別在農業和居民的食品供應方面可以看到好轉。

中國領導人在我們的关系中所挑起的分歧，決不會壓制我們對英勇勤勞的中國人民的友好和尊敬的感情。我們堅信，在我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共同目標中存在着統一的力量。今天我們同中國人民一起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五周年，並祝他們今後在新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和為下一代的更幸福的生活而作的鬥爭中取得新的成就。

（譯自1963年10月1日捷《紅色權利報》）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 友誼和合作是牢固的并正在 順利地发展着(节譯)

安托宁·諾沃提尼 1964年10月2日

在匈捷友好大会上的講話

在根据世界发展为我們提出的这些目标和每日的任务的同时，我們两党（肯定也包括絕大多数的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須譴責中国共产党領導破坏团結、危害革命进步力量、阻碍和平努力并从而在实质上帮助世界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政策。

今天已經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領導的作法不符合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攻击，是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团結的攻击。

过去，革命工人运动曾經经历过各种反对右傾和左傾的斗争。曾出現过形形色色的集团和派別，它們以自己的观点危害了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結。

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坚决地清算了这些观点。而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領導所做的一切既不是意識形态的爭論問題，也不是某种教条主义或机会主义錯誤的問題。討論的方式也同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不相称。

很明显，这是从大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立場出发的概念。从他們所公开宣布的自己的观点来看，这种概念是和革命工人运动的原則完全相违背的。

过去，我們曾从世界上最反动的分子那里听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所公开宣布的类似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一道贊成召开所有兄弟的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国际會議。

我們认为，各国共产党应在这次會議上估价执行 1957 年和 1960 年會議決議的成果；应该以同志般的坦率精神討論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問題；应该討論国际局势的主要政治問題；他們应该得出必要的結論，以便建立起各个共产党共同的思想基础，各个共产党将在自己国内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把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在共同會談以及共同声明中我們两党证实了在所有这些基本問題上观点是一致的，并坚决全力加强共产主义世界力量的团結。

（譯自 1964 年 10 月 3 日捷《紅色权利报》）